

毛泽东和他的



毛泽东之前的中国历史
走向权力

一个反抗者的诞生
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从造反者到统治者
延安时期

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权力矛盾

分歧者

1966——1976

毛泽东的长江之泳
上海，一个激进的城市
武汉事件

“文化大革命”冲击香港

毛泽东对红卫兵采取行动
党的“九大”

刘少奇的最后岁月

林彪的覆灭

衰落的年代

毛和周的对立面

政治钟摆的反复

权力斗争公开化

总体概观

毛泽东：神？人？或是怪物？

审判“四人帮”

毛泽东反对过的十个主要人物

[英] 克莱尔·霍林沃思 著
高湘洋 尹 赵 刘晨璐 译

河南人民出版社

毛泽东和他的分歧者
[英] 克莱尔·霍林沃思著
高湘泽 尹赵 刘辰诞译
高泽湘审校

责任编辑 夏晓远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32开本10.875印张 267千字

1989年4月第1版 1989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0,000册

ISBN 7-215-00596-8/G·65

定价4.00元

译 者 序

“毛泽东”对于现代中国，乃至世界都是一个响亮的名字。因为，他的一生，曾经影响甚至主宰过中国的命运，并且今天依然对中国人民的理论和实践发生着重大影响。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人杰出的领袖和代表，是现代中国最伟大的革命理论家、战略家和政治家。正是在他和以他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正确领导下，经过全国各族人民的艰苦奋斗，中国才摆脱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悲惨境地，中华民族才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和国防事业各方面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但也是由于他晚年的严重错误，导致中国人民在某些方面付出了本该小得多的代价。总之，毛泽东的一生，“不论胜利和失败、贡献和错误、理论和实践，都是中国历史、中共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①都密切关系到现代中国社会的发展演变，关系到中国人几十年来的悲欢祸福，甚至塑造了几代中国人的人格深层结构。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很难设想一部没有毛泽东的中共党史、一部没有毛泽东的中国当代史会是什么样子。因此，对毛泽东这位历史伟人一生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和教训进行研究、总结，

^① 李锐：《关于毛泽东晚年的思想和实践》，载《光明日报》1989年2月2日第三版。

EG 12/05
就不只是一个具有史学意义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有重要现实意义的问题。

作为一位历史伟人，毛泽东一生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和教训，是一个由多侧面、多阶段构成的复杂而又有统一性的辩证整体。对于这个整体，在实事求是的前提下，人们既可以且必要做全过程、全方位的研究和总结，也可以且必要作阶段性和特定角度的研究和总结。如果为毛泽东作政治传记，那么，就可以且必要有“全传”和“侧传”之分：前者对毛泽东一生政治活动做全过程加全方位的考察、记述，它的长处在于全面；后者则只着重于考察记述毛泽东政治生活某个侧面的全貌，它的长处在于专门、详细。早在毛泽东同志生前，国内外就有了不少毛泽东政治传记类的著作，且不乏力作。但是，由于这些著作是在毛泽东生前成书的，因而客观上就不可能是对毛泽东一生政治理论和实践全程的考察和记述。毛泽东逝世后陆续出的一些同类传记，基本上弥补了这个“过程不全”的缺陷。不过，总起来看，到目前为止，所有的同类传记著作，大都属于前述的“全传”类。专门比较详细地研究或记述毛泽东政治理论和实践某一侧面的“侧传”，十分鲜见。比如，毛泽东与中共党内历次重大矛盾斗争（即毛泽东说过的所谓“党内十次路线斗争”及我党我国人民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斗争）的关系，就是毛泽东一生政治生活中一个极为重要的侧面。专门、详细、深入、科学地研究和记述这个侧面的全貌，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这无论对于我们研究中共党史，还是对于我们更好地发展社会主义改革实践，显然都是一个亟需补上的工作。基于这种认识，我们翻译了英国女作家克莱尔·霍林沃思的这本《毛泽东和他的分歧者》。

二

克莱尔·霍林沃思是著名的英国政治新闻作家，由于她首先报导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新闻（1939年9月1日）而扬名于世。她长期担任英国《每日电讯报》记者，负责报导国际政治、军事新闻，曾多次访华。1973—1976年曾任该报驻北京记者，其间曾多次会见和采访过我党、我国高级领导人。作者现在香港大学任教，同时兼任香港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

在本书中，作者以一名记者的敏锐眼光和独特的思维方式，在占有大量亲身采访的第一手资料并从有关研究毛泽东和中国问题的论著、文献中吸收大量有价值的资料的基础上，从社会历史、思想文化、生平经历、政策主张等方面分析了毛泽东和他的分歧者，观察、研究并叙述了中共党史上所谓的“十次路线斗争”。它对于我们了解和研究毛泽东以及这段历史很有参考价值，至少它可以使我们了解到一个较少偏见的外国记者是怎样观察、分析毛泽东以及这段历史的，从另一个侧面启发我们的思路。

综观全书，它最大的优点在于资料丰富，这除了上面提到的原因外，还由于本书成书时间较晚（1985），因而使书中得以包括毛泽东之后中国人民对“四人帮”的审判材料，这无疑是本书优于它以前同类书的一个显著特点。

本书的另外一个优点在于，作者用以观察、分析、记述问题的基本方法是比较科学的，态度也是比较客观的。这主要从以下三点体现出来。

第一，作者重视从毛泽东所处的具体历史环境和毛泽东当时当地所面对的历史任务来说明毛泽东的所做所为。对毛泽东在中共党内历次重大矛盾斗争中所充当的角色以及与其他当事人的关

系，不是象西方许多人和同类著作那样仅仅归因于个人的品质、个人的权力和意志，而是将其置于中国复杂的历史和现实环境中去记述和分析。书中对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的起因的分析和记述充分表现了这一点。作者认为，毛泽东之所以错误地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政治运动，除了权力等问题上的争执，除了毛泽东个人作风上在后期越来越不善于或不愿意听不同意见之外，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毛泽东对当时中国社会及中共党内实际情况的认识有误，在于由此错误认识产生的善良而又根本不着边际的使命感。作者指出，当时毛泽东认为在党和国家机关内部，特别是在党和国家高级领导层内部，“正在形成”一个政治上“走资本主义道路”、工作作风上官僚主义、个人生活上腐化蜕变的“特权阶层”，认为中国因此正面临着象苏联赫鲁晓夫时期那样“变修”的危险，为了“挽救革命”，必须通过有全国亿万人民群众参加的政治大动乱，来乱掉这个“特权阶层”，推翻“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且认为这样的政治大动乱应该每隔七、八年就来上一次。作者的这种看法，与我党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有关问题的看法基本一致。这对一个西方作家来说是难能可贵的。再比如，毛泽东建国后在国家行政管理与国民经济发展等问题上曾有过一些错误见解，并基于这些错误见解而错误地批判处理过党和国家的一些领导人（如彭德怀、刘少奇等）。在本书作者看来，导致毛泽东这些错误的，主要也是思想认识根源而不是个人品质问题。至于具体的思想认识根源，作者认为是由于毛泽东头脑中缺乏用经济手段管理社会和国家的观念，并且由于毛泽东本人对现代社会经济活动的一般规律缺乏足够的了解，对当代世界现实缺乏足够的了解。作者还认为这同毛泽东受当时历史条件限制、个人阅历和知识面不够宽广有关。例如，作者指出：“对如何用经济手段管理国家明显不感兴趣，这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明毛泽东后来犯错误的原因。之所以如此，无疑与他拒绝出国有关，而且与他压根儿就没有受过这方面的训练有关。”根据作者在重大问题上的比较科学的见解，毛泽东与其他当事人的矛盾斗争不是什么个人权力之争，而是一种革命家责任感的矛盾表现。

第二，在对毛泽东以及其他有关当事人的个人功过是非的评价上，作者的看法也体现出历史地客观地观察问题的方法。作者一方面直言不讳地指出毛泽东的失误（如建国后没有始终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国家经济、文化、国防和民主政治建设上，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急躁冒进，“大跃进”运动的失误，“文化大革命”问题上的严重错误，以及在接班人问题上对林彪、“四人帮”的轻信、误用等等），另一方面又比较如实地肯定了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如在最后的总结中，作者认为：“作为一个伟大的叛逆者，毛泽东继承了中国古老的游击战思想，用之于20世纪的中国，同时又对马克思主义加以创造，使之适合于他那独具特色的中华民族的政治纲领。因此，他的名字无疑将永垂不朽。他推翻了腐朽的蒋介石政权，使四分五裂的中国重归统一，因此，毛泽东还将作为伟大的民族英雄永远活在世人们心中。”另外，作者对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朱德、彭德怀等人对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巨大贡献，对他们卓越的智慧才能和优秀品格都表示了钦佩和肯定的态度，而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则表现出明显的贬斥和厌恶。

第三，作者科学的、客观的记述和分析告诉我们，凡是共产党领导人的思想主张符合中国国情，能够竭诚团结、独立自主创造性地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就取得成就和发展；反之，凡是党的领导人的思想主张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并且领导者个人专断，把别人与自己在某些思想、政策乃至工作上的分歧轻率武断地上升到路线斗争高度、动辄发起政治运动开展批判斗争，就必然破坏党和革命队伍的团结，从而造成决策的重

大失误和混乱。在作者着重记述的建国后的这段历史中，这一点表现得比较明显，至于“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灾难性的大动乱，更是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三

在肯定本书的价值和长处的同时，也应该指出，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认为它是一本权威的有关毛泽东的论著，更不意味着我们毫无保留地赞同书中的所有观点。本书作者是一位记者，而不是一位政治学家。在本书中明显表现出记述优于分析；在记述分析中有时显得感情胜于理智。书中的有些材料、有些表述，明显地表现出作者的这种局限性。这不仅表现在作者掌握的一些材料中对人物、事件、地点、时间缺乏考证，多有不准确之处，而且更表现在作者比较热衷于“传闻”，掺杂“传闻”对某些问题加以联系、推论或推测，这便使本书的可信度打了些折扣。这种局限性不仅造成了本书一些细节上的错误，而且使得作者对某些大的事件产生整体性的偏颇。如对高岗，作者只是着重强调中苏矛盾和对国内工业管理体制上的意见分歧，而忽视乃至无视许多已知的可信材料，只字未提他的非组织活动。对于这些问题，我们认为有必要明确指出，但同时也应说明，只要作者不是蓄意编造或歪曲，我们也不必苛求。对于书中具体叙述失实和不准确的地方，我们尽可能加了注解。但是尽管如此，可能还有些尚无定论的问题和我们没有发现的不准确之处，这些还需要细心的读者注意分析、鉴别。

高湘泽 一九八九年二月

前 言

我的中国朋友曾不无惊惧地对我说：有许多人因为同外国记者及外交人员交谈而遭到囚禁。这位朋友是中国政府的一位官员，我们的谈话，后来被当作“查塔姆宫章程”(Chatam House Rules)在伦敦广泛流传。参与那次座谈或访问过那次座谈会的人，只要不透露在那次座谈中提供消息的人的名字，都尽可以利用从那里得到的消息。

不少记者在访问北京回国后，靠背叛他们的采访对象而成为名噪一时的人物。一提到这样的记者，我的中国朋友就恨得咬牙切齿。其实，和现在一样，大多数中国人以往在与他们那些“好奇的”朋友们谈话时，一直在谈话内容上很谨慎。不过，偶尔也有那么一些时候，当政治和人身迫害加剧时，他们也会变得无所畏惧。1976年上半年，就出现过这种情况。当时正是周恩来总理在元月份逝世之后、唐山大地震发生之前——这次地震预兆了同年9月份主席久病缠身的状况结束。

许多人当时都想告诉外国人有关邓小平第二次遭贬的内幕：邓这次遭贬，是早在1976年4月5日天安门广场清明节示威活动之前就发生了的事。在那次示威中，示威群众高度颂扬已故的周总理，对邓小平报以热烈的拥护。我的中国朋友们当时几乎都相信“四人帮”将在毛泽东主席去世后取而代之。他们说，江青当时实际上已经开始使用主席的手章和印玺——这种印章，在中国被视为象西方的签名一样具有权威性。

我的这些中国朋友诚恳地表明：他们希望全世界都了解已故的周恩来总理在内政外交上曾起过多么明智、多么有远见的作用。他们担心周总理的支持者会在邓小平遭贬之后受冷落或境遇更惨。有些人因此惶恐不安。记得有一次夜里，我在一个秘密地点冒着寒冷等待和一位朋友碰头，结果他未能按时到来。后来见面时他告诉我一些惊人的消息，这些消息有不少都在随后对“四人帮”的审判和其他事件中得到了证实。

无疑，1976年，摆脱了禁锢的舆论担心林彪这个“叛国贼”早先与苏联的密切联系，这种联系是20世纪30年代林彪在苏联停留的那三年半中建立起来的。许多人认为，直到1971年林彪军事政变失败为止，林彪与苏联的秘密联系从未间断过，而且还偶有小阴谋活动。这些阴谋家以为，当他们从南边发动进攻、在南京另立中央的时候，苏联人会从北边与他们配合，夹击中国。

江青拍摄的一张照片，暴露着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林彪的秃头。这张照片向中央委员会和外交使节们透露了这么一条信息：在毛泽东和林彪之间，关系已经全僵了，因为除了擦额头上的汗，林彪是从不摘下头上的军帽的。在人们的心目中，江青是一位肆无忌惮、恣意妄为、权欲极盛的女人，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备受折磨的人们，早已对她深恶痛绝。

在毛泽东的晚年，他一直为那十个领头反对他的人感到恼火。他认为这些人领导的反对他的运动是有预谋的、以破坏他的政治和人事权力为目的的。他经常提到“有关我们的路线问题的十次斗争”——其实，这些“路线斗争”，不过是在有关的政策和领导问题上的重大意见分歧而已。

我在这本书中，都是用现在中国人通用的汉语拼音方式来称呼中国人物的，只有少数人名地名，对外国人来说用以往的拼音比用汉语拼音更熟悉些，所以未使用汉语拼音方式，而沿用英文拼音方式，例如北京——“Peking”，香港——“Hong Kong”，

孙逸仙——“Sun Yat—Sen”，以及蒋介石——“Chiang Kai—Shek”。

许多人在翻译方面为本书提供了帮助，也有人对本书原稿的修改提出过建设性建议。在我原先驻北京的日子里，驻华大使、已故的约翰·艾惕思爵士(Sir John Addis)曾给我以极大的关照；事实上，他的僚属们对我亦是如此。大卫·布鲁斯(David Bruce，已故大使，首任驻北京联络官)和他的夫人伊万杰林(Evangeline)和他的继任者、美国现任副总统(“现任”是指作者写此书的时间。本书中译本与读者见面时，原先的副总统已是总统了——译注)乔治·布什(George Bush)，这些人都给我以很大帮助。法国驻华大使、加拿大驻华大使，以及澳大利亚、新西兰、阿尔及利亚、伊朗等国的驻华大使，也都不吝赐教，与我交换看法。而且在交换中，他们给我的帮助比他们从我这里得到的观点要多得多。

当我不在中国工作的时候，伊丽莎白·赖特(Elizabeth Wright)和大英中国中心的官员们都非常支持我的工作。自从我1981年年初来到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工作以后，爱德华·陈博士(Dr Edward Chen，研究中心主任)和S·S·K·秦先生(S·S·K·Chin)都为我提供了难以估价的咨询和帮助；历史系的玛丽·特恩鲍尔(Mary Turnbull)教授和罗斯玛丽·奎斯泰德(Rosemarg Quested)博士同样如此。香港前总督、现在的麦克尔霍斯勋爵(Lord Maclehoze)、副校长雷逊·黄(Rayson Huang)博士，也给我以鼓励和帮助。

我由衷感谢帕梅拉·雷蒂·埃格丽蒙特(Pamela Lady Egremont)。在我长期旅居中国的时候，她向我提出过许多精明的劝告，为我作了坚韧而耐心的工作。对于伊莱恩·罗布森—斯科特女士(Mrs Elaine Robson—Scott)，我也由衷表示感谢，她不辞辛劳，帮助校正了本书的一些证据。我在中国国内外的许多

同事和朋友，也曾慷慨賜教。其中包括尊敬的威廉·迪茲爵士（William Deeds，〈每日電訊報〉編輯）和他的同僚。自不待言，書中的結論是我自己的結論，與上述這些杰出的學者、記者和外交家們無關。

导 论

——毛泽东之前的中国历史

有文字记载的中华文明史，大约比埃及历史晚500或600年，大致与古代克里特岛上米诺斯文化的兴起同时代。的确，华夏民族是最先在黄河流域制作无孔上釉陶器的民族。而且几乎和埃及人于公元前2500年左右在尼罗河边的沙漠上修筑金字塔同时，华夏民族就已发明了日历。但是，除了大河流域的古代文明之外，中国在地理位置上的封闭性也是举世罕见的。

中华民族自称已有4,000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而且在公元前221年的第一位皇帝统一华夏之前，就已在文化和教养水平上达到了很高的程度。用畜力耕田是在公元前4世纪出现的事，与此同时，也已开凿了许多运河以利贸易和“占领”人口。这些运河的开凿最后又造成灌溉之利，并使更广阔的地区得以农垦。

在军事技术方面，铁器的使用比欧洲早了1000年。石弓的发明在中国也比在西方早了几个世纪。

最著名的中国学者之一是孙子，他在公元前六世纪末曾写过一系列兵法论著。孙子对整个中国历史都有着深刻的影响，而且对日本的军事思想亦影响颇深。他也是毛泽东战略理论的基本来源之一。孙子的学说认为：作战包含着远比士兵之战更多的因素；战争中的道义、理智和环境因素，远比肉体因素重要得多。他告诫“君王和统帅们”不要单纯依赖军事强力。

孙子坚信，最成功的将军是那些从不无的放矢的将军。他认

为“虚张声势”的作法是军事行动之必不可少的伴随物，而且还勾画了一套有关心理战的纲要性理论。

在孙子生活的年代，就已经有一些小国家开始修筑长城，以此作为防御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屏障。秦朝的第一位皇帝（秦始皇——公元前221—公元前210年在位）把这些零散的防御工事中的某些段落连接起来，使之成为一道连续的屏障，它东起渤海之滨的山海关，西至黄河的弯曲处，西南延伸到兰州。到了汉朝（约公元前206—公元220年），又把长城西延到新疆省境内，为在中亚进行军事竞争提供根据地，更重要的还是为了保障他们的移民、粮仓和古丝绸之路上的交通。最后，也可能是最主要的长城修筑者，可能是明代的皇帝们（公元1368—1644年）。

另一位著名的中国学者是孔子，他比孙子稍晚些，生于公元前552年。孔子对中国的影响，恐怕比其他任何一位个人对中国的影响都大。自从被从他的国家鲁国（今山东境内）驱逐出来以后，他率领他的门徒周游列国，宣扬封建原则，竭力把这些原则制成一种有关“社会公正和和谐关系”的哲学学说。他到处鼓吹他的伦理价值准则，特别鼓吹要人们尊敬国君和家长。孔子直到临死生活都很贫寒，他的一生无疑是失败的一生；然而，他死后却常常被人们尊为不戴皇冠的中国帝王。他的说教在他死后一直对中国社会发生着影响，甚至在20世纪的中国，仍然在发生着影响。必须强调的是，孔子的儒教是一种伦理和政治思想体系。它在很大程度上无视人神之别、俗教之别及政教之别。

道教在对中国的影响上是仅次于儒教的第二大学说。它产生于公元前479年孔子死后不久，但直到公元前3世纪传说中的老子写下《道德经》，道教才有其文字记载的史料。它的核心原理就是“无为”；同时，由于它呼吁人们返回大自然、返朴归真，所以对儒教起了一种抵销作用。自古以来许多有教养的中国人都并不认为儒道两种学说势不两立。许多官吏在官场上是儒教信徒，

回到家里则成了笃信道教神秘说教的人，企图与天同道。在自古以来的中国历史上，道教对国家政事很少影响，但却对中国的诗歌和绘画影响深远。

当欧洲文化逐渐发达并从希腊转移到罗马和西欧时，中国则因为受海域和“蛮人”的包围而与外世隔绝。确实，直到大约公元前2世纪中国的丝绸被带到希腊为止，此前的中国一直是闭关自守、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不相往来的。

用中国古代的平底船运出来的丝织品，有的被送到了波斯湾，有的通过位于现今婆罗洲或仰光的原始驿站而抵达红海。随后再被销往亚里山大里亚港或土耳其港。但是，从公元前1世纪直到罗马帝国的覆亡，只有帝国中的上流社会的贵妇人们才穿戴丝绸。另外，相当大一部分贸易品和一些好学的旅行者，都是从陆路上通过波斯，取道阿富汗，穿越通往吐鲁蕃、兰州和西安的沙漠跨越亚洲的。也有人由于地方条件的原因，通过其他种种途径跨越亚洲，如有些人走到了喜马拉雅山以南。

与拜占庭的丝绸贸易，是在公元552年因当时某个僧侣或更可能是一批僧侣、工匠和商人设法把蚕偷运出中国而衰落的。最流行的传说中说有一位教士把蚕卵藏在空心十字架中带出了中国。但是，这些珍贵的生物也可以被藏在瓷碗中或夹在皮革中被带到罗马。

在此之前，佛教已传入中国，最初是通过商人、随后又通过僧侣们经由丝绸之路将其传入中国。当时大约是公元初年。佛教从乔达摩（即释迦牟尼——译注）的学说中发展而来。乔达摩生活在印度北部，大约与孔子同时代。丝绸之路上的佛教寺庙，为旅行者们提供了遮风避雨之所；下榻这里的旅行者，利用佛寺从事商品交换，用实物或黄金换取当地的通货。此外，诚实的和尚还为那些将从事危险跋涉的旅行者们寄存金钱财宝。所以人们现在称丝绸之路上的和尚是“国际金融业之父”。

到公元4世纪时，佛教已不仅成为中国艺术生活中的一个很活跃的部分，而且成为中国宗教生活中的一个活跃部分。这种状况最初在北方特别突出，随后又传延到南方。公元8世纪是佛教在中国最兴盛的时期。它迎合了民众日益增长的对来世生活的希望，同时又使他们的现世生活具有虚饰的壮观。另外，僧侣们还会行医治病。佛教给妇女以男女平等的说教，因而它又自然会鼓起广大女性的信念，因为她们已对孔夫子有关家庭中男尊女卑的说教感到厌烦。

虽然基督教徒也曾涉足丝绸之路，但在公元7世纪和8世纪引起过许多宗教皈依现象的却是在公元6—7世纪间传入中国的叙利亚景教徒，例如西安博物馆中的石碑就记载了这一事实。基督教实际上是在公元841—845年间的宗教迫害时期被驱逐的。

科学和技术的大发展，其中包括在公元660年左右引进的铁索桥建筑术，使得唐王朝（公元617—906年）能够实行扩张。历代唐朝皇帝征服了包括朝鲜在内的整个满洲，征服了新疆，甚至渗入西藏，西藏的王子就曾“娶”了一位大唐夫人。

在整个以往的中国历史中，皇帝都具有神圣的权利。皇帝是“天子”，他死后将“乘龙车去天上作客”。每逢干旱或水涝灾害，他就命其大臣们去祭天。而且，尽管在漫长的世纪中也有些例外情况，但总的来说，皇帝也允许他的臣民保持他们对佛祖的崇拜和信奉道教或甚至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只要这些信仰活动不越出宗教事务的范围。

只有一位女人，即唐王的遗孀、女皇武则天，曾经使用过“天女”这个称号，而且从公元684年到公元705年一直统治着唐帝国。中国的历史学家们在传统上都反对妇女当政；因此，霍齐亚·莫尔斯在1907年写道：所有的编年史家们都争先恐后地往武则天身上倾泼污水。

在公元前2世纪初，汉朝的第一位皇帝的皇后就曾经在皇帝

在位时起过重大作用，并对他那傀儡儿子的行政事务起过重大作用。事实上，她当时控制了整个帝国。据说，她控制国事所用的方法与皇太后慈禧太后控制国事所用的方法一模一样——这位慈禧太后的当权时间恰好大体上与维多利亚女王当政的时间平行。

在历代中国王朝中，唐朝是很少几个对外国人持欢迎态度的朝代之一。它的首都长安——即当今的西安——成了来自阿拉伯、波斯和叙利亚的学者们聚会的场所。第一位来华的基督徒就落脚在西安。另外还有许多外国来客，比如印度的魔术师、骑马或骑骆驼的杂技演员，等等。事实上，在公元8世纪，西安已有4000多个外国家庭。

公元845年，朝廷突然惊觉到：为数众多的僧侣最终可能对中国的社会基础本身造成威胁。因为朝廷担心会有太多的人为逃避兵役和官差而遁入教门。于是，在事先未加警告的情况下，有4,500座寺院遭到破坏，260,000僧人和尼姑一夜之间被迫弃教还俗。外国侨民遭驱逐，来访的外国人也都受命返回本国。

公元9世纪更重要的发明是火药的使用。火药的发明最初在公元850年左右，尽管直到公元919年火药才被用于军事。起初是把火药制成手掷弹或炸弹，靠抛石机来发火。后来火药被改造成适合许多种发射器发射。在此期间，中国还发明了西方人不曾知晓的武器系统——即弓弩炮，其构造是在一辆车架上绷有许多弓弦，可以同时发射许多支箭或弩。中国古典文学、中医药事业及数学研究，在初唐时期也同样取得了惊人的发展。宋朝——它是在唐朝灭亡、经过一个半世纪的动乱后出现的一个朝代，发展了茶叶种植业，改进了瓷器制作技术。在宋朝时期，文学和绘画不仅在达官贵人中间得到进一步发展，而且在越来越多的商贾和初生的资产阶级那里也得到了蓬勃发展。

然而，宋朝从前人手中继承下来的坚船利炮，并未能使宋朝

免遭被蒙古人推翻的厄运。蒙古人于1215年攻占了北京，并在最后一位宋王于1279年的一次海战中被杀死之后，确立了对全中国的统治。事实上，蒙古人统治的区域非常广阔，西到布达佩斯，东到广州，包括波斯湾的巴士拉（今伊拉克的一个港口——译者注）。通往中亚的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安全了；于是，学者和商人又大批涌入中国。因此，也就有了威尼斯人马可·波罗在中国为官17年的事情。

明朝时期，基督教徒曾试图再次渗入中国——明朝在公元1368年左右推翻了蒙古人的元朝统治，继承了宋朝的传统，其统治时间延续到1644年。但是，芳济各会的修道士们取得的成就并不比600年前景教徒所取得的成就更大。

虽然外国人——特别是著名的意大利耶稣会会士马特奥·里奇（Matteo Ricci）——对中国科学知识和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的秘密社团——它已成了中国一个传统的麻烦——还是发动了一场民族狂热迷信运动，这种运动最后发展到了要摆脱外国人的影响。

当儒教再次赢得思想障地的时候，当中国的贵族绅士们渗入自蒙古人征服中国以来一直由蒙古人控制着的国家行政管理事务之中的时候，这种排外的运动也就得到了其他致力于驱除蒙古人的秘密社团的支持。1383年，明朝在南京建立了明王朝的首都。

新的王朝又开始了新的海外开发、贸易和征服时期。由63只中国平底船组成的远洋船队，曾经抵达帕拉塞尔和斯普拉特利群岛（即我国的西沙和南沙群岛——译者注）、环礁湖以及西太平洋、东南亚和印度洋的其他国家，并且带回了巴邻旁（即今天印度尼西亚的巨港——译者注）和锡兰（即今天的斯里兰卡——译者注）的国王来向明王朝拜。欧洲的贸易商这时也开始抵达中国的海岸：大约在1534年左右，葡萄牙人在澳门落脚；1637年，第一支英国航海船队抵达中国。在此期间，俄国人曾企图通过西伯利亚抵达

中国，但却失败了（不过，他们后来逐渐征服了西伯利亚）。西班牙人当时已占领了菲律宾的一部分，他们从那里运书到广州，而且由于把墨西哥的银元引进中国商业之中而与中国建立了贸易关系。

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最后于1699年在广州（当时中国最繁荣的港口）建立了一座工厂。几乎过了一个世纪以后，由杰出的、富有经验的麦卡特尼（Macartney）爵士率领的外交使团抵达北京，试图进一步扩大已经相当可观的中英贸易额，同时谋求与朝廷建立外交关系。82岁高龄的皇帝四次接见了麦卡特尼，但他却始终没有机会与皇帝进行实质性的讨论。尤其是皇帝拒不批准放他当礼物带给皇帝的热气球上天。这位皇帝在给乔治三世的信中就表明了他的态度，这封信今天很值得加以研究。

在那封信里，中国皇帝表示不可能允许外国使节驻留在他的朝中，并且表示：凡属可能为贸易活动提供的便利条件，都已在广州付诸实施了。此外，他还表示：“吾朝高尚尊贵的美德已遍及天下，……我们什么也不缺少。朕并不认为陌生的精巧玩艺儿有什么价值，你们国家的制造品对朕毫无用处。”皇帝在这里的口气，似乎是把乔治三世当作仆臣对待的。麦卡特尼对中国皇帝的自以为是感到困惑；不过，虽然他的外交使命失败了，但他却带回了大量的有关中国的信息。

贸易扩大了，而且，自从日本宣布对外开放以后，中国要再想控制欧洲人也越来越难。按照1842年鸦片战争后签订的条约，中国的5个港口开放对外贸易，香港岛也变成了英国的殖民地。然而，这次战争使中国蒙受了百年耻辱，使中国人不得不从百年前的起点上起步。中国人在公元13世纪为制造手掷弹和爆竹而发明的火药，现在却成了外国人用来使中国丢脸的工具。

明朝因其防务、砖铺的大路、假山花园、桥梁、寺庙和圣祠而令人瞩目。在明代，有500多座城镇得到彻底翻修。最后，明朝

的官僚机构变得过分庞大和专权，到了1469年，全国已有80,000名军官和100,000余名文职官员。结果，宦官和儒生之间的权力斗争导致了明王朝的覆灭。明朝的最后一位皇帝自缢之后，满族人就成了中国的统治者。一旦满人入京，就没有什么力量可以赶走他们。这样，1644年，清朝宣告立国，并且直到1911年诞生第一个共和国，清朝的统治才告终结。

中国道路对外商开放、在中国沿海建立由欧洲人掌管的港口和地区、以及最后的排外运动和比以往更强有力的秘密社团的兴起，这些都是在明朝时期就已开始了的事。同样重要的是，紧步探险者们的后尘，征服者和商贾们也都涌入教会之门，其中许多人对于巨大的官僚政治机构在科学、文化和医药方面的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

清王朝统治中国期间，中国的人口出现了戏剧性的增长速度，从1600年的大约1亿5千万人口增长到1727年的3亿人口。到了1850年，中国人口已增长到4亿2千5百万。这种增长的结果，导致出现了大规模的穷苦移民，特别是沿海地区更为突出。移民的去向主要是移往已在印度支那、缅甸和菲律宾建立起来的华侨居住区。人口的增长超过生产的增长。这一事实加上连续不断的来自欧洲人的压力，最后激发了预料中的反抗朝廷的斗争，这种反抗采用的仍是传统的方式。然而，当新的农作物——包括玉米和烟草——被引进中国，国家粮仓重新充实起来的时候，当小规模丝绸和陶瓷工业纷纷涌现的时候，局势又得到了缓和。

其时，俄国人已征服了西伯利亚。这时，对满清王朝的威胁不只来自俄国和从南方过来的欧洲人及日本人。从法国大革命中兴起的新的政治意识形态这时已不仅对新兴的资产阶级发生了影响，而且在学者和士兵中间也产生了影响。有关已被日本人采用的欧洲科学技术的价值的争论，把清政府的官员分成了不同派别。与高度评价这些科学技术的一派相对立的一派，人数仍然很多，势

力依然很大，他们认为中国应当明智地避免采用这些“蛮人”的新玩艺儿。

基督教的传入也引起了一些麻烦，这些麻烦在太平天国起义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尽管是令人遗憾的作用。这次起义的倡导者是一个村庄的小学校长洪秀全——他是一位从中原移居华南的“客家人”——与一个卖炭的人、一个失业的苦力及一位富有的地方绅士组成的“拜上帝会”。这个小集团与古时三结义式的秘密社团有很多共同之处，它组织了一场以推翻异教神和摧毁寺庙为目标的宗教运动。这场运动的政治色彩很浓烈，很快就转变成了公开的反清起义。到1851年为止，起义者们已占领了南方的大片地盘，并在南京建立了他们的首都，洪秀全在那里宣告自己是皇帝或“天王”。

虽然太平天国要打到北方、攻占北京的愿望失败了，但它对南方的控制权却一直维持到1864年，其实行统治的政策以土地改革、人人平等、妇女解放（包括废除缠脚习俗）为基础。作为反抗满清的一种姿态，起义者们都剪去了他们的辫子。

曾经有过一段时间，外国人、领事人员及商人们无法确定究竟该支持起义者还是该支持北京政权。当起义蔓延开来以后，英法政府的顾问们认为这是向清政府施加压力的一个好机会。于是，1860年英法联合采取的军事行动导致了火烧北京的圆明园。英法联军行动的结果是签订了一个条约，这个条约允许十一个港口对外开放，允许外国侨民在华拥有许多特权。

太平天国起义因内部的腐败而受到削弱，最后被皇帝的支持者们扼杀了。但是，由此造成的下述事实却对中国大众发生了长久的影响：奴隶得到了自由，妇女在理论上被承认有平等权利，并且引进了有欧洲味道的生活方式。

尽管有数以百计的秘密社团在活动（这些社团中的大多数最初都是畏惧或憎恨外国人的），但许多新兴的中国中产阶级则迫

切希望象日本那样引进西方的技术。其中有些人尤其渴望把欧洲的技术方法用于发展军事工业。有些人则认为经济虽然增长了，但却落到了外国人手中，并且认为随着茶叶种植业的发展和稻米生产的增加，农业正在变得特别有害于小工业或家庭手工业。

因为大权独揽的慈禧太后的原因，为引进西方技术而作的努力普遍遭到了挫折。慈禧太后的宫廷政治生涯始于1860年，直到1908年死去才告終了。在这48年中，她有37年拥有绝对的统治权。自从作为一名正值豆蔻年华的妃子进入皇宫以后，她便以皇帝的智囊顾问的身份表现出自身的价值，因为，几乎与所有的女人和宫廷中的不少男人不同，她是一位有文化才能的人。此外，她的运气也很好，为皇上生了唯一的一个王子。

虽然慈禧太后的父亲因在太平天国起义时的“逃跑行为”而被“查办”，慈禧本人却在派谁去镇压太平军的问题上给皇帝出了一个很好的主意，这位被派去的将军后来终于打败了起义军。那些见过慈禧的西方人都赞赏她的魅力和文化，但她同时也是一位野心勃勃、肉欲极强的人。

1898年，一批觉悟的学者曾设法说服皇帝在国家政事上实行日本已实行过的一些非政治性的改革。太后不赞同已经开始的改革。结果皇帝从此以后一直作为囚犯，在故宫度过了余生；而那些思想进步的学者们则未能幸免于杀身之祸。

在世纪的转折点上，出现了许多秘密社团，即欧洲人称为“拳击手”的社团（这里说的是“义和团”运动——译注）。他们猛攻外国人当时在京的聚居区——使馆区。50天以后，它们就被七个国家和日本共同派出的远征军（即帝国主义的“八国联军”——译注）镇压了。当时慈禧吓得失魂落魄，剪掉了她那四英寸长的手指甲，逃到了西安。

中国被要求付出巨额赔款（即“庚子赔款”——译注）。不过，从那时起，一直到1911年革命，对外贸易却很兴隆。从1861年以

来就一直受外国人支配的中华帝国的海关，培养诚实的人为官；更多的铁路铺通了；教会开办了许多学校，其他人，甚至象慈禧太后也被迫接受一些新的变革。其中包括建立中学。

和以往各朝代濒临覆灭时的情形一样，由于中央政府的权力衰落，这时也出现了军阀割据局面。实际上，各有不同权力和方法的军阀分别控制着不同的地盘，他们只是在口头上说支持皇帝。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强行征税，这些税由各村庄的头人收集起来上交他们；而对村里的头人们来说，收税不仅是一种身份和地位的表现，而且是他们获取外快的渠道。军阀们有的占据着城镇，有的则盘踞广大的乡村。当军阀集团结成统一战线时，他们就显得极有权势。许多军阀都既腐败又凶恶。

外国公司这时已架设了把中国各主要城市联结起来的电话线路；煤矿的开采以及诸如机床厂之类重工业厂矿的建立，也使得中国人不仅可以制造火柴和纸制品，而且可以用机器来进行稻谷脱壳和把黄豆作成喂猪养牛的“豆饼”。所有这些，加上先前数以千计的从通商口岸来华的外国人一起，造成了越来越庞大的中产阶级，其中有些人还东渡日本或西去欧洲留学深造。

正是从这批留学生中，孙逸仙博士，即中国第一位总统（尽管是临时代理总统）集聚了数以千计的追随者。这些人都矢志于推翻过时的封建王朝政权。孙是一位农家子弟，因为是一位基督教徒而受过较广博的基础知识教育。由于条件的限制，他在生身故乡广州地区受到了挫折，因而背井离乡，来到了美国的檀香山。他的哥哥是檀香山的一位农场主。在那里，他经过训练成为一名医生，与此同时也接受了许多自由进步的政治思想。回国后，孙发起成立了“兴中会”，但却遭到地方官吏的反对。此后他又逃亡香港和澳门，在那里开业行医。继而又转赴美国。在伦敦，清政府公使曾企图绑架孙，但并未得逞。

在此期间，孙又创建了更具反清色彩的“同盟会”，这个组

织在中国得到了发展壮大，因为自慈禧太后1908年死后，中央政府已极端虚弱。1911年10月10日的革命——即人们所知道的“双十起义”——作为发生在武汉的一次导火索性的事件的结果而爆发了。同盟会的宣传与沸腾的民怨结合在一起，使这次革命之火迅速燎原起来。政府有关铁路国有化的决定，也对革命者起了有利的作用。孙中山在美国从报纸上得知起义的消息后，匆忙携带一批追随共和的人和他的学生以最快的速度赶回上海。

遗憾的是，孙中山不仅缺乏强有力的政治基础，而且缺乏军事力量。他一回国，就被推选为在南京成立的政府的临时总统。但时隔不久，他就被迫辞去总统职务，让位给袁世凯。袁是一位有权势的军阀。他经常高喊改革的口号，实际上在他任总统期间，却对长江流域的独立运动大肆镇压，并在1915年自立为帝，不过此后不久便一命呜呼，留下一个四分五裂的中国，使中国陷入军阀混战的局面。

在此期间，孙中山在广州建立了他的军政府，然而他的基础始终不稳固，他本人也在1925年与世长辞。不过，孙的遗孀宋庆龄直到1981年6月去世为止，一直在共产党中国是一位虽然年高、却很有权力的人物。宋庆龄又是蒋介石的遗孀的姐姐。尽管有军阀混战和大量的盗匪活动以及普遍的腐败行为，但欧洲的战事依然提出了对食物，特别是对蛋类、面粉、皮革、食用油及其他生活资料的需要，这些需要比对瓷器和丝绸的需要更迫切。

这时，中国的某些受当地商会掌管的城镇虽然也曾在本身的孤立状态中得到了局部的安定和繁荣，但据人们传说，也仍然笼罩着一种前程未卜的气氛。此间也涌现出许多家中英文报纸，其中许多都反映着英法思想家的自由民主思想。

蒋介石接管了由同盟会演变而来的国民党，他试图以他的南京政府重新统一中国。同时，仿效孙中山的作法，他也接受了来自苏联的援助。

目 录

译者序

前 言..... (1)

导论：毛泽东之前的中国历史..... (1)

第一篇 走向权力..... (1)

第一章 一个反抗者的诞生..... (2)

第二章 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11)

革命活动——中国共产党成立——早期与蒋介石合作关系的
破裂及与陈独秀的矛盾——瞿秋白的错误及在农民和城市工
人问题上与苏联的争论——日本人侵占东北——罗章龙、李
立三及立三主义的终结——与王明路线的斗争——长征与和
张国焘的斗争

第三章 延安时期..... (45)

一块思想和实验基地——准备迎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解放战争

第四章 从造反者到统治者..... (63)

建立人民共和国——清洗高岗——“百花齐放”——鼓舞民
族士气——走向现代化的军队——中苏争论与罢免彭德怀

第五章 毛泽东与刘少奇的矛盾..... (89)

矛盾初起——毛泽东关注军队的情况——思虑中的毛主席
——“文化大革命”的开场戏——“毒草”——一个突如其
来的变化——林彪对他虚构的军事政变的描述——全国第一
张大字报——工作组

第二篇 1966——1976..... (120)

第六章 毛泽东的长江之泳·····	(121)
“炮打司令部”——红卫兵——首次给偏激情绪降温——群众批斗大会	
第七章 上海：一个激进的城市·····	(136)
安亭事件——毛泽东反对称“公社”	
第八章 武汉事件·····	(145)
第九章 “文化大革命”冲击香港·····	(150)
安东尼·格雷的遭遇——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重要会谈	
第十章 毛泽东对红卫兵头头采取行动·····	(158)
第十一章 党的“九大”·····	(166)
第十二章 刘少奇的最后岁月·····	(172)
“天下大乱，形势大好”——“五·七干校”——刘少奇的悲惨遭遇	
第十三章 林彪的覆灭·····	(188)
枪杆子与笔杆子——周恩来总理的作用——林彪暂时得势——林的基本力量与潜在力量——再谈外交政策	
第三篇 衰落的年代·····	(225)
第十四章 毛和周的对立面·····	(226)
俄国人加剧边境局势——党的“十大”	
第十五章 政治钟摆的反复·····	(236)
重大军事改组——张春桥和民兵的作用	
第十六章 权力斗争公开化·····	(253)
周总理逝世与天安门广场事件——毛泽东逝世——粉碎“四人帮”——邓小平再次复出——邓小平逐渐掌权	
第四篇 总体概观·····	(283)
第十七章 毛泽东：神？人？或是怪物？·····	(284)
第十八章 审判“四人帮”·····	(295)
第十九章 毛泽东反对过的十个主要人物·····	(301)
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	

——高岗——彭德怀——毛第一次“选定的接班人”——
毛第二次“选定的接班人”

参考文献目录..... (314)

译后记..... (319)

第 一 篇

走 向 权 力

第一章 一个反抗者的诞生

毛泽东主席出生于1893年，当时正值统治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王朝濒临灭亡。他的出生地、华南湖南省的韶山冲，至今仍是国家圣地，每年仍有好几百中国人到那里瞻仰，也有少数成批的外国人到那里参观。毛泽东的父亲最初是一个只雇一名长工的“中”农，后来逐渐发家，成了一个富裕的谷物商，为那间村舍小屋加盖了许多耳房。他家宅院门前，有一片美丽的荷塘，把宅院装点得更加美好。毛泽东少年时代就是在这片荷塘中学会游泳的。宅院紧靠一座树木成林、郁郁葱葱的小山。事实上，毛泽东的故居是如此惊人地充满诗情画意，竟然使有些玩世不恭的外国人误认为天方夜谭。

在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正值高峰的时候，即从1967年“文化大革命”的狂热阶段直到毛泽东去世，韶山这个村庄一直是“中国人的伯利恒或中国的麦加”^①，成千上万的人涌向那里参观毛泽东的故居，从那里买回纪念邮票或其他纪念品。然而，毛泽东的孩童时代却远非田园诗般的舒适宜人。从六岁起，父亲就强迫他下田干活儿。实际上，毛泽东的家庭背景是标准的原型家庭，即为使自己爬上小资产阶级层次而刻苦奋斗的农民或工人家庭。毛泽东后来逐渐变得憎恶和讨厌这类家庭。

^① 麦加是伊斯兰教教徒的朝圣地，位于沙特阿拉伯西部；伯利恒是美国第二大钢铁垄断组织“伯利恒钢铁公司”的总部所在地。作者在此借用这两个地名，是比喻性地说明当时韶山在中国人民心中的位置和重要性。——译者注

毛泽东的父亲是一个只念过两年书的退伍兵，不过，就是这两年的书，也已足够他家记帐所需。他似乎并不信教（虽然据说他曾在一次幸免于饿虎伤害后突然皈依了佛教）。毛泽东的母亲完全不识字，她笃信佛教，而且坚持要全家人都信奉宗教教义。

这样的家庭，并非幸福家庭。毛泽东弟兄三人，还有一个收养来的妹妹，毛泽东自己是长兄。兄妹几人都很喜欢母亲，害怕父亲的严厉，而且有时候简直是有点恨他们的父亲。多年以后，毛泽东告诉埃德加·斯诺（后者是美国记者，是第一批穿越国民党的防线进入延安访问毛泽东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之一）说：虽然他们全家不缺饭吃，但却从没吃过蛋或肉，只有雇来的长工每星期能吃到一个蛋。因为父亲把他们收的稻谷大都卖到附近的城里去了。

在两位家长的争论中，孩子们总是坚决站在他们的母亲一边。这位母亲不允许孩子们公开流露不满情绪，也不允许公开反抗父亲，她认为那些都不合乎中国人的行为规矩。村里闹饥荒的时候，母亲就会趁父亲不在家时给穷苦农民送些稻米。粮食短缺给毛泽东的父亲提供了发财的好机会，他可以把积存在城里的大米全部卖掉，赚得相当可观的利润。毛泽东说，实际上在他十三岁那年，由于父亲在谷物生意上的精打细算，他家确实“赚到了在村子里算是很可观的一笔钱”。

毛泽东和他的弟弟们最初上的是当地的初级小学，他们在校成天背诵孔老夫子的经典，但实际上却并不知其所云。毛泽东少年时代真正接受教育，实际上是后来的事，而且主要是通过阅读当时的报纸小说。他说他曾经深受古典名著《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的影响。《水浒传》说的是一帮绿林好汉占山为王、反叛腐败的朝廷的事。据说，毛泽东曾说过他晚年不喜欢这些古典小说。现在所说的“四人帮”等激进分子，打着主席的旗号在70年代中期发动过几次运动，有一次就是反对《水浒传》的。因为据

说《水浒传》中的起义领袖（他象罗宾汉一样，劫富济贫）最后和皇帝言和了。实际上，在1976年2月周恩来总理去世后，邓小平第二次遭贬时，就曾经把邓当作“投降主义者”加以批判，而且把邓与《水浒传》中的反面人物宋江相提并论。

自从六岁的毛泽东开始下田干活儿，家里很快就产生了家庭纠纷。因为，即使是在那么小的年龄，毛泽东也希望有自己的自由时间可以游泳、与伙伴们聊天。有一天晚上，他刚学游泳回来，就与父亲发生了纠纷。于是，他跑出去站在一个泥泞而难以接近的池塘边，威胁说：如果父亲不认错，他就跳塘。这个举动很快见效了，因为父亲最害怕的就是在自己上年纪之后没人服侍自己，没人接续祖宗香火。

毛泽东十岁的时候，有一次受到父亲和老师的双重责打，于是他就出逃了。他对埃德加·斯诺回忆说，他跑出来后一直漫无目的地徘徊在一条大路上，他以为顺着那条路可以走到附近的市镇，结果转了几天，还没有走出村子八里远。最后让家里人给找到了。使毛泽东感到意外的是，他发现这次冒险事件之后，父亲对他变得“比较体谅了”，老师对他“态度也比较温和了些”。毛泽东的第一次反抗取得了成功。

1906年，毛泽东十三岁的时候，父亲坚持要他辍学，把全部精力都用于种田。然而，毛泽东还是继续读书了，而且和村里思想开明的人一起贪婪地读一些政治书籍。这些人中间，包括郑观应的信徒^①。郑当时是一个知识分子集团的领导人，该集团力主中国应当发展自己的科学技术，使经济现代化。同时，郑的追随者还谴责上海和其他口岸城市的外国人把中国人当下等公民对待。

① 郑观应（1842—1921），广东香山入，近代中国早期改良主义者，积极倡导变法维新，认为“千古无不弊之政，亦无不变之法”。曾任上海机器织布局总办、轮船招商局会办、汉阳铁厂和粤汉铁路公司总办等职。——译者注

据毛泽东说，通过阅读各种书籍和政论文章，激发他重新返回学校。于是，他第二次离家出走，去会一个朋友——他的这位朋友当时是一个失业的法律专业大学生，他家有地方可供热情而来的毛泽东住。虽然这次讨论不很成功，而且有父亲反对，毛泽东还是设法恢复了学业，在十六岁上来到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学校离他家不很远。

在东山小学，毛泽东听说了有关慈禧太后的行为，知道了北京庞大而腐败的官僚机构的所作所为，而且听说当时腐败的北京政府企图把正在分崩离析的国家统一起来。说起来令人难以置信，但毛泽东的确是在1910年，即慈禧太后死后两年才知道她已死掉了。他还听说了当时各种秘密社团的政治力量。

1910年，一次地方粮荒导致了一次饥民暴动，这次暴动后来遭到残酷镇压，起义首领的人头被悬在城头上示众，以警告那些因饥饿而打算奋起劫夺地主粮仓的人。毛泽东和他的同学很长一段时间都在谈论这件事，他们坚决同情起义者——毛泽东这样对斯诺说。这次暴动惨败不久，毛泽东和他的朋友又注意到一本小册子，那本小册子悲痛地报导了台湾、印度支那和朝鲜被日本人侵占的消息。毛泽东显然已记不起这本小册子的名称和作者姓名，但他在多年以后于延安接受访问时，仍能记起并引用了小册子开头的一句话：“呜呼，中国其将亡矣！”。这件事对于激发毛泽东的民族主义倾向无疑是起了作用的。这种民族主义倾向，他一生从未改变过，而且后来给他与苏联的关系造成了许多麻烦。

在开阔视野、增长知识的这几年里，毛泽东也看到了农家妇女被她们的丈夫吊打、对她们个人和家庭的命运均无发言权或极少发言权的情况。实际上，毛泽东的父母曾在村里为毛泽东和一个青年女子订过婚。这件事，更加深了他的这么一种认识：人们对女孩子们就象对待某些动产一样，她们与和她们结婚的人并没有爱情——如果实际上不是象许多穷苦农家的女孩子那样卖到妓

院的话。其实，毛泽东的父亲之所以为他安排了这门婚事，目的是为了给自己的稻田里增加一名劳动力。

显然，对毛泽东来说，已不再需要有更多的书来激发他去反抗极不公正的社会制度。他到处宣传妇女解放的必要性——虽然他直到若干年后才用了“妇女解放”这个概念。在他看来，“应当把妇女和男人平等对待，不然就不可能有妇女的自由。”他认为在他的一生中，无论就家庭生活而言或就公众生活而言，都将是遵守男女平等的（不过，由于与他的夫人江青之间的麻烦事，他后期在实践中并没有贯彻他的信念）。同样无疑的是，那些为增强对异性的魅力而缠脚、走起路来手扶拐杖、一摇一晃的富家闺秀的情况，以及那些外强中空的农家们的妻子的情况，也都对毛泽东的认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农民的妻子缠了脚，但在家境不佳的时候又不得不到田里干活，所以更因“三寸金莲”而遭罪。至少在毛泽东家乡韶山冲，农家妇女没有受到这种“金莲小脚”的痛苦折磨。因为她们必须去地里干活，所以从小就没有缠脚。毛泽东还发现，那些经常劳动、穷得无法缠“金莲小脚”的农家妇女，确实在家务事上拥有较多的发言权。

毛泽东在东山高小只读了一年书——兴许是因为他与周围同学的关系处得不好吧。造成关系不和的原因，首先因为他比别的学生大六岁，而且又人高马大，再就是因为他没有养成（他从来也就没有打算养成）地主阶级和商人阶级那种死板的、文质彬彬的习惯。同班同学认为他既粗野又傲气十足。他也非常清楚这么一个事实：他只有一套象样的衣服，平常穿的总是破旧而显短小的衣服。为了更多了解世事、忘记在东山小学的不痛快，毛泽东决定试试运气，争取考进长沙的某所正规学校。出乎他的意外，他竟然被录取了。一到那里，他便加入许多政治讨论，从讨论中得知太平军起义、英法联军毁坏圆明园、义和拳起义以及慈禧皇太后对许多改革事件的许诺。

这时，他还读到了共和党领袖孙中山创办的报纸。这种事显然启发了他，所以他才会在学校的墙上贴出了他的第一篇政论文章。这种传统的表达思想的方式在当时很流行。这种形式后来成了毛泽东在共产党内爱用的一种手段，特别在“文化大革命”中更是如此。

不过，虽然毛泽东有反抗满清的立场，虽然他已广泛阅读过主张共和制的革命报纸，他还是和当时千百万其他中国人一样，对1911年夏末爆发的革命感到意外。“双十”——即10月10日——起义在武汉爆发，而且从武汉扩展开来，得到了穷苦农民和被压迫、被剥削的工人的支持。满清王朝并未得到他企图得到的外国势力的帮助，于是，1912年1月，共和党人领袖孙逸仙当选为新政府的总统，总统府设在南京。

毛泽东和他的同伴们当然为听到这一消息欢欣鼓舞。实际上，当运动发展到长沙时，毛泽东正准备离湘赴汉加入共和军。他目睹了发生在长沙城门口的那场“血腥的战斗”，据说在这次战斗中，革命党人被阻拦了很长时间，以致原来的巡抚有足够的时间从官邸中事前准备的墙洞中出逃。“战斗”对这位未来的主席产生了深刻影响，但他的批评者中有不少人却宣称说：和许多首次看到打仗的年青人一样，毛泽东当时也对打仗感到害怕。

毛泽东从他站着观望战斗的那座山顶上望去，看到一面旗帜迎风招展，它表明一个共和国已经诞生。这件事鼓舞了毛泽东和他的同伴，激动之下，毛泽东踊跃报名加入了共和军。他总共在城防部队中干了六个月，但学做的却是连队内务工作。

直到参军之前，毛泽东所知道的大多都还是农村的事情。入伍后，他交了两个朋友，一位出身于矿工，一位是个工兵。与他们交往，使毛泽东开阔了视野。在此期间，毛泽东把他的大部分铜钱都花在向挑夫买水上了，而不是自己去井上挑水。因为他当时觉得自己是一位知识分子，做挑水之类的活有伤体面。不过，

毛泽东在他那个排里还是很受欢迎的，因为他可以为那些文盲士兵写家信。空闲时间，他就拼命阅览所能搞到的全部当地报纸，无休止地与其他士兵谈论一些政治问题。经过这些谈论，毛泽东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的政治领袖们总是受军阀支配；同时，在他头脑中也就产生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看法。

当了六个月的兵，毛泽东就离开了军队，回到正规学校继续他的学业。因为他当时以为共和国已稳固建立起来了。可是，很快他就又对学校的课程和死板的课堂教学感到厌倦，自己钻到图书馆去看书。然而这并不能使他安下心来。他又根据报纸上的许多招生广告，到许多学校报了名，试图进专业学校学习。他考进了一所商业学校，但只读了一个月就退学了，因为学校讲课用的是英语，而他对英语却一窍不通，所以听起课来乏味得很，不知所云。就在这时，毛泽东开始对法国大革命前后出现的一些欧洲政治观点特别感兴趣，当时这些观点已由日本学生和从西方游览归来的学生传入中国。其时，几乎所有的西方政治观点都是通过日本传入中国的。

毛泽东坚决认为，中国不仅必须发展现代工业，而且必须建立一种新型的、“廉洁”的政府机构。和那个时代——其实几乎是所有时代——的青年人一样，毛泽东当时的见解并不完全始终如一。然而，他确实从未改变过热情激昂的报国之心，也从未改变过对军事领袖、对伟大将领的生涯和对国务活动家的生活的浓厚兴趣。正因为如此，才使人对下述事情感到费解：虽然他喜欢阅读那些描写以往战斗故事的作品，但他却竟然对当时已经不仅在西欧、而且已经在中东——即中国人常说的西亚——蔓延开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很少感兴趣，当时他读过的许多报纸都已报导过这次战争。

不过，虽然毛泽东当时仍然是不修边幅，而且在行为上放荡不羁，但他还是开始在长沙其他学生心目中以一位杰出的、足智

多谋的青年领袖的身份崭露头角。他曾经不无骄傲地对人讲过：在那个时候——即大约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同时的一段时间内——他接受了在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影响，即伦理学教授杨昌济对他的影响；杨曾经留学英、德和日本。后来，好几年之后，毛泽东与杨昌济的女儿结了婚，不过在长沙的时候他还没有时间谈情说爱。

这期间，毛泽东的课余时间全用在讨论政治问题和体育锻炼上了。为了锻炼脚力，他光着脚板走路，甚至光着脚爬山。冬天，他坚持洗冷水浴，而且经常徒步远涉乡下，与农民彻夜长谈，对农民的生活和艰辛有了更多了解。

毛泽东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题为《体育之研究》（1917年4月），文中拟定了日常锻炼的制度大纲——他认为，这些锻炼制度不仅会使人体格强健，而且可以陶冶心志。他在文章中强调：“体育的基本目标乃在于培养军人的英雄品质。”（这是按英文译出的。此句中文原文为“夫体育之主旨，武勇也。”——译者注）就在他为强健体魄而刻苦锻炼的时候，他已详细阐明了生活的道路，他说他期望从事的是教书和地方政治。为了保护第一师范学校，防御来自任何军事因素——即当时在省内互相倾轧的军阀们——对学校的危害，学生们组建了“志愿军”，毛泽东成了这支队伍的领袖人物。

另外，毛泽东还是学生会的总书记，这个学生会反对传统的教学方法，要求开设更多的西方科学课和欧洲哲学课。长沙这个小小的城市，也反映了当时遍及全国的轰轰烈烈的景象。当时中国的学生和知识分子，正在对不断由日本传入中国的欧洲政治思想进行争论。大量的小社团，既有公开的也有秘密的，都为这些思想的传播提供了机构组织方面的条件。中国的开明人士，到处宣称自己摆脱了“旧思想、旧道德、旧价值标准”，因为他们已深信个人自由。

当时，威尔逊（Wilson）的“自决哲学”（Philosophy of

self-determination)已在中国广泛传播。受这种哲学的影响,当1919年5月凡尔赛和平协商会议决定把以前属于德国势力范围的中国山东省转交日本接管时(日本已在战争期间实际接管了山东),立即引起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警觉。许多城市都组织了声势浩大的学生示威游行,反对西方势力和在巴黎的中国代表团。数以千计的电报拍给了伍德罗·威尔逊,提醒他不要忘记他的理想主义和他说过的贫弱国家的自决权。

大规模的反抗运动持续了好几个星期,北京的大学生们还放火烧了亲日派政客的房子。及至警察赶来的时候,学生们大都已无影无踪,但警察还是设法逮捕了10名学生领袖。对此,学生们的直接反应是:不仅在首都,而且在各省省城的大学举行总罢课。斗争很快就遍及各城市,因为全国的店员、产业工人和商业人员都罢工了。随后紧接着发生了全国一致的抵制日货运动,人们纷纷停止购买日本的产品或停止使用日本的汽轮机,码头工人则拒绝装卸日货。在全国公众的强大压力下,北京政府不得不释放了5月4日被抓的学生。这样,“五·四运动”就成了那场对全国发生了多年影响的运动的名称。

1918年,二十五岁的毛泽东已经是有大约17年学历的大学生了。不过,虽然他曾博览群书,他对自然科学、地理学、经济学或工程学却知之甚少或甚至一无所知。这位未来的主席,这时已认识到自己天生就是领导人的人,而且已立志夺取本地政权。当时,他对生活所持的各种观点互有矛盾,因为它们既要体现他对那些很少受教育的工人而言的优越性,又要体现他的这么一种坚定决心,即:决不接受达官贵人那一套行为习惯和语言。他一直在寻找可以救农民出水深火热之境的政治哲学。不过,他那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却并没有阻碍他既希望引进外来的技术,又希望引进外来的著作和政治哲学。

第二章 毛泽东成为 马克思主义者

1911年10月10日的共和革命——即“双十起义”——显然是一次不成功的革命，它并不足以统一全中国。由于军阀混战和外国人操纵，中国依然处于分裂状态。帝国主义势力你争我夺，都想日益扩大自己的地盘和政治、贸易影响，沿海地区的情况更是如此。开明的中国人，无不为欧洲各国向中国军阀送的巨额贿款感到气愤。共和党人的领袖孙逸仙本人既缺乏军事后盾，又缺乏政治基础。

孙逸仙和他的官员们以同盟会为基础组建了国民党，该党立党原则是“三民主义”，即“民族、民权和民生”，同时强调要实行土地改革、节制资本。国民党的纲领是既要驱除外国人，又要打倒满清政府，其民主政治（民权）的主要目标是建立类似议会制的制度。

1912年3月，权势显赫的军阀袁世凯接替孙中山的总统职务后，迁都北京。议会选举确实是进行了——尽管谁也不知道这次选举是如何组织起来的，国民党在下院596票中得了274票，在上院274票中得了123票。但袁世凯宣布自己反对民主政治，并且在1913年宣布国民党为非法政党，由此导致孙中山逃亡日本。孙中山曾试图在日本改组国民党，但却由于暗杀和受贿之风已经侵入他的队伍内部，使他的队伍缺乏内聚力，以致他的愿望落空了。

毛泽东1918年秋离开长沙到北京时，对上面这些历史事实是

有所认识的。他之所以去了首都，很可能是因为他当时正在帮助一批打算去欧洲实行著名的“勤工俭学”计划的学生。毛泽东也曾打算去法国勤工俭学，后来因诸多原因，在最后临出发时又改变了主意。内中原因，除了资金缺乏之外，还因为他实际上是一个在语言上很蹩脚的人。在正式场合，毛泽东说他没去法国是因为他想在出国之前先对自己的祖国有所了解。

许多坚决支持毛泽东的人，都认为毛泽东没去法国是一次大的决策失误。他和他那些打算建立新政权的同事们，都因为他对世界和对如何管理这个世界缺乏知识而备受其苦。毛泽东当然可以说他以前的领袖人物——皇帝——都从未出过国；但是，要知道那些统治者是在没有飞机、汽车和无线电的时代生活和进行统治的。毛泽东虽然两度出访苏联，但这两次出访对他了解西方世界却很少助益，以致他和他的先辈们一样，直到去世还以为中国是世界文明的中心。

到北京以后，毛泽东很快就和他以前的老师杨昌济接上了头。杨当时在北京大学担任教授职务。他为毛泽东提供资助，并帮助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谋到一件工作，即打扫图书阅览室、把书报摆放整齐。由于这份工作，他还能去听他当时特别有兴趣听的讲演。

图书馆馆长李大钊对毛泽东的影响很大。来京之前，毛泽东就已经在《新青年》杂志上读过李大钊的文章。图书馆是当时持左翼观点的人经常聚会之地，故而被称为“红色魔力场”。不过，那些到图书馆借阅图书的教授们，并不都象杨昌济和李大钊那样热情助人，这让毛泽东感到失望。事实上，毛泽东发现当他登记借阅报刊的人的名字（这是他份内的工作）时，那些人都尽量躲着他，不想与他交谈。他哀叹说：“好象我这个人不存在似的。”

在大学外面，毛泽东有幸结识了一些无政府主义者，他们介绍他读克鲁泡特金和巴枯宁的著作。当时正值知识分子和政治家

们力图估量“十月革命”的时候，毛泽东在图书馆中听到许多有关“十月革命”的议论。按毛泽东的说法，中国人在“十月革命”前还不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而今，虽然与苏联有争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却仍然是中国官方承认的中心人物。

由于毛泽东生性好动，他又参加了一个新闻工作者社团和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在这两个小组中，他都是代表农民的利益说话的。当时也和今天一样，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他们迫切需要“解放”。多年以后，毛泽东曾抱怨过他在北京的艰苦生活。那时，他们七、八个学生就挤在一个炕上（炕是一种用泥土砌成的床，冬天可以在下边生一堆火取暖），一个人要翻身，就必须先和其他人打个招呼。不过，尽管当时在首都遇到这些挫折，他还是可以从在首都的生活中自得其乐。尤其是，他在那里爱上了杨昌济的女儿。因为毛泽东那时薪水微薄，不足以养活妻子，所以他们当时并没有结婚。

让人奇怪的是，毛泽东在涉足情网之后，竟又会如此快地就辞去了图书馆的工作，南下上海。这件事情的部分原因至少在于：他急于会见和结交新的政治友人。当时中国有两个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小组。毛泽东已经知道其中之一，即北京的那个小组，该小组的领导人正是毛泽东的保护人、图书馆馆长李大钊。李曾经欢呼布尔什维克革命是一种“伟大的全世界性的力量”，并且把它与早先的法国大革命加以比较。

上海的共产主义小组是由陈独秀领导的。陈是一位古典式的学者，也是李大钊的朋友，对达尔文的学说和18世纪法国大革命都有独到的见解。（1974年爱德华·希恩在北京会见毛泽东主席时，送给主席一本初版达尔文著作，这件事勾起了这位中国领袖对青年时代北京的学习生活的回忆。）陈独秀和当时其他许多人一样，坚信要拯救中国，就必须走西方的民主政治之路。但随后他又改变了这一信念，因为他认为民主政治当时已被用作“骗人

的把戏”来扩张帝国主义的势力。所以，他又转而接受欧洲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强调必须重视城市工人的作用，强调工人中的先进分子必定会成为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及未来的革命的先锋。陈独秀还不无理由地宣称：“农民是散漫的，他们的力量也因而难以集中起来。”除此之外，陈还说，农民的文化水平低下，他们的生活要求也简单，因而“很容易转向保守主义”。

这样，紧接着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的“五·四运动”，在中国就出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两种解释。

虽然北京大学的言论自由是令人瞩目的，但图书馆里的讨论还是导致了政治紧张局势；加上来自保守分子的压力，李大钊最终遭到解职。离开北京大学以后，李大钊几乎全力以赴投身于政治活动，他的思想也和毛泽东一样，注重于越来越多地对农民、对农民与贪婪的地主、以及农民与“万恶的”军阀之间的种种问题进行思考。他认为，“在经济落后的中国，占人口百分之八十还多的农民必定会在革命中起重大作用。”

毛泽东在北京和上海的期间，多次访问过陈独秀，他认为“他（指陈独秀——译者注）比任何人对我的影响都大”。他们当时显然并没有论及究竟是工人还是农民应在劳工运动中起先锋作用，因为毛泽东当时特别热衷于鼓吹男女平等和建立代议制政府。他总是劝告人们相信的一个有利于穷苦佃农的观点就是：“和中国社会的其他阶层不同，佃户家的妇女不得不为经济原因而劳动”，“因此，她们拥有其他任何阶层的妇女都缺少的在家务事情上的发言权。”

多年以后，毛泽东说他之最终转向马克思主义，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后逐渐发生的事。马克思主义的详细情况，似乎是缓慢地逐渐渗入他的意识中的，这也许是因为他工作上一直很繁忙，而且一直要写很多有关中国本地条件的著作。俄国发生的种种事件所具有的重要性，显然比马克思著作中的话对毛泽东后来所说的

他的“政治觉悟”更有吸引力。

毛泽东确实曾经离京到上海为那些赴欧勤工俭学的学生们送行。从他那个时期的情况看，他当时确实可能连买火车票的钱都不够，他的朋友们帮了他的忙，他们既给了他足够的旅费，也给他带上了路上要吃的食品。

从北京到上海，一路上铁路沿线的农村都在流传着有关凡尔赛和会的新闻，还有传闻说中国代表团已同意“日本在中国立足”——这种情况，明显与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自决”信条相矛盾。而且，欧洲各战胜国似乎也不愿放弃他们在中国的租界。不几个月后爆发的由一系列自发的学生示威活动导致的“五·四”运动，这时实际上已经开始了，而且已在沿海许多省份传播了数月。

和一批即将赴欧勤工俭学的青年人一起在上海呆了一段时间后，毛泽东就返回故乡湖南去了。抵达长沙后，他找到了一份工作，在一所学校当辅导员，业余时间仍旧全力以赴进行政治活动。不过，这一次他不是象去北京之前那样沉浸在没完没了的讨论中，而是兴致勃勃地为报刊杂志撰写文章。

当5月4日北京数千名学生为抗议凡尔赛和会的决议而自发举行游行示威的时候，毛泽东实际上正在旅途之中。到长沙以后，毛泽东逐渐认识到“五·四”运动正在产生影响，而且是以北京政府为主要打击对象。许多政府官员因接受日本的要求而被指控为“卖国贼”。大学师生的斗争很快就得到了工厂、机关和商店的支持，抵制日货的运动也组织了起来。中国人爱用日期来为运动命名。这一系列自发的城市示威活动汹涌澎湃，成了中国的一场知识革命，因为中国已掌握了由西方传入的新思想。中国共产党早期的许多党员，都是在“五·四”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人物。

革命活动

毛泽东在他教书的长沙，创办了好几种周刊，其中有一种曾遭到当局查封。过后，他承认说他当时经常不得不通宵达旦地夜战，亲自动笔为周刊写稿，因为他约的那些撰稿人经常在最后时刻爽约——或者是由于怕得罪当地军阀，或者是因怕得罪右翼政府，也有人是因为懒惰。

由于毛泽东的革命文章和政治活动，特别是由于他主办了一份叫做《新湖南》的学生报纸，他最后被政府当局驱逐出湘。1919年9月，他二次来到上海，在一家洗衣店里做工。这次离湘，使他得以重新建立与陈独秀的密切联系，他们的谈话进一步把毛泽东引向马克思主义。照毛泽东的说法，到1920年夏，他已经“在理论上、而且在一定程度的行动上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了”。

转向马克思主义哲学，随后又转向接受作为一种实践手段的共产主义，这样，毛泽东就结束了他所说的为寻求“改善人民生活的办法”而探索的青年时期。他所说的“人民”，指的是农民。毛泽东自己出身于农民，而且他所认识的城里人里边，大多数人老家都在农村。因此，农民的疾苦和问题自然就成了他关心的头等大事。再者，毛泽东与城里人的交往也远不是令他满意的，总的来说，他觉得他们瞧不起他，认为他是“乡巴佬”。人家总说他土里土气、衣冠不整。的确，当他与江青——他的第三位夫人——在延安初次相识时，他们之间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青年时代的遭遇（毛泽东在北京，江青在上海，他们穿的都是从家里其他人身上脱下来的衣服）。同样无疑的是，毛泽东那种乡村语言和浓重的南方口音，也很难使他受那些在他工作的阅览室借阅的知识分子的欢迎或受他任教的那个学校的知识分子欢迎。事实上，

虽然他也曾竭力使自己向城市知识分子看齐，但到后来他却（因自认为比别人高超而）变得渐渐安心于他的农民习气，甚至于几乎把它当成一种值得自豪的事。早在他对女人有任何亲身感受之前，他在同事面前对性生活问题的评论也是相当袒露的。虽然他言谈举止粗陋，然而谁也不曾对他的智谋和领导才干有过怀疑。现在还健在的一个当年与毛泽东一起相处过的人回忆说，他“具有独特的气质”，而且无论什么样的集会，只要象李大钊、陈独秀这样明显高超的人物不在场，他自然而然就担起了领导者的角色。

1920年，毛泽东的父亲和杨昌济相继去世。这些令人悲哀的事过后不久，毛泽东就被任命为长沙第一师范学校校长，在他的一生中第一次享受到了可观的薪俸。这样一来，他也就能够与他老师的女儿杨开慧结婚了（此前，他与杨开慧之间有不定期的联系）。这位未来的主席，结婚的方式也很独特，他结婚的日子不让人知道。有一种学说告诉他们不要举行任何正式仪式，只管住在一起就行了。

此后不久，伯特兰·罗素访问了长沙（罗素曾在中国讲学一年），毛泽东去听了罗素的讲演。他对这位“英国贵族”的评论很有意思。他认为罗素赞同共产主义而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确，罗素强调说不需要有战争和革命，只需通过教育来改变领导阶层的思想。毛泽东不赞同罗素的观点，理由是：教育需要花钱，而钱几乎都掌握在资本家手中。

研究毛泽东早期著作的人们认为，与其他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不同，毛泽东极少写有关资本和国家财政方面的文章。对如何用经济手段管理国家明显不感兴趣，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明毛泽东后来犯错误的原因。之所以如此，无疑与他拒绝出国有关，而且与他压根儿就没受过这方面的教育有关。

毛泽东机智地在长沙建立了一个书店，卖的都是具有强烈的

左倾思想的书籍，而且说服了右倾的总督为书店开张剪彩。同时，他还在城里建立了一个青年共产主义秘密小组。尽管经常有一些麻烦（这些麻烦大多是因为各派互相对立的军阀造成的），毛泽东似乎还是与他那位漂亮聪颖的妻子共同度过了对他来说算是平稳的一年。他们当时都继续在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小组和由毛泽东帮助建立的其他研究组工作。

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之前，除北京和上海之外已经又有了三个信奉卡尔·马克思的学说的骨干小组。第一个小组出现在工业区，那里，劳工领袖们已采取行动建立劳动工会——特别是在外国企业的中国工人中间建立工会。左翼产业工人，完全赞同人们现在说的俄国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坚持主张说社会主义——即他们所公开声称的奋斗目标——最容易经由都市工人的革命斗争取得胜利。劳工领袖中间，有些人与莫斯科派来推动和指导中国马克思主义活动的俄国代表有密切联系。

第二个小组强调农民中蕴藏的能量，这个小组由毛泽东及其周围的一小批知识分子组成。他们由毛泽东在湖南联络起来，毛泽东已在其中处于领导地位。当时毛泽东经常想起过去的农民起义，认为地主强加在农民身上的苛刻的生活状况，将再次造成农民革命的条件。

第三个左翼小组出现较晚，它由那些从欧洲勤工俭学回来的学生组成。如前所述，毛泽东曾经帮助赴欧勤工俭学的人筹措经费，但他自己最后没有出国。这些归国的学生中，有周恩来和他的妻子邓颖超（虽然后者并未赴欧留学）及邓小平、李立三。此外还有原先当过“帝国”军官的年龄大得多的朱德，他后来成为“红军之父”。另外，周恩来和其他中国学生还在巴黎和柏林建立了他们自己的中国共产主义支部。这些学生在取道莫斯科回国之前，大都普遍游历了西欧。

上述三个小组之间，有一些重大的分歧。如果说以城市工会

为基础的小组中的人后来都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和亲修的修正主义分子”，那显然有些过分简单化。

中国共产党成立

1920年某个时候，第三国际派格雷戈里·沃廷斯基（Gregory Voitinsky）到中国，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他到中国之后，不仅与已在各城市建立起来的共产主义基层组织取得了联系，而且与李大钊、陈独秀也接上了头。这些活动就造成了现在所说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当时会议在上海法租界一所女子学校举行，^①有12个人参加，目的是要组建一个新型的中国党。李大钊和陈独秀虽然都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他们仍被尊称为“党的创始人”。由于警察的干扰，与会者们租了一支船，装扮成划船游览的，在附近一个小湖上结束了他们的会议。俄国代表没有陪他们开会。

毛泽东在参加过会议之后返回了湖南，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党支部。据他说，在随后的几年内，他已经在湖南“建立了二十多个工会”，其中包括“铁路工人、市政职员、印刷工人和政府造币厂的工人”。他的活动还涉及江西西部，具有重要意义的安源煤矿就在那个地区。他在安源有两位助手，后来这两个人都成了对毛泽东的生活极为重要的人物：一个是李立三，一个是刘少奇。刘少奇在赴莫斯科学习之前就参加了毛泽东的小组；他后来成了一位领袖，而且直到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罢黜之前，曾是国家元首和毛主席“选定的接班人”。刘少奇死后，邓小平副总理为他恢复了名誉。

^① 这种说法与我国中共党史界现有说法有出入。——译者注

在组织湖南青年知识分子研究小组时，毛泽东曾在一家地方报纸上登广告，征寻志同道合的研究者。1936年他告诉埃德加·斯诺说：他得到了三个半人的响应。其中一个应征者是罗章龙，后面我们将提到此人；“半个”响应来自一个没有“明确表态的青年，名叫李立三”。据毛泽东说，李立三当时“听完了”他们说的话之后就一去未返，他们之间的“友谊始终没有发展起来”。

毛泽东对他没有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原因有一个说明，从这个说明可以典型地看出他有些时候简直粗心大意得惊人。他说：“我本来打算参加会议的，但却把开会的地点给忘了，因为找不到任何同志，结果没能去参加。”此后不久，毛泽东不是自动辞去了校长职务，就是被解除了校长职务。他岳母在财政上为他提供帮助，但是，因为这个地方来了一位新总督，他在这个地方再出头露面就有危险了。

毛泽东没有错过参加在广州举行的第三次党的代表大会的机会。由于苏联的压力，那次会议做了一个关键的决议，决定联合国民党。孙中山和国民党人在日本改组了国民党，并且在一位军阀的好意赞助下，于1921年在广州建立了一个共和制的政府机构。当时，北京的中央政府除了在京畿地区有势力，在其他地方并无多大权力。中国北部当时大部分受各个军阀控制，外国势力则控制着上海和天津之类的主要码头。

要估计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是一件难事。因为从来没有哪一位领导人提过当时党员的人数。但是，公正地说，俄国人当时确曾给中国派去了一些善于从事组织活动的人，他们全力以赴做的工作，是在华南和华东的主要城市组织工会。孙逸仙甚至在南方也缺乏权力基础，所以他也乐于接受共产国际的代表。这个组织不时派来军事专家或政治顾问给他以帮助。共产党的成立，对于国民党的改组和壮大起了催化作用。

虽然毛泽东当时反对同国民党联合建立统一战线的提案，但

他还是第一次被选进了中央委员会，并且担任了组织部部长——这个职务需要他住在上海。1924年1月，他作为代表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对孙中山报以热烈的支持。实际上因他在上海为国民党做的工作，李立三曾经严厉批评过他。1925年，已成为共产党核心人物的李立三又一次为同样的原因批评过毛泽东。

毛泽东不时从舞台上消失，或许是真的病了。一些支持他的人说，他的病是因为既要作一名忠诚的共产党员，又要为国民党辛苦工作而造成的心理上的病。大约就在这个时期，即1924—1925年间，他在一系列问题上与陈独秀发生了意见分歧。在毛泽东看来，陈独秀这位共产党“老板”正在实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1925年，孙中山在北京去世，国民党内的意见分歧已达到危险的境地。此时，毛泽东并未在广州。事后不久，毛泽东有一段时间曾担任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在任期间，他自然而然强调了组织农民力量的重要性。正因为这种原因，毛泽东被任命为广州农民“训练中心”的负责人。时至今日，游客在广州还可以看到这个中心（即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译者注）。

如今著名的黄埔军校，当时已经建立。该校的目的是培养一批职业军官，领导国民革命军，当时还不怎么知名的蒋介石担任校长。蒋介石参加过1911年的革命，随后又去日本受训。他的日本教官描述他是一个“出众的人”。蒋介石被任命为校长，这还与已同宋美龄结了婚有关^①——宋美龄是孙中山夫人的妹妹，上海最富有、最有影响的商业银行家的家庭成员。蒋介石就任黄埔军校校长的另一个有利条件是，他曾去苏联学习过苏联的军事技术和政治指导工作制度。

^① 这种说法不确。蒋介石1924年就已担任黄埔军校校长，而与宋美龄结婚是在1927年底。——译者注。

然而，在黄埔军校政治教育部担任部长的却是年轻的共产党人周恩来，即未来的总理，他刚从法国归来不久。学员里面，在第四期中有林彪，即未来毛泽东第二次“选定的接班人”。所以，在共和分子和共产党人之间很快就发生了争吵。而且这种争吵一直或公开或秘密地延续到1949年的“解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也是不足为奇的。军校的权威是以金钱和武器为基础的，它首先是有赖于斯大林的代表的支持，其次有赖于在财政上受富商和地主支持的国民党，最后才有赖于当时最权轻势薄的象毛泽东这样坚信农民革命的人。

尽管有这些分歧，但当时最基本的目标是要统一中国，改变由军阀和帝国主义利益导致的分裂状态。1925年，这一目标尚未达到，孙中山就逝世了。但国民党人最终还是通过现在人们说的“北伐”（1926—1927）达到了这一目标。北伐战争以国共两党的联合奋斗开始，却以苦难和悲剧告终。

不用说，在担任由国民党出钱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负责人期间，毛泽东更坚信农民中蕴藏的巨大能量。他说：“我没有认识到农民内部阶级斗争的程度。”1926年，毛泽东受命到湖南考察5个县的农民组织。他就这次考察写了一个报告，题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由于许多原因，这个报告在今天很著名，人们可以在官方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看到这篇报告。据毛泽东说，在有两个俄国代表参加的各省联席会议上，他的报告中提出的关于大范围重新分配土地的建议得到了支持，但1927年4至5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却否决了这个建议。批评毛泽东的人说，毛泽东关于已组织起来的湖南农民协会的“庄重声明”是“吹牛”。

毛泽东为此感到愤慨，而且，他也许是在太轻视政治背景的作用了，因为他还是一个政治新手。蒋介石已经在上海和武汉领导了一场反对共产党的“反革命运动”，陈独秀却还宣称可以从与

国民党的合作中得到好处，而且还号召共产党人“克制、忍让”。将近10年以后，毛泽东对埃德加·斯诺揭露说：

“对于当时党的政策，特别是对于当时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我非常不满意。10年后的今天（1937年）我认为，如果当时更彻底地把农民运动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开展一场反对地主的阶级斗争，那么，苏维埃或‘山头’——即人们对共产党游击队根据地的称呼——就会更早、更有力得多地在全国发展起来。”

早期与蒋介石合作关系的 破裂及与陈独秀的矛盾

麻烦的根源在于国共两党北伐期间在“谁应当控制主要城市”这个问题上的激烈争论。两党之间最大的一场竞争——实际上是一场悲剧——发生在上海，当时周恩来正受命在上海担任军事部长。经过周恩来和工会的辛勤工作，3月21日在上海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有成千上万工人参加的罢工运动。蒋介石当时正在上海郊区。结果，北伐军实际上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就在短短几天内控制了上海。然而，周恩来做了这番杰出的组织工作之后不到一个月，蒋介石就开始算计共产党了，而且发动了一场血腥的反动政变。周恩来逃了出来，他的副手赵世炎却遭到逮捕，与其他数千名支持共产党的人一起惨遭杀害。周恩来一直没忘记这场灾难，直到1974年^①在上海会见蓬皮杜总统时，谈到这场灾难，他还是充满深深的痛心之情。

正是在由这次事件造成的气氛中，1927年4—5月，在武汉召开了充满争论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那次会议否

^① 原文如此，实际时间应为1973年。——译者注。

决了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然而，当毛泽东出于愤慨和憎恶而退出会场时（当时他佯称是生了病），他只当选了个中央候补委员。在那次会议上，毛泽东的朋友、从湖南来的工会组织家刘少奇，对据说已处于暴怒状态的陈独秀作了一番“抚慰”工作，第一次入选中央委员会。现在，陈独秀的名字排在与毛泽东曾有过分歧的十个人之首；或者，用毛泽东式的共产主义语言来说，是被排在“那些在十次路线斗争中挑头的人的名单”之首。

1927年8月1日的南昌起义，使得与国民党的决裂成为可能——如今，8月1日已成为红军建军纪念日。在此之前举行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陈独秀曾提出与国民党彻底决裂的问题，理由是国民党企图篡夺革命的领导权。“共产党必须要么放弃对群众运动的领导权，要么与国民党彻底决裂”，陈独秀这样说。他公开请示斯大林派来的代表鲍罗廷，鲍罗廷虽然明显同意他的观点，却又补充说“苏联决不会同意”。

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经历的一系列壮烈失败之一，它在中国编年史中的地位仅次于史诗般的长征。1927年7月，武汉的国民党左翼也撤销了共产党人的职务。绝望之中，共产党人谋划了南昌兵变。起义的核心军事人物是叶挺，虽然领导人中还有周恩来、朱德、贺龙等人（贺龙当时是属南京方面管辖的20军的军长）。当时中国共产党的许多精英人物都参与了这次起义，其中包括张国焘（中共创始人之一，后来成为一个重要的“山头”的领导人，但在长征中却与毛泽东争吵，1938年背离共产主义运动）、李立三（后来很快就成了党的领导人）、聂荣臻（中国原子弹之“父”）、刘伯承（未来的元帅）和周逸群（后来在一次巡视中牺牲了）。

起义不久，南昌就处在共产党人的控制中了。随后组成了一个25人的革命委员会，其中包括当时同情共产党的非共产党人孙中山夫人。但是，市区群众却没有起来保护起义军。因此，5天以

后，叶挺决定撤出南昌，以免遭到国民党军队围歼。起义军南下广东，9月下旬在汕头逗留数日。这期间，周恩来身染重病，被抬上一条小船和叶挺、聂荣臻一起去了香港。他们在香港隐蔽了一、两年。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当时正值共产党命运“极为艰难”之时。

同年8月7日，在武汉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当时，毛泽东虽已处于人们说的“在野时期”，但他还是参加了会议。会议撤销了陈独秀的领导职务，也许是允许、也许是未允许他继续留在党内。原先已是政治局委员的瞿秋白，这次会议上当选为党的总书记（虽然他患有肺结核）^①。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还是只当选了候补中央委员。这时已彻底放弃了与国民党合作的希望。用毛泽东的话说，“国民党已经成为帝国主义的工具，不能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了”。他还补充说：“长期公开夺取政权的斗争从此开始了。”

这样，陈独秀就成为对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挑战的十人名单中的第一人。除了这十人之外还有许多人，其中有些人比毛泽东本人开列的那十个人还要重要些，而且几乎所有的挑战者都被指责犯过“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虽然毛泽东把十人名单中的前三人叫做“左倾机会主义者”。这三个人是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②。

如同在任何西方政党内部一样，在中国共产党内部，也存在着公认的左右翼之分。简单地说，在国际事务上，左翼不仅在道义上支持游击队和革命党，而且支持诸如“世界革命”之类极为宽泛的激进运动。在国内事务中，左翼主张彻底废除农业社中的

① 这种说法不确切。瞿当时是主要负责人，但并未明确其总书记职务。——译者注

② 这种说法似不准确。按国内中共党史界一贯说法，陈独秀是右倾机会主义者。因此，究竟毛泽东是否如本书作者这里所叙述的那样说过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三人都是左倾机会主义者，值得怀疑。——译者注

私有地，或许，更主要的是要废除一切加班费和其他物质刺激。在进行政治任命的时候，左翼认为对行政官员或军官来说，“红”比“专”重要。换句话说，他们追求的是一种“纯粹的”共产主义状态，在那种状态中，没有货币，每个人都将按自己的需要来取得衣、食和住房。

右翼的那些人都是一些实干家，他们认为应当在理论上坚持人民战争哲学的同时，也让人们从“物质刺激”中得到实惠。他们认为，人民战争在中国那些人口稀少的地区是不切实际的，所以要强调重新武装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使解放军现代化，用核武器和尖端的常规武器装备三军。

中国的左翼和右翼之间，还有别的一些重大意见分歧。例如在文化、特别是在教育方面，左翼认为对学生来说，培养正确的政治觉悟，具备“红”的素质，要比取得学术成就更重要；而右翼则认为，学生既可以是优秀的共产党员，同时又是“专家”。

不过，尽管有如此明显的分野，许多被从党内开除或被清洗出去的人却时而被称作“右倾分子”，时而又被称为“左倾分子”。当然，一般说来，那些一开始就坚持与莫斯科全面协作的人大都被称作“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亲苏的修正主义分子。然而，这些帽子不时又（没有什么明显理由就）会被换成“左倾分子”这顶帽子。毛主席对什么叫左、什么叫右所下的定义，有点儿农民味儿。他说：“比如，婴儿在母腹中要九个月才能成形，如果你强要他七个月就成形，那你就是企图拔苗助长的左倾分子；如果你在九个月后还设法阻止他离开母腹，那你就是延误时事的右倾分子。”

南昌起义失败后，紧接着就是一段苏维埃或“山头”时期（在年青的中国反抗者中间，毛泽东决不是唯一受13世纪传统长篇小说《水浒传》影响的人）。1927年，对那些知名的、活跃的共产党人来说，没有多少路可供他们挑选。他们要么在上海、北

京或其他哪个城市进行地下活动；要么躲到莫斯科或香港；要么就是把他们的追随者和武器集中起来，建立他们自己的一个“山头”。当时，“山头”一般都选在两县或三县交界处，因为没有哪个地方当局对那里的地方安全负责。他们利用两个或三个行政或警察机构间的空隙求得生存。这种技巧显然并不新鲜。实际上，这是毛泽东从孙子在公元前500年写的《兵法》中学到的许多军事思想之一——《孙子兵法》是人们迄今所知最早的一部兵法论著。

由于比南昌起义早几月^①在湖南举行的农民暴动的失败，毛泽东被迫上了他的“山头”。若干年后，在延安与新闻记者和少数外国领导人谈到这次农民起义时，毛泽东常常坚持说：由于莫斯科没认识到农民中间固有的力量，致使中国共产党失去了一个大好时机。

当毛泽东正在为准备人们如今所说的“秋收起义”而组织农民，奔走于矿工、农民赤卫队及其他“山头”之间的时候，有一天他被国民党抓了起来。用他自己的话说，“当时国民党的恐怖达到了顶点，好几百赤色嫌疑分子被枪杀。”抓他的人奉命把他带到一个民团指挥部处死。“但是，我从一个同志那里借了几十块钱，打算贿赂押送我的人释放我，”毛泽东说，“因为普通士兵都是雇佣来的，看着我遭枪杀，对他们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好处。”但是副官不答应这样干——因为毕竟当时已有很高的悬赏要毛泽东的首级。别无他法，毛泽东只有设法逃跑。

跑到离民团团部大约200码的地方，毛泽东发现有一个水塘，周围长满很高的荒草。他说他在那里一直躲到太阳落山，这中间，有两次追捕他的士兵和农民已搜到离他很近的地方，几乎就要碰到他了，但他还是逃脱了搜捕。天黑以后，搜寻他的士兵撤走了，

① “早几个月”的说法疑有误，这里似指比南昌起义晚些时候的秋收起义。
译者注

毛泽东才光着脚板翻山越岭而去。据他说，尽管他年轻，可以光着脚跑好几里路寻找藏身之所，但他的脚仍被严重磨伤。那天夜里，他碰到了个农民（一次又一次，每当毛泽东陷入困境时，总会碰到有人帮他的忙）。毛泽东一定有很讨人喜欢之处，因为这位素不相识的农民竟然不仅给他找地方住，而且还给了他一些钱。他拿这些钱买了“一双鞋、一把伞和一些吃的东西”。这一来，他就可以到达安全的地方了。

秋收起义失败的原因，一部分是因为毛泽东正好在他组织和发动的这次起义的举事日——即9月9日——前夕被抓起来了。但是，无可置疑的是，这位未来的主席当时也错误地估计了当地农民和（他说的组成了他的“4个团”的）安源煤矿工人的热情和军事能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起义坚持了一个星期。最后他不得不承认起义部队“纪律差、政治训练实际上不存在”，而且补充说“其中有许多开小差的”。毛泽东还承认这次起义没有得到中央委员会的批准。这个中央委员会，按毛泽东的说法，“已不下三次地批评过”他，而且把他排斥出党。按照毛泽东在同一时期的其他一些说法，上述说法很可能有些夸大事实。但他当时在党内是一个非常“不得志”的人，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从那以后，开始了中国共产党人现在所说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到1927年冬，毛泽东已在井冈山建立起了“山头”，手下的部队除原来的4个团中幸存下来的人之外，还有投诚过来的两个军阀或土匪手下的人。总共加起来有1,000名左右共产党士兵。毛泽东说，他在山上的时候，那两个土匪表现很好，好象优秀的共产党员一样；他离开以后，他们又旧病复发，重操匪业，最后被已学会打游击的农民给杀掉了。

朱德的到来，使得毛泽东手下那支成份复杂的军队得以在国民党的压迫下生存下来，尽管只是暂时的。朱德出身行伍，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他的军人资历使他成了战场上极可宝贵的指挥员。

他参加过1911年推翻清王朝的昆明起义，当时他已是一名军官。1916年后，他相继升迁为团长和旅长，参加了护国战争。据熟悉朱德的阿格尼丝·史沫特莱说，1920年以前的几年内，朱德曾不自觉地陷身于军阀作风之中，身边有妾室和鸦片烟枪。后来由于一系列巧合的事情，加上阅读了一些左翼书籍，他自愿放弃了这种生活方式，而且还煞费苦心地想出了一条戒除鸦片烟瘾的妙法：乘上一艘英国轮船沿长江旅行，在那艘船上是无法弄到鸦片烟的。以后他又访问了法国、德国和俄国，归来时已是一位训练有素的、富有第一手战斗经验的共产党员军官了。

在朱德手下的人帮过毛泽东的忙之后，有过一段混乱时期，这期间朱、毛二人曾多次设法再次建立联系。朱德当时从南昌南下到广东，又从广东到汕头。在汕头，他的部队被蒋介石的军队打垮了。不过，这次失败后，朱德得到了他多年以前在云南时结识的一位朋友（即范石生——译者注）的帮助，他这位朋友当时是国民党军队的指挥官。由于这次短暂的合作，朱德受到政治局的严厉批评，直到他移军前往湘南的宜章并在那里建立起一个新的苏维埃。

当时毛泽东的军队在食物供应上有困难，为此他在1928年曾短时间放弃了井冈山，去与朱德会合。彭德怀来到后，他们的力量就更壮大了。彭德怀手下有一支激进的游击队伍，他是在那年秋天赶来与朱、毛会师的。彭和毛一样，都来自湖南。但当彭德怀回到湘赣边界的时候，估计朱、毛已有5,000左右人马，其中只有一半人有武器。

瞿秋白的错误及在农民和城市

工人问题上与苏联的争论

党的新领导人瞿秋白，虽然主动全文发表了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原文，甚至还为该文写了导言，但是，无论作为学者——他曾把托尔斯泰的作品翻译成中文——或是作为一个政治家，他都自然会倾向于莫斯科。不知由于什么原因，斯大林撤回了他的代理人鲍罗廷，改派了一名年青的格鲁吉亚人拜苏·罗米纳兹作他的代表。同时，党的路线也突然发生了剧变，由原来鼓励与一切同情者建立统一战线变为组织公开的城乡暴动来反对国民党。当时已是劳动工会领导人的刘少奇参加的秋收起义失败了，广州起义也遭到残酷镇压。这些失败之后，瞿秋白被指责犯了“左倾机会主义”或盲动主义错误。

1928年6月至7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莫斯科召开的。之所以在莫斯科召开，据官方正式说明的原因是，因为考虑到当时在中国境内聚会太不安全。实际原因似乎是因为斯大林想取得对中国共产党的完全支配权。瞿秋白被免去了总书记的职务，仍保留政治局委员的职务。一个不知名的人取代了他的职务，但随后实际权力落到了强有力的李立三手中。瞿秋白会后留在了莫斯科，在那里，他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以“斯特拉霍夫”（即他的俄文名字，意为“忧郁”）的名字为人所知。

在此期间，李立三从他的上海秘密地下指挥部里发出了一个又一个军事命令，这些命令对富有经验的朱德（其实是对毛泽东）毫无意义。李立三要朱、毛采取“强有力的进攻战术”，向长沙和其他城镇进军。他还要求在农村发动一场战役，打掉地主豪绅的气焰，主张由城市工人发动“强大的攻势”（包括罢工和暴

动），使敌人在自己的后方乱了阵脚。当时有人告诉李立三（或许只是他自己这样说的），说俄国将给以大量的军事援助。他似乎真的相信应当以苏联为靠山，从外蒙到东北，将会有对国民党的北面侧击。毛泽东正确地认为：李立三过于幼稚地高估了中国红军的军事力量，当时红军才刚开始形成一支有纪律的军队，刚刚制定了一套可为一般士兵理解的章程和口诀。遗憾的是，这些章程与李立三的命令并不合拍。

毛泽东和他的支持者们再次从孙子兵法那里借用的口诀是：

1. 敌进我退。
2. 敌驻我扰。
3. 敌疲我打。
4. 敌退我追。

这四条指示，每一条都由四个汉字组成。至于战士在行动上应遵守的八条命令，则被谱成了中国进行曲：

1. 离开时要上门板（这些门板是被队伍临时拆下来当床用的）；
2. 捆铺草；
3. 对老百姓要和气，尽可能帮助他们；
4. 借东西要还；
5. 损坏东西要赔（这一条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6. 和农民买卖要公平；
7. 买东西要付钱；
8. 要讲卫生，尤其是盖厕所要与住家户保持距离。

据毛泽东说，最后两条是当时很有上升希望的连长林彪补充提出的。

毛泽东还抱怨说，他还经常收到一些来自李立三指挥部的互相矛盾的、失败主义的命令，要他撤到边界去。后来在延安，他告诉来访的美国人说：每当红军背离他们自己的上述口诀时，

红军就会吃败仗。他强调说，他们的部队当时都是分散的小股部队，且资源极其缺乏，“只有采取熟练的游击战术”，各个分散的红军连队才有希望在反对国民党的斗争中取得胜利。因为国民党是“在雄厚得多、优越得多的基础上作战的”。

朱德、毛泽东、彭德怀三人领导下的红军，尽量避免打阵地战。彭德怀当时已是一位杰出的游击战领导人，据说却因为与一位同事军官的妻子有瓜葛而不受重用。他们使用的战术是“先巩固”一个地区，取得农民群众支持，而后再向前推进。40年后，美国在越南反共战中也使用了同样的战术，但却失败了。李立三也和美国人一样，急于要绥靖战见到成效，他一再命令毛泽东不切实际地快速推进。李立三还希望把能得到的全部武器集中到红军手中，他以为红军可以逐渐吸收参加进来的游击队员。

按照毛泽东的说法，红军当时打算采取的是“波浪式或潮水式的发展”，而不是缺乏巩固的根据地的“跳跃式的”推进。这些战术都是从实践经验中总结出来的，但当时在莫斯科和城市地下运动中都很有权势的李立三，却硬要采取别的作法。

尽管要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中这个特别“朦胧”的时期作出判断很困难（因为关于这一时期，有许多矛盾的利己主义的记载），但事实的确是：当李立三命令彭德怀与朱德和毛泽东会师第二次攻打长沙时，他的要求确实太不切实际了。彭德怀手下新建的红军的确去攻打长沙，即攻打毛泽东曾教过书的湖南省省城，但胜利只是短暂的，三天后，国民党军队又重新占领了长沙，并且对反叛者施以严酷镇压。

在这段时间里，仍留在长沙的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遭到逮捕，随后同毛泽东的妹妹一起惨遭杀害。毛泽东家里的其他成员也被国民党关了起来。让人奇怪的是，毛泽东竟然会以为他的妻子留下来很安全，把她留在了长沙。敌人告诉杨开慧，说只要她说出她知道的有关毛泽东及其同事们的事情，就可以放她一条生路。

但她拒绝这样做，结果被绑到长沙城门外，示众后遭到杀害，时值1930年。毛泽东后来在一首词里悼念过杨开慧。但甚至在杨开慧被杀害之前，毛泽东就已开始和党的工作人员贺子珍一起生活了，贺子珍成为他的第二位夫人。

国民党出过巨额悬赏要拿毛泽东的人头，因为当时他已被传说成了一位神话人物。有一天，一架飞机从他老家的村子上空飞过，村里农民就传说是毛泽东坐着飞机回“家”了。他们警告那些种了毛泽东家里的田的人说：毛泽东会要求蒋介石赔偿他家被砍倒的树和被损坏的一切东西。

坐镇秘密指挥部的李立三认为，朱德、罗章龙^①和毛泽东领导的红军自然会对“缓慢的”产业工人运动形成帮助。莫斯科告诉李立三说：应当乘机利用由1929年发生的长期的大萧条导致的“新的革命浪潮”。军事方面，俄国人同样认为：由于北方军阀阎锡山和冯玉祥已起来反蒋，蒋介石在国民党中的领导地位已陷入危机，所以共产党应采取行动进攻蒋介石。后来据说，李立三并没有对俄国人说明当时红军本身的虚弱情况。其实，彭德怀在延安说过，他的部队直到1930年才首次与李立三领导的党中央取得联系。

当时，各游击区的领导人还经常受到来自当地的压力。然而，李立三却强调说他们是“固执于游击战的军事思想而反对扩大红军”。他常常催促他们“抛弃已经过时的游击战术，在战术上来一个根本改变”，以便能接受阵地战战术。李立三曾多次用急件命令游击队领导人，要他们做好进攻城市的准备，说城里的群众已经表示，“一旦发动起义，只要告诉我们一声，我们就会参加。”事实表明这些全是假的。

事实上，城里的群众并没有团结起来支持城市领导人。这就很可以理解朱德、毛泽东和彭德怀为什么会日益对李立三的大话

^① 原文如此，疑是“彭德怀”之误。——译者注

表示怀疑。有一段时间，他们开始用行动来反对李立三（就象以前反对陈独秀那样），但却派周恩来去批评李立三。

据毛泽东说，1930年，红军就已经克服了“李立三主义”。这种说法尽管可能不很可靠，但确实无疑的是，在一定程度上，由于彭德怀对朱德和毛泽东的支持，李立三的影响确实受到削弱。

那年年底，蒋介石调动了大约10万军队，发动了国民党五次大围剿中的第一次，这些围剿都是按照德国能干的将军范·福尔克豪森（von Falkenhausen）的主意组织的。这位德国将军当时取代了俄国军事顾问的位置，成为蒋介石的军事顾问。毛泽东后来说，当时红军加上能动员起来的有关人员在内，总共有4万人左右。虽然双方兵力数量悬殊，但是，采用“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突然打击孤立分散的国民党军队”这么一种战术，红军最后还是打败了敌人，迫使敌人撤兵。“我们的战术就是，”毛泽东说，“迅速集中和迅速分散。”毛泽东基本上用这次胜利对“清除”李立三路线作出了贡献（如果可以这样表述的话）。四个月后，蒋介石发动的第二次大围剿同样遭到了失败。然而，虽然李立三及其政策已威信扫地，但毛泽东这时距离掌握领导权还很远，而且政治局再也没有授权他处理军事问题。确实，毛泽东说过，从1932年10月到1934年红军长征开始，他的时间几乎“全用在”苏维埃政府的行政管理上了，军事指挥权交给了朱德和其他人。

日本人侵占东北

1931年，日本人入侵东北，这给莫斯科和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带来了新的军事和政治问题。尽管苏维埃中国仍然受国民党包围，很难在对日作战上有所作为，苏联还是向日本正式宣战了。^①实际上，如果当时有机会对日本采取军事行动，莫斯科很可能是不

会对日宣战的。莫斯科的长远规划（如果它有长远规划的话）似乎是：先把中国统一起来，然后再考虑对在1910年占领了朝鲜的日本发动攻击。俄国人鼓励东北人和蒙古人发动一场自治运动，目的在于取得对这一富含煤炭矿藏的区域的控制权。当时在中国流传说日本有一句“格言”：“要征服世界，就要先征服中国；要征服中国，就要先征服中国东北和蒙古。”

东京的军事权威人物（很可能不一定让他们的政府知道）当时计划在1932年侵占中国东北，但驻扎在东北的关东军迫不及待，而且一系列事件也对日本人有利。1931年9月，日本人侵占了沈阳，随后又很快占领了长春、安东、营口和吉林。5个月后，日本人就控制了东北全境。而且，是在持孤立主义观点的美国总统赫伯特·胡佛1932年1月宣布美国不卷入战事之后，日本人才开始占领中国东北全境的。“为了使赤裸裸的侵略行径合法化，日本人制造了‘满洲国’这个傀儡国。”然而，由印度副总督劳德·利顿（Lord Lytton）领导的国际联盟委员会并没有被这种表面现象迷惑，它仍然谴责日本是侵略者。

罗章龙、李立三及立三主义的终结

由于过高估计红军的军事力量，由于甚至过高估计全国政治舞台上的“革命因素”或力量，李立三最后失去了影响。尤其是全国劳动工会对他极为不满，因为他那进攻性的战术导致工会遭到国民党极为严酷的镇压。实际上，工会领导人曾经说过：基层工人甚至于害怕加入工会。然而，1930年召开的六届三中全会上，为推翻李立三而作的努力却遭到了失败，尽管李立三会后被召到

① 据我国史学界以往有关资料反映，苏联在1931年并未正式向日本宣战，

——译者注

莫斯科，在那里过了几年流放生活。斯大林当时认识到李立三缺乏权威，不足以贯彻莫斯科关于以城市工会为基础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如今在中国，李立三可能是那些早年曾向毛泽东挑战过的人中最著名的一个人。斯大林当时用帕维尔·米夫（Pavel Mif）取代了李立三（米夫原是中国中山大学的名誉校长），要他去平息中共的党内斗争。米夫上任时，陪他来华的有原先在苏联留学的一帮大学生，他们就是后来人们所知道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

在李立三离任之后、王明于六届四中全会接任之前，有一段时间是罗章龙担任党的书记，好多共产党人当时都承认他为党的领袖。1931年1月上海举行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在一段争论中，罗章龙大发雷霆，扬长走出了会场，说是再也不回来了（也不可能再回来，不然就太丢面子了）。然而，这种举动确实使他丧失了党内的一个重要职位，而且使得王明和“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这些人已和罗章龙吵崩了）得以指责他不守党的纪律、“给党设置障碍”。另外，在选举前，他们还指责罗章龙不民主（在那次选举中，罗章龙被开除出党了）。有意思的是，这次开除还报到了共产国际。大约6个月后，共产国际批准了这一开除。

毛泽东对那次会议并没多大兴趣。那次会上，罗章龙竭力以劳动工会为基础来制订党的政策，试图反对“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和苏联，或把“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与苏联分开。实际上，自被开除以后，罗章龙曾试图建立一种独立的、以工会为基础的、不依赖那些归国学生和苏联的领导。当罗和他的那帮支持者被英国巡捕抓起来并移交国民党手中的时候，罗章龙的计划已取得了部分成功。被交给国民党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被杀害了，罗章龙逃到了香港。随后，他又返回内地，化装后在党内又工作了一小段时间。后来他又第二次逃到香港，几年后在河内死在胡志明的一座监狱里。^①

在毛泽东开列的不光荣的人的名单上，罗章龙排在第四位。他谴责罗章龙领导了“一小撮分裂主义分子”，这些人“后来都变成了右倾分子，而且堕落成反革命分子”。有些坚决支持罗章龙的人，后来被指责为替蒋介石出谋划策。罗章龙这位当年曾响应毛泽东在报纸上登的征友广告——即征寻“能吃苦耐劳、意志坚定、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青年”的那则广告——的人，竟然会（用毛自己的话说）“参加了共产党而后又转向了”，这让毛泽东从个人感情上为他感到痛心和耻辱。在毛开列的那张不光荣的人的名单上，瞿秋白是唯一受到毛泽东悼念的人，这也许是因为瞿秋白是在长征期间被杀害的。中国共产主义政权的编年史上，罗章龙一直被说成是一个叛徒。

与王明路线的斗争

幸亏毛泽东和朱德当时都“在他们的‘山头’上”，没有卷入党内这些威胁到党的生存的重大斗争。李立三被王明——即归国学生或“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的首领——取而代之了。的确，王明最后是斗败了李立三及其思想，提出了一种新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然而，尽管王明有莫斯科作坚强后盾，他要想在身处穷乡僻壤的红军中建立起自己的威信，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王明是一位杰出的演说家，原名陈绍禹。他起初是在1928年于莫斯科召开的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为一名出色的口译人员受到人们注意的。回国做过一段秘密工作之后，1929年他在上海便作为留苏学生——即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人物

① 这里对罗章龙的下落所作的叙述，与实际严重不符。据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党员知识手册》介绍，罗章龙仍然健在，且担任全国政协委员职务。——译者注。

出头露面。虽然他和李立三一样反对毛泽东的游击战术，但他却在李立三担任领导职务的后期给李立三找了不少别的麻烦。

意识到当时政治局内部的严重分裂和不和，毛泽东大胆地邀请全体政治局成员出席将于1931年11月7日在瑞金召开的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以对毛泽东赏脸的姿态出席了会议，心里想的不是支持毛泽东的苏维埃，而是要杀一杀毛泽东的威风。毛泽东后来对许多来访者提到过这件事，但他的对手却声称说：在当时权力斗争的关键时刻，政治局委员全体出动来到瑞金，这是受当时从共产国际来的军事顾问李德支使的，唯一目的就是要推翻并撤换毛泽东。在此之前，毛泽东就已受到过党内批评，说他不仅是“一般的意识形态贫乏”，而且是“机会主义的实用主义”，指责他没有采取强有力的“阶级和群众路线”。然而，由于粉碎了国民党的两次大围剿，毛泽东及其同伴们的精神状态很好。

毛泽东的个性控制了整个大会，在明显的权力斗争中，只有三个留苏归国学生——其中包括缺席会议的王明——被选进中华全国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

毛泽东这次取得了重大胜利，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已建立了自己受当地农民全力拥护的苏维埃（或称“山头”）。另外，他有自己的党政机构，而且，也许最重要的是他有一支独立的、在巩固的根据地起作用的军队。但毛泽东依旧是一个局外人，而且并没有象他希望的那样被吸收进政治局，因为他和那些留苏回国学生之间的分歧太大了。尽管毛已成功地运用了游击战术，那“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却仍然要求他接受阵地战战术。谈到当时正日益严重的来自日本的威胁，毛说他提出要进入统一战线。政治局却拒绝与他们所说的“改良主义集团”进行军事合作，反而主张红军迅速扩军，以便能够担当起“保卫苏联免遭帝国主义攻击”的“崇高职责”。

蒋介石在1931年7月发动的第三次围剿，因为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和1932年在上海开辟了第二条战线而缩短了时间。但是，由于惧怕苏维埃——即游击区——的成就，蒋介石认为他在消除“赤患”之前无法有效地进行抗日战争。他的德国顾问也持此看法。1933年5月与日本人签订的“塘沽协定”，为蒋介石发动第五次围剿提供了机会。这次围剿由蒋介石在1933年10月发动，他调集了大约70万军队。这一次，蒋介石用他所谓“战略上取攻势、战术上取守势”的办法，企图把红军包围在各个山头上以困死红军。国民党军队在苏区周围修建了许多要塞和碉堡，同时，蒋介石还向农民许诺，答应为他们“重建家园”。他宣称说，七分问题是政治——共产主义问题，只有三分是军事问题。

1933年11月，福建发生了一次反叛蒋介石的活动（即由当时国民党第十九路军领导人蔡廷锴等人领导的抗日反蒋的“福建事变”——译注）。反叛者们已在福建成立了一个“山头”，但当时由“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领导的政治局却作出了一个十分错误的决定，不给反叛者援助。毛泽东当时确实试图搞一些协作行动，以便既支援他的同志们，又迫使蒋介石在两条战线上作战。国民党部队对毛的计谋不加理睬，于1934年1月集中力量镇压福建的反叛，暂不去管毛泽东和朱德。

由于在外部受到来自蒋介石的攻击，在内部受到竭力破坏毛泽东地位的那帮留苏回国学生的干扰，毛泽东的处境十分艰难。让人感到惊奇的是，毛泽东竟然从这样的环境中挺过来了。有一段时间，他的个人权威受到严重削弱；同时，由莫斯科鼓动起来的势力第一次使毛泽东处于明升暗降的境况，把他弄成了一个没有实权的挂名首脑。这种状况在毛漫长的一生中以后还要碰到多次。莫斯科把毛泽东排斥在党的会议之外，有几个月的时间，毛泽东头上布满了政治阴云——如果实际上不是被软禁起来了的话。但是，正象毛泽东自己所指出的那样，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作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长征与和张国焘的斗争

毛泽东已经做好了准备，而且也已有权作出决定，计划撤离以某种方式作了7年造反根据地的“苏维埃共和国”。后来，据说共产党人之所以离开江西，还有一个目的是要便于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作用。但实际上，那年10月中旬从瑞金撤离完全是为了躲开敌人。

成千上万的男人离开了妻子，伤病员也留了下来。据猜测，许多伤员后来都牺牲了；妇女们都疏散到了老百姓家中，其中许多人在一两年没得到丈夫的音讯的情况下改嫁了他人。毛泽东自己的两个孩子也留给了老乡，只带了他的第二位夫人贺子珍随行，贺很快就又怀孕了（那两个孩子后来也再没听到音讯）。

正规部队不仅因他们的每一门大炮受拖累，而且，各种笨重的机器也给他们增加了负担。他们把机器拆成零件带走，想着有一天一旦安定下来，还要再安装使用这些机器。红军走的路，使人回想起19世纪末美国人在派克斯峰周围的洛基山中走过的路。当时，美国人为抵达西海岸，把他们珍贵的家具扔出了带篷马车。中国人走过的这条路上，则是扔满了机器部件和枪支，因为很不幸，他们的马匹很少，实际上除了人就再没有别的运输工具。

毛泽东这时指挥着红军的一支骨干队伍，因为好象是在蒋介石军队对红军缩紧包围、瑞金城面临严重危机的时候，毛泽东的权威又重新得以树立。在信丰打过一场短暂的战斗之后，红军成功地突破了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圈，迈着疲惫的步子，以每天或每

夜25英里的速度前进。蒋介石的部队不仅有火炮、卡车和装甲车，而且有飞机。当红军各纵队在白天行军暴露目标时，就会遭到蒋军飞机的骚扰。抢渡湘江的战斗打了一个星期，红军付出的代价是力量损失了一半，因为许多人当时认为夜间行军太辛苦、太容易有人开小差。直到1935年1月抵达贵州北部的遵义城，一直都是“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掌握党和军队的统治权。他们在向西转移时，从未高涨过的士气已低落到了极点。

人们普遍公认遵义标志着毛泽东一生中的一个关键转折点，因为在那里确立了他对全党的控制权。到遵义后，刚有一段相对安全的时间，毛泽东就提议召开扩大的（当然要把他扩大进去）的政治局会议。会议一开始，毛就激烈抨击了“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指责他们没有支援福建暴动，指责他们愚蠢地、错误地决定打阵地战。在以往一直忠诚于“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的周恩来的支持下，毛泽东击败了“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及其西窜新疆、背靠苏联创建立足点的计划。毛泽东当选为新设的政治局主席^①，他和周恩来一起决定长征应当北上陕西。此前一直是红军总政治委员的周恩来，这时让位接受毛泽东的领导。

为了欺骗一直在红军后面穷追不舍的国民党军队，为红军渡过长江创造条件，红军作了许多迂回行军，设置了许多骗局。他们故意表现得好象要进军长江上游少数可以渡江的渡口之一龙街渡口。蒋介石立即调集军队，部署包围圈，而且把长江南岸的船只全部转移烧掉。然而，就在一个国民党飞行员刚向他的上峰报告说红军正在建一座至少要用一个星期才能建成的竹桥以后，红军却突然折转去向。经过一连串急行军，穿着缴获来的国民党军装，一个营的红军在一个夜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了唯一可以渡江的另一个渡口——位于云南境内的皎平渡，不声不响就解

^① 原文如此。遵义会议毛泽东当选为政治局常委，张闻天为总书记。——译者注。

除了国民党守军的武装。他们说服一个国民党哨兵去收集船只——因为这里的船只没有烧掉。过江以后，对面的国民党驻军正在玩麻将，措手不及就被红军消灭了。这样，红军只用了9天时间就全部过了长江，而且没有损失一兵一卒。一过江，他们马上就烧掉船只，迫使国民党追兵不得不绕到别处去过江。

长征继续穿越四川省前进。在四川境内，红军遇到了比以往更严重的障碍——大雪山和大渡河。的确，强渡大渡河和抢夺泸定铁索桥，是整个长征中最著名的胜利，也最需要伟大的英雄主义行为和坚韧毅力。考虑到用船只渡河太慢、太费时间，有可能使国民党赶上来包围红军，红军决定动员连续急行军，抢占大渡河上唯一的一座浮桥泸定桥。虽然铁索上的全部铺板都让敌人拆掉了，顽强的义勇队还是冒着对岸守桥敌军猛烈的机枪火力冲过桥消灭了守敌。许多人因受伤掉入河中。对那些等待过桥的人来说，胜则存，败则亡。

一旦过了大渡河，红军就再也不会受到国民党部队骚扰，但横亘在面前的却是大自然为他们设置的障碍。实际上，在穿越人迹罕至、没有什么东西可吃的大草地和中国好战的部落居住区时，红军的损失仍然很惨重。只有8,000人继续前进翻越了岷山和六盘山区，到达相对安全些的陕西省。长征途中，毛泽东与张国焘在有关红军的最终去向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后者自从1931年以来，一直是鄂豫皖苏区党的领导人。以前，他们两人在有关红军游击部队该采用什么战术上就已经有过分歧和冲突。在开过两次协商会也未能统一思想的情况下，张国焘带着一部分人（包括朱德在内）西去俄国方向，毛泽东则带着一部分人北上陕西。直到几十年后，在北京才对朱德为什么没有和毛一块留下来作出了令人满意的说明。原来，朱德实际上已劝说过张国焘，但他们的部队已经和毛的部队分开了，这就断了朱德的退路。张国焘率领的部队随后遭到了严重的苦难，损失惨重。待到 he 最后来

到延安与毛泽东会合时，他已经没有资格再向毛的领导权挑战了。

就战术意义上讲，长征实际上是一次大撤退，因为它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灾难，人员损失达百分之九十。但是它却成为本世纪最伟大的军事创举。毛泽东总喜欢把它说成是“对共产主义来说的一次伟大的精神上的胜利”。他说：“如果它的参加者能够赢得长征，他们就会赢得任何事情”。长征者们中间的核心，形成了一种紧密团结、富有凝聚力的领导，这个核心在随后30年中大体上没有什么变动。邓小平和在毛的晚年担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陈锡联，在林彪阴谋政变后担任国防部长的叶剑英，中国的“原子弹之父”聂荣臻，党的财政能手李先念，先在北京任司令员、后调任新疆军区司令员的杨勇，以及后来被说成“大叛徒”的刘少奇，此外还有林彪，这些人都是这个核心中的人物。

长征中在政治上很活跃的少数妇女之一是邓颖超，即周恩来的夫人。周恩来在长征途中身患重疾，有6,000多里路程不得不躺在担架上让战士抬着走。红军在过彝族区时，彝族部落首领对所有的汉族人都恨之入骨，扬言谁若帮助长征的人，就要烧死谁。由于不抢就无法得到食物，红军有时候不得不为争取几头牛羊而打仗。据毛泽东说，有时“要得到一头绵羊，就要搭上一条人命”。不过，当毛泽东说下面这番话时，他显然是有些夸张了——他说：在靠近西藏、海拔很高、空气稀薄的地区，蔬菜作物长得比正常情况下大五、六倍，一个萝卜可以“够十五个人吃饱”！

不过，对毛泽东在延安所做的“统计学上的概括”却值得重提。他说，几乎平均每天都有一次遭遇战发生，有15个整天被用于打大决战。在长征经历的368天中，有230天用于白天行军，18个晚上用于夜行军（据我从与经过长征的人的谈话及他们的著作中判断，估计用于夜行军的时间要多得多）。100天是花在停顿上的，其中又有许多天用于打遭遇战。据说红军翻过了18条山脉，

跨过了24条河流，占领过64座城镇，而且，除了国民党军队外，还躲过了10个省的不怀好意的军阀。

干部们刚一安全到达延安，马上就开始在黄土山坡上挖筑窑洞，不几个月，全部常设机关就都住进了窑洞。由窑洞又逐渐发展成如今天去延安旅游的人可以看到的宿舍：在山坡上挖出的两间屋子。一间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办公室，靠内的第二间是卧室。一副蚊帐就算是很高级的奢侈品，糊有宣纸的格子窗就是地位和身份的象征。

当地的老百姓缺乏组织，当地原先的共产党人也忽视了这个问题。这里的共产党人在20年代初期就建立了一块根据地，但却很少致力于建立行政机构。人们公认这里的生活水平远低于中国东南方的生活水平，而且困难成堆。邓颖超在解决了基本卫生问题之后，马上又着手组织发动预防流行病的战役。她和许多人当时都已尝过这些流行病的苦头，如结核病。随后她又宣传破除女孩子缠脚及买卖少年儿童（特别是卖女孩子）的陋习。

长征途中，毛泽东、周恩来和王明、张国焘一起当选1935年8月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委员。由于欧洲共产党人对纳粹德国和墨索里尼统治的意大利都很担忧，所以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政策这时得到了广泛的接受。但是，因为俄国人担心日本人入侵，这就使克里姆林宫比前几年更愿意和有权势的国民党军队妥协。这样一来，中国共产党就仍旧是一位“可怜的远亲”。

第三章 延安时期

一块思想和实验基地

从延安的生活中，逐渐形成了一种社会和政治模式，巩固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当张国焘和朱德带着他们那支被打得七零八落、饥寒交迫的队伍到达延安时，用比喻性的语言来说，他们向毛泽东叩头认错了。毛泽东当然是够聪明的了，他很好地款待了他们。一些很小的事件在这个被隔绝了的团体的各成员中引起了很大的关注，毛泽东的通大便问题成了一段时间内人们谈话的经常议题之一（因为，从吃大米变为在长征最艰难的日子里吃黍类食物，使毛泽东和其他许多人都患了经常性的便秘病），以致每次通过大便之后，人们都会向他表示庆贺。这件事看起来似乎有点儿可笑，然而，许多经过长征的人在刚到延安之初都受过这种折磨，这却是确切无疑的事。因为他们不得不吃黍类食物代替大米和肉类，而且缺乏水果和蔬菜。不过，他们确实设法搞到了一些烟草（后来是他们自己种烟草），每当毛泽东考虑什么紧迫或重大问题时，他那窑洞里就会充满从手工卷的纸烟中释放出来的烟雾。延安产生的安全感，使毛泽东可以晚上一直谈话到二、三点钟，然后白天一觉睡到正午时分——这对毛泽东来说已是一种很大的奢侈。

如前所说，埃德加·斯诺是最早打进延安的西方记者之一，

他1936年7月到达延安。斯诺不怀疑毛泽东正是他要找的“老板”，他得到了唯一经毛泽东认可的属于第一手资料的传记。这本传记两年后以《红星照耀中国》（中译本书名是《西行漫记》——译者注）为题问世。它表明斯诺的运气真是太好了，因为毛泽东和所有的中共领导人总是不愿给别人讲他们以往的生活详情的。也许他们最初是不想让同志们知道他们还有一些亲戚是富农、商人或银行家，但发展到今天，却形成了一种传统，认为透露个人过去的背景、学历和生涯几乎是一种有失体统的行为。当毛泽东在世的时候，北京就曾经把透露这类情况的作法叫做“自吹自擂”。斯诺回忆说，当他正在记录由口译人员翻译的主席生活的细节时，主席的夫人贺子珍——她当时正在厨房里准备饭菜——也从厨房里走过来听她丈夫讲述，似乎这些消息中有许多是她从前不知道的。贺子珍不久就病倒了。她在长征中生过一个儿子，从那以后身体就再没复原过。虽然她在和毛泽东结婚之前也是一个热情奔放的党员和工作人员，但她并没有参加过邓颖超组织的城市社会和管理活动。

斯诺到延安后不久，著名的“西安事变”就使与国民党之间的政治问题更加复杂化了。事变中究竟发生了哪些事情，从未充分透露过；只是说有一天早晨六点钟，蒋介石在离西安大约半小时路程的温泉被绑架了。只有很少几个访问者——我是其中之一——被允许看到过蒋介石和他的情妇下榻的那间小屋，那屋有一个很小的后窗户，蒋介石就是从那个窗户中逃出屋子的。他出逃时没穿外衣，也没戴假牙，逃出后跑到了疗养所后边一座陡峭的山坡上。对蒋介石这位上了年纪的人来说，爬山的事实在太吃力了，那些追捕他的人要比他敏捷得多，所以很快就抓到了他。这次事变过后40年，我从北京得到的资料表明：早在事变之前，蒋介石的一些部队就已受到“赤色分子”宣传的影响，强调建立统一战线的好处。的确，由于周恩来的组织作用，许多传单已散发

到国民党军队中，质问“为什么中国士兵要打中国人？”但更为重要的原因也许在于：当日本人不断蚕食华北领土时，离延安共产党人很近的由张学良（即少帅张学良）和杨虎城二将军领导的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两个师，已经不那么热心拥护蒋介石了，因为他们认为他们的枪口更应当掉转过去打“外国侵略者”。周恩来在1936年6月间与张、杨二将军建立了秘密联系，随后又发展到双方定期会晤。当时他们就已开始商量建立抗日联合统一战线了。他们双方还同意在有什么军事行动或什么有计划的进攻之前互相通气（当然也是秘密的）。

蒋介石访问西安时，张学良将军相当坦率地向蒋提出了自己对统一战线的看法。蒋介石粗暴地拒绝了这些看法，而且随后又很快决定把这两个看起来支持与“赤色分子”合作的师南调。这位总司令再次返回西安商量拟议中的部队调防计划和他想重新发动的反共战役时，就被抓了起来。毛泽东非常想把蒋介石弄到延安审判，但莫斯科坚决反对这样做^①。听说蒋介石被“赤色分子”抓起来了，全世界都为之震惊，蒋介石本人和国民党人大大地丢了脸。莫斯科指派周恩来和后来成为国防部长的叶剑英立即去西安谈判释放蒋介石的事，因为莫斯科“希望留下他当领袖”。这件事表明了莫斯科当时的权威。蒋介石的夫人、孙逸仙博士那位亲共产党的遗孀宋庆龄的妹妹，来到西安与蒋介石谈判，当然，也是为了证实蒋介石的情妇是否已离开。虽然蒋介石同意了共产党提出的要求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实质性观点，但是，在莫斯科的压力下，共产党却没有得到任何文字性的协议。国民党部队也没有再进攻共产党人。若干年后，周恩来总理说，蒋介石并没有信守关于采取联合军事行动抗日的协议。

张学良将军出于“侠肝义胆”，陪送他前不久的那位阶下囚

^① 这一段有关毛泽东对“西安事变”的处理态度及莫斯科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作用的叙述，与我国中共党史界的基本说法很不一致。——译者注

（即蒋介石——译者注）回到南京，他一到那里，马上就遭到了逮捕。随后对他进行审判，判了他10年监禁。国民党撤离大陆前夕，他被转移到台湾；从监狱里释放出来后，他仍然被软禁着。事实上，据张学良的弟弟在评论最近一部描写“西安事变”的电影时说，张学良至今还被“限制在自己家里”。

毛泽东当时实际上并没有说话。这时他松了一口气，坐在一旁想自己的事，因为他屋里的蜡烛一直亮到深夜。他打算整理一下他已经写下的军事和政治文章，设计新的“思想”。他每新写出一篇文章，无论是论述党的组织的文章还是论述抗日策略的文章，都要先征求一小批高级领导同志的意见，然后再以讲演的方式向广大听众发表。

毛泽东的夫人贺子珍在离开延安去莫斯科治病前，为毛泽东又生了一个儿子。贺子珍当时显然是因为上海小女明星江青的到来才患了现在所说的“精神分裂症”。江青体态苗条，处事果断，有一双“漂亮机灵的”眼睛。邓颖超曾去西安试图说服贺子珍返回延安继续治疗，不要去莫斯科。贺子珍流着眼泪告诉邓：她和主席之间的一切事都已经完结了，事情既已如此，她最好是尽量躲得越远越好。

关于江青最初是怎么见到毛的，人们说法不一；但一位当时在延安的女士告诉我，说他们第一次是在一次讲演会上碰面的。江青一到延安，马上就得到了当时有权势的安全部长康生的保护^①。康生曾经访问过莫斯科，而后又在新疆见到过王明。正是通过康生的影响，江青才找到了一份工作，在毛泽东的内部军事机要办公室当档案管理员。康生和江青除了都是山东人之外，二人还有某些共同的东西。据批评康生的人揭露，康生不过是想用江青来加强自己对主席的影响。然而，康生在离开延安之后很久，

^① 此处康生的职务，是据原文译出的，疑不确。——译者注

实际上是在他后来的全部生涯中，都是坚定地忠实于江青的。江青初到延安的时候，对任何扶助她的人都很感激。她与毛泽东婚后不久，就为毛泽东生了一个女孩。象邓颖超这样一些老一辈女战士，各自都有与江青不同的社会背景，她们都受过很好的教育，阅历丰富，且在组织妇女运动方面富有经验。当时的配偶们，别人是不邀请他们吃饭或参加讨论的，因为他们都已是丈夫或妻子了；他们各自都或者在某一既定专业上有专长，或者根本不参与工作。

当时，政治局的人强烈反对毛泽东同江青结婚。因为大家认为贺子珍是党的优秀工作者，而且已为主席生了5个孩子；再说，经过长征，贺子珍的身体也可能很不好。延安的女士们也担心这位二流电影明星对主席影响太大，因为主席当时显然已经迷上江青了。所以，当时的高级领导同志都只是在这么一个条件下才同意这门婚事的，即：不许江青参与政事。实际上，在延安时期，除非有人来他们的窑洞拜访，江青是很少和主席一起露面的。甚至连俄国代表团的成员也认为江青很有魅力，虽然她很少开口说话，而且似乎总是急不可耐地想取悦于主席。不过，她确实每次都去参加每星期六晚上的“舞会”，那是延安当时最大的社交场面。主席的华尔兹跳得不怎么行，狐步舞也不熟练，但兴致却很高；江青则是一位舞场老手，舞姿优美。周恩来的舞也跳得很老练。

让人奇怪的是，这些共产党人当时从延安的舞厅中得到了无害的娱乐，但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们却竟然认为应当在中国禁止跳舞。在那场动乱之前，北京饭店那间地板富有弹性的舞厅里，经常设有茶舞会（即设有茶点的舞会——译者注）；而且，周恩来总理也经常是在理过发后，先到这个舞厅跳上一刻钟的舞，而后才返回办公室。70年代初期，不仅在舞厅里跳舞被认为是“颓废的”事情，而且连向外国侨民提供家务服务的外交事

务局也下令要招待员和所有其他的人“撤离”一切有舞会的外国侨民区。只是在“四人帮”垮台后，这种情况才慢慢儿有所改变。北京的国际俱乐部开设了舞厅，而且，直到1981年11月底突然有一张通告说不再设舞会之前，外交使馆中的舞会也没有再受到反对。虽然相对而言参加舞会的中国人很少，但主管官员还是暗示说，舞厅走廊里发生的“欺诈行为”太多了，其中有来自第三世界的外交人员参与。

延安时期，毛泽东实际上还教过青年人打麻将牌，但这种活动在70年代初期也被当作陈腐的娱乐活动加以取缔。从来没有人对毛泽东在行为标准上的这种突然变化作出过令人满意的解释。有些解释暗示说，因为麻将容易引起赌博——中国的工人至今仍有对赌博很感兴趣的，而不是所有的娱乐活动都受到禁止。我也确实听到过饭店职员在靠近我的房间的空房里玩麻将。

后来，主席称在延安的时期是“黄金时期”。一年后，一有机会从军事和政治问题中抽出身来，他就去认真研读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实际上，正象斯图尔特·施拉姆（stuart sohram，美籍学者，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系教授，著有多本有关毛泽东的论著。其中《毛泽东》一书，已由红旗出版社1987年12月出版了中译本——译者注）说过的那样，从1938到1940年间，毛泽东本人的著作分属两个领域：首先是战争中的军事问题，其次是政治问题——眼前的或长远的政治问题。毛泽东曾写过一个小册子，论述主要供“红军”使用的日常游击战的战术问题。后来他又探讨过游击战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而且只有在这时才真正具体研究了日常战争的战略问题。

在写作过程中，毛泽东得到了1937年到达延安的陈伯达的帮助——如果不是受后者启发的话。陈伯达原先当过教授、记者和地下政治工作者，直到1940年左右，他才在毛的心目中有了特殊的印象。当时号称“新起的理论家”的陈伯达，当上了主席的政

治秘书，而且几乎把全部时间都用来协助主席起草政治讲话稿和政治文章。另外，他还为中共的新闻社写过一些有见地的批评报导，抨击蒋介石的法西斯主义倾向和“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仍在坚持的“错误路线”。因为，自从王明在苏联呆了6年、于1937年回到中国以来，亲苏分子的权力和威望已明显有所上升。离开莫斯科之前，王明曾与斯大林会谈。据江青说，王明曾经“正式”代表共产国际，表示反对毛泽东向来主张的土地改革政策。然而，为江青写传记的罗克珊·维特克（Roxane Witke）却暗示说：“争论在江青思想中留下的印象要比个人对抗或王明在领导集团中那种讨厌人的表现在江青思想上留下的印象淡薄些。”江青强调的是主席的善良性情，她说主席“表现得宽宏大量，甚至在他（指王明——译注）遇到危险的时候还伸手拉他一把”。江青举例说，1945年召开的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没有一个代表”愿意选王明进中央委员会。“只是经过主席劝说，他们才选了他。”不过，王明在中央委员会委员中的名次排在第43位（七届中央委员总共44人——译者注），他的职务则排在第44位，是最后一名。江青在上海当女演员的时候，曾经吃过那些支持王明的人的苦头，这一点无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为什么江青会对王明有恶意。实际上，毛泽东之所以提名王明当中央委员，是因为受到俄国人的压力。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在毛泽东办公室或毛泽东办公室周围工作的那三个人，即江青、陈伯达和毛泽东的安全部长康生，后来都成了左倾的核心人物，而且在差不多20年后都成了组织“文化大革命”的那个小组的领导成员。

当时在延安更重要的一个人物是乔治·哈特姆（即现在人们所称的马海德）博士。他是一位黎巴嫩血统的美国医生，因其政治信念而于1937年来到延安。他在延安，既是一名无私的医生，又是一位很棒的口译人员。他娶了一位漂亮的中国姑娘，生过一

个儿子（这位儿子现在已将近40岁，没有说英语）。和许多长期在华工作的外国人一样，马海德也很少与非中国籍的外国侨民打交道。但我有幸因一次偶然的机会在海南岛见到了他。他仍然很活跃，而且热情地介绍中国人如今在医院里如何工作，这给本来就为数不多的见过他的外国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实际上，在1973—1976年间（当时本书作者正担任《每日电讯报》驻北京记者——译者注），在许多外国人中间只有一个在华当过多年翻译的人曾经定期与我碰头。该君是一个学识渊博的美国人。他为我理解当时中国党的现行路线给以帮助。其他在北京为中国政府工作的英国人和美国人，每当在公开场合接触时，也都是十分坦诚的。

同样有趣的是，在延安的日子里，外国人竟然很容易地就可以同中国人结婚。而今这一点实际上是不可能的。1975年间，曾经有一个中国人爱上了一位似乎也信仰马列主义的英国学生，他们申请结婚，但男的很快就被送到离北京“好几百里远”的一个不知名的农村公社，女的则离华回国了。甚至到1981年，也还有一个名叫李霜的知识分子，因为和她那位身为外交官的、向她提供财政资助的法国人有瓜葛，被遣送到劳改农场接受为期两年的“再教育”（后来由于法国政府出面交涉，她没有到两年就被释放，并获准离开中国去巴黎）。从来没有给哪位男性记者分派过女性的翻译人员，我的那位翻译（女性的）只获准在经过允许的情况下六个月同我吃一顿饭。我想，这大约是怕她受到我的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吧。“四人帮”倒台以后，这种情况也得到了改变。但情况仍然时有反复。

西安事变后，周恩来成了毛泽东身边第一位处理棘手问题的能手，他的夫人邓颖超仍然留在身边精心照料他。随后，周恩来先是在延安和南京之间穿梭，后来又是往返于延安和重庆之间，因为重庆后来成了蒋介石的战时首都。他总是不时返回延安，去

领导与莫斯科或与华盛顿的谈判，由此就逐渐成为主席身边未正式任命的有权威的顾问和可信赖的代理人。他那天生的风度、处理问题的外交技巧以及他丰富的世界知识，都对毛泽东非常有用。

在延安的岁月，不仅使毛泽东及其支持者们有时间考虑他们取得政权后所应采用的共产主义类型，而且也为他们提供了试验他们的经济和社会计划的机会。在延安，显然十分需要自给自足。北京的经济事务专家之一李先念，20年代末、30年代初曾经领导过鄂豫皖苏区（或称“山头”），这个苏区当时仅次于朱德和毛泽东领导的江西苏区。李参加过长征；而且，按照毛泽东的说法，虽然“他没有上过大学，也没有受过任何高等教育”，但却成了主席身边第一号富有经验的财政顾问。他使用了一种地方货币，同时辅之以严格的定量供应制和高度的“政治觉悟”（在西方，“政治觉悟”叫做公众意识），使每个人都可以得到合理的衣食供应，只不过衣服有点儿粗糙。那里没有鸦片烟（这一点很重要），而且，虽然据说许多战士都是为了逃婚才加入红军，但总人口性别比例也还正常，且很少有士兵强奸当地女孩子的事。

延安时期取得的另一大发展就是文化气氛的发展。据在访问延安后写过文章的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Harrison Foyman)说，左翼知识分子绝大部分来自上海，“就象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英国当代思想家、律师和国际活动家、讲演家，1902年出生。——译者注)与孔夫子相去甚远一样”，他们与战士们的“农民情趣也格格不入”。尤其是，他们确实有点儿瞧不起没有文化的农民。反过来，农民也没有时间象城里那些有高度文化修养的人那样只为自己高兴而赋诗、作画、写小说。据和毛泽东一起在延安的人说，毛泽东当时在领导权上一步步上升：从一位年青的革命游击队伍领导人成为更成熟的“军事战略家和政治理论家”，使他得以有时间讨论艺术问题。无疑，在这方面他

也受到过江青的激励。经过和左翼知识分子的一系列讨论和辩论，毛泽东写出了他那篇如今很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毛泽东在文章中指责说：作家和艺术家们远离广大群众、“生活空虚”，其结果是使自己不“熟悉人民的语言”。讨论中，毛泽东坦率地说，他自己年轻的时候也曾经认为挑行李有伤体面；而且补充说，他当时并不在乎穿知识分子穿过的衣服，但却不愿意穿农民穿过的衣服，因为觉得农民穿过的衣服不干净。这番话感动了许多人。毛泽东还指出：从上海的“亭子间”出来的人并不都是优秀的共产主义者，他们的作品常常资产阶级味道太浓。他坚持说，作品现在应当为人民大众而作；在革命文学中，那些“无用武之地的英雄”是没有什么地位的。诚然，毛泽东的许多观点还有点混乱，但他的主要目的是要为讨论指出一条道路，使讨论能够把陈腐的封建的文学形态逐渐转变到有利于尚未成熟的革命文艺的形态。“一切有害于人民大众的黑暗势力，都应当被揭露出来，”毛泽东宣布这就是革命文艺家和革命作家的基本任务。当毛泽东发表上述著名的讲话时，江青始终在为他做秘书工作。他的这些话，无疑为江青后来指导创作的芭蕾舞和电影铺设了道路。有趣的是，据当时的目击者讲，毛泽东在来座谈会发表他的第一次讲话时，是“坐着小汽车”来的——它是主席的身份的象征；而且，虽然当时天下着大雨，在他概要地叙述他希望用什么方法来保证文学艺术为革命事业服务的时候，挤满了人群的礼堂外面，还是坐着几百人听他讲演。毛泽东坚信文艺能够用来“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

在座谈会长时间的讨论中，王明的许多支持者曾“站起来反对”毛泽东的意见。他们尤其不赞同毛泽东的下述告诫，即：当帝王们否定言论自由的时候，“冷嘲热讽”是正当的作法；而在新政权下，“冷嘲热讽”就不合时宜了。另一个不赞同毛泽东的

看法的人是著名的男女平等主义者、著名作家丁玲，她当时正在对毛泽东主张的党对文艺工作的绝对控制权提出批评。丁玲是男女平等主义的领头人之一，她引述延安当时存在的男女不平等现象来批评共产党领导人，说他们没有贯彻他们所宣传的崇高理想。这次座谈会过后不久，很快就发动了一场反对丁玲的运动，随后，她很快就无声无息地离开了她担任的《解放日报》文学专栏主编的职位。接管这个职务的是丁玲的一位主要对手。

虽然丁玲很快就倒台了，但她还是与江青结下了仇恨。这也许是因为虽然她自己也已结了婚，但却仍对结婚这档子事持蔑视态度，而且认为男女平等对于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主义社会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事。另外，毛泽东宣称说妇女的地位已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丁玲对此也持嘲讽的态度。她为政治局成员的妻子们（虽然没有点名，其中也包括江青）过的生活表示痛惜，她指出：“大男子主义仍然占据着至高无上的支配地位。”不过，丁玲确实也承认延安的妇女比中国任何其他地方的妇女境况都好。在后来的“百花齐放”时期，丁玲又短暂地复出过，但很快就再次从公众眼中消失了，去到“作家协会”（这个组织的名称经常更改）办公室当了一名清洁工。1976年“四人帮”垮台后，丁玲又得以恢复名誉，且获准外出旅行。

有些年长的中国干部（官员）如今说，当主席正集中全部政治力量消除以王明为首的“投降主义”的影响的时候，身为主席手下最成功、最得信赖的将军之一的林彪，却正忙于和俄国人建立关系。这种联系对林彪在20多年后阴谋策划反对主席的军事政变时也起了作用。作为1937年曾与日寇大战过的八路军115师师长，林彪曾经扬名露脸过一番。在1938年的一次行动中，他受了重伤。随后在11月份去了莫斯科——尽管美国记者霍尔多·汉森（Haldore Hanson）报道说他在当年秋天就已完全康复了，但据当时官方正式说法，他去苏联是“为了治病”。林彪在苏联期

间，曾作过有关中国的战争形势的报告，为俄国的新闻通讯社写过文章；而且有报道说，在1942年2月经由西安回延安之前，林彪还参加了列宁格勒和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很少有人知道他在苏联的三年中间都干了些什么。但有一点是确切无疑的，即他不仅学会了用在一般中国人看来很难学的俄语写作和看东西，而且学会了很流利地说俄语。当时林彪就已养成了不用香皂洗澡的习惯，因为他认为洗掉皮肤上天生的油质是既倒霉又不卫生。这位不洗澡的将军在延安几乎没有被人发现过有这种习惯，在莫斯科热烘烘的房间里，林彪的朋友们却闻到了他身上的气味。但他们认为这是“中国人”特有的气味或是与林彪的健康有关，所以原谅了他。

当毛主席派林彪去重庆协助周恩来进行与蒋介石之间那种没完没了的谈判时，国民党人和周恩来都发现了林彪的特殊习惯。尽管林彪并非周恩来那样优秀的外交家和谈判家，但是，逢到未来的总理不在重庆时，他还是担当了毛泽东的代表角色。据说，林彪当时与下级美国军官及外国代表们（尤其是那些对军事问题感兴趣的外国代表）相处得很好。返回延安后，直到他不知为什么又去苏联之前，林彪又逐渐恢复了他在军事上的作用。现在人们才明白，他当时再次去苏联是为了向苏联人汇报中国共产党人在谈判桌和战场上遇到的同国民党之间的麻烦事，以及急需苏联向红军提供的武器援助。林彪与苏联的关系竟然如此之好，以致他竟能够成功地要来当时急需的、已被苏联“停止”供应了几个月的轻武器和地雷。回到延安后，林彪于1944年第一次被选入中央委员会。^①到1945年底，归他指挥的已有10万军队，而且经常有一种不确切的传闻，说他是日本投降后的中国东北红军司令员。

^① 林彪第一次进入中央委员会的时间应为1945年（“七大”上）。——译者注

准备迎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早在1942年，当毛泽东作出下述预言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作准备了。他预言说：斯大林格勒一战，注定了希特勒的灭亡；这一发展也将对远东产生直接影响，远东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头痛事将越来越多，直到它走进坟墓。毛泽东清楚地认识到，日本人把他的俄国伙伴赶出中国东北，并且迫使蒋介石迁都重庆，这些都间接地对中国共产党人有利。同时，毛泽东还清楚地认识到，国民党人正在积极准备，企图在日本人撤走后接管全国。共产党人自己则认为，接管全国的最好办法就是取得全国农民的同情和信任。至于武器问题，毛泽东没有指望从俄国人那里得到慷慨援助。所以当时就训练红军学会用从敌人手中缴来的武器打仗。

1945年春，在为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做准备（这件工作一直持续到该年下半年）的时候，毛泽东说服中央委员会作出了一个关于清除他的对立面曾犯过的左右倾错误的决议，由此进一步加强了他的领袖地位。这个决议中提到的人（按时间先后）有：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决议中没有点王明的名字，而是说：只是在遵义会议采纳了毛泽东提出的“正确领导”之后，党才有了力量和活力。在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以前亲苏集团的成员都从政治局中除掉了。尤其是在毛泽东所致的开幕词《论联合政府》中，他明确指出他正在准备同国民党人进行全面的斗争，以争取在打败日本人之后掌握全中国。

同年8月6日，美国人在事前没向他们的俄国盟军打招呼的情况下，向日本的广岛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两天后，俄国人在没有向美国说明意图的情况下，派遣了150万军队进入中国东北，

同时对日宣战。俄国人设法占领了几乎整个东北和朝鲜北部，美国人则占据了朝鲜南部。日本投降后，俄国人与中国国民党人签订了一项协议，国民党人得到了掌管铁路的权力，实际权力则落到了莫斯科手中。

这一年下半年，由于美国人的强硬压力，毛泽东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对国民党人的态度，并且于8月份去和蒋介石作了20年来的第一次会面。俄国代表团成员告诉毛泽东：尽管斯大林曾经称毛泽东的政策是“冒险的政策”，但斯大林仍将不“插手”中国的内部事务。而且，据塔斯社报道，莫斯科怕插手中国的事会导致世界局势充满冲突。俄国人认为，毛泽东的“冒险主义”就体现在毛泽东去和蒋介石谈判时所带的那张条件单上。首先，毛泽东要求“承认”在延安和其他各地“由人民选举出来的政府”——即解放区的联合委员会。其次，他坚决主张应由共产党代表接收共产党控制区的日本人投降。另外，毛泽东还要求立即释放政治犯、严惩卖国贼。他的最后一个要求是要建立民主联合政府。

重庆谈判的开幕式的确很文明、礼貌，但旁观者看得很清楚，这两位中国领导人之间不可能达成什么协议。毛、蒋双方的谈判一直持续了六个多星期，从8月下旬一直到10月11日，最后就双方之间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达成了某些暂时协议。周恩来留在重庆继续进行治疗，于1946年1月初，签订了一项停战协定，同时组成了一个三人委员会，由周恩来和美国将军马歇尔、国民党将军张治中组成。1946年，由董必武和邓颖超陪同，周恩来一直陷在和美蒋的谈判中，并且在春季国民党迁都南京时同他们一起离开重庆。在北京，由叶剑英——即未来70年代中期的国防部长——率领一批共产党人参加三方执行部（即“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译者注）。停战协定常常遭到破坏，显然，当周恩来最后离开南京返回延安时，中国正在被拖向内战。几个月后，中共宣布

说，美国之所以要竭力达成一项停战协定，是为了争取时间为国民党人提供帮助。自从1946年1月签订的停战协定被撕毁后，国民党人就集中控制了各城市和铁路沿线，毛泽东则继续通过在农村组织农民军队来扩大自己的力量。同时，虽然有蒋介石的精锐部队阻拦，林彪率领的部队也还是比较顺利地开进了东北。

解 放 战 争

日本人撤走后，内战的战火就在全中国范围内燃烧起来了。为长远的安全计，共产党人准备分两批撤离延安。当时有少数人猜测，不出两年他们就会在北京建立起政府。江青和其他一些人就曾描述过当时迫使他们撤离延安的对延安的空袭。邓颖超（她当时将去一个城市工作）把主席的一个女儿李纳带在自己身边，毛泽东和江青随后也骑着马撤离延安。他们两人看来都乐于进行这次新的长征，而且至少在起初，他们还用了大量时间和驻地村里的农民同吃同住。江青当时的工作（出于政治原因而用化名），就是在他们辗转流动的情况下向主席报告人们对他们和对国民党人有何议论。周恩来、任弼时也在这次新长征中与毛泽东同行。第一年将近年终的时候，由于国民党大兵压境，共产党人开始遭受睡眠不足之苦。周恩来当时实际上已累得精疲力竭，鼻孔出血。毛泽东坚持要把为自己准备的担架给周恩来用，周恩来坚辞不受。的确，当时曾盛传国民党在1947年3月抓到了毛泽东司令部的人，但这实际上是一种无稽之谈。

虽然通讯条件很差，在离开延安的最初几个月里，毛泽东还是设法保持对所有军事行动的情况有详细了解。到1947年下半年，随着共产党的将军们节节胜利，他又开始集中精力考虑以延安经验为基础，为已经“解放”的地区制定政策。到1948年4月，毛泽

东已可以设法在河北省西部的平山县建立临时根据地，他在那里一直驻到往北京搬迁。也就是在那里，他开始考虑“由农村政权向城市政权转变”这么一个艰难的任务，同时告诫胜利之师在占领城市后不要“骄傲自满”。

毛泽东急于听到来自东北的进展情况。在东北，紧接着军事上的胜利，林彪就离开了，把东北交给了高岗。高岗曾经在毛泽东1935年长征到达陕西之前领导创建了陕北游击根据地。毛泽东曾用极为赞赏的语言谈到过高岗，他说：

“外来干部比较本地干部，对于熟悉情况和联系群众这些方面，总要差些。拿我来说，就是这样。我到陕北已经五六年了，可是对于陕北的情况的了解，对于和陕北人民的关系，和象高岗这样的同志还都无法相比。”^①

后来，在1948—1949年间，高岗的职位从原先居于林彪之下的东北军区副政治委员提升到东北军区司令员兼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这样，他在东北就既是军事上的司令员，又是共产党的“老板”和第一“行政首脑”。正是以这种身份，高岗1949年前往莫斯科，谈判有关12个月易货协定的事，用东北出产的大豆、菜籽油和谷物换取苏联的工业设备、汽油、卡车、纺织品、纸张和药品。这个协议一向被认为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是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缔结的一项协议，因而也是在苏联仍然和国民党保持外交关系的时候同中共的政府机构签订的第一个友好协议。同时，高岗领导下的东北还是中国第一个完全处在共产党掌握之中的地区。因此，高岗也就第二次提供了一个安全的根据地，使得红军可以依托这个根据地发挥作用，地方共产党政府也得以在这块根据地上进行土地改革和工业国有化试验。

当时的国民党方面，蒋介石过于自信，他扬言可以在短短几

^① 这段引文在翻译时参考了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780—781页的一段话。——译者注

个月内结束内战。战争一开始，他当然得到过成功，但是，到1947年中期，局势就发生了变化。在东北，林彪的军队使蒋介石驻扎在那里的最精锐部队（这些部队在指挥上很愚蠢）遭到重大损失。用美国将军巴尔的话说，这一损失意味着“开始完蛋了”，因为在丧失45万军队之后，国民党军队的士气已严重低落。当林彪从东北抽身向北京和天津形成钳形攻势时，陈毅——未来的外交部长——的部队也占领了山东。国民党将军傅作义下达的作战命令，让共产党的一位谍报员给偷走了，由此最终导致傅作义的投降。蒋介石被迫隐退了一段时间，他的代理人则仍然希望能保住南半个中国，企图与共产党人谈判。但是，眼看胜利在望，所以毛泽东（他在战斗中并没有投入多少精力）轻蔑地拒绝了国民党的一切提议。值得重视的是，莫斯科和中共党内有些高级领导人则满足于由共产党占据北方，把南方留给蒋介石控制。尤其是莫斯科当时强烈支持这种比较安全的选择，毛泽东则坚决不改变主意。

尽管主席倍经辛劳，甚至在从延安到北京这期间曾经承认自己“开始上年纪了”，但是，他还是为知道自己的领袖地位不可挑战而感到莫大快慰。延安时期使他能够不断了解到他所起的相当于第一位共产党皇帝或共产党总统的作用（特别是在延安的后一段时期）。他和他的中央委员会作出的如下正确估计，使他和中央都赢得了崇高的声望。他们估计说：如果照斯大林和“投降主义者”所建议的那样和国民党人划江而治，把南半个中国留给蒋介石，那将是一种十分愚蠢的作法——尤其是在高岗和共产党人已经控制了东北的时候。而从位于河北省西部的平山县开始，毛泽东就开始考虑解放区和东北的土地改革问题，以及把权力中心由农村转向城市的问题。

在1949年6月30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的大会上，主席宣布说即将在北京成立的他的新政府就是要“一边倒”，即倒向

苏联一边；在国内事务中，“敌人”——即地主阶级——将会要么受到改造、要么被消灭。同时，他告诫中央委员会成员进城后不要骄傲。

早在共产党人控制全中国之前，毛泽东就已满怀信心地开始和那些同他并肩战斗了几十年的人一起为即将诞生的新政府作安排了。没有人敢和他争执，因为他当时已是一位虽然自负、但却很出色的“赤色皇帝”了。也没有人想倒他的台——尽管当时表面上向毛泽东表示祝贺的俄国人实际上决不喜欢看到毛泽东成为在共产党中国如此不容争议的领袖。

第四章 从造反者到统治者

建立人民共和国

毛主席常常告诉他那些亲密的中国朋友说，最让他激动的事，就是他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上面对成千上万热烈欢呼的人民、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所感到的那种团结战斗的同志式的自豪感和成就感。但他又承认说，正是从那时开始，他的麻烦事就多起来了。因为当时共产党人所接管的国家是一个因受抗日战争和内战之灾而千疮百孔的乱摊子。当然，主席周围有一批深得信赖的同志，这些同志伴随他经历过长征，并且在延安又和他并肩战斗。遗憾的是，几乎所有的在开国大典期间拍摄的新闻照片都再也无法找到；实际上，就连那些印有开国大典场面的纪念邮票，今天也找不到了。最初是从“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刘少奇受清洗开始，就不卖这种邮票了；在主席的第二位“选定的接班人”林彪1971年企图发动军事政变以后，“按照中共中央的命令”，库存的货也被全部销毁。

由于延安时期无论在内政还是外交上都已积累了不少经验，所以，由造反者到统治者的转变对毛泽东及其助手们来说并不很困难。但他们却面临着不少巨大的问题。例如，国民党不仅把从北京和其他博物馆中弄来的珍宝运到了台湾，而且带走了国库内的外国通货；由于农民为逃避战乱而背井离乡，造成农业生产严

重下降，工业生产也可怜得很。为了使人们返回农田和工厂，共产党人特别突出强调他们政策的中华民族主义和“统一战线”方面，推举出许多著名的非共产主义的政治家来支持他们的主张。但是，只凭这些恢复正常状态是不够的。为此，务实的新总理周恩来不得不说服毛主席相信：无论中国农民如何勤劳，为了使解放后的老百姓有饭吃，还必须进口一些大米和小麦，而且必须从苏联进口工业机械和某些类型的武器。

当时，主席和他的总理住在故宫西边中南海旁的那些小巧玲珑的楼阁——有游廊的平房——里，在与“大跃进”期间修建的现在的人民大会堂正对面。他们每天晚上都长谈到深夜，直到附近住的政治局其他委员都睡下以后很长时间。1949年过后不久的那些日子里，虽然大门口也有警卫人员站岗，但还是允许中国人到中南海去游览的。一般情况下，人们总可以透过周总理办公室的窗户看到总理；主席则常常迈着潇洒的步子，不带警卫陪伴，从政府的一个部转到另一个部。

当主席和总理在北京建立党和国家机器的时候，各大区的司令员们“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权力”。当时全国划分为六大区，由军政委员会掌管。1950年间，许多大区的领导人都进入中央要害部门任职，特别是在军事委员会。从那以后，人们一直把军委描述成“集总参谋部和国防部的绝大部分功能为一体的联席会议”。在任何情况下，它都是最高军事决策机构，直到今天仍然如此。

到1950年年初为止，各大区司令员都一直按照本地情况的需要，以许多种身份来使用他们的军队。他们首先处理的是暴力问题，在这方面一般都很奏效；随后又用军队向农民灌输毛泽东式的共产主义。战士们自然也还被调去从事修复重要桥梁、建筑新公路以及修复铁路和码头等等劳动。那些在战斗中最不理想的部队，当然首当其冲被遣散。第一野战军在新疆的大部分部队都被改编成了生产建设部队，受命去开发未经开发的农业和矿产资源。这

样，关于现代化问题和为适应现代战争而进行训练的问题，自然而然就在一定程度上退居次要了。

随着冬天的到来，经济形势更加严峻，当时身兼外交部长的周总理正在北京着手与俄国外交代表团联系，安排毛主席第一次出国——即赴莫斯科——请求援助的事。在此之前，毛泽东就曾经宣布过他的“一边倒”的政策，强调“中国人民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也是没有的”。（参见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译者注）毛主席此次访问莫斯科（由陈伯达陪同）的结果，就是形成了莫斯科——北京轴心，这个轴心是1950年2月14日正式建立起来的。斯大林同意把军事上的联盟作为《友好同盟条约》的一部分，答应给中国1亿英镑的贷款，并且派俄国专家帮助中国工业和中国红军的现代化建设。回北京不久，毛泽东就有人说：取得苏联的援助，比“从老虎嘴里掏生肉”还难。因为毛泽东本来希望不仅得到贷款，而且得到现金。

但是，回到北京后，当刘少奇——他当时在党内的位置比周恩来靠前——宣布详细计划时，毛泽东却也公开声明与苏联的“联盟是永久的、牢不可破的、不可战胜的”。实际上，尽管俄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东欧都需要专家，他们还是很快派出了4,000多名军事专家到中国军队中去了，其中大约有一半人分别去了空军和海军。大约5,000名行政管理官员和专家被派来援助中国的工业企业、铁路、码头、煤矿以至最后是核武器制造。到1954年2月，当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访华的时候，俄国已经同意参与中国160项主要生产项目的建设，如建筑水库大坝、建立军事工业和重工业工厂，等等。俄国人还鼓励中国人在亚洲事务中发挥主要作用。但是，在表面上的热诚和亲昵背后，这两个大国之间很快就发生了一些重大纠纷。中国人力图坚持他们固有的民族主义特色，以便在世界权力场中取得地位；他们还坚持强调农民

的作用。50年代初期，中国的官员就已多次声明：“我们的共产主义同苏联的共产主义有很大不同。”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的爆发（在建国后如此短暂的时间里就发生了这么一场战争！），起到了把全国人民逐渐团结起来的作用。起初，中国人担心美国会进攻中国，因为他们注意到美国专门在台湾海峡巡逻的第七舰队已经扩编。他们警告华盛顿说，中国人民认为，在朝鲜“三八线”以北的任何行为都是敌对行为。当然，北京极为关心的是中国在东北的工业基地，那里离火线太近了。

许多专家如今认为，毛泽东之所以乐意参与朝鲜战争，还有别的原因。尽管毛泽东的那些将军中间从没有哪个人想以军阀自居，毛泽东有时候也还是担心他们中间有人会这样做。朝鲜战争给他提供了一个机会，使他可以通过把大量部队派往东北，从而改变国内有潜在危险性的政治军事权力分配状况。另外，行政官员和军事指挥员们还可以利用这次“外国威胁”来加速国内的改革，并且号召为全体人民而“牺牲”。还有一点就是，朝鲜战争还不幸给中国的外交方面带来了一个不利条件，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之间打进了更大的一个楔子，迫使中国不得不进一步密切同苏联的关系。

清洗高岗

在政治和工业领域，也有一些麻烦和清洗事件，它们最终导致高岗的垮台和自杀——在毛泽东那张对立面名单上，高岗排在第七名。高岗的倒台对毛泽东个人的影响很深，也明显削弱了党的领导集团。因为这位能干的行政官在陕西根据地——它在长征结束时为毛泽东提供了一块立足之地——的发展中起过重要作用。

高岗是在1948—1949年间升任东北最高军事指挥员的。当时，别的将军不是随林彪南下，就是到平山县（后来是北京）毛主席的司令部担任政治角色去了。高岗是在六大军区划分之后唯一身兼四种——军队、党、政府和经济——关键职务的人，也是曾经单独与既控制着东北的铁路、又控制着旅（顺）大（连）港口的苏联打过交道的人。高岗曾经“接管”过东北，并且亲自与苏联谈判签订了为期一年的易货协议，用大豆从苏联换取当时急需的工业设备、卡车、汽油、纺织品和药品。尽管俄国人拆走了东北的许多工厂，但它仍然是中国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地区，随后，高岗又成功地使铁路复通，为解放后于1950年开始在朝鲜作战的“志愿军”输送器材。后来，在朝鲜战争期间，东北又对中国入朝作战部队起了后勤基地的作用。高岗在种种事情上都取得了明显的成就，以致被人们誉以只有很少数人才能得到的“毛主席的亲密战友”的美名。尤其是，作为第一块“解放区”的“老板”，高岗除了在工业方面取得成就之外，还成功地进行了土地改革。1952年11月，他作为起决定作用的政治局的一位成员应召进京，领导新成立的国家计划委员会，起草第一个五年计划，同时仍然保留在东北时担任的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虽然高岗与苏联的关系很好，但他还是受到控告，说他与贝利亚——即让人痛恨的斯大林的秘密警察头子——有勾结。这些说法并没有完全为人所疑。虽然缺乏确凿的证据，但在清洗后生存下来的高岗的朋友们还是声称：高岗只不过是“应邀”向贝利亚汇报过当时在东北铁路上工作的白俄分子的活动——当时东北的铁路正在按苏联铁路轨道的标准进行改造。高岗以前的一位助手说，1949年高岗在莫斯科的时候，斯大林曾经提出，他愿意支持把满洲搞成一个与苏联有密切联盟关系的独立国家，实际上也就是搞成象苏联在亚洲的卫星国蒙古那样的国家。据说，高岗当时断然拒绝了这种主张，使得斯大林十分恼火，最后放任这条

消息传到毛泽东那里，说是高岗曾听到过这个建议。这是斯大林因高岗缺乏热情而对高岗的报复，但他的动机是什么，却依然让人费解。毛主席显然因为高岗没有对他说过斯大林的主意而感到生气。这件事很可能进一步加深了毛泽东与高岗之间的裂痕，因为本来几个月以前在工业和经济、党务等问题上，他们之间就已有过重大分歧。高岗以前的一位支持者提到的另一个传说是：虽然高岗与苏联的关系很好，但斯大林还是用某种古怪的方式暗示毛泽东，说是高岗与自己的关系过于密切，已经到了危害主席健康的程度。不过，有一件事是确切无疑的，即俄国专家在中国东北的工作深深感动了高岗，为此，他一再提出说莫斯科管理重工业的方法比中国共产党人所主张的那些方法要有效得多。的确，高岗曾强烈主张“一人管理工厂”，反对当时中国正在试行的各种形式的集体领导。他在继续强调集中国家资源来发展重工业的至关重要性时说：“委员会无法经营大型企业。”高岗的最后一个重要报告是他1950年9月交给中央委员会的，在那个报告里，他主张要更加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

高岗垮台的日期可以确定为1954年1月20日，即列宁逝世三十周年纪念日那天。当时，他与主席之间在基本经济战略——即应当给重工业分配多少资金——以及国家行政方法、党务机构的管理（这也许是最重要的一点）上的意见分歧，已经持续了一年或更长的时间。他公开声明说，他认为，把党的书记放在优先地位、党的书记可以撤销工业领导人，这些都是“荒唐的”。

当时，报纸上出现了一系列文章，用后来中国共产党人中间流行的方式不点名地批评了高岗的作法。与此同时，刘少奇除了谴责“某些高级干部（官员）”把他们工作的地区“看作他们自己的私人财产或独立王国”之外，还号召重新回到集体领导上去。从这类文章开始出现，到高岗正式受到警告和清洗，之间经历了一年时间。最后的起诉书上说，高岗曾经企图从邓小平手里篡夺

总书记职务^①，而且他不但不低头认罪，反而“以自杀作为他叛党的最后表现”。除了“据说的”高岗的“同谋犯饶漱石（饶是中央委员），还有其他7位名人因为在“反党集团”中的活动而被开除出党^②。另外还有好几千未点名的高岗的支持者和不少党政军高级干部，也在高岗倒台后的几个星期内被撤职或降级^③。

70年代初期，中国人曾经公开议论高岗的罪行。据说，他企图在东北建立一个与苏联有密切联盟的半自治区；也有人说他甚至更坏，企图当一名勾结苏联的卖国贼。清楚无疑的是，没有什么严格的证据可以构成高岗的叛国罪。但却有一个证据证明高岗突然与毛泽东在个人关系上发生了破裂。这种破裂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这么一个事实造成的，即：自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以后，毛泽东越来越不愿听到反对他本人的不同意见。象在延安窑洞时期那样鼓励别人对他的讲话提批评意见、鼓励各人讲自己的观点的日子，在毛泽东身上已经成了历史。他周围的人们已经开始注意到了权力的腐蚀作用。据一位中央政治局委员讲，主席当时明显只允许周恩来、刘少奇和邓小平自由地对他提批评意见。

“百花齐放”

到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制订出来付诸实施的时候，人民共和国的百姓们已经经历了一系列不断变化的政治运动：从“抗美援朝”一直到实施婚姻法和几种旨在提高公共卫生和健康水平的配套法律。然而，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间，尤其是在那些拥护人民政府的非共产主义党派的知识分子中间，却有大量被压抑的不安

①②③ 作者这些说法不确切。——译者注

和躁动。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以及赫鲁晓夫那次揭露斯大林暴行的秘密讲话，无疑对这种不安和躁动起了鼓舞作用。当时在精英人物中间，正流传着这样那样的有关匈牙利事件和赫鲁晓夫讲话的传说——其中真假掺杂。

其时，毛泽东和中国政府已开始慢慢脱离俄国那一套高度集中化的、专家治国论的、偏重重工业的经济管理方式，形成自己的一套方式。毛泽东的讲话《论十大关系》，表明他已经认识到正在发生的事情和政府当时面临的复杂问题，特别是由城市工人和乡村农业人员之间日益增长的差别引起的复杂问题。毛泽东提出（实际上是坚决主张），为了避免出匈牙利事件的可能性，也为了发现哪些批评是真正针对政府的，应当允许群众“出出气”。随后，主席提出了他那著名的口号——“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许多拥护“统一战线”的非共产党人士，认为这一下有机会可以说一说他们想对共产党政权和人民政府领导人说的心理话了。特别是知识分子，他们挥动手中的三寸狼毫，写了一些带控告意味的批评文章，着重谈了他们对自由的希望、外文书籍的不足、妇女缺乏平等的机会等等问题。

其中最有意思的形象之一，就是丁玲的姿态。她是毛泽东第一位夫人的校友，一位真正的平等主义者，也是革命形势下一位杰出的女性独立的象征。自从她在延安因其独立自主的姿态而受到思想改造之后，她变成了一位非常畅言无忌的人。尽管如前面所说，她后来遭到严厉贬职，成了作家协会的一名女勤杂工，但她在1978年年初还是第二次得到平反。目前她的影响很大，在文学界享有很高的威望。其他有些知识分子虽然受惩处程度不及丁玲严重，但也都因其提出的批评过于坦露而受到过惩处。当时不仅是刘少奇和邓小平，就连主席本人也被全国各地突然迸发出来的自发而强烈的批评意见搞得大吃一惊——实际上是彻底被震惊了。全体政治局委员都敦促主席赶快收场。毛主席也这样做了。

但这场“百花”运动确实使领导们认识到，有千百万中国人渴望得到更多的人身和文化自由。

虽然有某些人曾在方法问题上提出过批评意见，但中国领导人还是为在最初几年里取得的成就感到鼓舞，尽管他们说的“已经征服了通货膨胀”可能是一种言过其实的说法——当时的通货膨胀曾以百分之三十至四十的膨胀率持续了一年多。采用以每星期内5种商品的价格——即大米、食用油、煤、面粉、棉布的价格——为基础的工分制，确实使价格受到了控制，因为流通中的纸币数量大幅度减少了。经过土地改革，农业生产（据说1949年的时候比战前的数字低了百分之七十）也有了活力。到1952年，土地改革已经完成。7亿亩土地重新分配给了3亿农民。在人口稠密、生产力较高的华东和东南地区，每个农民只能分到1亩地，在华中是2亩，华北是3亩，而东北则达7亩之多。为了提高产量，同时也为了防止出现新的富农阶级，紧接着分地之后，政府又开始推动农民走向集体化。

中国革命过程中较严峻的时期之一，就是土改初期那种对待地主和富农的方式。据一位中国共产党人估计，大约有500万人受到他们以前的佃户或政府的审判。人们只知道期间有过一些暴烈的行动，处死过不少人，但却无法估计究竟处死了多少人。周恩来总理说他相信有两百万人死亡或被处决，但当时在华的外国观察家则认为数字更大些——大约有三四百万。这次土改过后不久，千百万农民就又感到失望了，因为他们原想着能够长期拥有土地，但实际上却很快就发现自己缺乏必要的农具，无力耕种，除非加入农业合作化。

1952年，人民共和国宣布说，从1949年解放以来，工业产量增长了百分之七十。结果，由于许多虚假的有利条件，虽然在1953年就制订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但由于缺乏机器、缺乏经验、统计资料不足等等原因，使得这个计划的执行延迟了两年。直到

1956年，甚至在已经取得了惊人的进步、增长速度已有所缓和的情况下，据报道说，第一个五年计划只达到了最起码的目标。1967年以后“文化大革命”导致统计数字一直中断到1980年左右。在这之前，中国人公布的统计数字总是言过其实。他们公布说钢的年产量达到520万吨，铁的年产量580万吨，煤炭年产量1.22亿吨。由于受这一“成就”的鼓舞，政府制订了一个更加雄心勃勃的五年计划。但是直到毛主席发动“大跃进”运动之前，这个新的五年计划的详细内容却很少传达到基层供讨论。发动“大跃进”，连许多政治局委员都感到吃惊和担心；它的目的，是要通过狂热的奋斗，扩展本来就已经过热的经济，并且在农业上使农业合作社向人民公社转变。

学生、干部和熟练的技术工人，都被动员去参加工业生产，到1958年秋季，全国各地已新建了大约60万座“土高炉”。据后来揭露说，虽然当时钢铁产量比1957年增长了百分之六十五（这无疑包括有虚报夸大在内），但在1,100万吨总数中，有300万吨都“不适合用于工业用途”。一座土高炉无论如何是无法抵得上一座现代化钢铁厂的。而且，许多铁锹和其他农具都被轻率地扔进土高炉炼钢，理由是：今后再也不需要它们了。这样一来，就导致长期的农具不足。原先乐观主义者以为可以到手的用拖拉机牵引的犁，事实上并没有制造出来（实际上，在中国的不少地方，农民至今仍然在用马、骡子或甚至于用人力耕田）。

农村人民公社的建立速度太快、太急于求成了，它缺乏充分的准备。许多刚开始接受合作社的农民，很不情愿进一步社会化。这时，毛主席亲自访问了一个地方（那里有30个合作社合并成了一个人民公社），以此鼓励全国推进公社化运动。

正是在建立农村人民公社的时候，毛主席开始了他与刘少奇之间长期的、激烈的争论。政治局之外，没有一个人意识到主席与他选定的这位接班人之间在观点上已有了重大分歧。刘少奇认

为，主席试图把集体农业社改造成人民公社，这将危害到共产党执政以来正在取得的进步；尤其是，主席“任性地”主张用土法建工厂，也将对新生的政权产生更大的危害。周恩来总理此时一如既往，在主席和刘少奇之间起了调解人的作用，结果使主席和他在党内最主要的同事之间的关系得以恢复。但是，人们知道，从那时开始，毛泽东在对刘少奇的关系上就一直心怀保留了。早在长征之前，二人就在有关中国应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有过重大分歧：刘少奇赞成俄国的路线，主张通过城市工人和工会的奋斗实现社会主义；毛泽东则当然是相信农民的力量。

后来我注意到，当时青年男女们——包括我的那位男翻译——站在毛主席画像前时，一副敬仰的神态，简直就象要对主席顶礼膜拜了。人民公社的老社员们也回忆起主席在视察的时候给他们提出的好建议，这些建议受惠于主席早年在农村的生活。少数人还珍藏着他们和主席的合影，把它们看成珍贵的传家宝。

毛泽东的这些巡访，对于公社化运动起了催化作用。虽然主席教导说国家比家庭重要，但公社还是允许已婚的人和自己的子女一起生活，而让未婚的人住单身宿舍、吃大锅饭。毛主席当时还认为，作为一个单位的家庭已几乎失去了它的作用，再过不了多久，家庭就似乎会消失。当时每个人民公社的平均人口大致是25,000人，他们有自己的商店、学校、医院、养老院和某种形式的轻工业。从理论上讲，管理公社事务的领导是由社员选举产生的，这种领导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易名为“革命委员会”。每星期大约有5—8个小时的时间用于“学习”或进行政治教育；社员在地里干活时，大多数公社的高音喇叭都播放着革命音乐和讲话。

当时，许多公社都允许社员保留有自留地，用于养猪、养鸡和种植供家庭消费用的蔬菜——按照主席的说法，每头猪都是一个天然的肥料厂。剩余的产品可以拿到当地市场上去卖。因此，

大城市——如北京、上海、甚至西安——附近的公社社员都很精心于经营自留地。直到1977年邓小平重新掌权，关于自留地的问题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激进分子们认为应当取消自留地。许多公社为了消除自留地，就用公社的拖拉机耕各家的自留地。起初，他们保证说耕过以后各自留地的主人还可以继续种，但后来就逐渐吞没了自留地。别的一些务实的“革委会”，则继续允许保留自留地。

除了自留地，在公社生活的家庭一般还获准建房，并且拥有房产权。各家各户攒钱买必要的建房材料，亲戚朋友们义务提供劳动力。这样，大约花400英镑可以盖一座二层共四间的房子。记得我的汽车司机就曾经请假（绝大部分外国人在中国都非有一个中国司机不可），说是要回老家帮他老爹盖房子，因为他可以“继承”老爹盖的房子。我的这位司机还很贪爱加班费。每当我指着工厂外面的“光荣榜”，给他看榜上那些拒绝收取加班费的激进分子名单时，他都会回答说：“我才不是那种傻瓜呢！”他说这话时竟然毫不在乎别人听见，而且是在激进政权的顶峰时期1973—1976年间说这种话的。

公正地说，“大跃进”期间也取得过一些真正惊人的成就，其中包括在八个月内建成了占地面积11英亩的人民大会堂这么一座雄伟壮丽的建筑物。位于天安门广场西侧的人民大会堂，是政府的许多办公楼的集中地。在三楼东南侧，曾设有周恩来总理的办公室，那里面的灯光常常总是亮到凌晨三四点钟。所有大型的官方宴会，都是在人民大会堂内举行的，那里面可容纳6,000人同时进餐，而且还很宽松舒适。另外还有一个巨大的会议厅，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在那里举行，厅里有一个能容纳100余人的平台。这里还常常被用作剧场。中国的每一个省在人民大会堂里都有一个按各省的特色装饰起来的宽敞的会客厅。里面还有一些宽敞的住房。林彪企图谋害主席以后，有一段时间

主席和江青就在那里住过。当然不用说，那里还有供警卫人员和安全员住的房间及常设的厨房、餐厅。还有一件值得一提的有趣事情是：一有计划说有外国外交部长来访，那些将在迎接外宾时起作用的厨师和仪仗队，就会提早得到消息，比外国驻华使节及新闻界要早知道好几个月。这样，厨师们就可以事前学会做来访者国家的菜肴，仪仗队也可以事前学会来访者国家的国歌。

鼓舞民族士气

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民族士气上出现的低落最突出地表现在军队中。和中国人不同，许多外国观察家至今依然认为，军队是中国三大权力支柱中最重要的一個（其他两个支柱当然就是共产党和国家机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红军的某些部队中所特有的一系列新问题，结合在一起就造成了官兵之间普遍存在的意气消沉现象。

1950年，考虑到大约有500万精通于非正规战的游击部队要改造、整编成能够在当代条件下护卫政权的军队，毛主席和他在政治局中的同志们决定有必要介入朝鲜战争。分布在各地的非正规的军队，已经划归六个大军区辖制。长江以北的军队一般都已征服了国民党军队的抵抗，在老百姓中间进行过了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另外，他们已建立了在很大程度上受他们支配的地方政权机构。在江南和西部新统一的地区，这些工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很长时间才开始进行。各大区之间的通讯联系仍然不多，要加强中央控制常常很难。实际上，只是由于军队对主席近乎奇迹般的坚定忠诚，以及由于因为朝鲜战争而导致的重新改组，当时才能够防止出现任何“赤色军阀主义”。然而，注意到军队司令员们拥有的巨大权力和他们与他们的下级之间已经建立起来的

那种忠诚感（靠着这种忠诚，他们一起战斗了二十年），毛主席和刘少奇认为，只有一场反击外来帝国主义者的战争才能产生保健的效果。

当然，除此之外，中国领导人当时也担心在朝鲜的美国军队会有一天突然不吭一声就窜犯中国；而且，考虑到当时中朝边界线不很清楚，美国军队还可能会窜进来侵占中国的“一片领土”，占据中国的一个或更多个重要港口。如果美国人侵占了中国人认为属于自己的任何一寸土地，那都会使新生的政权遭到危险的丢脸状况。另外，毛主席还希望在朝鲜与俄国人的联合作战能保证他在有机会进攻台湾的时候得到莫斯科的支持。实际上，对朝鲜战争给中国军队带来的长期影响，怎么估计也不会过高。

起初，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0月下旬在身经百战的彭德怀元帅统帅下跨过了鸭绿江。彭元帅和军事委员会——它后来和总参谋部的职能合并了——当时实际上都很清楚：志愿军缺乏大炮、运输工具、通讯器材及后备力量。彭德怀试图用“把敌人淹没在人海战之中”来弥补上述弱点。这是从“人海战术”的观念中得出的想法（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在第一回合中，这种战术奏效了。这也许归因于彭德怀是一位坚毅开明、平易近人的司令员——他和战士们在战场上同甘共苦，吃的是同样的食物，吸的是同样的香烟，在战斗中身先士卒。

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攻击波在第一阶段发生了作用，打退了联合国军队——尽管在战役开始之初，志愿军战士每五、六个人中就有一人除了棍棒之外就再没有别的武器，只得在哪位战友牺牲时捡起牺牲者的步枪使用。中国军队体制中的弱点太明显了，因为军队缺乏后勤供应，他们用的是在抗日战争和内战时期从日本人和国民党人手中缴获的武器，而且适用于轻武器的弹药也无处可找。医疗供应同样不足，食品供应也经常短缺。据一位中国战俘说，除了在战斗中死伤的人之外，还有大约8,000名志愿军死

于寒冷或失踪。一位中立的瑞典军事专家写道：“面对联合国军队强大的火力和南朝鲜村民对中国政治委员的共产主义说教的无动于衷，毛主义的意识形态无法与之匹敌。”

联合国——主要是美国——的军队很快就学会了承受中国军队的第一打击，并且成功地举行了反攻，以致到1951年冬季，中国在朝鲜的部队几乎濒临崩溃的边缘。虽然北京政府当时已能自己制造一些轻武器和弹药，但是从军事的观点看，他们所提供的供应，价值仍然是微小的。于是，为了使北朝鲜政权免于覆灭，俄国人突然出来帮中国人的忙，向中国提供了大量的武器装备。这种援助不仅有助于形成军事对峙局面，而且为中国军队进入现代化常规战争领域提供了十分重要的一块跳板。倍受美国空袭之苦的中国军队，提出说急需建立一支自己的现代化空军，同样，毛主席（他在美国空军对中国军队司令部的空袭中失去了他和杨开慧的儿子毛岸英）也急切希望建立这么一支自己的现代化的空军。彭德怀元帅当初坚持不让主席的那位“志愿军”儿子到前线去，把他留在了元帅自以为安全的他的总司令部里。彭德怀说，后来主席和他吵起架来，总“不肯原谅我丢了他的儿子”。

彭元帅（他是一位非常平易近人的司令员）后来描述说，朝鲜战争的最初八个月是很“可怕的”八个月。当时，中美两国军队间的战斗，把狭小的朝鲜半岛打得天昏地暗。从引进苏联武器装备之后形成军事对峙局面，直到1952年7月停战，彭德怀手下指挥的军队从没下过70万人；当然，他也使这些军队得到了常规战争的锻炼。其间能用于进行政治教育的时间很少，政治委员（每个营级以上的单位都配有政治委员）的重要性不断下降。

值得补充指出的是，虽然俄国人并没有向中国人提供自己最先进的武器（实际上，他们愿意提供的只是苏联军队已逐渐淘汰下来的坦克、大炮和装备），但中国军队得到的这些武器装备还是大大鼓舞了中国军队的官兵，使他们产生了与人民战争观念相

反的对常规装备的兴趣。人民战争观念在整个抗日战争和国内战争中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它是以毛主席的这么一种哲学为基础的，即人的因素比武器的因素更重要，战争的胜利要靠战士的政治觉悟和意志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这种哲学还很适合完全处于防御地位的新中国的国际形象。毛泽东曾多次强调说过，中国决不会对哪个国家先发动进攻，而且也只有在必不得已的情况下，为了重新把人民团结起来，才会使用防御性的手段。几年以后，这种思想发展成了一种确定的政策，北京的武装部队也完全是适用于起防御作用，但他们还保留收复那些他们认为属于他们的地区的权利，如台湾、西沙群岛、南沙群岛以及南海诸岛屿——在南沙群岛已发现明朝时代的许多遗物和钱币。

走向现代化的军队

无论如何，虽然毛主席曾不止一次说过需要有一支现代化的军队，但他的态度实际上却自相矛盾；而且，在中国已经成为核大国以后很久，他还经常重提过去有关人民战争哲学在战略和战术上的有利之处的说法。1951年，中央委员会号召研究“如何把人民军队改造成一支优越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1953年，毛主席说：“为了防御帝国主义者们的侵略，空军和海军必须有全部机械化的武器”，而且还补充说：“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是大量能够掌握和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的人。”

实际上，在中国人已经拥有核威慑物（中国人很不喜欢用这个词语）之后好几年，由于他们的常规武器装备已经完全过时，在与俄国人的战斗中将不起什么作用，中国人又被迫回到了人民战争思想上。“就是俄国人发动核进攻，毁坏了中国的所有城市，也还会有亿万中国人继续战斗”，毛主席这么说。事实上，在这

种思想的鼓动下，中国曾经修建了数以千计的防空洞。但在50年代，由于有俄国军官指导中国军官使用俄国提供的武器和为支撑一支现代化的陆军所必需的组织编制及设施，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进程还是得到了稳步进展。

除了150万参加过朝鲜战争的部队，中国军队中的某些精锐之师在延安时代也受到过一些训练。当时，游击部队曾制订过各种各样的训练机构，其中包括炮兵军官训练机构，虽然他们承认他们的大炮并不多。不过，尽管修理师、通讯兵、炮手和步兵、坦克兵、骑兵军官都受过训，但他们训练的三分之一时间都用在政治灌输上了。经过朝鲜战争，司令员们逐渐对“浪费”那么多时间从事所谓的“政治学习”感到不满。他们认为，如果把这些时间用来学习射击、开汽车、操作电话交换机或学习农村长大的军人从未学过的其他基本功，将会更有用得着。这一时期，政治委员的权力进一步下降，因为再也没有命令让他们与军事指挥员一起联名签署文件。事实上，有些政治委员曾抱怨说没有给他们配备必要的交通工具以便他们在演习中不掉队。对这类抱怨，司令员们的答复是，他们应当象战士们那样学会行军。

当时在中国曾进行过多次征兵，但事实上由于几乎所有的劳动力都适合于入伍，所以多次征兵也并不显得多么了不得。朝鲜战争及随后的几年里，大约有300万军人复员。当然，复员运动是逐渐进行的。对某个在战场上效用不大的连队或看起来似乎效用不大的连队，在最后遣散之前，先是把它们调去做警卫工作。虽然广大群众也逐渐听说朝鲜战争伤亡惨重，但无论男女，在入伍问题上竞争还是很激烈。因为在军队里可以学一门手艺，而且，当过兵的人很有可能进工厂当工人，比在边远的农业社那种荒凉的环境里要强得多。

实行征兵制及建立正规军，其直接影响之一就是民兵的力量削弱了。50年代中期，在俄国式的军队现代化高潮时期，相对来

说民兵是被冷落了，对民兵的活动很少做或几乎不作什么宣传报导。与俄国人之间的矛盾初露征兆后，《人民日报》上就又出现了有关评论农村民兵活动的文章，由此逐渐发展成一场“全民皆兵”运动。尽管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上层军官不赞同，但据说到50年代末期，已有各类民兵近2亿2千万。还应当补充一点，当时，加上一些处于关键位置的农业社的社员，大约有500万武装民兵曾经受过特殊军训（虽然时间很短），可以从事通讯工作、使用高射炮或反坦克武器。另外，在那些地理位置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农村公社以及东北一些距中苏边境几百公里以内的公社，有1500万—2000万民兵受过反暴动训练和游击战训练。这些人全会使用步枪，有些还会使用半自动步枪。尤其是，他们每年都要拿出1—4个月从事军训。不过，也有数百万民兵只能和1940年的英国国民军中最弱的部分匹敌。这几百万民兵中的领导人也许在二、三十年前受过一些军事训练，但在50年代中期（今天实际上亦是如此），他们一般是不带武器的。民兵的士气通常都很高，因为他们真诚以为自己是在执行保卫毛主席的任务；他们认为，帝国主义的核进攻不可能杀绝所有的中国人，民兵可以而且将会抗击任何企图侵略中国的军队。

1952年7月，彭德怀元帅返回北京，受到了隆重的欢迎。当时他在政治局也有着巨大影响，尽管以前他很少有时间参加政治局会议。朝鲜战争结束之后，他决心借助当时在华的1000名俄国军事顾问的帮助，使中国人民解放军专业化。苏联的训练规范和他们的军事编制思想，一起被拿了过来，发放到解放军的每一个基层单位。尤其是，经过朝鲜战争，彭德怀元帅坚持要把以往被忽视了的空军和海军也列入“现代化，纳入编制和训练轨道”。元帅下令建立一套国防体系，这套体系保护的首要目标应是政府机关、电台和联络通讯中心、铁路和公路，以防御日益严重的来自美帝国主义的核讹诈。北京不无道理地认为，这样一来就可以振

奋地方行政官员的士气。随后，彭德怀又负责把全国分成了11个大军区，每个大军区都有一位元帅或上将任司令员。这位身居北京、大权在握的国防部长，“并不阻止”各位元帅设法从地方上取得尽可能的工业支援。这一来也就自然而然在党的官员中间引起不满，他们认为重工业生产直接用于国防的比例太大。连跟踪标定仪、卡车和大量需要的“水桶、电线和管道”，都一起让军队给弄走了，党的一位领导人过后气愤地这么说。

接受了俄国训练路线的士兵们，对“大跃进”中出现的“土高炉”和其他副产品公开表示看不起，他们认为这些都是严重的劳民伤财。许多新提的军官虽然一般说来都是共产党员，但实际上并不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选定10位元帅，采用精致的苏式军服，这些对于缓和军官阶层的不满情绪很少起什么作用。据党内激进分子讲，这个军官阶层的成员当时已不再和他们的士兵同吃、同住、同甘苦，而是要求一种特殊地位。有趣的是，彭德怀元帅常常不在受此批评之列。

中苏之间的友谊一开始就有裂缝，因为斯大林对毛泽东拒不接受俄国式的共产主义很生气。他害怕中国对亚洲和亚洲各党左翼的影响，因而根本上对毛泽东持不信任态度。从主席方面来讲，他也从未忘记：斯大林已不止一次地在采取有计划的军事或政治行动之前不给他打招呼，而他曾经要求斯大林事前给他打招呼，因为他认为那样一来，在以前可以为北京提供一个向国民党军队进攻的机会，在后来则可以为北京进攻台湾提供机会。莫斯科在国民党政府离开广州撤往台湾之前，一直和国民党政府保持着外交关系。这也让毛泽东很不满意。在政治方面，莫斯科没有邀请中国共产党参加1947年在莫斯科成立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这一点，毛泽东也很生气。但是，直到1952年斯大林去世，据一位中央委员说，“虽然两国之间有一些紧张、分歧甚或小吵小闹，但一直没有公开争论。”

毛主席发动“大跃进”的意图之一，就是想在生产领域压倒俄国人，虽然这是一个愚蠢的想法。奇怪的是莫斯科并不很在乎毛泽东取得成功。莫斯科和北京都不想让“帝国主义者”知道他们之间的意见分歧，尽管北京当时已经开始用欧洲的一个卫星国阿尔巴尼亚向莫斯科进攻。

俄中两国之间日益加深的裂痕即使不曾让彭德怀感到惊慌，也曾使他感到担忧，因为他和其他所有的职业军人一样，认为“专”比“红”重要。他们担心，如果莫斯科继续拒绝兑现斯大林曾允诺过的与中国“共享”核技术的话，由此导致的重大争论将使毛泽东重新返回到原先说的“纯粹的”人民战争国防思想上去。

1959年，赫鲁晓夫来到北京，要求建立中苏“联合控制”，来承担中国海军和核装置的指挥任务。毛主席以其特有的直率和魄力拒绝了这一要求。这肯定对赫鲁晓夫产生了很大影响，他答复说可以提供更多的工业援助，同时包括为新建的工厂提供一些辅助配件和机床。赫鲁晓夫当时肯定已为和美国达成核协定下了很大赌注，但这一点可能是毛泽东所不知道或不完全理解的。莫斯科基本上不愿意向中国提供或不想允诺向中国提供核装置样品，它害怕毛主席会用核技术对台湾采取“冒险行动”。而且，考虑到美国已经盘踞着南朝鲜，并且在日本和菲律宾有精良的海军基地，俄国最高统帅部当然很谨慎，不愿卷入远东的冲突；尤其是当时他们知道他们在所有的装备上（从核武器到自动步枪）都不及美国优越，所以更不愿卷入远东的冲突。不过，尽管对莫斯科感到失望，但在整个1958年中，毛泽东每见到一位俄国人，都还是要向对方详细讲述金门—马祖海峡的危机。当时，毛泽东开始向赫鲁晓夫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导地位挑战，这也加剧了这两个主要的共产党大国之间的紧张局势。

中苏争论与罢免彭德怀

身为中共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的彭德怀元帅，突然发现自己被夹在毛主席和赫鲁晓夫的争论中。1957年，作为军事首长和政治局成员，彭德怀曾陪同主席去莫斯科参加纪念俄国革命40周年大会。正式的庆祝仪式结束后，紧接着俄国人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和成功地试验了洲际弹道导弹（这两件事都让中国人大为吃惊），彭德怀率领一个由中国的司令员们组成的庞大而重要的军事代表团来到了莫斯科，讨论中苏联合战略问题。同华沙条约组织各国的军事首脑举行过高级会谈之后，彭德怀广泛参观了苏联的军事设施，经由哈伯罗夫斯克（即伯力——译者注）和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译者注）回到中国。这两个地方离中国很近，很少有哪个中国人能获准到那里去参观，更不用说象彭德怀那样获准去看军事设施了。

彭德怀在参观考察途中的时候，俄国人答应提供大量物资援助，以支持中国国防力量现代化。但回到北京后，他明显失望了，显然是俄国人违背了自己的诺言。于是，回国不久，彭德怀发表了一篇讲话，表明他在莫斯科的谈判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并说中国不得不把自己的工业基础“作为坚强的国防力量的前提”。应当指出的是，这次讲话是在1958年发表的，当时正值强调自力更生的“大跃进”轰轰烈烈兴起的时候。经过一次历时长久的中央军委会议（这次会议于7月份结束），北京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关于“解放台湾”的宣传战。在莫斯科看来，这是一种极端危险的做法，是一桩“傻事”，因为当时美国海军正在台湾海峡频繁活动。

尽管有上述挫折，毛泽东并不打算向莫斯科让步，因为他当时

仍然处在即使在今天他的崇拜者也还认为属于他的“黄金时代”的余辉之中。在与前一次党代会相隔11年之后，1956年召开了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会议上就对这一点有过确认。这次会上，毛泽东再次当选为党的主席，并且得到“来自与会代表们的多次经久不息的掌声”。大会满意地指出：国内外和平已进入一个新阶段，工农业正在令人满意地前进，中国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在外交上的承认。的确，党内当时存在着后来所说的那种“普遍的乐观情绪”。但是，所有提到毛泽东的“思想”的地方，都从由刘少奇起草的新党章中删掉了。

这种喜庆的气氛，很快就让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带来的结果给冲散了（“双百”运动后紧接着就是“大跃进”）。然而，以往对群众情绪的变化反应总是很敏感的毛主席，这时却变得反应迟钝；而且，虽然有他在政治局的朋友们向他报告，他还是没有认识到自己的威望下降的程度。

当彭德怀1959年4月应邀率领一个友好军事代表团去莫斯科和华沙条约各国访问时，不满情绪已经渗进了军队基层——这支军队毕竟大部分是由农民组成的。士兵们并没有享受到与高级军官——包括将军们——共同服役、共同吃住玩乐的快乐。他们知道主席坚持要军官每年有3个月时间和士兵同吃同住，但他们不无理由地猜想到，没有哪个军官会来同他们一起过艰苦生活。

由于在东北、在朝鲜战争中服过役，由于高级将领间的多次互访，彭德怀元帅不只与俄国军事统帅部有许多业务联系，而且在那里有许多私人朋友。当他和毛泽东发生争吵时，这些联系就被毛用来说他是一个亲苏分子。

元帅和他的友好代表团抵达波兰时，华沙条约各国的外交部长们正准备开会，其中东欧各国的部长们毫不隐瞒他们对“大跃进”的看法。他们认为这是一种愚蠢的、导致浪费的运动。同时，聚集在那里的参谋长们也批评毛泽东那种非常著名的关于“红”比

“专”好的观点，认为中国威胁说要解放台湾是作了一件“蠢事”。实际上，华沙条约司令部是害怕他们自己被卷入远东的战争。

虽然赫鲁晓夫在“大跃进”发动之初曾经对大跃进可能取得的成就表示关心，但是，华沙条约会议过后，他在阿尔巴尼亚首都地拉那会见彭德怀的时候却告诉彭，说他现在已转而为他的共产党邻邦的未来感到忧虑。其时，莫斯科与北京的关系已经紧张起来了，而且1959年年初，俄国人已经故意推迟向由他们帮助在西安附近建立起来的兵工厂提供机床设备。这是他们违背诺言不与中国共享核秘诀和核技术后的又一次背信弃义。地拉那会议的高峰，是赫鲁晓夫作了一个指责中国的发言。他指责说中国的“大跃进”造成了时间、物力和人力的浪费，同时还严厉指责说，不应当在中国士兵需要受训练以便很好地使用新式俄国武器装备的时候，却让士兵们花费大量时间从事政治灌输、种田和建设。无疑，彭德怀觉得俄国人的指责许多是有道理的。他告诉俄国领导人，说他已下令缩减了士兵们用于学习毛主席的思想的时间。赫鲁晓夫硬要彭德怀与华沙条约各国在军事上更加紧密合作，作为对增加援助的报答，彭德怀则向他概括说明了中国毛主义的“自力更生”政策。赫鲁晓夫还再次提出了他不久前与毛主席会谈时曾被毛气愤地拒绝了关于建立联合指挥部的建议。据说，直率的彭德怀元帅当时在与赫鲁晓夫私下会晤时表明他认为主席犯了一个严重错误。但是，几年以后，彭德怀在中央委员会里的朋友们强调指出：彭德怀从来没有背叛过毛主席。他的一位朋友认为，那样做实际上“不符合他的天性”。

赫鲁晓夫鼓动彭德怀从地拉那给毛泽东写一封信，说明他说的全部观点。彭德怀后来就写了一封信，并且在把最后草稿拍往北京之前，与俄国领导人详细讨论了这封信。人们认为，彭德怀的代表团中的一个军官曾把这个消息透露给了自己认识的在主席

身边工作的一位熟人。回国途中，彭德怀在莫斯科中途停留，与俄国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会谈，并且第二次与赫鲁晓夫见面。此后，他在回国后向总参谋部表明了他的观点，他认为，为了保持同苏联的军事联盟，值得向苏联让步。因为只有如此，中国才能得到自己的国防力量急需的军事和民用设备，也才能得到6,000名俄国专家的帮助。

就在彭德怀出访的时候，1959年4月，国内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他再次被任命为国防部长，并且是排在第三位的副总理。同时，他还接替了朱德担任的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的职务。

对彭德怀来说不幸的是，就在他返回北京一个星期后，莫斯科和北京的关系便在6月20日最后破裂了。他还为另一件事感到丧气，即：虽然原来名单上写的是由他向高级军官大会汇报率代表团访苏的情况，但实际在大会上作汇报的却是他的一位下级——总政治部副主任肖华。无疑，因为受到他自己所见所闻的鼓励，加上从他的那些大军区司令员和总参谋部人员中间听到的情况，彭德怀在私下强调说，当时需要的是“社会主义国家间的相互依存”而不是主席极力主张的“依照自力更生精神搞单干的政策”。当时，许多人已经开始亲眼看到土高炉生产出来的产品的低劣质量。在这些人中间，原先由大跃进鼓动起来的劲头已经下跌。受听到的所有情况的驱动，在1959年8月举行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不顾一切地对毛主席关于人民战争的观点以及关于大量动员民兵的观点提出批评，并且批评“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许多高级干部都支持彭的观点，他们指出：在军事上实行自力更生，将致中国于极易受美国核强权威胁的境地；尤其是，如果苏联成功地实现了与华盛顿的和解，中国就更容易受美国核强权的威胁。

毛泽东很可能对彭德怀在军队中的崇高威望感到不安，因为他对因发动大跃进而在私下一直受到政治局成员的批评已很敏感。

而且，他在此以前还被迫把相当于国家元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这个职位交给了刘少奇。然而，尽管毛泽东的个人声望和权威已经下降，但他还是决心以他说的“反党活动”为理由把彭德怀拿掉，并且在同年9月份让林彪取代了彭德怀的职务。不过，和其他被毛泽东清除的人不同，彭德怀还可以在北京随便走动，甚至在1960年他还参加了官方举行的一次葬礼。他的名字既没有从卷宗中抠掉，也没有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史册上消失。在其他场合，只允许对他作为一名军事指挥员取得的成就稍加赞扬，但毛主席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到他时却称他为“同志”。一位权威人士说，毛主席在世的时候，别想指望写中国共运史的中国作者在“不是非提不可的时候提到彭德怀的名字”。这位权威人士还补充说，彭德怀的名字还被人从官方对他1936年在陕西的功绩的叙述中删掉了。1979年，彭德怀得以平反昭雪。

由于个人关系上的破裂，由于对中国应当如何保持同苏联的关系有不同意见，中国失去了一位第一流的国防部长，军队也因此蒙受损失。这些，都更加降低了主席的声望。在被列入“犯了路线错误的人”的名单后，彭德怀深感痛苦。但他仍然坚持自己对中国应采取的国防政策的见解。从主席方面来讲，他对彭德怀称他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深感恼火，后来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赫鲁晓夫就是用“小资产阶级狂热”这个词来说毛泽东的。

当毛泽东集中注意军队问题、提名林彪当国防部长的时候，处于更高地位的实干家刘少奇正在逐渐消除毛泽东在“大跃进”期间鼓励和提倡的各种作法。毛的威望无疑正在急剧下降。而且，虽然他击退了彭德怀的挑战，但他也清楚地知道：军队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军官同情彭德怀的被称作“亲苏的修正主义”观点。不过，“亲苏的修正主义”这个概念，很可能是他受到激进分子们的启发才提出来使用的；而且，当时还有以江青和安全部长康生为首的、如今已受到罢免的“四人帮”在向他汇报来自基层的

情况。这些情况就象毛泽东认为的那样“是真实的、然而并非我愿意听到的情况”。

第五章 毛泽东与刘少奇的矛盾

矛盾初起

彭德怀被罢官以后，就开始进入了毛泽东用夸张的语言所说的“两条路线斗争”的阶段。更直接些说，所谓“两条路线的斗争”，实际上就是毛泽东与刘少奇——他是法定的毛泽东的接班人——之间的权力冲突。毛泽东希望“继续革命”，刘少奇的首要目的则是希望在经历了“大跃进”造成的灾难之后，恢复农村和城市的社会安定，复兴经济。这时的毛泽东，很为不能制止他所谓的刘少奇的右倾趋势感到烦恼。他认为为增加生产而使用的物质刺激——农业社中的自留地和工业中的加班费——太多。尤其让毛泽东感到不满的是：他发现，自1935年他成为党内公认的领袖以来，到60年代，他实际上已经很难接近中层，似乎中层是掌管在刘少奇和党的手中；并且，自己的讲话已经很少能被群众听到。

毛泽东是够聪明的。当他认识到彭德怀已经不仅在军队中、而且在广大民众中被公认为民族英雄的时候，他便承认自己犯了错误，甚至承认自己犯了“严重错误”，而且承认“大跃进”这个实验所付出的代价“太昂贵”。然而，无论广大群众是否知道主席的自我批评，党内和国家机构中对他的批评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大胆了。

当支持毛泽东的人以谴责自然灾害来为粮食歉收寻找理由时，刘少奇则宣称：对农民的调查表明，自然气候只占歉收原因的三成；“人为的”因素应负七成的责任。同时，刘少奇所面临的恢复生产的任务，还因为最终在1960年6月发生的中苏关系的破裂以及苏联撤销援助、撤走1390名援华技术顾问和技术专家等因素而变得更加艰巨。

不过，自从1958年以来，刘少奇掌握的权力是逐渐增多了，到1962年为止给人的印象是：他几乎已经使国家的经济恢复到了正常状态。无疑，国家这时正处在健康恢复或甚至于有所前进的大道上。这中间，毛主席经历了两年或更长一点时间的自愿的半退休生活。其间，他倾向于集中精力关注林彪和军队的政治宣传工作，这些工作最后导致在1965年取消军衔制。

作为国家元首，刘少奇急切希望结束毛主席那种个人的、神话式的领导方式，并且，由于党的总书记邓小平的支持，他还力图取得对党务的掌管权。要做到这些并不容易。因为，尽管毛泽东在政府上层官员及党的高级干部中声望已经降低，但他在一般老百姓的心目中还深受爱戴，并且几乎已达到受崇拜的程度。刘少奇虽然缺乏主席那种坚强而迷人的个性，然而这位抑郁而刻板的人物却很聪明，而且被他在政府和在中央委员会中的同事们拥戴为“务实、老练和勤奋的”人物。刘少奇很清楚自己缺乏主席那种吸引人的魅力，而且，按照他的夫人的说法，他还感到自己处在一种很难处理的境况中——因为他不能够公开与毛泽东的分歧。

从表面上看，中共党的“八大”和“八大”以后，毛泽东的个人威望已达到了顶峰。因为自从1945年在延安召开的“七大”以来，中国人民得到了解放，而且被统一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毛泽东是无可匹敌的、勿容置疑的领袖，他创建了人民共和国，随后又指导国家在农业和工业方面经历了一系列变革，使工农业得以从内战的创伤中痊愈。然而，现在人们才知道，出席大会的

代表们都明白：由于刘少奇的作用，所有提到毛主席及其思想的语言，都从党章中删掉了。^①只有少数高级干部当时认识到了生活的严重性和即将到来的严酷的权力矛盾。少数人之所以会注意到这一点，是因为刘少奇在过去经常高度评价主席，而且直到“大跃进”为止，一直都服从并忠实执行毛主席的意志和命令。

主席本人也已清楚地认识到了刘的抱负和精神状态。按照毛的说法，甚至在刘企图把他变成供桌上的一尊佛像束之高阁——即迫使他退到国家首脑的位置上——之前，他就已经认识到了刘少奇的抱负和精神状况。尤其是刘的著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公开发表，更惹恼了毛泽东。实际上，毛曾私下对人说过这本书主张的是“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政治纲领；随后，他又公开称这本书是一株“毒草”。数年以后，毛泽东告诉埃德加·斯诺说，这件事导致他着手采取措施来反击他认为的“逆风”。毛泽东在发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之初，从未清楚规定过这场运动的目标——除了说参加运动的人应当研究他的“思想”并研究这些思想与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及组织这四个领域的联系之外。最初，这场运动被指定不仅在那些因“大跃进”后的宽松环境而产生了懒惰、腐败或产生了小地主所有制复辟的农村开展，而且在那些估计有轻微反抗行为的地区开展。

与此同时，毛泽东极力主张把城市出身的学生送到农村去劳动，以此作为消灭阶级的示范，并且主张这些学生应当在为获得最高的生产率而奋斗的同时，为创造无阶级的社会而奋斗。“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不久，便开始对一些著名的哲学家——其中包括冯友兰——和一些比较不知名的学者、记者、漫画家和戏剧家集体清洗。这些人都因“传播‘因循守旧的思想’或‘修正主义’并追随‘资本主义’路线”而受到指责。其中许多人被赶

^① 这种说法疑有误。据有关史料记载，“八大”这样作，是根据毛本人提议，由党集体作出决定的。——译者注

到稻田去作苦力。而且，由于他们中间缺乏组织和强有力的领导，所以几乎并没有发生什么反抗活动。1962年8、9月份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成功地制止了——至少是在纸上成功地制止了——任何在农业社会化纲要方面所作的继续退步。在这次全会上，毛泽东还倡议作出了一项决议，强调迫切需要从更年青的党员中培养“革命接班人”。自从这次被毛泽东认为是成功的会议之后，大约四年左右时间中，他一直没有再召开任何大型党的会议。

毛泽东关注军队的情况

毛泽东选择林彪担任国防部长，这十分明显是试图以此遏制刘少奇正日渐增长的权力。因为，尽管许多领导人都可能对林彪的背景表示怀疑，但毛泽东却相信自己可以依赖林彪的绝对忠诚。其实，与林的前任彭德怀相比，林与苏联有更多的友好关系。尤其是林彪这位以前在国内战争时期战斗在第一线的战士，一直把在公开场合和在政治局及部长会议等一切场合都令人肉麻地吹捧主席当作自己的职责。他一上任国防部长，马上就公开抛弃了他以往对曾被毛泽东称作“阵地战”的浓厚兴趣，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常常被称之为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的理论及其相应的意识形态理论，其中包括这么一种观点，即对于士兵来说，“红”要比熟练使用武器更重要。实际上，毛泽东在1966年初确实说过战士应当“沿着又红又专的道路前进”。

彭德怀任国防部长时，鼓励战士加紧训练，以便能在战斗中有效地使用手中的武器。而林彪则命令指挥员（军官）让位给万名新政治委员，以便后者宣传主席的“思想”。和他的前任一样，林彪也不仅是国防部长，而且是军事委员会的副主席，他声

称：把12万指挥员下放到他们所不熟悉的基层单位工作，将会收到“大好处”。这种观点，正是彭德怀曾为之感到痛惜的主席的观点之一。林彪上任国防部长后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发动一场以促进中国人民解放军“高举毛泽东军事思想和党的总路线的红旗前进”为目的的战役。的确，由于林彪强调在战争中“人的因素”比武器的因素更重要，因而导致这位国防部长与战场上的职业战斗员之间出现了严重的紧张局面。然而公正地说，林彪确实也曾不断强调“政治虽然是第一位的，但现代武器的复杂性也要求必须在正规军训方面比在政治思想方面花费更多的时间”。

某些中国军事观察家现在认为，林彪就任国防部长的头几年，在执行主席关于“把政治放在第一位、把军事素质训练放在第二位”的命令时是有点打折扣的。眼下还难以确证林彪当时的想法究竟怎样，但确定无疑的是：为了使中国成为一个军事强国，林彪当时强烈主张建立核武装。林彪知道中国的常规武器与美国相比是何等落后，也知道自从与苏联关系破裂以后，中国的弹药和装备是多么紧缺。

和主席一样，林彪也担心当时越南的战火会蔓延到中国来，而且通过变更军事部署、增加东南军区的部队，为避免这种危险作了尽可能的努力。毛主席急需军队在他与刘少奇之间“两条路线的斗争中”给他以全力支持。因为毛一直很重视他早期的一个“思想”，即“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他很重视他青年时代的军阀们因为掌握了枪杆子而产生重大作用并建立起权威的事实。后来，主席又把这个口号修改成“虽然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但枪还是必须服从党的指挥”。无论毛泽东晚年怎样强调枪必须服从党的指挥，他也并未改变上述基本观念。在毛泽东看来，虽然刘少奇和邓小平竭力想解除他在党内的革命工作，但当时刘邓在军队方面的影响还是有限的。同时当毛泽东认识到他与刘少奇、邓小平之间的斗争已进入初始阶段的时候，他便尽力对林彪给以扶持，

因为他认为他最终会需要军队对他表示无条件的忠诚。在毛泽东看来，由于军队本身是全国性的组织，所以军队的支持无论比起党或是比起国家行政机构来都要“神通广大”得多。毛当时可能是被林的吹捧感动了。

不过，当林彪接任国防部长时，他的地位似乎再往好处说也是不够稳固的。毕竟他曾两次离开军队，其中一次是1939年—1945年期间，他不是去莫斯科养病，就是到重庆同国民党谈判。另一次是1952年他患病之后。许多人当时曾认为他已生命垂危。总之，不管由于什么原因，林彪确实是再次离开了军队，时间长达近7年之久。有些最上层的官员当时对任命林彪当国防部长感到惊愕，因为他的历史中曾有一段不那么光彩的、神秘的插曲，它表明林彪并非总是象他现在所自称的那样忠于毛主席。

诚然，林彪在1952年确曾被选进政治局，但随后不久很快就因为他在东北时与高岗的亲密关系而被贬出政治局。与高岗的联合被称为“反党联盟”，最后导致高岗自杀（前边已有叙述）。然而，不知怎么经过一番表面上的辛劳苦干和私下对主席献忠心，当1955年4月邓小平第一次被选进起决定作用的政治局的时候，林彪又因被认为是“清白的”而重新进入政治局。毛泽东之所以选定林彪作国防部长，是因为他看重林彪作为一个战士所固有的那种潜在的服从品格，并且因为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林彪曾被逐出政治局。

无论如何，林彪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地位远比广大群众通常所想象的要虚弱得多。林彪曾经是第四野战军杰出的司令员，这支野战军在1950年已有100万人了。大多数老百姓就是根据这一事实作出上述想象的。然而，所谓第四野战军中的林家军，实际上是以这支著名军队中原先在东北坚持斗争的那10万人为基础的。有60多万人是随后在那里为了准备应付中国内战而补充进来的，他们并不一定是这位司令员的热烈赞赏者，因为他们

并未分享过他早先的胜利。

周恩来总理在“艰难的60年代初期”的态度还难以断定。他看到了刘邓当时力图帮他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周当时对国家机关发布的口头指示，是要求国家机关帮助党恢复秩序。但周从未公开偏离过他对主席坚定不移的忠诚，因此，他支持主席的路线。虽然在有些时候他也对主席的路线持保留态度，例如在提到反对物质刺激的时候。

在此期间，无论是作为国家元首的刘少奇或是周总理，都广泛出访并接待许多外国代表团访华。毛泽东则采取局外人的态度。他不断接受一些附加的头衔，而且惹人注目地访问农业社，在那里，他总是毫无例外地被当作皇帝或神接待。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刘少奇，都认识到了这么一点：随着60年代的向前推移，他们之间两种政策的斗争将变得更加剧烈。毛泽东坚信革命处在严重的危机关头，认为革命最终将象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那样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被断送。1964年后半年，毛泽东以无情的态度发动了有预谋的、他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号召对党进行彻底的大检修。刘少奇和邓小平都对学习和运用毛泽东的思想不大感兴趣，这一点让毛泽东感到恼火。中国人民解放军当时学习毛泽东的思想的热情要比广大群众的热情高得多。1962—1964年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城市所取得的成就比毛泽东所希望的要小得多。

因此，在1965年举行的一次所谓“非正式的协商会”、一次由“中央委员会的一定委员们参加的”小会议上，毛泽东极力主张说应当有一次“文化革命”。为了制定必要的运动计划，他提议成立一个由五位“领导同志”组成的小组来组织计划中的战役。出乎刘少奇和刘的朋友的意外并让他们感到高兴的是，毛泽东提议把自己的四位主要对立者、即四位坚决支持刘少奇的人的名字摆在五人小组中的前四名位置上。其实，这是毛泽东走的一着很精明很机智的棋，因为第五位成员是毛泽东的老安全部长、政治局

委员康生，康自然会把私下发生的事全都转告主席。毛泽东希望扩大“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并把它转变成能造就一批有神通的领导人的“文化革命”，以便使这场运动得以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确，毛主席尤其渴望的事情就是运动能在城市里开展起来。因为在60年代早期的日子里，毛无力阻止刘少奇在邓小平的支持下正在增长的对党的掌握权。这一点很使毛泽东生气，因为他以前一直认为刘的助手邓小平是“自己人”之一。另外还让毛泽东感到气愤的是：他不得不在中南海他的那些“散人”中间度过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南海是以前故宫的西边一隅，很是美丽迷人，那里是在京的政治局成员的家居所在。为此，毛泽东在外地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

同时，各位领导人的夫人的态度也加重了事态。在中南海各位夫人中间（周总理的夫人邓颖超可能例外），大家对毛主席的夫人江青都感到讨厌，特别是对她在政治上的权力感到忿忿不平。毛泽东主席最初在延安遇到江青的时候，就曾经有一种意见强烈反对毛与江结婚。最后，以不允许江青插手政治为条件，政治局才同意他们结婚。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是一位美丽且有很高教养的人，在她眼中，江青是一个无知而诡计多端的二流角色，遗憾的是主席竟看上了江青。叶群——即林彪的夫人，林在家时她起着部长的私人机要秘书的作用——也认为江青是一位让人感到别扭的人。

值得重视的是，自打主席允许江青插手政事，二人间的关系就有了变化。尤其是，虽然有许多证据可以证明相反的结论，但江青以往的病仍然可能是心病而非生理上的病。无疑，从主席准许江青在公开的政治场合露面以后，很少有人再听说江青犯过她以前犯过的结核病、肠胃病和皮肤病。江青曾经四次被送到莫斯科治病，而且每次有人去访问她，她的忧虑和担心就会加重。尽管她最先被邀请与斯大林共进午餐，她却很敏感地回想起，主席

的第二位夫人也曾被送到苏联接受治疗，并且在据说治疗失败后被送到中国很边远的一家精神病院了。毛泽东1957年赴莫斯科参加庆祝俄国革命40周年的时候，江青正在莫斯科一家医院养病，但毛泽东却没有去看望她。这件事惹得江青心神不安。

江青后来承认，到1960年，政治权力已占据了她的生活，而在此以前与她的生活有关的，只是婚姻和性生活。她不再象以往那样担心主席的翻译人员（主席从他们那里得到了一种真诚的关心），也不再妒忌主席的秘书和护士。她在主席的办公室旁边互有连接的游廊平房中安置了自己的一套私人办公室，在办公室中放了一个特殊的筐子，专往里扔打有记号的报纸和她认为主席会特别感兴趣的书籍。在小型的政治会议上，江青对主席显得十分尊重（如果不是赤裸裸地顺从的话），主席也很少当着中央委员的面因她说了蠢话或错话而与她发生矛盾。她的政治观点十分激进（也许是出于自负的缘故），而她的“敌人”的观点、尤其是她在文化界的敌人的观点，则无疑属于右翼观点。她在青年时代缺乏机会，现在却在主席、陈伯达、康生的鼓励下，致力学习共产主义文献和马克思主义。不幸的是，她那众所周知的弱点也和她所反对的人的弱点相似，她也喜欢讲究衣着、食物和“资本主义的”电影。

思虑中的毛主席

1965年夏初，毛泽东主席认为已经到了他清理思绪、制定未来重大政治行动计划和基本轮廓的时候了。与西方国家的领袖们——戴高乐将军可能是例外——相比，毛泽东有一个很便利的条件：他可以离开他在北京的办公桌（在那里，他会受到部长们和党的高级领导人的打扰），携带他的夫人和一小组随行人员到外

地去。

于是，主席和江青就住进了他们在杭州的一幢别墅。这幢别墅位于杭州北部一座陡峭的山腰上，很是漂亮舒适，以前曾是一位银行家引以自豪的财产。从理论上讲，任何一位政治局委员都可以住进这幢别墅。但实际上，当时只有主席一人可以在早晨和傍晚站在这幢别墅中欣赏西湖美景，领略来自西湖的令人惬意的微风。另外别具特色的是，别墅附近有一个很少使用的、跑道很长的专用机场，可供主席从这里迅速飞往上海或北京。但这次使用这条航线的却主要是江青，她当时对主席来说是一件无价之宝；她既是主席的记者——不断向主席汇报人们的思想、言行，又是一位政治顾问。此地离上海很近、很方便，正是在此期间，江青与上海党内掌权的偏激分子及文化界的人建立了很密切的关系。

就在这次隐退的前一年，主席还听说农民们仍然在谈论“大跃进”带来的灾难。虽然当时土地方面的情况还可以，但有些精明的社员已经在采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避免重复前不久的灾难。许多社员设法扩大自己的自留地，兴致勃勃地从事农产品经销，把自己的产品拿到城里的自由市场上去卖。其实，还有一些农民在土地上种植比较高档的作物——如花卉和稀有的水果，供应主席所说的“黑市场”。在主席看来，当时许多人都正在逐渐使自己转变成小资本家，而且把钱花在购买高档家具上——如软床垫（这是主席坚决拒绝使用的“奢侈品”）、椅子、柜子，等等；而当时的公社社员，则在为自己的住宅添建房屋。

作为对农民的行为的支持，公社社员告诉主席派来访问公社的代表说，党的总书记邓小平在那不久以前曾说过现在广为人知的一句名言：“私人承包‘完全正确’，只要它能提高产量，正象不论白猫还是黑猫，只要善抓老鼠就行。”毛泽东这位曾经因邓小平的才干而大力推举邓小平的人，这时听到这些情况后大为震动。更使毛泽东受震动的是，他听说刘少奇为了寻求对刘所实

行的那一套政策的支持（毛泽东本人认为这套政策是右倾政策），正在农村进行走访。刘少奇每到一处，都对干部们说：“凡是有利于提高农民的生产热情的手段，就都可以使用。”这就等于大张旗鼓地为进一步实行物质刺激开了绿灯，而且当有人对此提出疑问时，刘少奇反复重申说“关于资本主义倾向的问题，似乎并不那么可怕。”

据江青说，这句话决定了刘少奇在毛泽东心目中的永远垮台。毛泽东还为其许多来访者所谈的大量“右倾”倾向感到震惊。党内有的高级领导干部不仅住上了配有诸如收音机、录音机之类新玩艺儿（这些新玩艺儿当时还没有在公开的市场出售）的高级住房，而且为自己的子女开办了特殊的超等学校，在自己的办公处所配有轿车库。

主席还从他那年轻的侄子毛远新那里听到了反对意见。毛远新在前来看望主席时，曾告诉主席有关学生和青年人目睹党和国家受那些已经六、七十岁的“长征战士”们掌管而感到的失意感。主席那些年青的来访者们认为，这些年迈的老战士已完全丧失了原先的“革命热情”。这些青年来访者还告诉主席，在大学和技术院校中，又在重新强调技术上的“专”而不强调“红”。

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一般说来对中国的科学家和大学教授们是一种鼓励，鼓励他们重新坚信不应当象许多偏激分子所主张的那样削减学术课程而点缀上体力劳动。另外，由于觉得有刘少奇的支持，大多数大学都抓紧时机告诫它们那些比较革命的学员说，那些以自己在技术和学术上的成就而不是以政治思想为基础而得到承认的学生，更有可能为祖国的科学进步作出贡献。因为显而易见，核时代更需要专家治国论。

所有这些消息，都刺痛了主席，并使他感到沮丧，因而也“证实了”他所最担心的事。他不止一次地向许多来访者——是其中一位来访者告诉我的——强调指出，许多伟大的发明家和

“思想家”——例如瓦特和爱迪生——都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发现电力的富兰克林，主席说，曾经是一位报童。主席认为迫切需要特别按照他所确信的“正确路线”对教育制度进行重建。大学和高中，正是他寄希望从中发现他的革命接班人的地方。

毛泽东越是对当时的政治局势进行沉思，就越是感到自己在党内缺乏足够的力量去改变现行政策，或者说实在的，是去向“右倾路线”的总设计师发起挑战或反抗。毕竟，刘少奇仍然是国家元首和毛泽东自己选定的“接班人”。主席曾经经历了数日犹豫和愁思，因为他觉得并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可以得到政府部门的支持，尽管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6年来周总理一直对他极为忠诚，并且成功地掌管着他所创建的国家机器。主席担心周总理会选择有利于提高生产率的法律、秩序和条件，而不是选择主席认为对自己获得权力来说至关重要的政治剧变。毛泽东还担心：虽然周总理已不再担任外交部长了，但他却依然希望中国在外国面前能表现出一种秩序井然的景象，而毛泽东自己所计划的那场剧变，则会破坏这种现象。

让人大惑不解的是，不知为什么，毛泽东竟完全被林彪所表现出来的忠诚的外表欺骗了。因为事实一直在表明林彪就任国防部长以来所玩弄的两面派手法。实际上，毛泽东原先很注意林彪1963年在中央委员会和其他一切场合所表现出的对“中国从爱国角度考虑而与苏联疏远”所持的反对意见。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林彪说在军界反对苏联的修正主义还为时尚早；他还强调说：在中国牢固确立起自己的核力量之前，中国不应当采取如此坚决而独立的反苏立场。尤其是，他还表明他支持这么一种政策，即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完全掌握核武器之前，不应当有坚定的反苏立场。林彪认为中国应当接受赫鲁晓夫关于提供核武器样品的建议。虽然林彪也知道这样一来就意味着这两个共产主义政权在武装力量方面建立“联合指挥”，也就是意味着中国对核武器的最终控制权和

甚至于对战争机器的最终控制权都掌握在苏联手中。

最初，拟议中的联合指挥是由苏联用华盛顿和伦敦曾经使用过的语言加以解释的。例如，关于美国向英国提供核武器一事，就有一种“双钥匙制度”，保证导弹在未经英美双方共同同意的情况下不得发射。然而，尽管中苏两国科学家直到1966年一直是在一起秘密合作钻研核课题的，但不久便有消息说，苏联所企图实现的对中国核武装力量的控制权比美国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内外对英国核武力的控制权要多得多。尤其是赫鲁晓夫还企图以向中国提供大量常规武器和全部常规武器技术为基础，把苏联的权威扩张到中国常规武装力量中去。许多中国报刊——包括《红旗》杂志——实际上已经暗示说：“过分执迷于核武器的重要性”，已导致林彪相信中国应当“为当时凭借在核尖端方面的优势以超级大国自居的苏联服务”。评论家们认为，这些观点构成了林彪的“卖国思想”。

有一位中国官员暗示说，林彪曾经以下述理由请主席原谅他的上述作法。这个理由就是：当时武装部队已经为“红和技术上的专”之间的矛盾感到痛苦，他必须这样做，才能得到指挥员们在人事上对他的支持。无疑，当时的指挥员们确实已为苏联撤销援助带来的恶果而有怨言。事实上，在60年代后期确实存在着武器弹药上的短缺，特别是缺少苏联提供的大炮需用的弹药和器械备件。当时的总参谋长罗瑞卿（他后来也遭到了罢官——实际上是被清洗了）确实公开对林彪倡导的“用比军事训练更多的时间学习毛主席思想”持批评态度。罗在私下也对与苏联的决裂持批评态度。

无可置疑的是，无论用什么办法，总之毛泽东主席在下决心改变党的政策并决定在必要时“除掉”刘少奇的时候，得到了林彪的全力支持。毛泽东本人纯属臆想式的对周恩来总理的态度的怀疑，使毛泽东觉得自己在军队之外并没有真正的权力基础。但

是，即使他得到了周总理的支持，如果没有军队的支持，总理的支持也会对他与刘少奇和党之间的斗争几乎毫无价值。

主席在杭州期间，同时在离主席的别墅不远的一幢别墅休养的林彪，曾多次造访主席。他们一起讨论了林彪写的那篇曾在当时名噪一时的文章《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当《人民日报》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20周年发表这篇文章时，曾经引起一些智囊部门的一阵惊慌，它们纷纷企图据此解释中国对美国和对欧洲的政策。在这篇文章中，林彪一开始用了中国人通常用的态度，长篇大论地分析了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期间所用的战术。毛泽东曾经建立了红军的农村根据地，这些根据地在农民的自愿协助下逐渐控制了广大的乡村，因而使得共产党人能够包围并最终消灭城市中的敌人。由于林彪现在所宣传和主张的这种战术在中国以往的历史中曾经大获成功，所以也就得到了普遍的接受。于是，在文章结尾部分，林彪用比喻性的语言称北美和西欧是当时世界上的“城市”，称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是当时世界上的“乡村”地区。当时在第三世界中，那些被压迫民族正在进行反帝斗争。林彪预言说：世界革命最终将会重仿中国革命的模式，“城市”将逐渐被“乡村地区”包围。

这篇文章很自然就在驻京的外交官中间引起了一阵波动。这些外交官们担心：中国人不只是再次公开表明在军事和道义上支持遥远的非洲革命，而且将可能走得更远，不仅会支持北印度、泰国、缅甸、柬埔寨等国的反抗组织，而且会支持南越的反抗组织。毛主席对中国以外的世界很少有亲身经验。因此，他一贯倾向于放手让周总理和外交部的专家们去处理外交政策上的细节问题；然而，他对中国将来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及中国对共产主义世界的领导权却常有深虑。这种对共产主义世界的领导权，正是他渴望取苏联而代之的。

当中苏关系几乎每月都有所恶化的时候，第二个超级大国

——美国——正忙于越南战争，并陷身于各种战斗行为之中（其中包括轰炸）。这些战斗离中国边境很近，使毛主席不得安心。实际上，当时中国有些高级官员已承认自己认为确实存在着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威胁。为缓和局势，刘少奇向政治局建议：中国应当派代表团参加莫斯科的苏共“二十三大”，谋求修复中苏关系。主席当时担心，这样一来可能使中国象陷入朝鲜战争那样陷入越南战争。因为他最怕再次处于依赖苏联的境地。同时主席还认为，即使当时美国人已插手亚洲大陆的战事并把台湾作为其行动的后方基地，中国也不到与美国人对话的时候。当时中国的总参谋部提醒说，要警惕可能出现的在两条战线上作战的危险。主席当时实际上也承认这一点，但他却下结论说，最危险的敌人是中国内部的敌人，认为继续存在两种外部威胁有助于全国的团结。其实，就象华盛顿当时已经认识到的那样，他们在越南啃下的东西已经超过了他们的咀嚼力，因而并没有进攻中国的打算。但是，当时却很难希望中国人相信这个事实。

“文化大革命”的开场戏

1965年9月，毛泽东和江青一起回到了北京。随即，毛以中央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召开了中央常委会和政治局会议。经过长期休养和多次西湖之泳，毛的精神状况非常好，他开始向刘少奇和其他领导人坚持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进攻了。随后，在江青的鼓动下（江青此时的兴趣仍然在文化界），他开始号召人们再次投身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特别是文学艺术领域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主席特别提到了著名史学家和作家吴晗四年前写的剧本《海瑞罢官》。这个戏剧写的是明朝时期一位诚实的官员，他胆识非凡，敢于批评皇帝，最后却冤遭罢官和杀身之祸。

这种形式的讽刺性戏剧，在中国有着悠久的传统，而且每一个身居京都的人都明白：这个剧本实际上批评的是主席本人，因为他使他的前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冤遭罢官。另外，如果没有当时身为政治局委员的北京市市长彭真支持，这个剧本就无法在北京问世。因此，这个剧本是一场乔装过的针对毛泽东本人的批评。

同时，毛泽东还注意到当时党内有一种强有力的公开运动，其目的如果不是要彭德怀官复原职，至少也是要给彭德怀委以新的高级职务。至于毛泽东本人的意见，由于新闻部门基本上仍然掌握在刘少奇的手中，所以实际上仍旧难以公布开来。不过，在周恩来总理的支持下，林彪发动的诸如“向解放军学习”等一系列全国性的宣传战已开展起来了。这些宣传战有双重目的。战士们一方面向农村社员宣讲主席的思想，同时也帮助社员们收庄稼、架桥梁、修梯田。另外还有一些持续了好几年的运动，其一是“学大寨”运动——大寨是当时农业公社的典型，它从国家获得了大量的资金援助，用于修建精心施工的建筑项目，同时却在粮食产量上搞浮夸虚报（这是过后被揭露的）。其二是“学大庆”运动，即在工业上与农业上的学大寨同时并举的一个运动。大庆是当时中国主要的油田，这个典型是名副其实的。它以落后的设备（尤其是在为抽油所必需的供水方面的设备，更是落后）实现了即使在今天看来也算很高的产量。

此时，林彪发明了一种袖珍的、有红封皮的毛主席语录，供战士们放在口袋里随身携带，以保证战士们不仅学习它们，而且能正确引用其中的口号。林彪为这种语录本写了前言，它们一印刷出厂，很快就到了战士们手中。这种语录本也就是后来人们说的“小红书”。但当时要在地方上发行这种语录本还很困难，因为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仍然占据着书店的核心书架和仓库。

林彪用来建立各类民兵队伍的办法，给主席印象很深。以前曾在军队中服过役的数以百万计的男女都被组织起来受到训练

——通常是不配武器的，以便投入任何新的人民战争或任何可能发生的动乱。林彪还为形成年轻的“红卫兵”铺好了道路。

虽有农民的悲观主义态度，但主席还是听到了有关国民经济得到改善的消息。因为到1965年为止，中国已没有债务负担，并且从“大跃进”的灾难性后果中恢复了过来，粮食和工业产量均已恢复了1958年的水平。

“毒 草”

1965年夏末，在北京召开了历时持久、火药味浓烈的政治局会议，在此期间，毛泽东派江青去了上海。此前，江青已和上海唯一重要的党员张春桥建立了友好关系。张曾公开扬言反对当地党组织的“修正主义路线”。此后，张又介绍江青认识了作家姚文元。姚当时虽然年轻，却已是一位较有名气的评论家。这一系列活动的结果就是：11月10日的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这篇文章指责剧本《海瑞罢官》是一株由“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资产阶级分子”写的“毒草”——毒草一词已经成为当时共产党人喜欢用来否定对立面面的一个辱骂性的词。在中国人看来，这些指责也包括对北京市市长的指责——这位市长是该剧本作者的顶头上司，是反对毛泽东路线的“资产阶级分子”的“领导人”。

彭真市长已经听说了姚文元的活动，但却并未采取行动。当江青最初企图把革命议题引进北京戏剧界的时候，彭真也和邓小平一样对江青的计划反映十分冷淡。事实上，彭真确实说过不可能让革命样板戏走上舞台（邓小平后来说，只要不强迫他去看江青排演的戏，他就不在乎江青的排演）。彭真对姚文元文章的直接反映，就是命令《人民日报》不要转载姚的文章。但后来他又

被说服修改了他的决定。不过，彭真要求必须在转载时加一个编者按，说明这里发表的批评文章是文艺而不是政治批判，并且说明随后还将有其他作者继续发表自己的观点。

这样一来，正如可以预料的那样，主席与中南海他周围一些人的关系又一次陷入紧张状态，并且又一次为之感到烦恼。于是他决定返回杭州。但在返回杭州之前，为了消除任何可能出现的有关他去世或有关他身体不好的谣传，他采取了一个非常的作法，邀请了他的大约三、四十名“外国朋友”去上海参加他为庆贺他的一位外国朋友安娜·路易斯·斯特朗80寿辰而举行的宴会。其中，许多应邀者都是在外文出版社或政府的外国语学院工作的。虽然当时这些英美“外国朋友”中只有两个人出于好意与外交人员或新闻记者谈起过这次宴会，但有关“主席身体很好”的说法却很快不胫而走、广为传播。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从这以后，毛泽东有5个月的时间没再露面。这一次，是从1949年一直到去世为止毛泽东隐居时间最长的一次，其间他既没有在公开场合露过面，也没有接见过因公来访的客人。

一个突如其来的变化

由主席点名组成的“五人小组”，原来是为了“指导工人的文化大革命并净化文学艺术”的，但是在彭真的领导下，该小组起的作用却发生了变化。此时，康生的表现自然有点儿象是“站在主席一边”的人。事实上，直到彭真为准备一篇报告而突然把大家召集起来为止，这五位党的高级领导人即使不是从未碰过头，也是很少碰头的。彭真要大家准备的这篇报告，内容是要重申他的这么一个观点：吴晗的剧本虽然有不很含蓄地指责主席的地方，但还是应当作为一种文化问题对待。

彭真的报告——即后来著名的《二月汇报提纲》——认为，吴晗和其他作家一样，都应当享有主席在1956年至1957年“百花齐放”时期许诺给作家们的自由。被当作毛泽东路线的支持者的康生，显然没有被邀请参加起草这个报告的那次会议。报告的一份副本送到了刘少奇那里，彭真自己则到杭州去见毛主席，但却没给毛看报告的原件。几天以后，彭真在北京发表了报告的原件，说上面盖有主席批准这个报告的印鉴。当时康生在北京，他在电话上与江青通了几个小时的话（因为主席当时听力已经严重下降）。随后，毛泽东这位在语言上始终朴实而富于鼓动性的大师，开始动手草拟对这件事的答复。

当时，刘少奇和他的夫人正计划从三月下旬开始用三、四个星期的时间访问巴基斯坦、阿富汗和缅甸。康生当时除了担任安全部长^①之外，还是党内与外国共产党联系的首席代表，他又一次打听到了刘少奇等人在国外的活动情况，并将情况转告给了毛泽东。刘少奇和他的夫人都太过于乐观了，他们满以为等他们回国的时候，有关吴晗的剧本的争论就会风平浪静了。而且他们在临出国时留下了行政管理奇才邓小平，以为邓可以为他们与毛泽东之间必不可免的最后摊牌做好准备。

1966年元月下旬，周恩来总理私下去杭州与毛主席进行了一次未公开披露过的会面，主要内容无疑是讨论近几周来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包括阴谋和反阴谋活动。因为（在我看来）似乎很难设想周总理竟然会不知道那个神奇而又真实的报告。

江青那位从上海来的偏激的朋友张春桥（他是新的“文革小组”的副组长），在那个月的月初把北京大学学生领导人蒯大富召到既是政治局高级成员住宅区、又是党中央和国务院办公厅所的中南海他的办公室。他指使蒯大富对刘少奇和邓小平进行诋毁。

^① 原文如此。当时我国没有安全部，康生也不会是部长。——译者注

张对蒯强调说：“那两个在中央委员会里炮制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还未投降。”他给蒯出谋划策，要蒯集合其他“革命战士”，把他们——即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名字搞臭，再加上“痛打落水狗”。这次召见，使蒯大富感到非常荣幸。因为，蒯大富说，张春桥“已经对我亮出了他的老底”，并且“对我表现出特别的信任”。蒯大富很快就召集他的朋友们帮助组织了一次游行示威。随后，大街上出现了一支游行的学生小集团，他们狂呼“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据当时在京的外国人说，这些学生还给市中心的许多建筑物都贴上了标语，散发了许多强调同一主题的传单。

更糟糕的是，身为国防部长的林彪也诽谤邓小平，说邓不仅是一个“反党分子”和“赫鲁晓夫式的人物”，而且是“一个阴谋帮派的成员”。此外，他还诬陷说邓小平有自己的“舰队”。在当时的中国，“舰队”这个词几乎就是以推翻现存政权为目的的私人军队的代称。

另一种离奇古怪的说法出自康生之口。早在1966年夏初，他就诽谤说贺龙元帅“秘密布置军队，准备发动二月兵变”。贺龙是一位长征战士，他在解放华南和华北的战争中都是一位杰出的人物，此时除了是起决定作用的政治局的成员之外，还是副总理和中央军委重要成员。

这三个人，张春桥、林彪、康生，都与江青有密切的政治关系往来，所以人们有理由相信江青对这三个人作过必要的指示或至少是煽动他们去干上述勾当。就象在其他情况下一样，当时江青很可能声称是以主席的名义行动的，而且也确实可能是以主席的名义行动的。因为林彪经常见到毛泽东，他很容易向主席对质江青的指示。康生要见到主席也很容易。

周总理到杭州面晤主席以后，主席对《二月汇报提纲》的答复就最后定稿了。这篇答复以下述看法预示了“文化大革命”，

即中国正在被引向一场以消灭“黑线专政”为目的的“艰苦、复杂、长期的斗争”。其中所说的黑线，换句话说也就是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中那些反对毛主席的成员。在当时中国共产党人的术语中，“黑”这个词就意味着那些邪恶的人及那些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合作的人。由于相信可以依赖军队的支持，同时也知道周恩来总理毫无疑问是自己一边的人，主席就在刘少奇启程出访的大约两天以后，指名道姓地对北京市的党组织和彭真发起了进攻。毛当时要求撤换《人民日报》的总编辑和编委会，连同中国官方的新闻机构新华社的上层职员也一起撤换。

在刘少奇于1966年3月底4月初出国访问期间，邓小平主持召开了一次党中央书记处会议，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都参加了这次会议。其中的陈伯达在成为政治局委员之前，一直是主席的政治秘书和为主席起草发言稿的人。康生告诉邓小平说彭真犯了反对毛主席的错误，随后又把他对邓的谈话转告了毛泽东。毛泽东随后很快召集了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在4月16日同意解散负责组织“文化大革命”的五人小组。

四天以后，刘少奇出访归来。在北京机场上他受到的迎接很冷淡，这意味着他和主席间的麻烦事还没有了结。而且，很快他就吃惊地听说：邓小平和周恩来都默认了对彭真的批评，尽管他们都知道刘少奇在首都的党务及有关事情上是多么倚重于彭真。

这时，基本上已处在毛泽东控制之中的报刊杂志，都加强了对彭真的攻击。1966年5月6日的《解放军报》上，在社论中进一步说姚文元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有更严重的意义，说它不只是“一个学者的造反”，而是一场“生死搏斗”的一部分。这家报纸说，有些人——彭真和他的朋友们——“抗拒党的领导，犯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因为他们企图与无产阶级进行一场力量的较量”。文章声称“军队也不是生活在真空中的”，它号召全

体同志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参加这场伟大的斗争”，以便“把这场伟大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文章只是提到“曾庇护生产坏电影”的彭真，这说明这篇文章在发表之前是经江青看过的，并由江青添上了一些话——如果不是象当时许多人认为的那样经过江青和林彪联合炮制的话。

毛泽东一向很少操心细节问题，他喜欢处理主要问题，总是把组织工作留给别人去干。此时，他正在等待时机。他又重温了他在战争时期的口号：“饭要一口一口地吃，敌人也要一个一个地消灭”。他认识到，如果他同时攻击的象彭真那样的敌人太多了，对立面就会联合起来，从而强大到他无法对付的程度。在游览首都的时候，他环绕市郊，以他亲眼所见证实了江青向他汇报的一个情况：当时正在出现一种腐败现象，越来越多的高级党员干部不但用轿车办公事，而且开着轿车旅游、返家。他还很不高兴地看到：政府机关办公室中的家具摆设全是崭新锃亮，看上去“一副资产阶级的外观”，电影院里还在放映陈旧的、传统的、非革命的影片。确实，毛泽东当时认为中国共产党正在陷入或实际上已经陷入与俄国共产党同样的“糟糕状况”，正在形成一个新的特殊阶层——即行政官僚阶层，这个阶层的人穿的不是工人穿的布胶鞋而是皮鞋，拥有较多的书籍、上等的房子和优质的收音机，尽管他们也和所有的人一样穿着毛泽东穿的那种式样的服装。所有这些，都给毛以极大的刺激，使他觉得他非采取措施发动一场政治动乱不可。在召集了一次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那次会议上被扩大进来的人确保了毛泽东的多数票——以后，主席撤销了彭真的职务，解散了“五人文化小组”。随后他又组建了一个新的五人小组来领导“文化革命”，其中包括江青、陈伯达、康生。主席还发了一项指示。这条指示在中央委员会内部引起了不安，因为他（用几乎与他10年后用的语言相同的语言）声称：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们已“钻进”了党、国家和军队的最高层。他强调

说，这些人的目的是要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其中有些人我们已经识破了”，毛泽东说，“但是有些还没有被识破”，而且“在我们中间还隐藏着赫鲁晓夫式的人物”。

中央委员会还发了两个通告，并指示说要把这两个通告发到县一级党的领导人（中国的县大小不一，大致与美国的县相似）。第一个通告是有关政治局委员兼北京市市长彭真的，第二个是有关林彪当时手下的总参谋长罗瑞卿将军的。通告谴责罗瑞卿“用资产阶级路线反对无产阶级军事路线”。这句话的意思很清楚，因为我们已经说过，罗瑞卿不赞成关于对战士而言学习毛主席思想比在军事技术上熟练要重要得多的观点。特别是，罗认为300万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必须用现代化的常规武器重新武装起来。他反对林彪对人民战争的看法，认为林彪这位国防部长没有吸取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经验教训。通告还说，罗瑞卿在接到要求他对自己的错误思想作自我批评的命令后，企图自杀。中央委员会说，这是一种怯懦的表现；罗瑞卿因此被正式撤销职务、开除出党（1975年6月，当他光荣复出的时候，笔者与他谈过一次话，他看上去非常健康）。

在上述通告起草出来进行讨论期间，毛泽东主席表现出对杨尚昆特别厌恶。杨是一位党务干部，他在中央委员会开会期间，未经主席特别批准就用磁带录音机录下了主席的指示。中国人对录音机特别敏感，除了最上层的几位官员外，任何人也不许把录音机带进人民大会堂。非正式的讲话在发表之前都要经过修改补充才重新录音。不知怎么回事，毛泽东的讲话录音让会场外面的人知道了，康生也听说了这些录音。这些录音在国际俱乐部里播放，被许多外交人员复录了下来。杨尚昆的解释是：由于主席那一口著名的、浓重的湖南口音，加上主席经常用一些农村土话，再加上主席的声音缺乏共振音，所以专事速记的工作人员记不下主席的话。主席在会上经常用的那种省略式的说话方式，也给别

人增添了困难（后来，主席的侄女王海容副外长就承担了这项别人无法替代的工作，在主席接见重要外宾时，把主席用的成语和主席的点头示意都翻译成标准的中国普通话，再由别人将它们译成来访者的语种）。

主席不愿将他那花样繁多的骂人话和山野村夫式的语言在党的核心圈子之外传播得太远（这一点上，主席可能是犯了一个错误，因为对他的即兴发言所做的逐字直译，常常因其独创性和新颖性而给人以很深的印象）。

林彪对他虚构的军事政变的描述

5月18日，当林彪在秘密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上发言时，他一改以往阴沉的腔调而使用了戏剧性的语言。他声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情报部门获悉，某些中央委员参与了一些地下反革命活动。为了加重攻击的分量，他还点了一些与彭真、罗瑞卿一起工作过的人的名字。林彪强调说，毛主席“有好几天都没有睡好觉”，因为主席不得不拿出全部时间努力避免一次军事政变。据当时见到主席的一位中央委员讲，林彪的话纯属捏造。实际上，所谓军事政变完全是林彪在自己的想象中虚构的事情，因为除他以外再没有人说过这件事。但他却确实宣布说，已有军队（显然是专门从8341部队中挑出的人，该部队从延安时代开始就一直是主席和政治局的警卫部队）被派往一些关键和敏感部位，如电台、电话局、邮政局以及北京市的政府部门。林彪还宣布说8341部队的两名军官已被撤职。这显然是为“他的人”进入这两个重要岗位铺路的。直到1971年为止，政治局成员们几乎都已忘记了这段小插曲（见本书第十二章）。进入8341部队必须具备的条件，就是完全忠于毛主席。

这时，县级党组织已开始收到并学习有关彭真和罗瑞卿的两个通告。许多县级负责人都对这么长时间没见主席露面感到奇怪。干部们似乎已感到沮丧和有点儿混乱，担心领导层内部有了什么问题。

在此期间，毛泽东的努力开始在上层产生作用；而且，自从1966年6月以来，刘少奇似乎已最后失去了在政治上对关键的党报《人民日报》的控制。另外，由于彭真和罗瑞卿已无可挽回地被清洗掉了，曾经帮助毛泽东处理过罗瑞卿问题的叶剑英元帅，这时在党内的位置逐渐上升；也就是说他已进入政治局内部的所谓“统治集团”了。同时，叶剑英还是周恩来的老朋友。

彭真倒台以后，因为主席又去了杭州，刘少奇又再一次负起了组织“文化大革命”的责任。他向工厂、农村公社、学校和政府部门派去了充当“故障检修员”的“工作组”，进行“纠偏战役”。这些工作组都由坚定可靠的党员组成。派工作组的基本想法是要增强党在工会、妇女组织及学生组织中的权威。但是，毛泽东却借助康生、江青和陈伯达的帮助，尽全力否定刘少奇的努力（康、江、陈这时已经是在负责指导“文化大革命”的新的五人小组^①中起决定作用的人物）。

全国第一张大字报

在导致“文化大革命”开始的一系列危机性事件中，第一件事发生在1966年5月25日。当时，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聂元梓贴出了她那张后来臭名昭著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对哲学系副主任和北大校长及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一道加以指责。聂当时与江

^① “新的五人小组”一说不确切。——译者注

青相识，而且已经“红”得有名。在此之前，由于她的政治见解，她与学术上的许多权威有过冲突，而且她已看过贬责彭真和罗瑞卿等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通告。

这张大字报的一部分，有必要在此转摘一下：

“你们为什么如此害怕大字报？……这是反击向党向社会主义向毛泽东思想疯狂进攻的黑帮，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开大会，出大字报就是最好的一种群众战斗形式。你们‘引导’群众不开大会，不出大字报，……这不是压制群众革命，不准群众革命，反对群众革命吗？我们绝对不答应！”^①大字报还鼓动全体革命人民起来推翻“对大学的统治，在斗争中奋起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一切赫鲁晓夫式的修正主义者”。

当时不但大学生，而且成千上万的中国人都对大字报作出了反映。据一位信仰共产主义事业的外国人（他当时在为中国政府作翻译工作）说，大字报在北大贴出不到几个小时，就有数千张大字报贴了出来。这位外国人承认工作组的领导们曾说过如下的话：“一切都完了，现在最要紧的是让讨论开展起来”；“不要等到人家抓到铁的证据才行动”；“你们觉得谁需要批判就批判谁好了”；“以后咱们再分辨是非吧”。不用说，党的老战士们都对当时出现的无政府主义状态感到惊恐，受刘少奇影响的“工作组”力争把大字报的数量控制在最低数，力图使大字报的内容尽可能地平和。但是，直到刘少奇召集党的会议为止，无论工作组还是学校的干部，都未能起到重大作用。这一次在刘少奇召集的会议上，党的总书记邓小平表示支持刘少奇，邓说：当前的大字报活动太出格了，大字报的强硬口气反对的不是修正主义，而是党和社会主义。这次会议作出了一个关于“反击挑衅者”的决定，它无疑鼓舞了党的领导干部们，同时由此开始了偏激分子所谓的

^① 本段引文与原文有出入，翻译时据《人民日报》1966年6月2日第一版所登原文作了必要改正。——译者注

从6月10日到7月31日历时50天的“白色恐怖”时期。

毛泽东这时仍然在杭州焦虑地观看着局势，因为他认为有些地方的老党员似乎在逐渐压制他一贯支持的群众的热情。解放军战士在“学习解放军”和“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战役中已经和许多大中学校建立了友好关系，为的是进一步在这些单位发挥作用，而且无疑也为帮助这些单位组建“红卫兵”准备了条件。然而，整个局势却十分混乱，以致许多外国大使公开表示感到困惑，公开承认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这些困惑也发生在中共许多省级领导人身上。他们曾经告诉我说，他们只好“低头不语”，保持沉默。换句话说，他们决定在弄清究竟出了什么事之前一直尽可能地避免惹人注目。

10年以后，似乎可以清楚地看出当时受党内老干部支持的刘少奇与从上到下那些好斗的左倾分子之间的明显分野。但在当时要作出这种对形势的分析却是不可能的。实际上，事情本身要复杂得多。在此期间，刘少奇把工作组派到有麻烦的那些政府部门和大中学校，为的是保护党的组织。起初，工作组刚来的时候，许多左倾分子都误以为工作组是他们的支持者。但当工作组说不允许再贴大字报、不准再游行示威时，他们很快就发现了自己的误解。在很多地方，也有不少党组织的领导人企图利用当时的政治舞台，消除那些常常与自己意见相似的竞争者。在这种情况下，双方之间的争论往往又会建立在个人冲突的基础上。在其他地区，这种冲突又表现为两个由具有同样见解的人组成的集团之间的直接了当的权力斗争。在这些互相斗争的集团中，一方是当权派，另一方则是“在野派”，或者说一方是“有权的”，另一方是“没权的”。一直到1976年，在中国的许多地方还残存着这种派性斗争的余毒（见随后几章）。

幸亏中国曾经雇用一些讲英语的人在一些省城当教师，有五、六个城市的情形才得以很好地记录保存下来。甚至比“红卫兵”

自己在这方面记的东西还要多些。北京的电台播放了聂元梓的大字报以后，很快就在一些省城的大学里引起了骚乱，有些地方还出了不少麻烦事。许多大学的校园后来据说就象星期天上午海德公园的“演讲者之角”^①一样：大学生们站在板凳上或站在台阶上，为诸如“豪华的生活”和“反革命活动”之类的事而高声呼喊着谴责他们的教授。教师们的住处还常常横遭搜劫，他们的“资产阶级书籍”——有一次还包括一套完整的乔叟和莎士比亚著作集善本——都被付之一炬，家具则被搜查者们作为追求刺激的对象加以破坏。数日之后，许多院校和高级中学里都有不少教员被当作“靶子”选出来，带着显示自己的“罪行”的圆锥形纸高帽步行游街。学生们自然乐得逃脱日常课程和考试。同时，对他们来说，在风和日丽的初夏时节游历中国的许多地区，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毛泽东的新口号“对反动派造反有理”，也给学生们以新的鼓励，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北京的新闻界鼓动学生们要“扫除一切牛鬼蛇神”。

工 作 组

但是，由刘少奇和党中央倡导派出、受到地方党组织拥护的工作组，在进驻上述单位期间也有过一些不仁慈的行为。那些写过大字报的学生，有些受到了比几星期前教授们所受的打击更重的打击。刘少奇认为党的老干部和工作组是为保卫党的权威而战斗的突击队，他自然会对他的支持者们的过火行为加以宽容。实际上，刘少奇曾经派他的夫人王光美作为工作组的成员进驻北京的清华大学。在那里，王光美认为党的领导人的子女“绝对可靠”，

^① “海德公园”是英国伦敦的一个公园，以可让人们在其中自由发表各种演讲而著名，故而常被用作“自由讲坛”的代称。——译者注

所以安排党员领导干部的孩子们担任了一些关键职务。为此引起学生们对她的反感。但是，虽然因此，学生们当时并没有起来反对她，只是后来她才因此吃了苦头。

有一位英语教员目睹了西安发生的事情。西安是中国腹地黄河沿岸的一座城市，曾经是一座美丽的古都，那里有中国最好的博物馆和中国最古老的大学。工作组进大学后，几乎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一个名叫王永亭（音译——译者注）的女大学生身上了。这位姑娘曾经写过大约20张大字报攻击政府当局。因此，工作组指示学生们写大字报谴责王是“人民的敌人”，把她说成“美女蛇”、“落水狗”。随后又逮捕了王，迫使她写了一连串检讨。不仅如此，王还被公开示众长达数小时。王的个人检讨被收了起来，同时派了7名大学生去“监护”她，说是要一直到安排审判她为止。这期间，王从她被囚禁的那间屋子跳窗自杀了。

在后来作为一座“革命”城市而出名的上海市（那里离毛泽东所在的杭州不远），据说党的老干部们表面上都投入组织“文化大革命”了，实际上却都在尽力利用手中的权力维持对学生的控制。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曹获秋，据说为贯彻毛泽东的意图所做的工作很有限，却告诫全党要警惕“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危险，并且补充说他将采取行动反对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党员。据说，上海的工作组尤其具有压制性和威胁性。

在此阶段，对毛主席的政策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多数人认为主席不会有错。如果刘少奇和党的老战士倡导组织的工作组压制学生，偏激分子就会抗议说不允许教育部门的群众自由发表看法；如果工作组允许学生充分自由地批判、示威和（实际上是）反叛党和政府当局，他们就会很快失去对局面的控制，刘少奇又会因没有维持好秩序而受批评。然而，当时许多中国人和外国评论家都认为毛泽东在玩火，认为毛泽东很可能失败并被当作没有实权的国家元首排挤在一旁——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就是象刘少奇

本来计划的那样，把毛当作“供在架子上的佛像”闲置起来。

无疑，毛主席清楚地知道自己在中央委员会中的多数地位是很勉强的——如果说有这种地位的话。因此，他打算召开“扩大的政治局会议”来增加自己的支持者。他在杭州时，虽然有江青和康生向他仔细汇报情况，但他肯定还是很难全面了解国家正在发生的事情。对情况的不确定性，更加重了主席对接班人问题的忧虑。因为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目的虽然是要“使革命继续进行下去”，但他当时却经常对他的来访者谈到接班问题上的斗争。例如，在接见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时，毛泽东就谈到过这种斗争。

毛泽东特别注意斯大林死后在接班人问题上发生的斗争所采取的方式，并且希望避免这种事态在中国重演。在毛泽东的谈话中，对于党和国家机构的规模及其享受的特权日益扩大一事，也表现出忧虑。无疑，毛希望邓颖超能把他的这些忧虑转告周恩来总理。因为毛担心中国已经开始形成一个精英人物特权阶层，而他一直为苏联感到痛心的事情之一就是在苏联有这么一个阶层。

但是，在最后下决心离开他那安全可靠的根据地杭州、返回北京之前，主席花了将近一个星期的时间与他的国防部长林彪进行了讨论。林彪声称，军队无疑百分之百坚决拥护毛主席（后来的事情证明事实并非如此，但重要的是主席当时相信是如此）。林彪赞扬了青年干部为把青少年集结起来支持毛主席而做的工作。那些被派去参加前一段战役的战士，继续向青年人灌输有关的思想，这些思想最后导致组建“红卫兵”。另外，康生也利用他手中掌握的秘密情报网，配合民兵和军队进行为建立“红卫兵”组织所必需的创始工作。然而，这都是一些具体细节，毛泽东在集中全力于权力斗争和实现政治复辟的戏剧性手段的时候，忽视了这些细节。

从1965年11月26日毛泽东与他在北京的“外国朋友”共宴，一直到1966年7月，局外人都很少知道毛泽东的去处。1966年6月的《人民日报》上确实出现过毛的照片，照片上他正在接受一位阿尔巴尼亚人的访问，同时有邓小平、周恩来陪伴。这表明毛还在活动，但却并未说明他身居何处。有的报导说他正患着各种疾病，有的说是癌症，有的说是肺结核，这些说法流传很广，而且还普遍被信以为真。

第 二 篇

1966—1976

第六章 毛泽东的长江之泳

“炮打司令部”

1966年7月16日，毛泽东在武汉畅游长江，令举世瞩目。主席被一群青年簇拥着横渡长江，欢呼声此起彼伏，随行船上录像机、照像机忙个不停，分别记录了这个场面。毛泽东精神焕发。这位七十三岁的老人，虽然不象同游的男女青年那样朝气蓬勃，也游得十分带劲。据报道，他在急流中搏击了65分钟，顺水游过五、六英里江面。毛无疑是想说明，七十多岁的他仍然精力充沛。当这一壮举被中国报刊公布于众时，欧洲人却认为很荒唐，因为报道中词藻华丽，语言夸张。尽管许多外国人怀疑是否确有此事，但他们也承认，毛泽东的身体的确健壮。后来，新华通讯社发表的照片消除了这些疑虑。

两天以后，毛主席返回北京，召集了中央扩大会议。会上他尖锐地批判了刘少奇、邓小平派工作组一事，说他们企图镇压革命。毛主席强调说，党内的“大人物”应当呆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不要到闹事的地方去。他对刘少奇、邓小平组建的新的党政机构很不满意，说这些机构人浮于事，“我在这里是孤家寡人，……我们以前没有这种庞大的机构，也干得挺好。”毛泽东还说，党派出的工作组阻挠学生，不让他们讲话。应该让他们发表意见，为什么我们要害怕几张大字报和几条反动标语呢？或许是给刘少

奇一点安抚，毛又说：“对于左倾分子经常敲打敲打也没害处。”那时，主席的信条是“不是革命的动力，就是革命的对象”（这是毛泽东在中央委员会上常讲的话，但这一条后来没有象他的其它语录那样被广泛引用）。

江青后来以她特有的直率方式透露了主席对中央委员的讲话：“你们太缺乏耐心，说形势混乱甚至无法控制”；“广大群众没有错”，“让他们再闹几个月”，还说“当他们闹腾得心满意足时，如果你们觉得太乱，我们可以放放气。”主席还批评了过去六个月里在北京主持党的工作的人，说他们对这里不断升级的政治混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刘少奇、邓小平十分了解刚刚形成而仍处于萌芽时期的“红卫兵”组织，并且自然而然地为此感到担忧（如果不是彻底被震惊了的话）。由于毛泽东大发雷霆，工作组奉命撤离了几乎所有的教育机构。就在这时，毛泽东给北京清华附中的“红卫兵”（他们自称是最先成立的“红卫兵”组织）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对他们表示支持。这样，毛泽东就把刚刚形成的红卫兵运动推向了新高潮。

人民解放军和民兵在大学和中学里培训了一批批青少年组成红卫兵，目的在于使他们成为虽然年轻，但却富有战斗性的党员，为贯彻毛主席的教导而奋斗。毛泽东自己也向他那些偏激的朋友们表示，他希望从这些红卫兵中选拔出一些新生力量来掌权。

1966年8月5日，毛主席贴出了他的一张大字报，表明他打算清除刘少奇（或许还有邓小平）。在《炮打司令部》这一醒目的标题下，毛主席提出，这里所说的司令部不是别的司令部，而是党本身的司令部。“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他写道，“他们……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又何其毒也！”这是毛泽东成为共产党主席后所

写的唯一的一张大字报。北京那些政治嗅觉灵敏（即积极参与党的政策）的人，立刻从这张大字报中觉察到有一场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正在进行。他们准确地估计到，这场斗争与大中专学校里的干扰与反干扰运动有关。在党中央所在地外面汇聚了成群结队的男男女女（他们竟然有幸知道这个地方的准确位置，而在1973年至1976年期间，甚至一些党的专职干部都不知道这里）。毛主席走出办公室接见群众，并号召大家：“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然而，当时没有多少人真正明白他的用意。

与此同时，在另一次中央扩大会议期间，刘少奇的部下抱怨说，不仅会议被毛泽东的赞同者垄断，而且在会议之外他们也不让别人发表不同意见。刘少奇也抱怨说，毛泽东为搞自己那一套，已经违背了他亲自制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民主集中制是毛泽东表现他的人民观点——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群众”观点——的一种形式。党中央考虑制订的各项政策，从外交政策到私有土地的面积，都先传达到地区一级党的干部，然后是县级，最后传达到基层供群众讨论。随后，一些评论和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再经过同样的渠道反馈到中央。当然，基层群众有时也会提出一些平庸之见。然而，经中央讨论通过的决定，一旦被宣布，就没有再讨论商量的余地。

然而，毛召集的这次会议最终结束时却成了一次正式的中央全会，全会全部通过了毛主席四年来所作的决定以及他提出的罢免事项。中央委员会还通过了他的外交政策提案，这个提案主要是对抗苏联的。更重要的是，全会通过了《十六条》，高度评价了正在向前推进的“文化大革命”，制定了今后运动的发展方针。北京电台立即转播了《十六条决定》。其中第一条重申了“文化大革命”的目标——这正是刘少奇的工作组以往想尽力转移的。决定说，运动的主要对象是整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和“继续传播资产阶级思想的学术文化权威”。

第二条强调党对青少年的信任，对他们在5月里张贴大字报、组织政治大辩论的革命热情给予肯定。《决定》的第三条指出，

“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取决于党的干部能不能放手发动群众。第四条强调群众要放开手脚，自己解放自己，并告诫干部要依靠群众，不要怕出乱子。第五条中断言95%的干部群众是反对右派和反革命分子的（这是自大跃进时期以来，毛主席一直坚持的数据）。第六条提出要文斗不要武斗。第七条中，公开批评了刘少奇派驻的工作组，指出以后不能“因为运动中出现的问题”而采取反对学生的任何行动，假如有确凿证据证明是犯了罪的，罪犯需交付司法机关。以上是最重要的几条。可能是由于对刘少奇、邓小平所犯错误的性质还没有确定，《十六条》中没有点他们的名字。

红 卫 兵

1966年8月18日黎明前，北京的中心，90平方英亩的天安门广场聚满了年青人，他们身穿草绿色制服，臂戴红袖章，列队成行。很富有戏剧效果，当太阳从东方冉冉升起，放射出第一道霞光时，毛主席出现在著名的天安门城楼上。这一切大都是国防部长林彪精心组织安排的。等候了将近一夜的男女青年顿时欢声雷动，欢呼声取代了歌声。毛泽东头戴军帽，身穿绿军装。城楼上到处悬挂着他的巨幅画像，其它建筑物上挂着大幅标语：“毛主席万岁”（“万岁”是中国人对历代皇帝的一种祝愿）“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还有一幅当时已不大时髦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广场西侧的人民大会堂前矗立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以及孙中山的巨幅画像，成千上万面红旗使整个广场汇成了一片红旗的海洋。

主席把讲话的机会留给其他领导人，自己则不时地向欢呼的

人群挥手致意。在事先安排好准备电视录像的时刻，他又走到青年人中间让电视台和电影师拍摄镜头。他还和一群红卫兵“交流革命经验”。接着，毛主席愉快地接受了一位女青年给他戴上“红卫兵”袖章，这意味着毛泽东以他举足轻重的权威给刚刚兴起的红卫兵运动以巨大的鼓励和支持。同时，毛主席还建议这位女学生将她的名字“彬彬”（意味着文静雅致）改为“要武”（热爱武装）。这次事件的一个重大缺陷就是：主要演讲者林彪，用他被人称为“少气无力的颤音”读着讲稿，听起来索然寡味，大煞风景。尽管刚刚实现了他梦寐以求的愿望，被冠以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取代刘少奇成为党内第二号人物，林彪仍显得局促不安。

林彪在讲话中，用夸张的语气将毛泽东说成是“世界革命的天才”（后来，林彪对此很懊悔，因为毛泽东很快就提出反对意见）。林彪号召大力清除“旧的”东西，打倒一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仍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偶尔也有几个镜头，他绕着观礼台走来走去，面部没有以往的笑容，很显然，他心情不好。就在不久前，他才被正式通知由党内第二位降至第八位。

最不喜欢这种场面的周恩来总理看上去很坦然，他穿一件翻领短袖衬衫，很适合八月的炎热气候，而其他政治局成员则和毛泽东一样，都穿着长袖绿军装。周恩来举止言谈象一位出色的电视演员，他显得对广场上发生的任何事都很感兴趣。周恩来首先向大家表示问候，并呼吁北京的学生以主人翁的姿态接待从各省份来到首都的数以万计的客人。周恩来在讲话中也赞誉了毛主席，但与林彪相比，总理的措辞要缓和得多。

聂元梓，这位在大学里率先贴出第一张大字报的偏激教师，在陈伯达——毛主席指定的“文化革命”小组组长——主持的这次集会上发表演说，着重抨击资产阶级旧风俗旧习惯。

大会以后，红卫兵的情绪达到了高潮，街头上出现了以毛主

席的话为内容的新标语“不破不立”。陈伯达煽动红卫兵头头们要“准备战斗”。许多红卫兵组织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开始破“四旧”，即“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他们象检查团一样走进新闻机构和政府部门。在红卫兵看来，墙上只能挂毛主席的像，其它字画应一律摘掉。他们还把一些机关人员压在办公桌玻璃板下的妻子儿女的照片也撕毁。这些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的红卫兵，竟责令政府工作人员刮掉胡子，剪短头发。他们很快就变本加厉，更加无法无天。他们擅自进入办公楼内，借口找资产阶级书籍、化妆品以及西方的音乐、图片，搜查办公人员的私有财产。那些被认为出身于地主、富豪家庭的工作人员，处境更为艰难。这些事就发生在距毛主席起居办公的中南海仅有几百码远的地方，他对这些情况显然是清楚的。这块被九英尺高墙围起的地方，有两个湖，湖边垂柳成行，亭子举目可见。当时，几乎无处不遭红卫兵冲击，只有中南海是唯一没有受红卫兵小将冲击的地方。

冲击政府机关之后，红卫兵的注意力又转向商店和旅馆。在主要商业街王府井，红卫兵打坏了建筑物上的霓虹灯。那些绫罗绸缎和皮毛衣服以及其它商品，都被他们斥为奢侈品。他们警告理发师不许理欧洲发式，不许烫发，勒令饭店简化菜谱。数以万计到处串联的红卫兵名为传经送宝，实际上是旅游、观光、聊闲天，他们不吃名贵的北京烤鸭而愿喝不值钱的面条汤，以显示自己革命。

寄卖所（实际就是经营旧货的商店，目前在中国的每个城市几乎都仍能见到）也遭到查抄，说是要破四旧。而红卫兵闯入私人住宅抄家的场面，就更是惨不忍睹，找警察也无济于事。后来对于重要部门的查抄暂时受到禁止（不过，这种查抄行为在“文革”后期又死灰复燃），因为红卫兵将他们从文件中获取的个人或国家机密很快写进了大字报或印成了小报。一位驻华外交人员

发现中国的机密文件满街飘，其中一部分竟被送往香港出售。

后来，人们赞誉周恩来总理时说，他在“文革”初期的困难阶段力挽狂澜，避免了行政管理机构陷于瘫痪。确实有过一种后来得到证实的传说，说主席从总理那里得到某种形式的默许，而在当时，甚至连其他政治局委员都对此一无所知。当毛泽东极力“纵容”红卫兵制造更大的混乱以整垮党内的一批老干部的同时，他也清楚地知道，必须抓粮食、煤炭和油的生产，不然，全国将陷入混乱的无政府状态。而且毛泽东也明白，惟独周恩来才是既具有丰富的管理经验、又有非凡的才智善于应付各种局面的人选。

起初，周总理并不赞同、实际上是并不信任所有的有关成立红卫兵组织的计划。但是，他同时无疑也看出政治趋势正有利于毛泽东以及偏激派而不利于他的朋友刘少奇、邓小平及其稳健派。因此，周恩来提出，红卫兵不得干扰工农业生产，不许冲击某些科研机构，诸如远离主要城市的中国核科学基地、人民解放军训练基地等。在这一前提下，他同意出席大型群众集会。

靠近大城市或各省会火车站的农村人民公社难免遭到红卫兵队伍的扰乱，他们向农民要吃的，找住宿。但是总的来说，这一阶段的“文化大革命”对农业生产冲击不大。麻烦问题主要在运输系统。很自然，上百万的红卫兵在全国范围内大串联，使运输量骤增，造成货物运输量减少近百分之十。更有甚者，红卫兵还拦截了一列满载苏联武器驶往越南的列车。就在这个时候，周总理出面干预并劝说主席，说已经到了该让红卫兵返回家园的时候了，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减轻运输负担，保证国内食品以及出口产品的正常运输。“文革”中，周总理曾多次出面调停，这只不过是其中一例。在此之前，北京天安门广场已举行了七次大规模的接见红卫兵活动。在第二次接见时，林彪对红卫兵“横扫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残渣余孽”的伟绩给予充分肯定，同时他又重申，要

警惕那些窃取了党的高级领导职务的资产阶级反动分子。在第三次接见时，林彪又以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作为他讲话的主题。

在此前后，几乎所有城镇都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同一地方有三、四个观点不同的组织相互竞争，每个组织都想争取更多的赞同者，于是，各派组织之间常有武斗发生。有些派性组织还从驻军部队偷来武器搞武斗。一些学生在武斗中丧生。更有甚者，一些女学生在混乱中竟被强奸。流氓行为在恶性膨胀，红卫兵把市区的墙全涂成红色。不仅如此，数以百计的古寺庙内，雕像、装饰全被破坏，以致于尽管做了大量的修复工作，至今还有一些寺庙仍不能开放。一些知名人士也受到冲击，其中包括中国第一任总统孙中山的遗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副委员长、驰名中外的宋庆龄女士。尽管她是蒋介石夫人的胞姐，而且仅在临终前才加入共产党，但她早就将自己的命运与共产主义联系在一起。她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每日晚餐前更换衣服——引起了红卫兵的注意。后来，周总理向她表示了歉意，还说这种非礼之事太多了。

这些暴徒们还闯入圣殿女修道院，砸毁宗教古迹，甚至恶毒殴打老修女（由于驻华使馆外交人员的子女上学，需要外语教师，这些修女留在了中国），但从没有谁向她们道过歉。另外，还有许多人闻风丧胆，不等红卫兵到，便先将自己的东西毁掉。笼中的鸟、缸里的金鱼、盆里的花草都在劫难逃，被视为典型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好多人都对我讲过他们是怎样赶在红卫兵发现这些倒霉的东西之前，杀死了鸟，折坏了花草。还有一些人砸坏自己的留声机和西洋乐器——诸如小提琴、吉它等等，因为主人们怕红卫兵因此而找麻烦。在广州，红卫兵经常闯入民宅，搜外国货。人们整日提心吊胆，不少人烧掉了自己的进口日用品，其中有他们多年来从香港买进的东西，还有亲朋好友赠送的礼品。

当时，许多无辜的人惨遭迫害，求助于警察和军队都于事无

补，公安人员也不维持社会秩序。看到这种情景，驻华外交人员深感震惊。数年后，周恩来总理提及这些事时说，因为当时曾下过命令，不许武装力量干预红卫兵运动。然而当年的大字报上却说，周总理曾讲过“杀戮是可以理解的”，这显然令人难以置信。早在内战时期，周恩来在上海主持地下工作，那时被获准的暗杀行动就极为有限。毛主席本人也反对死刑，在50年代中期，他就讲过，“杀人不是割韭菜”。

首次给偏激情绪降温

那年秋季，为了使红卫兵运动有所收敛，林彪提醒他们，说主要攻击目标“必须是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接着，北京及全国其它省份的许多党的干部就陷入红卫兵围攻之中。毛主席在《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里暗示过的领导者之间、政治局内的争权活动10月17日被挑明。北京的大字报上号召大家“要誓死捍卫毛主席”（有趣的是，1976年4月，在邓小平副总理再次被打倒之后，北京出现过同样的大字报和标语）。次日的大型红卫兵接见活动中，标语更换了三次，并传说，正在进行着一场新的、严峻的阶级斗争，目前还难决胜负。这次集会，一反往常那种由领导人讲话赞誉主席功绩的模式，党的领导人只是乘车绕天安门广场一周，即宣布接见完毕。这使参加接见的百万小将们大失所望。当天晚上，象往常一样，周恩来向群众解释了一些领导人缺席的原因，告诉他们江青身体欠佳，林彪是因没时间准备讲稿等等。“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恩来总是这样，发挥他的才智和魄力平息事端，他为此做了大量工作。

林彪曾对一些高级干部（当然也包括周总理）散布谣言，说刘少奇和邓小平正在密谋政变，这种指控在当时是难以解释清楚

的。后来一些中央委员认为，毛主席的最终目的是整掉刘、邓，同时又想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林彪对此心领神会。就林彪本人来说，他想尽快结束红卫兵的造反运动，因为它不仅影响了运输，还给军队形成很大压力。据林的政敌讲，林彪甚至早在他企图搞政变之前就认为，刘少奇、邓小平是难以整垮的。因为，周恩来虽然站在毛主席一边，但他一直在施展自己巧妙的斗争策略尽力从中调和。通过详细调查之后，周恩来和毛的秘密保安头子康生都说，所谓政变阴谋，最终查无此事。

指控别人政变的这位主席“最亲密的战友”，后来自己竟以政变罪告终，这不能说不是一种报应。此后连续五个月，林彪几乎没怎么露面，不知是主席的旨意还是他个人的意愿。也就在这一时期，一向很“顽固”的邓小平，经过私下里多次交涉，首次做了自我批评，承认自己和刘少奇一直在推行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此后，刘少奇和邓小平继续以政治局委员身份参加接见群众的活动。一直受党直接领导的原“文化革命小组”此时已被解散，新组建的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任组长，江青任副组长，江青的老搭档康生是顾问；还有来自上海的张春桥等。就是这个张春桥，伙同姚文元按毛泽东的旨意登载了一系列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作为导火索，引起了这场“文化大革命”运动。

新的中央文革小组搬到重要的中央军委所在的楼内办公。红卫兵从全国各地来到首都接受毛主席的检阅，然后再返回家乡成立红卫兵组织，从8月到11月间，共有1,100万青年到首都参加接见。虽然周恩来总理在8月份曾讲过串联是件好事，但此时中共党内稳健派已公开表示，要逐步减少进京红卫兵的人数。

除此之外，红卫兵还到乡村去参观温泉、参观旅游胜地，还到被称为“革命圣地”的毛主席的故乡韶山参观。这些都给铁路系统带来了难以承受的压力，因此在11月25日、26日的最后一次

大规模接见时，有关领导告诉红卫兵，他们是本年度最后一批，“今年不再举行接见活动，到1967年春季天气转暖时再另行通知”。

此外，政府还告诫红卫兵，要他们在12月20日之前必须离开北京，20号以后将不再免费提供车票和食宿。派去与红卫兵合作的军代表奉命送红卫兵上火车，然后返回各自部队。后来毛主席自己也承认是他制造了一场大动乱。人们必然会推测这是因为周总理就运输系统的混乱给主席提了意见。据说，主席在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曾以息事宁人的口气对大家说：“如果大家对我有意见，也怪不得你们。”还说，他自己对于红卫兵照他的指示所造成的暴力冲突也感到震惊。他并不否认，“文化大革命”犯了许多错误——尤其是他自己——使不少人在运动中丧生。然而他还说，错误是难免的，也应看到，共产党经历28年才发展到今天这样，而“文化大革命”才仅仅开始五个月。主席强调说，他认为至少要经过五年才能得出经验。但他没具体说明，五年这个时间数据是怎么得来的，也没有解释他早些时候根据什么说“乱上几个月并不是坏事”。

就在这前后，毛主席再次离开北京去杭州。按照毛的指示，江青公开以领导者的身份操纵“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虽是很有名气的作家，又多年在毛泽东身边当秘书，但他很不善言谈，在群众集会上总是江青扮主角。江青当过演员，会作戏，讲话时照顾到舞台艺术效果，从而取悦于那些年轻的听众。然而她时常抬高自己，嘲弄别人，使人听起来有些刺耳。

不久，江青的注意力便开始转向文艺界。她在此之前已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文化工作顾问。在一系列集会上，她曾严厉指责那些负责京剧工作的人，说他们不是搞西方类型的电影、芭蕾、音乐会，就是搞一些传统戏。来自上海文艺界的江青过去的许多

仇人都被整了下去，由一些愿把“革命”题材引进所有娱乐活动的人取而代之。江青强调，男女主人公都必须表现普通老百姓，即工人、农民、战士（简称工农兵）。而不是象以往那样，代表帝王将相和达官贵人。此后一个时期，文艺表演的确呈现出一派“新景象”，魔术、杂技、木偶剧、各种形式的芭蕾舞剧，概不例外。同时，所有的西方音乐都被说成了资产阶级的“靡靡之音”，所有电影中都剪掉了谈情说爱的场面，凡涉及到性问题的一概删去。这一点让人难以理解，因为毛泽东本人以前也讲过一些有关性爱的话，而且他也曾结过三次婚，并且总是喜欢有漂亮活泼的女性伴随左右。而这个对性问题极为严肃的阶段，恰恰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年轻的红卫兵到处串联的时期，因此，数以百万计的人来来往往，竟很少有因谈恋爱而怀孕的。

那时，虽然江青还不是政治局委员，但在对付了文艺界的“坏分子”之后，她还是又把注意力转向了党的领导机关。

12月上旬，红卫兵半夜里抓走了彭真（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市长）。几天后，他们又绑架了前宣传部长陆定一（因陆曾得罪过江青）和已被撤职的总参谋长罗瑞卿，还有原先“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的杨尚昆以及其他老干部。大约一个星期以后，前国防部长、已被软禁的彭德怀元帅，被军用飞机押送北京。而在此之前，中央已经发布过重要通告，目的就在于禁止红卫兵私自抓人，非法拘留人。通告说，不论何人，只要从事这种非法活动，将按国法严惩。现在我们才知道，当时是周总理在获悉首都红卫兵无法无天的行为后，深感忧虑，授意起草了这份通告。陈伯达、江青没有参加讨论这个通告的会议。诚然，江青的确也讲过与通告类似的话，告诫红卫兵不要武斗。然而，至今仍有不少人怀疑，即使江青没有唆使抓人，也是她领导的中央“文革”小组派军用飞机将前国防部长彭德怀从成都押到北京的。

群众批斗大会

继这次大搜捕之后，1966年12月12日，在工人体育馆召开了批斗大会。这也是“文革”期间最不堪回首的一幕。会上，彭真、罗瑞卿、杨尚昆等遭到了万名红卫兵的公开批斗。据目击者讲，不知是因为受了折磨、恐惧、挨饿，还是三者兼而有之，他们当时身体很虚弱。罗瑞卿（他是1975年在周恩来总理、邓小平副总理主持下重新恢复工作的最后一个人）出现时腿上打着石膏，曾传说他因不愿遭受红卫兵的批斗而从监狱窗口跳下试图自杀，或许腿上的石膏能证实这种传说。这次批斗会的主要目的是想使这些老干部当场出丑、威信扫地。江青那时曾企图以此使这些老干部不能东山再起，“永世不得翻身”，事实最后证明，这是一种痴心妄想。

这些人被逼着向群众低头认罪、请求宽大。人群中有的嘲笑、唾骂的、指手划脚的，他们很开心地欣赏着这个场面。在当今中国，共产党人有时也讲，“面子”已不再那么重要。这是自我安慰。我曾亲眼目睹过周总理责备几位高级官员，他们当着外国人失了面子，几个星期都垂头丧气的。

假如中央“文革”小组当时允许把这些老干部早点处决的话，他们可能早已成了烈士，这批观众也会因此而失去一次免费娱乐的机会。一些人认为，这些人一旦名誉扫地，将寸步难行。他们因此成了“阶级敌人”，其中即使没有关进监狱的，一般也是被派去干诸如掏粪、运粪之类无人愿干的脏活或最折磨人的活，以此度日。不少次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总理总是出面调停，以这些人年迈体弱为由，寻求更妥善的方法安置他们。不管怎么说，这些老干部在农村没有呆很久。尽管对于这类或其他残害老干部

的事件，毛主席可能无力阻止，但他对这些情况非常了解，他本来完全可以将他个人的意见告诉中央“文革”小组，让他们去“降降温”。

周总理自然是一直在北京、在人民大会堂三楼他的办公室里。他通常工作到深夜，而白天，他又要全力以赴来保证在红卫兵掀起的大动乱压力下，国家管理机器能勉强运转，不至于全部瘫痪。总理还千方百计地试图说服红卫兵头头们采取较为稳妥的方式，然而连他也感到无能为力。年底，有迹象表明，关于刘少奇、邓小平是继续留在党和国家的高级职位上还是被清除出去这个问题，毛主席身边有两种意见，各方势力旗鼓相当。与此同时，红卫兵对于他们不能进入中南海也忿忿不平。这堵红色的高墙内，是毛主席和中国领导人居住生活的地方。这里有一流的军队警戒，警卫人员就住在附近的营房内。没有遭到逮捕的刘少奇、邓小平以及其他政治局成员，不能参加任何活动而只能呆在家中，否则便会被红卫兵抓去。

抓不到刘少奇和他的夫人也就无法与他们辩论斗争，红卫兵因此气急败坏。其中一个红卫兵组织竟设下圈套，送给王光美（刘少奇的夫人）假消息，谎称她的女儿伤得严重，需立即动手术，要她去医院盖章。王光美陷入圈套后被带到她曾以工作组组长身份工作过的清华大学。经过长达8小时的粗暴盘问，王光美被迫在这私设的法庭上，承认她和她仍是国家主席的丈夫生活方式资产阶级化，她还答应向学生进一步揭发她丈夫推行的“反动路线”。实际上，后来并没有证据证明她这样做过。但这一事件必定达到了它预期的目的，给了刘少奇阵营一个沉重打击。

也应当看到，毛泽东之所以号召红卫兵“炮打司令部”、在党的领导集团内部制造大动乱，还有其它原因。当时他看到了一些腐败现象。在北京以及全国其它省市各级政府中，许多党的干部生活在特权社会中，他们的生活水平比普通百姓高得多。在毛

主席看来，当时的中国很有可能步苏联共产党的后尘。江青对刘少奇夫人到印度尼西亚进行国事访问时衣着华丽、佩戴珠宝大加指责。这对毛泽东确有一定的影响。但毛泽东本人也确实想击垮这一新生的特权阶级。他认为，从旧社会过来的人，没有经过很好的改造，这些人中有许多虽承认共产主义，但骨子里还是“修正主义分子”。另外，除北京外，三分之一左右的基层管理部门的头头，曾经是蒋介石、国民党的部下。尽管这些人象中国的官僚阶层一样，很胆小怕事，不会挑起事端，但毛泽东肯定设想他们与反共的侵略者有勾结。显然，这样做只能是枉费心机。未来的共产主义以什么形式出现目前还很难预测，但中国无论过去或现在都把它作为追求的目标。毛泽东欲将这两种不同类型的人从党和国家机关中清除出去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看不出他想要什么样的人取而代之。事实上，许多高级干部被赶下台后，党的领导人都陷入了困境，无法顺利开展工作。后来事实表明，正是由于行政部门管理不善，效率不高，才促使周恩来总理下决心让邓副总理以及一大批党政军干部重新出来工作。

·农民

·①

·

·1955·

第七章 上海：一个激进的城市

安亭事件

上海的“文化大革命”序幕较长，因为当时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曹获秋和副书记陈丕显^①都是坚定拥护刘少奇的“顽固派”。而且，陈丕显还坦率地提出七十二岁的毛主席“已经太上年纪了，应该休息”。尽管如此，上海仍与北京一起双双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先锋城市。

上海市委根据需要曾印发过40万册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这些书不仅堆满了书店，而且战士的挎包内也塞满了这本书，使得表现“毛主席思想”的“小红书”在战士的挎包里没有多少立“足”之地。那本由林彪写了前言的小红书，在北京首次检阅红卫兵之前已印行了上百万册（据新华通讯社的工作人员透露，总印数达8,300万册）。在上海的高级干部中，1965年就已坚定地支持毛泽东路线的只有张春桥一人。当时，他有许多时间都是在北京组织全国的“文化大革命”。上海各大学以及部分工厂的造反运动，是由曾经在北京贴出全国第一张大字报的聂元梓点的火。1966年秋，她大摇大摆地窜到上海，住在和平饭店。另外，那些曾在北京参加过红卫兵集会的大学和高中学生，也急

^① 这种有关曹、陈二人当时职务的说法不确切。曹当时任上海市市长，陈是第一书记。——校者注

于在自己家乡成立组织。当时所谓“交流革命经验”的说法极为流行，红卫兵们几乎整日为此奔忙。不几天，聂元梓就把和平饭店变成了舆论宣传的中心和红卫兵集会的场所。这家饭店位于黄埔江边，当时仍然象诺维尔·科沃德(Noel Coward) 20年代初在那里写《私生活》一书时那样，是一座完美新颖的艺术典范。直到1974年，有位退休的电梯工人（会讲英语）还记得诺维尔·科沃德和“游乐场的爵士乐队”那辉煌的岁月。

当时，王洪文因为坚决拥护“文化大革命”，已经在上海国棉十七厂小有名气（后来在1973年8月召开的第十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他一跃成为党内仅次于毛主席、周总理的第三号人物）。1966年11月，“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宣告成立，同时召开了有上万名群众参加的大会。当造反派派出一个代表团去见“反动”市长曹荻秋时，有4万多群众聚集在大广场上听那蛊惑人心的演讲，直到晚上9点多钟。为了稳定一下造反派的情绪，曹荻秋让他们稍加等候；造反派随即决定派代表团进京向中央领导汇报。他们乘坐的火车从上海站驶出20分钟后，在安亭接到市长命令停了下来。市长要求（实际上是命令）工人代表立即返回，他们却采取消极抵抗的作法，坐在火车里唱革命歌曲，念那本“小红书”。这种僵局一直持续了10个小时，直到张春桥乘专机从北京赶到上海时才结束。

张春桥作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几乎可以协商解决工人提出的任何问题，他们也就没必要再进京。此外，张春桥还宣布，承认“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为合法的革命组织。接着，大字报发表了工人的观点，他们还赶印了许多传单，用军用卡车在上海繁华街道上散发。对于这次事件的这种意外变化，市长表面上表示高兴，暗地里下令公安局把国棉十七厂的十五个头头定为反革命分子，其中包括王洪文。偏激分子们称市长此举是“背信弃义”。到12月中旬，上海已明显地形成了两种势力，一边是“工

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另一边是上海市委市政府。看到上海潜伏着骚乱的危险，而他们又力不从心，市长曹获秋和他的助手们转向北京求援。

骚乱和示威游行也扩散到了码头上。外国船只停泊在那里，找不到装卸工。农民要求国家抬高粮价，否则他们就停止供给城市粮食。码头和工厂的合同工、临时工也开始讨价还价，因为他们的工资比正式工低得多，还没有退休金，不享受公费医疗，他们年老以后，就被送回家乡，分文不给。为此临时工连续举行游行，出乎他们的预料，他们的要求竟然得到了满足。为了缓和局势，市领导给一部分码头工人补发了工资，给另一部分工人增加了工资，还有不少奖金。

市政当局还向群众发放了大量的日用品或物质实惠，想以此维持安定。一时间，几乎所有商店里的消费品柜台上都空空如也。这种作法后来被称为“经济主义”。然而，这些被称为“糖衣炮弹”的额外工资，并未能使市长的权威免于崩溃。因为发电站、火车站、水厂的罢工已严重威胁着这座城市的日常生活。

人们后来说的上海“一月风暴”，始于1967年1月3日。这天，“工总司”接管了《解放日报》，还赶走了“走资派”，即一些正在工作的编辑和印刷人员，这些人被认为是市长的追随者。次日，报上登出《告上海全体人民书》。文中，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阐述了上海的严峻局势，呼吁“全体革命者起来击退经济主义歪风”，同时还告诫人们要抓生产，以挫败市长和那些主持市政工作的“反革命分子”的“阴谋”。

在上海，不少积极分子读过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的著作。党的月刊《红旗》杂志在上年曾登过一篇文章，是由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红旗》杂志总编辑陈伯达撰写的，文中对巴黎公社的失败表示同情。由于这篇文章，加上上海对这个主题的宣传，导致工人接管了一个又一个工厂。与此同时，在张春桥的

指使下，部队派出一些小分队保卫广播站、发电厂、码头、大桥和银行，以防坏人破坏（马克思当年就曾指出，巴黎公社社员没有占领银行是一大失误）。在这次有权威的“革命夺权”运动中，张春桥、姚文元是幕后策划，由王洪文在前台表演。

据报道，有300万人参加了1967年1月6日举行的群众大会。会上宣布推翻上海市委、市政府，免去曹荻秋的市长职务。五天后，党中央、国务院从北京发来电报，表示承认上海新的革命政府。

“中央文革小组”还提出两条新标语：“学习上海小组的革命经验”，“丢掉幻想，准备战斗”。1月16日，毛主席对上海“工总司”的夺权正式表态支持。

在没有任何法律和道德压力的情况下，成千上万的人自觉自愿地退还自己的奖金和超额工作补贴。在许多英国人看来，这简直不可思议。这表明，在中国青年人中间有许多人真的信仰平均主义。然而，毛主义者主张的是：只有到世界革命胜利、最终消灭了货币之后，才能实行工厂厂长和清洁工一律享受同样的工资待遇，“各取所需”。

成千上万已被送往贫瘠的农村参加劳动的上海青年，利用这个机会返回家乡，或到处游玩，或投身于上海的政治骚动中。不少目击者报道说，数以万计的人整日在街上闲逛，常因观点不同而大打出手，各自都称自己是拥护毛主席的。张春桥告诫大家要维护社会秩序，还提醒造反派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反对极端民主和自私自利。实际上复旦大学的学生确实绑架了三名作家，将他们关在学校地下室内，后由一队带武器的军人将他们救出。一个月的“光荣革命”使这些人后来被扣上“极左分子”的帽子。这在“文化大革命”中期，甚至在后期，都是司空见惯的事。

就在1967年年初这段时间内，曾经就将要成立的“上海人民公社”进行过周密的计划。最后决定，“公社”的领导成员应该

从“工总司”下属的38个群众组织中选举产生，每个组织有两个名额。刚刚夺了市长权的当选者，开始组建新政府，迫不急待地想以“公社”这种革命形式控制这个城市。紧接着又组织了一次大型群众集会，二月份“上海市人民公社”正式宣告成立。在冗长的宣言中他们提道：“前上海市委、市政府已被砸烂！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主要策划者张春桥、姚文元出席了大会。据说，党中央批准了这一行动方案，认为这一方案将实行“民主集中制”（如前所述，这种制度是毛主席所倡导的）。

“公社”登台不久，张春桥、姚文元便接到毛主席的指示，命他们立刻进京接受召见。出乎他们意料之外，毛泽东对成立“公社”极不赞成。最后，两位上海偏激派领袖也不得不承认，这次犯了严重错误。由于毛泽东的干预，“公社”于2月14日更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毛泽东反对称“公社”

主席为什么改变主意，这一直是一个难解之谜，因为他自己陈述的理由，总是避重就轻。他告诉张春桥、姚文元，说“上海人民公社”的成立会惹出一些麻烦，并说他怀疑他们是否认真想过这些问题。主席想了一会儿，又接着说，如果全国都成立人民公社，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否也应改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社？

“别人会承认我们吗？”（毛泽东很少如此关心外交上的反应。）“苏联可能不会承认我们，但英国、法国会承认。还有，对我们驻各国的外交大使，我们该作何解释？”

接着，主席告诉张、姚，说已有20多个地方要求成立“人民公社”，但中央已发布文件，规定除上海外，其它各地不许这样做。同时毛泽东还敦促两位上海领导“改一下”，将“公社”改

为“委员会”或“城市委员会”。他说，“公社这个名称，用于镇压反革命太弱了些”。这大概是他反对成立公社的真正原因。几年后，在同他侄女的一次谈话中，毛表示，他最讨厌的是公社的自由选举，因为他自己的人在选举中可能被左派或右派击败，他毫不掩饰地说：“想想看，如果这个在全国推广开来，会有多危险。”

毛泽东主张，一切重大事情必须由“中央”决定，也就是说，由他控制和掌握。对于任何不经过政治局而擅自作出重要决定的机构，他都不能容忍，并斥之为分裂组织。主席还就一些标语口号的提法作了新的指示，“以后不要再用‘打倒坚持反革命路线的顽固分子’，而要用‘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主席还告诉上海代表不要再用“天下者我们的天下”这条当时几乎妇孺皆知的语录。毛泽东补充说，他记不得曾讲过此话。实际上他1920年曾这样讲过，后来在对年青人讲话时还用了“世界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

整个一月份，派性冲突遍及中国的许多地方，包括南昌、广州、西安、甚至边远地区新疆。新疆地处中国最西北，靠近中国的核基地和导弹基地。北京的红卫兵在苏联驻华大使馆前的游行示威进行了将近一个星期，使馆外沿街的树上挂满了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的漫画像，高音喇叭中也叫喊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叛徒”。首都大字报铺天盖地，除了林彪与主席本人，其他中国领导人都难免遭到红卫兵的冲击和诽谤。

尽管周总理极力劝阻，江青仍一意孤行，唆使造反派围攻外交部长陈毅，据说他已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不过，二、三月份，在北京的大字报中，也有指责江青和另外一些偏激派领导是“极左分子”的。毛泽东在1970年曾对外国客人说，当时派性斗争确实激烈，他也为红卫兵的无纪律性感到遗憾。当时主席凭着对政治舞台的洞察力，感觉到他和陈伯达以及“中央文革”已无法控

制这次运动的方向。勿容置疑，他对此十分关心，因为早在一、两年前他就讲过，如果军队和人民不再跟他走，他将再次上山打游击，重新武装夺取政权。

一位观察家说，当时的中国象一位瘫痪病人，大脑不能支配四肢。因此，在对付刘少奇、邓小平的同时，主席又开始采取有效措施控制红卫兵。经过同林彪商议，毛主席公开指示军队指战员到红卫兵中支持左派，在他们遭到“反革命分子袭击”时给予支援。在主席或甚至在林彪看来，这个命令非常合乎情理，然而对于一位军区司令员来说，比如对无论广州或乌鲁木齐军区司令员来说，是很难辨别哪一派红卫兵组织是真正的左派，因为各派都讲自己是为毛主席而战。此外，军队一向反对那些对他们驻地的安定构成威胁的人。但是起初他们一般都的确支持过红卫兵。不久，从北京发出了一系列指示，劝告造反派要自制，周恩来还当众严厉批评了某个红卫兵团体蛮横无礼的行为，指出“触及敌人的灵魂比刺伤敌人的皮肉要重要得多”，这样可以争取许多人站到毛泽东路线一边而不是将他们推向另一边。

1967年3月30日，林彪说已经调遣了30个步兵师（约40万人）来保障国内一些要害部门正常工作。从理论上讲，军队守卫的是广播电台，以确保播出的文章与中央精神一致。省级报刊也大致如此。但实际上，军队的主要任务显然是保护机场、发电站、车站、水厂、码头和公路。

1967年3月下旬，北京的气氛的确有所缓和。但这种缓和显然没有持续多久，因为4月份又出现了更多的非法法庭，刘少奇的夫人再次受到红卫兵的侮辱。不久红卫兵又召开了一次更重大的批斗外交部长陈毅及外交部其他领导人的大会，其锋芒所向实际上是对着周恩来总理。部长起初还心平气和地回答红卫兵提出的问题，后来红卫兵殴打保护机密文件的工作人员，陈毅才气愤地报告了周总理。此后，红卫兵又交给总理一份最后通牒，勒令陈毅

和两位副部长姬鹏飞、乔冠华到红卫兵法庭听候处理，被总理严辞拒绝。红卫兵接着便贴出大字报攻击他们，并于5月29日再次冲击外交部。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在这场众所周知的大浩劫中，绝大多数农村人民公社的生活却依然如故。当然，这里也出现了一些墙报，为“文化大革命”唱赞歌；同时，受林彪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推行的个人崇拜的影响，农村里也到处可见毛主席的巨幅画像，还有许多塑像。但总的说来，城市里的政治动乱对农民波及较小。

虽然调遣了大批军队保护铁路和其它要害机构，管理仍经常陷入瘫痪状态。红卫兵还精心策划了一场拦截火车的事件，车上载着运往越南的苏联武器。此事惊动了周总理。事后红卫兵供认，他们用赋了自制的手榴弹、地雷。红卫兵在铁路上的广泛行动，造成许多地区煤和油紧缺。相比之下，虽然绝大部分地区处于动乱中，城市的粮食供应却仍然较有保障。

考虑到10年后当主席日见衰老时江青手中日益上升的政治权力，1967年4月江青发表的那篇讲话就显得特别重要。究竟她是否企图通过讲话，把自己树立成唯一受主席请求解释主席思想的人，这一点没人知道；但据她的政敌讲，她是借毛主席的威望表达她自己的意思。在几次长篇讲话中（其中一次是给中央军委做报告），她炫耀自己和毛主席生活在一起，并说尽管许多情况她还不甚了解，但由于她是主席最亲近的助手，所以她可以解释主席的思想。讲话的中心议题是要求高级干部必须爱护红卫兵。她还说他们应该走出军营、办公室，和下层群众打成一片，帮助他们建立革命政权，推翻旧机构。

整个夏天，中国的许多城市都有报导说因武斗导致伤亡。据报道，在气候炎热的云南省昆明市的一次巷战中，1,000多人受伤，300余人丧生（或许报道有些夸张）。类似事件在各地时有发生，虽然造成的伤亡不象昆明那样严重，城市形势日趋恶化。在1967

年春夏交接之时到过中国其它城市的外国客人说，中国当时在搞内战或处于内战边缘。

一些老资格的政治局委员曾告诉来访的外国知名人士，当年周总理如何竭尽全力劝说毛主席，请他让红卫兵返回他们的大学、中学和工作岗位上去。显然毛泽东相信，从这些年青人中会造就出一批领袖人物，他们将具有他所希望看到的受下一代人支持的思想。这些思想就是他已基本认可的具有强烈中国民族特征的毛式共产主义。苏联人对幼年的中国共产党曾有过极大的影响，毛泽东对此极为担忧，惟恐他们会再次从年青一代寻找代理人。成千上万自称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们竟然接受了那些或以加班费为名或以自留地为名的物质刺激，这件事的确让毛泽东感到惊诧。这一事实使他更坚定地认为，必须把刘少奇、邓小平一类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先从党内清除出去，然后再来管制红卫兵，使他们遵纪守法。

第八章 武汉事件

“文化大革命”的目击者，尤其是外国的目击者，难免带着自己的偏见看待所发生的一切。在首都北京，外国人较多，他们可以通过相互交流情况得出更接近于事实的结论。但在各省，情况就不同了。早期那些语言教师曾做过一些不掺杂对红卫兵或老干部有个人倾向的客观报道，除此之外，对于一些事件的报道就各有所异、截然不同了。在对标志着“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危机关头的武汉事件的报道上，情况尤其如此。

由于许多原因，使武汉成为一座重镇：长江穿城而过（毛主席就是在这里畅游长江的），武汉港可以停泊远洋巨轮；此外，武汉地处贯穿南北的铁路干线京广线上，横跨长江架有一座大桥，连接着一条通向西北的铁路支线；沿江两岸以及向南北方向都建有优质公路；武汉还是重要的工业中心，市内还设有国家的大军区司令部之一。由于交通方便，靠近军事训练场，该地区还被用来调遣、训练那些不属于该军区管辖的部队。

当时，全国上下一片混乱，许多城市还在搞派性武斗。尽管如此，北京对红卫兵和造反派向党夺权的活动仍表示支持，只是在上海、黑龙江、山西、山东这些已经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地方，才解散了群众组织。

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声明，他曾试图与红卫兵讲和，但事实却证明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总是与我们对着干”。当陈再道管辖的河南军区参与制止街头两派之间的武斗的时候，引起

了北京当局对此事的关注。根据1967年4月6日的命令，军队禁止使用武器，但他们历经艰难还是使社会秩序有所恢复。然而北京的“中央文革小组”却指出说，在武汉爆发的骚乱中，陈再道支持了错误的一派。

两派势力强大的群众组织为争夺这座战略重镇不停地搞武斗。其中一派组织名为“百万雄师”，声称有大约125万人，对立派是“武汉工人总部”。“百万雄师”有解放军作坚强后盾，还得到陈再道的默许，因为陈再道认为他们是“左派”（或许陈的判断是错的）。而由红卫兵组成的“工人总部”却不这样认为。街头武斗不断，一次，两派在长江大桥上发生了冲突，造成数人死亡。局势十分严峻，周恩来总理也破例离开北京到武汉，施展他非凡的策略想促使双方和解，缓和紧张局势。总理不能在这里久留，就委托和他同去的公安部长谢富治及“中央文革小组”宣传口负责人王力留在武汉继续贯彻执行已经达成的协议。这两人刚在昆明成功地调解过类似的两派争端（前面讲过，在那次争端中有300人被打死）。

然而，当他们7月14日到达武汉时，2,400多家工厂处于停产和半停产状态，庞大的武汉钢铁公司和下属的分厂都已关门停产。公安部长通过电话向周总理报告了大概情况，然后于7月18日召开师级干部会进行形势讨论。谢富治告诉与会的将军们，说他们支持“百万雄师”是错误的。他拒绝听取8201部队政委的陈述，致使政委和其他人愤然离去。次日天气炎热，黎明时分，“百万雄师”的成员头戴安全帽，手持棍棒、大刀和长矛，乘军用卡车前往城市周围、机场和火车站的武斗据点，8201部队乘装甲车支持他们。一夜之间“打倒王力和谢富治”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他们住的宾馆被包围，王力被抓走。经历了一番周折，他终于被辗转送到安全地带。后来胳膊带着伤乘飞机返回北京。王力、谢富治被囚禁的同时，“百万雄师”向市内所有对立派组

织的驻地都发动了进攻。

北京得知了这次骇人听闻的事件。还有一些谣传，说周总理乘飞机赶回武汉，在飞机将要着陆时，飞行员得到消息，有人企图伏击总理。后来总理调集了直属中央的二、三个伞兵师进驻武汉维持社会秩序。毛主席发表长篇指示，要求尽快结束这种混乱局面。毛很少这样亲自干预，他的话对于制止派性斗争起了重大的作用。而且，武汉群众确信是毛主席的讲话，因为，当时无人敢欺世盗名。社会秩序果然很快恢复了。

全国各城市数以万计的高音喇叭都播出了毛主席的指示，因此对于武汉发生的事件，几乎无人不晓。但为了保险起见，武汉海军舰艇上的水兵，还是走上街头，向过往行人散发印着毛主席指示的传单。动乱刚刚停止，又播出了一个通告，这次是以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共中央和中央文革的名义发出的。通告坚决支持被“错定为反革命组织的”武汉工人总部，严厉指责军队负责人歪曲事实、蒙蔽群众、支持“百万雄师”，还指责他们“竟然采取法西斯野蛮手段，围攻、绑架、殴打中央代表”。

通告强调武汉工人总部胜利了，同时下令要“百万雄师”立刻解散，呼吁那些受蒙蔽的群众回到毛主义的革命路线上来。陈再道被召到北京，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曾思玉接替他的位置任武汉军区司令员。一周后，百分之九十的工厂恢复了生产。据报道，尽管还残留着武斗的痕迹，但城市已经秩序井然。公正地说，武汉素来就是工人罢工和宗派斗争的前沿，还是华中政治和工业动乱的发源地。

谢富治和王力回到北京时，在机场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欢迎仪式。“文革小组”利用这一事件煽风点火，7月25日他们在天安门广场集会发表演说，号召大家继续努力，同反对毛主席的人拼到底，煽动要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文化大革命”。同时《人民日报》也把反对毛泽东的人描述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红卫兵运动当时实际上已开始低落，但它的组织者们又利用武汉事件为红卫兵运动加油打气。在这一时期见过毛主席的人都说，虽然，“武汉事件”中主席个人崇拜的威力得到充分体现，但即使在他最称心如意的时刻，他还是担心自己在这场权力斗争中被挫败了。因为，他看到党和军队中的稳健派和拥护他的偏激派两个阵营旗鼓相当。为了获得绝对优势，毛主席可能去动员农民，他的愿望和政治宗旨总是靠农民实现的。但在主席看来，农民当时没有造反的对象，他们曾斗倒了地主，但不能让他们斗争人民公社的领导人，尽管在少数地方确实发生了类似事情。说来奇怪，主席没有看到，公社的男女干部同工厂干部和城市其他干部一样，也是党的老干部。

偏激派之所以占了上风，无疑是利用了中国人民对毛主席的热爱、崇拜和敬仰。

广大农民急需一个新的偶像来崇拜，因此，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就成了他们乞求保佑平安的对象。与其他领导人，包括刘少奇、林彪相比，惟有主席有崇高的威望，甚至在七十二岁时仍被树为崇拜的偶像（后来，主席自己也承认个人迷信搞得过火了）。在这一点上，他可以同戴高乐将军相比。在阿尔及利亚内地特来姆森，我曾亲眼看到戴高乐将军走进狂热而好斗的阿拉伯人群，他站在高处示意部落成员们安静，但足有十分钟，人们都一直在争抢着吻他的手。毛泽东的个性有更伟大之处，他有独特的魅力，且乐意承认小错，因而赢得了身边的工作人员的爱戴。一些批评家说，毛泽东只承认小错，对于所犯的严重错误，他从没有承认过。但他的确私下里承认过自己应该对“大跃进”造成的混乱负责。

爱抽进口的三五牌香烟，爱吃湖南家乡的辣味饭菜，这些事都因为是毛主席的嗜好而变得特别有意思。直到毛泽东去世，他一直依靠大多数青年人狂热的支持。这些青年的生活通常是单调

乏味受约束，社会不允许他们沉迷在绵绵柔情之中，就连一对未婚男女星期日逛公园也会受到指责。因此他们到政治中寻求刺激，不但积极参加毛主席所喜欢的接二连三发动的政治运动，还坚定地为中国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他们坚信这是世界革命必须仿照的标准的马克思主义模式。

武汉部队这次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做出了与北京不一致的决定。毛泽东原来认为军队中百分之七十到九十五的指战员是忠于他的，但武汉事件使他认识到，军队不会自动支持偏激政策。另据记载，当时周总理被认为是坚决反对红卫兵的，在武汉他使两派初步达成协议，而后来这个协议被撕毁，主席只得命令恢复安定秩序，同时还派了可靠的伞兵部队进驻武汉。的确，周总理当时也在设法维持自己的正常工作。他曾告诉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如果他们不立即出面制止造反派，他的办公室就会被包围，红卫兵将会把得到的机密文件内容用大字报张扬出去。

无论毛主席还是江青，都不希望这种事情发生，因为周总理那里有许多秘密文件，一旦公布于众，将会在红卫兵中引起可怕的反响。其中有一件典型的事情就是：红卫兵批判邓小平晚上用军用飞机找伴打桥牌（不知是真是假），而与此同时，主席却正在杭州用军用飞机与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进行日常联络。江青也曾趁北京冬季蔬菜单调、国家还要招待贵宾之机，用军用飞机从南方运来鲜花和水果。因此，当毛主席动员红卫兵造反派斗倒刘少奇和跟随毛多年的老干部时，他自己也是担惊受怕的。据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尽管军队以各种形式显示对毛主席的忠诚，武汉事件还是引起了主席对军队的怀疑，主席对此事件十分恼火。实际上，个人崇拜带来了严重的恶果，因为它使得有人可以打着红旗反红旗，还使得到处都是毛主义者在反对毛主义者。

第九章 “文化大革命”

冲击香港

香港报刊不断在头版长篇报道大陆“文化大革命”的情况，香港人也跟着搞起了“文化大革命”。一些人对1966年12月澳门发生的骚乱表示关注，但无人介意越来越多的人佩戴主席的大红像章，这些人多是共产党开办的商店、银行、学校、工会、报社的工作人员。1967年5月初，九龙工艺花厂的工人造反打破了这块殖民地的安宁。当局调来了训练有素的华人——广东籍——警察对付造反的工人和混在其中的捣乱分子。次日，骚乱波及到九龙的其它地区。但是在历时三天的骚乱中，无一人丧生（只有一个小孩死在阳台上，据估计，是被上面掉下的石块砸死的）。在制止骚乱中，警察仅向人群投掷催泪弹和美制无毒烟幕弹，还向示威者发射了对皮肤无害的跳弹。紧接着，中共干部驱车前往总督官邸抗议警察暴行。示威群众从香港中部中国银行附近出发，人们挥舞着小红书，唱着歌，还不时地高呼革命口号。总督的助手接受了他们的书面抗议。一连几天，总督官邸一直处在喧闹人群的包围之中。

与此同时，学生红卫兵组织在一伙从广州潜入香港的造反派头头帮助下，把一些学校、机关和商店的空闲房子改造成制造土手榴弹和简易小型武器的地方。示威活动愈演愈烈，每天，示威群众向总督官邸递交请愿书后，就会同驱赶他们离开的警察发生冲突，墙上贴满了一批批言辞激烈的反英大字报。警察在总督官

路警戒时也受到袭击。一些年青人朝警察高呼口号，煽动他们向警官开枪，领头的是新华社的工作人员、摄影记者和为当地共产党报刊工作的其他人员。

5月15日，驻北京的英国临时代办唐纳德·霍布森（Donald Hobson）先生被召到外交部去接受中国政府的照会，文中说道，全副武装的军警向“手无寸铁”的工人和学生开枪，香港发生了大规模的血腥暴行。联系到侵越美军把香港作为休整地这一事实，照会说，香港当局的所作所为只是英国政府勾结美国反对中国的阴谋的一部分。此外，中国政府指责香港当局对“文化大革命”怕得要死，恨得要命，采取敌对态度，妄图排除“文革”影响。中国政府要求立即释放被捕的人，包括被捕的工人、新闻记者及摄影记者，并警告香港当局，如其不然，由此引起的一切“严重后果”由香港当局负责。然后，以中国当时惯用的方式，由新华社立即发表了这一照会。

香港的示威游行不断发展，红卫兵在游行中肆意向警察挑衅，致使当局逮捕了更多的人并宣布实行宵禁。由此招致许多言辞更加激烈的反英大字报，还爆发了交通工人罢工。但这次罢工引起了广大香港居民的不满，因为他们不得不步行去上班。偏激分子还试图阻止食品供应，但没有得逞。所有这一切使人感到震惊，因为当时这块殖民地上流传着谣言，并且传播甚广，说中国要收回香港。然而这毕竟是中共自1949年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一个没有明讲的长远目标。单从军事上看，任何力量也阻止不了他们。但当时香港每年付给中国6亿美元（大约折合2亿5千万英镑）的外汇从内地买进大量的粮食，尽管中央“文革”小组的激进分子竭力反对这样做，也没有中断这项贸易，因为这笔外汇占中国总需要量的三分之一还多。

然而，这也无助于尽快结束示威游行。在英国政府宣布支持香港当局后不久，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就立刻宣布关闭在上海的英

国领事馆并勒令英国领事彼得·休伊特(Peter Hewitt)和他的助手在24小时内离开上海(从那时起上海领事馆就没有再恢复)。在离开上海的途中,休伊特遭到红卫兵的虐待,他们揍他,踢他的肚子,往他身上涂浆糊。而与此同时,在葡属殖民地澳门,英国领事不仅被偏激分子谩骂,而且还被迫在烈日下站了七个小时。

几年后,我有机会证实了一位避难者的陈述。他原先是一个红卫兵头头,据他讲,周恩来总理曾强烈反对在香港的暴力行为,国防部长林彪也支持这一观点。但江青领导的“文革小组”却悄悄派了20多个受过训的“红卫兵”潜入香港,指导各类学校中的红卫兵组织。

整个6、7月间,香港一直被暴力气氛所笼罩。而恰恰在这一时期,不幸的是经验丰富的外交部长陈毅被激进分子姚登山赶出了办公室。姚是极左组织“5.16”的一个头子(这个组织是根据毛主席的“5.16”通知而起的名)。他曾被印度尼西亚驱逐回国,返回北京时却被当作英雄受到欢迎,康生给姚以大力支持,尽管是暗地里支持。因此,香港的煽动闹事者有北京的偏激分子作后盾。

在姚登山控制外交部期间,许多在京的外国使馆受到了冲击。缅甸使馆首当其冲,据说是因为缅甸当局不允许在缅华人佩戴毛主席像章。接着是两位日本共产党人在北京机场受到虐待,随后在印度、蒙古、苏联的驻京使馆周围出现了群众游行示威。另外还有一位意大利贸易团体的领导者被软禁在办公室内不得外出。

一位俄国人,因在餐馆内失手打碎了玻璃杯而遭到非法法庭的“审判”。法国大使被辱骂,甚至连北越和北朝鲜人也遭到偏激分子的侮辱。一些为中国政府工作的外国人为了显示自己比中国人更革命,更忠于毛主席,经常带领偏激组织行动,许多英国

人参加了“5.16”组织，后来这个组织被党中央和中国政府定为“极左”组织。

安东尼·格雷的遭遇

8月18日，红卫兵闯入路透社记者安东尼·格雷的住处，在此之前，格雷已在住所受到软禁。这是北京对香港当局以暴乱和破坏社会治安为名逮捕中国记者一事采取的报复行动。暴徒们先砸坏了路透社室内的设施，吊死了格雷心爱的猫，随后把预先写好的大字报贴在格雷的背上，用暴力胁迫他“坐喷气式飞机”，让他跪在地上，弯着腰，胳膊被扭到背后，还让他保持这种姿势不许动。不久，格雷的面前就流了一滩汗水。他的保卫人员对此也无能为力。紧接着第二天，爆发了反对斯里兰卡使馆的示威游行，8月21日，又爆发了反肯尼亚的示威游行。

8月22日，大批群众聚集在英国代办处门外。由于中国政府已照会香港当局，限48小时内释放被捕人员，英国临时代办唐纳德·霍布森和其余23名代办处工作人员（其中5名女士）正在等待消息。代办处门外，中国军队站成一排，仿佛要阻止街上那些高呼着侮辱性口号的示威者以保护里面的外交人员。示威者在树上架了高音喇叭，还举着强烈排外的标语。天色渐晚，一个红卫兵组织架起了探照灯，另一个组织领着人群唱起了革命歌曲。大约晚上十点半左右，红卫兵拥进了代办处——战士们让开了道。他们先烧了停靠在游泳池附近的汽车，然后冲入大楼，砸坏窗户，捣毁室内设备，并用自带的汽油在代办处内放火。

唐纳德·霍布森和工作人员躲进了保险库，这是入口处左边大楼里用来存放档案和密码的一间地下室。但他们又被红卫兵从迎风口灌进的烟熏了出来。后来唐纳德·霍布森在给他夫人的信

中描述了当时的情景：

“我打开门先走出来，其他人随我之后。院子里大约有5,000人。我立刻遭到一顿毒打，任何可以触及我的人都用他们手中的不同武器打我。妇女发疯似地扑过来，想用棍棒将我打倒。他们抓住我的头发拖我，揪住我的领带勒我。我确实不知道怎么了到了那个离门不远的地方。突然有人抓住我的胳膊，用中文朝我喊‘这边来’。他拉着我朝英国代办处后面的印度使馆跑去，在那里，他将我藏在印度使馆的大门后。”

“我头上遭到重击的地方鲜血直流，我被打得昏昏沉沉。”

代办处的几位女士想到对面阿尔巴尼亚大使馆避难，但遭到拒绝，被关在铁门外，阿尔巴尼亚人还用嘲笑的目光看着她们受凌辱。然而，有两位姑娘在芬兰使馆受到保护。全体代办处工作人员不仅遭唾挨踢，还被迫向毛主席鞠躬。更令人发指的是，一位外交官告诉我，暴徒中竟然还有英国人。其中有一个领头的——“家庭出身好”——还穿着精制的翻毛皮鞋在女王像上乱踩。

高音喇叭内播出了江青、陈伯达的指示，命令人群解散，这对于代办处外愤怒的人群没有起到多大作用。甚至后来连周总理的指示也没有奏效。凌晨，暴乱势头逐渐减弱，高音喇叭里播出周总理对红卫兵和“5.16”组织的又一条命令，让他们各回各家。

8月下旬的偏激行为给周恩来提供了重新控制外交部的机会。因为一向与北京友好的柬埔寨首脑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此次也威胁说要召回使馆人员，同中国断绝外交关系，因为这里治安混乱，继续留在北京，人身安全不能保障。周总理去见常在外地的主席，告诉他如果象这样侮辱外交人员并威胁他们的生命安全，在世界上，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中，中国就不仅仅是丢脸的问题了。总理进一步强调说，商人将不再同中国交往，而且在这混乱

的情况下，中国仍不仅要引进技术，而且需要进口粮食和原材料。

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重要会谈

从英国代办处遭受冲击到8月30日这期间，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之间进行了一次重要的秘密会谈。这次会谈极易导致周总理结束他非凡的政治生涯。从1934年至1935年的长征起，他们两人就一直关系密切，但在采用政策问题上，他们存在着不少分歧意见，周总理经常劝说毛主席修改或删除一些过激的方案。此时他们的关系十分紧张。为了处理各省在混乱中出现的问题，周总理夜以继日地工作，已经劳累过度。现在总理本人正遭受“5.16”和红卫兵的攻击，在大字报上，他的名字和刘少奇、邓小平这些“敌人”的名字写在一起。在这严峻的时刻，一天晚上，一伙红卫兵试图冲进人民大会堂总理的办公室看公文档案，总理以他特有的魅力和气概，经过断断续续长达48小时的劝解，终于使红卫兵离去。在诸多的事务中，军队尤使总理操心。他注意到，虽然有林彪的影响（林彪此时也不在北京），在许多部队，极左派的政委正逐步掌握大权。极左的“5.16”组织，和政治局里江青等人支持的激进组织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5.16”组织想一夜之间取消货币，实现真正的共产主义，大力支持世界革命。后来在柬埔寨，波尔布特政权把“5.16”组织的部分理论付诸实践。在中国，极右分子一般是指那些赞成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人，被称为“亲苏的修正主义分子”。

总理结束了与主席的会谈之后，还不能断定主席是否理解他的观点，因为毛泽东仍不时地强调，刘少奇及其他“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没有被打倒。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

目的就是要清除刘少奇和其他“亲苏修正主义分子”，在他看来，为最终打倒刘少奇，还需利用偏激分子。因此，他自然不愿意驱除偏激分子。而总理则希望把这些向往“真正共产主义”的年轻极端分子关进监狱，或遣送到千里之外的农村。

现在人们才知道，当时周恩来提出要辞去总理职务，退出政治局常委会。他向主席提出这样有威胁性的要求，这是唯一的一次。主席提出的全部要求就是请周总理继续“尽力维持”，他在地再呆几天认真考虑一下这些事情。回到北京，总理自作主张，采取果断行动，命令逮捕一些最危险的武装极端分子，并给香港的示威者发出通告，要他们“冷静下来”。

但是，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导致了另一些出人意料的不愉快的事情。驻伦敦的中国代办处工作人员处于紧张、恐惧的气氛中。他们接到通知，要他们在没有事先打招呼的情况下不得离开伦敦。另外据他们说，许多高级外交官在伦敦街上被人跟踪。一天早上，中国代办处人员以几件小事为借口，手持“小红书”冲出了代办处，后来发展成“波特兰斗争”。这实际上是由外交人员组织的一次政治示威。

北京的中国官员拒绝给英国、荷兰、印度尼西亚等国外交人员的家眷签发出境证，也许因为他们对于外交人员出境后会说些什么感到担忧。基本形势混乱和工作人员不愿承担责任，也有一定的作用，因为中国人正抱着极不友好的态度。另外，政府机关内部紊乱，很可能没有具体指定专人负责给英国外交人员办理出境手续。同时，英国代办处无法与中国高级官员或部长取得联系。尽管周总理对红卫兵的过激行为表示不赞成，一些中国官员在与英国外交人员的交涉中仍设置障碍，他们强调说新华社记者至今仍被非法扣留在香港。或许是因为英国当局不同意中国人在香港设立领事馆或代办处，这些工作以前一直由新华社香港分社兼作（1980年，新华社香港分社租赁了一座原宾馆大厦，由此可

以俯瞰幸福谷赛马场。他们在这里招待总督，除了搞新闻活动，在建立经济特区之后，1981年他们又在这里开设了签证处）。

据共产党的同情者说，不同意签发出境证的另一个原因是，现政府想阻止世界新闻界发表有关事件经历者的陈述，因为这些陈述将表明中国正处在内战的边缘，至少显示出中国是一个安全无保障的国家。

周总理当时最担心的是他后来谈到的全国“几乎陷于无政府状态”。在绝大多数城市里，造反派与稳健派近于势均力敌。而造反派内部又常常分裂为两派或更多派，都自称拥护毛主席，他们常常在街上搞武斗，所用武器有棍棒、桌椅腿、大刀，更不必说步枪和机枪了。

一些莫名其妙的行动和命令更使得人心惶惶，局势不安。例如，一位不知姓名的人从北京向所有的大城市打电话，警告人们说要发生“资本主义复辟”了，要人们必须“为保卫毛主席和党中央”战斗到底。毛主席颇为机警，他经常呆在外地，在北戴河住一段时间，又到上海、杭州呆一些日子，据说他还巡视了长江流域。林彪这期间也常住外地。唯有周总理留在北京，而且这一时期周总理和林彪的关系急剧恶化。因为周恩来认为国防部长如果守在北京自己的司令部里指挥控制军队，事情会更好些的。

由林彪和江青发动的“揪军内一小撮”的运动，将红卫兵和一些极端组织的注意力转移到了军队。有一两个星期，周总理成天担心这个运动将极严重威胁部队的团结统一。尽管这一运动实际上并没有发展起来，而且几天后，“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也从大字报上消失了，但它在国防部及高级军官中还是引起了极度不安。

第十章 毛泽东对红卫兵 头头采取行动

1967年夏天，据少数仍留在北京的外国人报道，首都居民对“文化大革命”的厌恶情绪与日俱增，还有一定影响的“文革小组”已失去它昔日的政治风采。它的理论喉舌《红旗》杂志受到众人的谴责就说明了这一点。这个月刊至关重要，通常由它向基层干部传播党中央或“文革小组”的“正确的政治路线”。但是对解放军和军队中的读者来说，这家刊物太好斗了。1967年11月在最后一期交付出版后，《红旗》杂志编辑部中许多成员被逮捕，尽管江青和陈伯达极力庇护，也无济于事。据周恩来总理说，当时江青由于过度疲劳到杭州疗养去了。

毛主席意识到，经过一年半的游行和运动，广大人民群众对“文化大革命”已没有什么激情。为重新激发他们的热情，毛主席巧妙地改变了“文化大革命”的最终目的，把热情已尽的红卫兵和广大群众的斗争目标从“党内走资派”转向党外的地主、资本家和反动分子。当时全国各地经过一番周折，都已制定了省、市和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成立计划，军队取代了原先的权力部门，占据了省级领导人的位置，因此，主席对军队当权的方式也很关心。

国家形势再次陷入混乱状态。江青回到了北京，但她现在也难以给“中央文革小组”注入新的活力。同时首都军队也不听她调遣，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带领一卡车全副武装的战士试图

逮捕江青的一个工作人员。^①江青亲自出面干涉才制止了这件事。周总理尽力为他们开脱，宣布“中央文革”、尤其是江青没有支持声名狼藉的“5.16”集团的极左分子。但解放军和广大群众不相信，也不予理睬。北京街头又出现了许多大字报，从大字报上反映出不仅红卫兵学生互相指责，而且高级军官和中央委员也互有指责。

为了再次煽起“文化大革命”的热潮，1968年年初，国家安全保卫部负责人康生在北京的一次会议上，给中央一些上层领导人罗列了危言耸听的罪名。他说，刘少奇曾四次被捕，先是1925年在湖南向国民党投降，后来仍是1925年在武汉投降了汪精卫（国民党党阀），1936年投降蒋介石。康还说，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是混入革命队伍的老牌美国、日本和国民党潜伏特务。接着又说，前总参谋长罗瑞卿是“特务”，他甚至从来就不曾加入过共产党；前北京市长彭真是“脱党分子”，前国防部长彭德怀是“叛徒”。康生冗长的发言刚落音，江青立即高呼：“打倒邓小平！”因刚才这位人称“康老”的康生没有提到邓小平。于是康生随即又补充说：“邓小平是逃兵，还需要进一步揭发。”江青一伙对邓小平的强烈憎恨肯定在一定程度上是7、8年后导致邓再次下台的原因。

虽然随后有一批群众组织象应付差事一样敲锣打鼓举着红旗上街游行，声言支持康生的讲话，但他这些骇人听闻的揭露实际上并没有激起群众新的热情。照外国记者的描写，市面冷冷清清；但大学校园内，通常有4、5个武斗据点，里面驻扎着各派的指挥部，他们不但有步枪还有机枪，其中一个组织还吹嘘拥有改装的坦克。各派之间不断互相残杀。每天据点里还派出一些革命小分队，乘着装有高音喇叭的宣传车，敲着锣鼓到处游说宣传，

^① 这种说法不符合事实。江青曾在讲话中如此诬陷傅崇碧，但实际上无此事。
——校者注

张贴大字报。

有一些报道说，毛主席曾冒险到极不安全的大学去了一趟，但这件事可能性很小。不过他对各派红卫兵头头及后来说的“小将们”的活动的确了如指掌。江青安排有关人员将校园内有重要政治内容的大字报抄送主席。1968年初，“中央文革小组”和政府部门收到上万封信，抱怨高音喇叭噪音太大，那些武斗狂常常让高音喇叭声彻夜不停。江青和政治局委员必定也被吵得睡不好觉，外交人员也由于缺乏睡眠而精神不振，更重要的是北京的工人都受到极大影响。

1968年初夏，主席终于渐渐得出结论：他曾寄予厚望的学生头头不堪重任。他下结论说，这些人不具备当接班人的条件。接着主席派到学校里的人报告说，“红卫兵小将”正在酝酿一个幼稚的计划，要组建一个全国性的红卫兵组织，企图接管全国的广播电台。如果这个计划能够实现，他们还打算进一步策划在全国建立红卫兵权力机构。为此，主席被迫采取行动。虽然红卫兵这一行动只是白日做梦，并且没有象陈伯达和江青这样老谋深算且影响广泛的成年人和领导人支持，但这些年轻的阴谋者不仅在新闻界，而且在军队的政委中也有一些朋友。因此，尽管这个阴谋很幼稚，但主席还是决定要把这一计划扼杀在摇篮之中。毛泽东没有明确提及这一阴谋，但心灰意冷地宣布，在大专院校里，由“地派”和“天派”挑起的武斗该结束了。他的主张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大力支持。

一些不携带武器的解放军战士被派到了大专院校，但没能制止红卫兵武斗。因此，7月上旬，毛泽东派出了大批“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大学，工宣队最初是为肃清刘少奇的影响和反对派性而成立的。一个外国人写到当时的情况时说：“城市突然一片寂静”，喧嚣了两年的高音喇叭声第一次消失了。工宣队要求学生十点钟就寝。红卫兵小将竭力反对工人，把他们称作“侵

略者”，说他们是由“黑帮”和反毛势力派来的。随着越来越多的工人进驻大学，工宣队不仅明确声明他们拥有权力，而且明确声称：只要派性冲突不停止，他们就不会离开学校。

在清华大学，“井冈山”组织中很有影响的头头、“红卫兵小将”蒯大富首先向工人开火（这个组织是用一座山的名字命名的，1934年长征开始前，毛主席曾在那座山上抗击国民党军队）。红卫兵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出产的轻机枪向工人开火，5名手无寸铁的工人被打死，50多名被打成重伤。在这个危机时刻，毛泽东派人通知红卫兵头头开会，想告诉他们，他决定结束武斗，停止这场混乱，不许他们再活动。大多数北京居民认为，毛泽东早就该这样做——早早就该这样做了。

发出传唤令几个小时之后，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里一间小会客厅内等着会见“小将们”，周恩来总理和国防部长林彪坐在主席两旁。后排坐着“文革小组”的成员陈伯达、江青、康生、谢富治、姚文元、叶群（林彪的妻子），还有新上任的总参谋长黄永胜。

曾贴出第一张大字报的教师，时任北京革委会副主任的聂元梓，领着应召前来的一帮人进来，她身后跟着三位“对立的学生部队的指挥员”——北京师范大学的战将谭厚兰、“北航红旗”的极端分子头头韩爱晶，“北京地质学院红卫兵”兼北京“地派”的头头王大宾走在最后。

毛主席立刻注意到蒯大富没有来，这时有人告诉他蒯大富正忙于查找派出工宣队的“黑手”。“我就是黑手！”毛主席激动地大声说道，这种激情曾使72岁的主席畅游长江。毛接着说：

“我派新华印刷厂和针织总厂的工人，还有中央警卫部队到大学去，要他们坚决制止那里的武斗。”当几个年轻头头低声申辩说他们“受到了工人的压制和镇压”时，主席又重申：“黑手不是别人，正是我。”

接着毛泽东对学生头头大致讲了他和党中央（尽管他很有可能还没有同中央商量）打算怎样处理武斗和混乱。他还说北京有50多所大专院校，只有5、6所发生了严重的武斗。主席强调说，他们已认识到形势完全失控，红卫兵头头很使他们失望，如果学生再不停止派性武斗，就要派解放军接管学校。主席这样说时，周总理和林彪不断点头表示赞同主席的意见。“你们青年人投身于体现我们的‘文化大革命’的大批判、大变革运动中。但是现在你们不再搞批判斗争了，也没有明显的变革。”另外，主席抱怨道，他们把运动搞成了“局部武装冲突”，在群众中影响极坏，实际上，工人、农民“甚至你们学校的学生”都对这种局面很不满意。主席说他不但很了解红卫兵各派的“武装冲突”，而且还引用了校园内大字报里小将们用来互相指责的许多原话。

毛泽东提到聂元梓的绰号“老佛爷”，这个绰号是她那一派给她起的，这也表明她的威信不是太高。慈禧太后就曾被人称为“老佛爷”，另外聂和慈禧也有些相似。然后。毛主席谈到他不赞成的教育制度和考试制度。据报道，在这次谈话中，主席说他从未读过一本军事战略著作。但这当然与事实不符，因为毛泽东是根据中国古代战略家孙子的著作成功地创造了游击战的。毛主席还暗示，红卫兵不仅没有解决国内重大问题，他们本身反而成了主要问题。主席还重复了他听到的有关学生搞逼供信的情况。他严厉批评了红卫兵对待派到大学里维持秩序的解放军和工人的态度，还指责他们搞派性。毛泽东承认他自己也不是没有错误的，例如在《湖南农民运动考查报告》中，他曾写了1919年“五·四”运动高潮时期，农民“让人带高帽游街”的情况。^①然后，毛泽东概括地总结了“文化大革命”出现的一些问题。在谈到当时的派性活动时，毛泽东阐述了“根据他们的阶级斗争经验应当建立

^① 原文如此。作者把年代弄错了。——译者注

什么样的政权形式的重大问题”。毛泽东详细说明了中国当时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类型，接着问：“你们认为我们现在在往何处去？”他认为这个问题比武斗重要得多。

学生头头韩爱晶，不让主席停留在这个重要问题上，他想进一步了解毛主席对毛阵营内派性问题的看法。可惜毛主席没有做出令人满意的回答，因为就象基督教徒吃过苦头后都清楚地知道的那样，主席也知道没有人能阻止信仰者从不同角度去领会他们崇拜的对象的指示。会议自始至终，江青对“小将”说话的口气一直很严厉，因为这些“小将”使她大失所望。在她对韩爱晶说了一些特别刻薄的话之后，主席恳求江青不要再批评他了，又说：“你总指责别人，从不检讨自己。”他还风趣地说：“他的性格有些象我年青时的性格。”这些话很有意思，因为1974年以前，很少听到毛主席和江青之间在公开场合有任何意见分歧。一些观察家相信，江青当时既恼火，而又心神不安，她怕自己的政治生涯将随着红卫兵运动的结束而告终。对江青来说，幸运的是，情况并非如此。虽然她当时肯定受惊了，而且在一年以后（即1969年^①）当她在“文革小组”的主要助手、主席讲话的起草人和主席信赖的秘书——陈伯达下台时，江青也一定经历了许多尴尬的场面。

我听说，1973年夏末，在毛主席主持的中央会议上，江青对主席毕恭毕敬，好象他们之间只是朋友和同事关系。我见到她几次，她讲话时，每次提到毛的名字都很恭敬。

在会见结束时，主席告诉“小将”，希望他们尽快同对立派和解，然后解散组织。他希望他们（不包括聂元梓，她贴出著名的大字报时就是讲师）给其他红卫兵树立一个好榜样，到农村去，向农民学习。这出乎他们的预料，因为，至少他们自己认为，他们在全国政治运动中起了积极的、甚至是主导的作用。然而不

^① 此处时间有误。实际应为1971年。——译者注

管怎样，他们总得服从毛主席的指示，这些指示是主席在这里亲口对他们讲的。自然，毛主席接着说，“小将们”可以将自己的知识和经验传给农民。但是到气候恶劣的地区（比如到靠近蒙古和苏联边界的地区）去生活，没有有文化的人，没有图书馆，甚至没有象样的厕所，这样的前景对于这些经历过首都轰轰烈烈场面的“小将们”来说，毕竟没有什么吸引力。毛主席告诉红卫兵头头，他一生头一次使用了录音机。所以“小将们”不能象以前那样随意篡改毛主席的指示。

尽管如此，见到毛主席和他的一些接班人，并同他们进行了交谈，这件事还是让“小将们”感到荣幸。先是国防部长林彪，然后是周总理，他们俩人都是“长征”老干部（红卫兵过去常指责象他们那样的年龄太老了）。接着是较年轻的成员陈伯达和江青，“红卫兵”曾把他们看作同盟，他们都近六十岁了，而康生已六十多岁。唯一年青的是姚文元，他四十四岁，尽管他以对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引发了“文化大革命”，然而这次他令人失望，会议自始至终他一言未发。

“小将们”非常清楚，毛主席对红卫兵活动的这番指示，意味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但在毛会见后，他们仍孤注一掷，力求击败工人和他们的其它对立派，并且声称，虽然有主席的录音指示，但主席还是支持他们的活动的。然而人们对他们的煽动也象工人对他们的活动态度一样漠然置之。几天后，工人在附近解放军部队的帮助下，拆除了各派组织在校园里逐渐修建起来的坚固工事，并用军用车辆运走了大批的轻机枪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制造的性能良好的旧式二零三式步枪。

红卫兵的派性武斗不只限于在北京发生，许多目击者说，广州的武斗更激烈，哈尔滨也发生了长期的武斗骚乱。武斗还波及昆明、西安；不断升级的武斗还使鞍山的钢铁生产处于停滞状态。到1968年，由于红卫兵扰乱铁路运输，使运输量下降了百分之八

到十。只有少数城市免遭各派组织的武斗之灾，这些对立的武斗各方都声称是拥护毛主席的。更严重的是，“文化大革命”的这时期中在各对立帮派之间出现的争吵，只是表面上消除了，而实际上却随时都可能再次爆发。

当时，就是毛主席的威望也难以在一夜之间制止全国性的红卫兵活动。所以他和周恩来总理只好日益依靠解放军来维持社会秩序。城市里的“广大群众”经历了近两年无休止的示威游行和数月的混乱之后，都迫切希望结束这场公开的政治运动。这是对主席和总理的强有力的支持。然而，很难使广大群众相信，“文化大革命”已经只有其名而无其实了。这听起来似乎很奇怪而且似乎自相矛盾，因为老百姓对于参加频繁的示威游行已习以为常了。

9月初，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了一次群众大会。会上，为了进一步制止红卫兵的活动，周总理宣布，“现在已是全国山河一片红了”。总理还要求在场的青年人“到基层去，……，上山下乡，到工矿和农村去劳动锻炼”。对于红卫兵来说，他们更乐意听“文革”初期领导人的讲话，因为那些讲话给他们打砸抢的行为提供了依据。

然后，江青又作了讲话。这是江青最后一次在大型群众集会上讲话。她强调说，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和中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企图以此安抚学生们。随后，她又希望青年人接受工人阶级领导。最后她号召全体工人“爱护红卫兵战士，帮助他们，教育他们”。在场的一位美国人南希·多尔·米尔顿（Nancy Dall Milton）写道：“这番即席讲话是‘文革小组’最后的回光反照，这个小组曾一度希望获得最高权力。”

少数红卫兵因不愿沉没在农村从事艰苦的劳动而自杀。无疑，权欲已在他们头脑里深深扎下了根，因此，后来患精神病的不止蒯大富一人。有些家长不愿让孩子到农村去，就让他们呆在家中，另有许多家长设法帮助他们的孩子逃避下乡。

第十一章 党的“九大”

1969年3月份，苏联人越过乌苏里江对中国进行武装挑衅，这反而使得长期筹备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开得非常圆满成功。苏联沿中国北部边界驻扎了大批的军队，周恩来总理对此事比国防部长林彪更为关注。苏联于上一年8月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总理担心，莫斯科是想从东西伯利亚这个偏僻的地区挑起事端，然后借此对中国重要工业区东北发动大规模进攻。据中国官方报道，珍宝岛连续发生了57起边境事件。根据1858年签定的《璦琿条约》规定，边界应沿江中线划分。这个岛位于江中稍靠中国一侧，距它最近的村庄也在50英里以外，所以该岛在军事和经济上都没有什么价值。周总理担心，苏联挑起边境事件背后是否隐藏着更大的阴谋。有人认为，对于苏联的挑衅计划，林彪非常清楚，并且支持他们这样做，因为他确信这种进攻将有助于使“九大”代表集结在他的周围。大会上后来的事实果然如此。

周总理也想使大会早日召开，以便宣告结束“文化大革命”的狂热阶段。尤其重要的是，周总理想使这次大会给新建的各省革命委员会指出工作方向，因为他迫切需要这些费尽周折才建立的机构切实肩负起管理国家的重任，那样他就可以分出一部分精力考虑外交事务——从“九大”前夕到“九大”结束这一阶段，他在政治局会议上都顾不得讨论外交事务。对苏联日益增长的军事力量，总理感到担忧，他想尽快对华盛顿的和解愿望做出相应的反应。但他很清楚，林彪宁愿同令人讨厌的社会主义国家结盟，

也不会同意与友好的“帝国主义者”握手。

尽管毛泽东主席与周总理各自的理由有所不同，但他们都急切希望召开这次大会，以巩固“文化大革命”的所谓成果。主席希望看到在清除刘少奇及其在各省的追随者之后新建立的党组织，但由于在上海革命委员会成立过程中遇到的一系列问题，毛泽东不打算用由基层自下而上选举的方式来建立党组织。

整个1968年一年中，不愿下乡的老红卫兵和军队之间不断发生冲突，这些都让总理操心。杭州就是这方面一个典型的例子。杭州曾是很安全的风景地，以致“文化大革命”初期主席可以时常只由少数保卫人员陪同来此休养。在武斗后期依靠军队支持掌握了权力的集团，与那些被置于对立面的集团所持观点相近。但由于没有一个特别杰出的人物可以统一对立各派，结果使得这个风景地的局势变得极为紧张，人们莫衷一是。实际上，掌权派与在野派的斗争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这个问题曾经一再爆发出来，并且一直延续到“九大”开过很久都未平息。

幸亏军队的努力，杭州的社会秩序才逐渐恢复正常。在广州，许多极端分子被抓了起来，其中有大约40人在受到公开审判后被处决。原先遍及各地的武斗和混乱状态，逐渐受到军队的控制。因为北京采取了严厉的措施和新的监督方法来监视极端分子的行为。例如在广州，红小兵——即少年学生——不仅报告有关他们家庭成员的情况，还报告他们亲戚、邻居的情况。当然也不单是孩子们这样干，全国所有的城市都用这种方法。这不仅使当局可以及时掌握个人的政治活动，而且还可以及时掌握每个人的性生活情况^①。1970年初，假如一个姑娘下班后通常是晚上七点到家，如果她偶然晚回家半个小时，她就需要讲清自己到哪儿去了，都干了些什么。

① 这显然言过其实，属于想当然的推测。——译者注

社会秩序刚恢复，军队就（仍然是照北京的指示）开始帮助建立革命委员会。起初，他们几乎得不到党组织的帮助。他们忠诚执行上级指示，试图召开各派组织会议，但由于各派之间在对党的路线认识上分歧太大而甚费周折。在许多城市，尽管成千上万的老红卫兵已被送到农村去，但造反派的势力仍很强大，他们不愿与老干部结合，尤其讨厌那些在“文革”中被打倒后又重新恢复工作的老干部。老红卫兵与老干部之间仍存在着极大的对立情绪，老中青三结合很难实现。结果，在许多地方，理论上应由红卫兵、老干部和军队干部组成的革命委员会，实际上主要由在当地起领导作用的军队干部组成，而红卫兵和老干部在革委会中占的比重很小。

1968年期间，“内部人士”——中央委员及部长们——已察觉到形势发展不正常，但他们不清楚具体发生了什么事。因为报刊上连续发表文章，指责“多元化”和“多中心论”，指责每个集团都想“以我为核心”。人们现在才知道，这些文章都是在周总理授意下写的（周总理本人没有时间自己动手写），矛头直指林彪和陈伯达。然而从党的“八大”（其间经过各省建立革命委员会）到党的“九大”，实际经历了12年半的时间。按规定，全国代表大会每5年召开一次。因此，这种情况也表明有某些事情是很不正常的。

对于林彪与莫斯科之间有秘密联系，周总理也可能早有怀疑。因为早在“九大”之前，他的好友、前总参谋长（后来的国防部长）叶剑英和军队里的一些老部下就报告过，陈伯达为了给自己和林彪捞取政治资本，到部队进行视察。周总理一定对主席和邓颖超谈过此事，但很少向其他人说过此事。

“九大”的目的在于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制定新党章，选举新的领导班子。各级革命委员会为召开这次大会奠定了基础。革命委员会的筹建过程比周总理预计的多用了两年时间。与会的

1512人，是各级革命委员会、群众团体以及各省党组织经过一番艰难的努力统一认识后选出的代表。因此，许多代表之所以当选，都是因为老实，没有很强烈的政治意识，并且对党和国家忠心耿耿，例如，工农业战线上的劳动模范等等。实际上参加会议的代表有三分之二都是身着草绿色军装的。

毛主席首先在大会上讲话，指责刘少奇是“工贼”、“叛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然而，他的讲话只是林彪政治报告的开场白。接着，林彪做了两小时十分钟的报告。会上给代表们的印象是林彪与毛泽东关系十分亲密，当时从会上拍摄的照片也反映出这一点。一位代表对我说，从他们相互交换的眼神和对会场气氛显出的满意的表情来看，毛和林好得象是“一个人”一样。当然我们现在知道，即使在当时，毛和他第二位“选定的接班人”之间意见也不尽一致；然而，毛泽东当时需要林彪和军队，林彪也需要毛泽东。林彪的报告先由陈伯达起草，后经毛主席和周总理作了大幅度修改。在这个报告中，几乎每两段就要对毛主席赞颂一番。他号召大家继续深入开展“文化大革命”，重复了毛的最新指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在外交政策方面，他也引用了毛主席的话，“帝国主义是纸老虎”，并且猛烈谴责了美、苏两国。林彪作报告时，少气无力，声音含糊不清，还不时停顿。他发言结束时，与会代表起立热烈鼓掌。

新的领导机构——中央委员会——的选举工作，从开始到结束用了21天时间，这说明三派之间存在很大的意见分歧。就象中国常出现的情况那样，几乎在每一个问题上都众说纷纭，难以统一。当然，林彪和军队占优势，而一些“文革”期间的造反英雄则很难得到发言的机会。尽管毛泽东和林彪显得非常亲密友好，周总理无论对毛泽东本人还是对多数大军区司令员都仍然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他实力雄厚，既可以得到前总参谋长叶剑英、前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和他的老朋友、经济学家李先念的支持；又至

少可以依靠两大军区司令员，即当时的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和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据一位代表讲，随着会议的进展，林彪越发显到疲惫不堪，他做报告时含糊不清，有时甚至听不到声音。他这副精疲力尽的样子与毛主席满怀信心、精力充沛的姿态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据代表们说，林彪象往常一样，对主席大肆吹捧，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崩溃、社会主义将取得全世界胜利的时代党和国家的理论基础。人们不禁会想起，刘少奇曾把党章中有关毛泽东思想的内容全部删去，因而使主席极为不满。当时的官员们对我们这些大会结束不久就访问中国的人强调说，“九大”标志着“文化大革命”混乱时期的结束。但后来说法又有了改变。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既不象许多老干部担心的那样偏激，也不象他们担心的那样年轻。实际上，新的中央委员平均年龄为61岁，而上届委员平均年龄56岁。委员会中，军队干部占一半以上，地方干部从近百分之六十降到百分之三十。劳动模范和群众组织的代表比例有上升，这些代表不管发言人讲什么都热烈鼓掌。老红卫兵所占比例少得出人意料。出席会议的代表中，有以大军区司令员许世友、陈锡联、李德生为首的一派；以林彪为首的中央军委办事组包括总参谋长兼大军区司令员黄永胜、空军司令员吴法宪；中央军委副主席、老帅叶剑英支持以周总理和财政部长李先念为首的政府领导小组；偏激派以毛主席本人为首，包括陈伯达、康生、江青以及“上海帮”姚文元、张春桥。朱德等党的一些老干部没有实际权力，但他们一般都支持周总理。

只有政治局委员、部长、一些大军区司令员等“内部人士”清楚，“九大”并不象全国甚至全世界所想象的那样是林彪个人的重大胜利。当然，他实现了成为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的野心，并把他的接班人地位写进了党章（这是从全体党员到小学生在两周的政治学习中都必学的文献）。但是，这次大会也暴露了

林彪作为政治人物所具有的弱点，代表们纷纷谈论林彪口齿不清的发言和奇怪的个人习惯，并说他缺乏应有的风度。这些情况，老资格的代表已不感到奇怪，他们还会记得，1942至1943年间，林彪作为共产党的代表去重庆与国民党谈判的时候就在外交上遭到过失败。

“文革”时期被消除的高级军官，许多都曾在不同时期是林彪的部下，并被认为是他的人。实际上，据史蒂夫·秦（Steve Chin，香港大学有影响的中國问题专家）所说，这次大会暴露了林家帮“在结构上的薄弱性”。然而，人们都期待着毛主席在军事上、政治上给他的正式接班人林彪更大的权力来扭转这种局面。尽管人们对林彪评头论足，但仍有人认为，只要毛泽东大力扶植，已经任国防部长10年了的林彪就会站稳脚跟。林彪曾对他的亲信抱怨过，说由于主席在“文革”时期一直占据着中央军委主席的重要位置，使他不能按自己的意愿任免军区司令员。林还抱怨说，几乎所有的重要文件，甚至军事命令，都要经主席亲自签发。自然，除了那25个最重要的位置外，林彪可以随意在空位上安插他自己的亲信。事实上，林彪后来确实受到指控，说他在重要位置上安插了大量亲信。

人们当时没有意识到，林彪在处理党政事务中多么依赖陈伯达这个顾问。陈很乐意充当首席顾问和联系人的角色，因为尽管他在党内位居第四，但他没有权力基础，时常担心自己会因失宠而丢权。但由于陈伯达作为林彪的代言人同毛主席打交道，周恩来与偏激派都至少帮助他在表面上保持着以前的权威。

第十二章 刘少奇的最后岁月

“天下大乱，形势大好”

各级党的领导遭冲击，机关被砸烂，与过去城市居民那种死气沉沉的状况相比，这种情景对整个国家来说更为不幸。自1949年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一直肩负着制定党和国家政策的中央政治局，到1967年底已基本上形同虚设。事实上，从以陈伯达为首的“文革小组”攫取政治领导权以后，政治局就很少开会。从地区一级委员会直到小工厂的委员会，党的领导已有名无实。以往受人尊重的党的干部不是身陷囹圄，便是吓得不敢讲话。在这种极度混乱的情况下，工会、妇联、共青团等组织已无法正常发挥作用。在一些地区，警察已失去作用。以往，公安局负责外国人行踪以及城市间的人口流动，现在已无人过问。因为以往负责这些机关的老干部经常受到红卫兵的围攻，他们不敢冒险上街，不敢去机关办公。更为严重的是，在许多城市，红卫兵为争权仍在打派仗。广州、上海、天津、北京还出现了自50年代以来已消声匿迹的黑市。许多商店被盗，在对北京西单大商场的一次趁火打劫中，竟有人开枪射击。

因此，各省以及各主要城市中建立革命委员会经历的时间比总理预料的长得多，这就不足为奇了。社会秩序一直是由解放军负责维持的，听说由于红卫兵以及极左分子的偏激行为，国防部

长林彪已转变态度，部队士气为之大振。

在出任国防部长的最初两三年内，林彪给予偏激的总政治部以极大支持。军队的政治路线总是先由总政治部决定，再通过部队政委普及宣传。林彪当时急于推广“小红书”，以进一步推动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在军队里他主张只“红”不“专”，还推行具有破坏性的激进主义，对军队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然而当发生全国范围的混乱和全国公安系统瘫痪时，林彪意识到，部队需要军纪严明，基础稳固，这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因此，他的态度较前有所改变，或照他的政敌的说法，他是看风使舵。

对前段形势进行总结之后，毛泽东作出结论，认为虽然对党的忠诚还很难估量，但可以肯定，约占百分之九十的行政机构能坚定地跟着周总理，而军队中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人拥护林彪。此外，主席还从他的一些亲近顾问那里得知，农业生产正稳步上升，工人冬季温饱已不成问题。这一点他在视察人民公社时也已看到。不仅如此，许多农村还在搞长期工程，他们筑起大坝，搞水利灌溉，挖水渠，造梯田等。

受周总理的建议影响，这一时期主席发布了许多指示，后来他终于批准了恢复急需建立的党和国家领导机构。主席主张，各省市以北京、上海为榜样，组成老干部、军代表、红卫兵代表三方比例大致相同的革命委员会。老干部自然不情愿与这些曾不止一次殴打过他们的粗鲁的小字辈同在一个委员会里工作，然而红卫兵也瞧不起老一辈的革命者。毛主席倡导的老中青三结合形式的革命委员会，在组建过程中困难重重，到1967年底，尽管解放军起了促进作用，全国仅有5个市建立了革命委员会。

因此1967年8月8日，林彪召集了高级干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偏激的江青和陈伯达、各关键大军区司令员（包括陈锡联，他当时在东北，后来调任北京军区司

令员)、还有极左路线代表王力、戚本禹。为了抚慰偏激派和稳健派双方,林彪开头就强调“武汉兵变”是件好事,因为它暴露了坏人坏事。接着林对大家说:“文化大革命”所取得的成果最大,相比之下,人民付出的代价极小。这与毛泽东讲的意思大致相同。接着林彪竟然对大家说,必须清除军队内部的反革命分子。这与10天前所讲的截然不同。他说,许多军队干部犯了错误,还点名批评了总政治部主任肖华,指出他的下属政治委员开始干得不错,但由于肖华所犯的一系列错误,使他们渐渐跟不上形势。

司令员们获悉,他们将独揽军区的重要权力。会后的一周内,驻京部队公开批判了50多名部队政委,说他们曾经宣扬“文化大革命”不利于军队的正规化建设。与此同时,根据运动需要再次提出了“拥军爱民”的口号。极左的“5.16组织”这时仍叫嚷要揪军队干部,直到1967年9月下旬毛泽东批评了派性,“5.16”才被镇压。9月份林彪也发布命令,批准部队用武力自卫。

江青的讲话都是有利于新的路线的。同时,作为偏激派先锋和主席的夫人,她对红卫兵有极大的影响。由于前两次红卫兵对军队和总理本人的冲击,周总理一直深感忧虑。这次他成功地说服了主席,让江青采取相应的行动。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江青曾要求揪军内的坏人;并鼓动红卫兵“夺取”军权。现在,她称部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说分裂军队将会导致无政府状态;过去江青曾纵容红卫兵抢警卫部队的武器,而现在她强调,偷武器者应判死刑。她还号召红卫兵各派组织现在应该坐下来学习文件,消除隔阂,无论做到这些有多困难。“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也做了类似的讲话,呼吁停止内战,告诫红卫兵不要头脑过热。

然而,尽管有解放军的大力协助,从1968年1月到5月,也只成立了14个新的革命委员会组织。这期间,江青出人意料地在3月份再次煽起红卫兵运动高潮,使革委会成立的步伐放慢了。

由于缺乏有效的公安力量，军队奉命把参与制造混乱、示威的青年抓起来，其中没有正式职业的，被送到靠近苏联边境的农村人民公社。还有数以万计的青年被送回他们当年串联时曾到过的农村。

当时的保安工作如此涣散，以致1967年毛主席要去户县的一个农业公社视察时，他的贴身警卫汪东兴（后来是政治局重要成员，因在1976年逮捕“四人帮”而出名）极力劝阻毛泽东，说那里两派正在搞武斗，太危险了。主席还是坚持了自己的意见。视察途中，尽管人们把他当神一样保护起来，他还是察觉到，那个地区正处于混乱之中。让主席深感震惊的倒不是派性冲突，而是那些蛮横的造反派对他们的行为所作的辩解。许多年轻的头头，先是宣称他们忠于毛主席，忠于他的革命路线，然后承认在哈尔滨、杭州、成都（仅举三个城市）这些地方，“饼”的数量有限，他们是为争“饼”而战。这里所说的“饼”是指优越的住房条件、用小汽车参加迎宾宴会的资格、以及高级干部所享受的舒适的生活。

1967年9月下旬，返回北京进行短期查访之后，主席发布了一系列新指示，这些指示很快就以大字报形式出现在首都的主要街道以及大学内外，一些报刊也争相转载。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喉舌《人民日报》没有转载，因为当时它仍在极左分子的控制之中。对于不了解情况的外国人来说，毛主席的指示确实至今仍不好理解。他写道：“天下大乱，形势大好。”主席经常把“天下大乱”与“大好”相提并论。但紧接着他又讲了国内的混乱情况以及恢复正常秩序的紧迫性。他还讲道，群众已被动员起来，参加反对修正主义的生死政治搏斗——这里没有点刘少奇的名字——他们的政治觉悟在斗争中也得到进一步提高。按中国人的说法，就是指民众对于毛主席倡导的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力和理解力得到了进一步提高。

周恩来总理几个月来不断受到冲击干扰，虽多数属于间接性的，也足以使他忧虑。就在这时，一幅题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彩色照片大量发行，进一步确立了周恩来总理的威望。照片上除了周总理，还有毛主席、国防部长林彪、中央“文革小组”领导陈伯达、江青、康生。此后不久，一直受到周恩来保护的外交部长陈毅，应邀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8周年的庆祝活动，这意味着陈毅将重新主持外交部工作并驱逐极左分子。

军区司令员们为恢复正常社会秩序竭尽全力，他们公开承认在一些地方的确遇到不少阻力。然而他们有枪，还掌握着同样重要的通讯工具。尽管还需花费时间，指战员还是坚信最终将取得胜利。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素以军阀混战著名的国家，竟没有谁想重返那种年代。周总理和毛主席此时对于林彪及其军队日益增长并包揽一切的权力感到担忧。

“五·七干校”

在国防部长林彪的提议下，1968年5月主席同意在黑龙江省柳河建立了第一所“五·七干校”，作为为“文化大革命”中那些红卫兵和成千上万名多余的党政干部提供接受再教育的场所的示范。将各级持不同政见的人搁置起来，这是一个极为理想的办法。尽管有相当一部分干部是在毛提倡的“精兵简政”运动中被下放到干校的，但开始时，进“五·七”干校仍被看作是一种惩罚。

“五·七干校”形式很快普及，仅广东一个省在1968年底，已建成大约300所这样的学校，内有10万多名老干部和红卫兵头头。尽管设立了这些干校，红卫兵仍继续闹事。在偏激派的堡垒上海，学生们怨声载道，说他们被关在党的门外，在新的革命委员会里他们的入选代表太少等等。红卫兵在辩论中引用马克思的话，

“旧势力总是设法在新的体制中寻求复辟，巩固自己的力量，”以此支持自己的观点。《文汇报》上刊登社论指出，“即使它们（指革命委员会）在组织上吸收了革命的新鲜血液，他们还可以尽其所能，象挤牙膏那样排挤新生力量。”（这里我再一次引用了官方译文。）

刘少奇的悲惨遭遇

国家元首刘少奇遭受清洗，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这件事使近两年来的政治大动乱局势急转直下。事实上，此刻这位以前身为毛的“选定的接班人”的人已是奄奄一息，被关在一所秘密监狱内。他曾在“大跃进”时期反对过毛的政策。毛主席认为刘想架空自己，使自己成为挂名领袖——即“供在架子上的佛像”，为此，他对刘少奇一直耿耿于怀。

1966年8月召开了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会上点名说林彪是党内“第一副主席”，取代刘少奇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这一切使刘少奇及其同伴们感到他们面临着下台的可能。由于主席在接班人的提名上有明显的变更，刘少奇在党内的地位迅速下降。此外，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也无疑给全党一个印象，表明主席不是要把刘赶下台，就是要使他有名无实。

尽管没有点名，刘少奇和邓小平也都很清楚，中央“文革小组”呼吁红卫兵横扫的“牛鬼蛇神”就是指他们。尽管如前所述，刘少奇为反对偏激分子曾派出了由党的忠诚干部组成的工作组，但刘、邓都已认识到败局已无法挽回。因为，当时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正处于高潮期，大街上男女老少都佩戴着毛泽东的大红纪念章。毛泽东在八亿中国人心中已成了共产党的神或皇帝，只有极少数人知道他实权有限。

至1967年1月，报刊上不断出现的“中国的赫鲁晓夫”、“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具体所指，在全国已成为公开的秘密。除此之外，刘少奇还被说成是“党、政、军内修正主义分子和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总头目”，同以毛主席、林彪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对着干。

在周总理具体安排之后，刘少奇拜访了毛主席，会谈中，这位国家元首主动提出“马上辞职，携妻子儿女到老家农村种地，终生做百姓”，换言之，也就是当一个与世无争的顺民，逐渐被人遗忘。但主席一言未发，只是抽烟。最后刘少奇结束了他的谈话，主席送他出来时，嘱咐他要好好学习，保重身体。主席很可能是不愿让刘少奇返回他的故乡，那里距湖南长沙不远，几英里之外，翻过小山丘，便是毛泽东的故乡韶山。那里每年都要接待成千上万的来访游客。

这实际上成了两位领导人的最后一次会面。据刘少奇夫人讲，从那以后，他们就逐渐与外界朋友、同事失去了联系。但这期间，除了一两次骚扰之外，他们在中南海过了一段清静、安宁的生活。

现在人们知道，当时江青、康生和陈伯达伙同林彪给刘少奇罗列了很多罪名，还指使一些人对他进行诬陷。但江青及其同伙的这些极其恶毒、卑劣的行径在当时除了少数几个已吓得魂不附体的诬陷者外竟无人知晓。直到后来（1980—1981）审判“四人帮”时才被揭出。一些中国官员坚持认为毛主席不知道此事，但即便如此，他至少应该发现一些可疑之处，因为早在1966年8月，江青就与林彪一唱一和，开始捏造刘少奇的罪名。林的老婆叶群，指使一位高级军官写信诬告刘少奇“想掌握最高权力，正伙同邓小平筹建资产阶级司令部”。从后来审判“四人帮”时提供的大量证据可以看出，在有意迫害刘少奇、邓小平的一伙人中，江青是首要唆使者。据某红卫兵组织中的一些极端分子揭发，7月份

江青曾煽动他们去冲中南海刘少奇的住所。显然，毛主席不会完全相信江青之流的诬陷之词，他们毕竟共事47年，在他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辉煌时刻，刘少奇就站在他的身旁。后来在红卫兵对刘少奇攻击、侮辱最凶的阶段，毛泽东也曾试图保护刘少奇免遭摧残，这种事就已表明了主席对江青一伙的诬陷之词并不全信。

主席很可能是后来受了假证词的影响。这些证词出自于曾跟随刘少奇工作过的人以及和他一起住过监狱的人之手。但据说却是刘涛与他父母刘少奇、王光美断绝关系真正触动了毛泽东。刘涛不仅笼统地批判了他们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还详细描述了他们用餐如何丰盛以及他们穿的“皮”鞋。而主席却是另一种极端的生活方式，他总是穿着帆布鞋、补丁衣服，饮食简单，只要有辣椒就行。听说刘少奇于1955年曾命人在海南岛南部棕榈成荫的海滨建了一座漂亮的别墅（现为旅馆），里面陈设奢华，有盥洗室，还装有日本空调，毛主席为此非常惊恼。其实，刘涛所说多有夸张，为了某种个人利益，她想致父母于死地。毛主席去世以及粉碎“四人帮”之后，她又声明不承认所讲过的一切，竭力为自己开脱辩解。

对于1967年7月18日晚发生的事件，众说纷纭。当时一大群人聚集在天安门附近即中南海的入口处，强烈要求批准他们进中南海，审问国家元首刘少奇和他的夫人王光美。一种说法是，警卫人员遵照“最高指示”，即毛主席讲过的话，拒绝放任何人入内。他们就等在外面不走，人群中还搭起了帐篷。数小时之后，两小组造反分子被送到刘的住所。其中一组，将刘少奇和他的夫人分别隔离在两个房间里单独审问，长达2小时20分钟；而另一组多数是红卫兵，将他们的房间仔细搜索，还抢了东西。然而，1982年据一些中国领导人告诉我，事实上刘被一小撮狂热的红卫兵批斗了一番，其间他们殴打了刘少奇，还将他的衣服剥光。无论

是上述哪种情况，总之，红卫兵离去不久，他就被软禁起来。刘少奇当即写信告诉主席，说对他的“反党罪行”和“复辟资本主义”的指控纯属捏造。他还写道，“我已失去自由。”假如刘少奇当时曾被“批斗”，即被红卫兵殴打、审讯，在审判“四人帮”时，应该特别提到这一点。

然而，如果红卫兵真的冲击了中南海这一神圣不可侵犯之地，必然给主席、江青以及其他领导人引出过许多麻烦，因为只有在这里，首长们才得以在群众的视线之外、稍稍松弛一下（如果在夏季，他们可以坐在湖边读书看报）。他们非常珍视这种个人自由。另外毛泽东也曾想过保护刘少奇，使之不受暴徒侵扰。至少有一两次，他公开拒绝让刘少奇去参加被红卫兵称为“斗争会”的审讯。但红卫兵当时急于赶在公审之前，对刘少奇、邓小平以及他们的夫人进行大会批斗，让他们交待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右倾活动。

几位有机会见到毛主席并非常大胆、敢于坦率直言的老干部，试图想从他那里弄清楚为什么他竟允许人们诬陷诽谤一位仍受法律承认的国家主席，但主席迅速转变了话题。紧接着，江青就弄得这几位老干部生活上很难过，有人还提醒他们康生在7月份召开的大会上已经讲了刘少奇的“叛变”行为。尽管江青个人对邓小平也很不喜欢（实际上是已经恨得咬牙切齿），然而逐渐地，邓小平这位仅次于刘少奇、作为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人已不再象当初那样引人注目。当刘少奇被列为“工贼”、“叛徒”以及“帝国主义的特务”之时，邓仿佛被人们遗忘了。当然这与周总理千方百计地保护他是分不开的，但另外也可能由于主席感觉到，中央“文革小组”不应该贪多嚼不烂。总之，毛泽东喜欢讲：饭要一口一口地吃。

① 这种说法与实际时间有出入，——校者注

毛泽东对于邓小平的主要不满在于，从1949年他被指定为中央总书记到1955年^①，这位党的总书记从来不去看他，不向他征求意见，也不找他商量工作。

夏季，刘少奇的健康状况开始恶化，据刘的夫人讲，是由于忧虑、遭受挫折，加上缺乏锻炼。后来，严重到卧床不起，靠夫人照顾，服用一些补药和其他常用药。但这期间，通常为政治局委员治病的医术高明的大夫却无一人来看过他。随着对刘的诽谤和诬陷不断升级，他的健康情况每况愈下。许多揭发材料是被监禁的人在狱中“提供的”，证词五花八门（关于这些，后面在“审判四人帮”部分将有更详细的叙述）。他们揭发刘少奇曾与前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有秘密来往，并说当时王光美本人已是美国特务，是她为司徒雷登与刘少奇的会面作的安排。囚犯还写了一份纯属捏造的离奇证词，指控刘少奇于1950年5月派他的妻兄王光英去香港给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

早在中央召集会议宣布对刘少奇的正式罢免之前。刘少奇就已被迫离开了他作为党和国家第二号人物时在中南海内的住所。当时，他虽被软禁，仍可以收听广播，或从警卫那里得到消息。后来，国防部长林彪突然命令将刘少奇转移，他被几个战士抬上了救护车，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送到北京附近的空军机场。随后，又从那里被用飞机送到郑州东边的古城开封。据刘少奇遗孀说，他的飞机在机场降落后，专门挑选出来的医护人员登上飞机，看到刘“光着身子，躺在担架上，盖着粉红色被单，眼睛紧闭，”“鼻孔里插着鼻饲管，脸无血色。”自然，刘后来就被救护车带到一座专门为他准备的监狱，这里四周装了电网，戒备森严。据1980年5月《人民日报》刊登的一篇报道记载，刘少奇被关押在一座拱形楼内，1949年共产党胜利之前，这里是金城银行的一个支行。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中央特别

会议^①，会上一致通过了“罢免”刘少奇的决议。他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并被“永远开除出党”，被说成是“叛徒、内奸、工贼”、“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说他“混进党内并犯下了滔天罪行”。据刘少奇遗孀讲，为达到更进一步刺激他的效果，故意在刘少奇生日那天即11月24日把决议内容传达给他本人。她说，这是毛泽东在精神上对刘少奇的一次残酷摧残。获悉他被罢免的消息后，刘少奇很少再讲什么。1969年11月12日凌晨，他死于肺炎，他生命的最后一年被他夫人称为“无声抗议”的一年。他去世之后，尸体被塞进一辆吉普车内，而双脚仍露在车外，就这样被送往火葬场。

1979年4月，中央召集工作会议，“经过详细认真的调查研究，已采取措施为刘少奇同志平反昭雪”。^②在对毛主席的评价中讲道，尽管他仍不失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下了严重错误”。可惜的是，只有刘少奇夫人代为接受这公正的裁决了。

现在不可能确切地估计当时江青在政治上对主席到底有多大影响。当然，由于主席默许她代表自己讲话，她的权力明显大大增强，当时她与林彪串通一气，使周总理处境极为艰难。但在整个“文化大革命”时期直到党的“九大”，毛主席都是精力充沛，并且控制着整个局势。即使他由于被林彪大肆吹捧所蒙骗，或因听任江青摆布而支持偏激派，他对自己的行为也是清楚的。许多党员干部，虽不敢直言明讲，但毛泽东对刘少奇的处理的确使他们震惊。当时，邓小平也被撤职，但又一次由于周总理的关系，没有被监禁，也没有被开除出党。这已有点近乎奇迹。有一段时间，邓小平被送往农村与农民同吃同劳动。

① 这次会议应为八届十二中全会。——译者注

② 此说不确，刘少奇平反昭雪时间为1980年2月的十一届五中全会。——校者注

据说，在宣布了这一系列罢免决定之后，毛泽东感到一丝宽慰。直到刘、邓被赶下台，他一直都极不愿对红卫兵极端分子的活动实行严厉制裁。中央特别会议通过的决议在文字上虽然沿用了江青长期以来对刘少奇的诽谤诬陷之词，但现在我们知道，在冲击英国代办处及武汉事件之后，由于周总理执意要辞职，才致使毛泽东在清洗国家元首之前对过激行为进行了抨击。毛泽东坚信，清除刘少奇，不仅“挽救”了他个人，也“挽救”了他历尽艰辛所缔造的党和国家。

整个夏季，陈毅一直都是极左分子攻击的主要目标之一。主席非常清楚，对外交部长陈毅的攻击，矛头实际是指向陈毅的保护人周总理的。陈毅极力与红卫兵讲和，甚至在他被戴上高帽游街时也是这样。他还尽力解答他们就毛主席的思想提出的有关问题，但是他断然拒绝接受他们的政治观点。陈毅被赶出外交部之后，体重下降了40磅。主席见他情绪低落，想使他振作起来，便说：“造反派在外交部呆的40天中所犯的错误，比陈毅40年犯的还要多。”毛主席还当众宣布，“5.16组织”给外交部罗列的一系列罪名纯属夸张不实之词，陈毅将官复原职，同时要虚心接受意见，纠正过去的错误。

结束了在华中地区人民公社的视察之后，毛主席立即表示支持周总理，从而及时制止了反对总理的运动，接着对陈毅的攻击也逐渐息鼓收兵。今天我们知道，主席无疑是经过几周思考之后才决定支持周总理的。同他并肩工作近半个世纪的总理是他的得力助手，曾一直辅佐他处理国内外事务。是周总理提醒他，国家正面临着分裂和无政府状态，随时可能出现饥荒。也正是由于这些促使毛主席作出了上述决定。但对象主席这样非常喜欢搞政治运动的人来说，作出这种决定是不容易的。因为，那时他的头号对手刘少奇仍是合法的国家主席并且在政治局住宅区中南海内住得离他很近。事后看来，当时周总理要辞职不干，无疑对主席震

动不小，不过主席当时没有流露罢了。数年后的1975年，当总理因病离开办公室时，主席曾流露出缺憾之情，由此也可以作出上述判断。

清洗刘少奇后时隔不久，在毛主席的支持下，周总理很快下令反对已使一些城市陷入混乱的无政府主义，紧接着，中央“文革小组”清除了极左分子，一场新的运动广泛掀起，人们以大字报形式揭发“5.16组织”以及其他极左分子的罪行。此时，主席正在北戴河休养。在昔日的夏都里，有他的，更准确地说是政治局的十几所别墅。平日主席爱拟政治口号，还喜欢赋诗，多是些富有浪漫气息的诗篇。在北戴河有严密的保安措施，主席在这里除与其他领导人谈话外，有时还游泳、写诗、做文章。后来他的对立面曾指出说，他当时写了“5.16集团是个秘密组织，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其实他并没有写过这些话，不过他确实写了“斩断黑手”这条语录口号，意为清除反革命分子。接着街头出现了通缉令，搜捕那些已被证实的极左或极右分子，同时逮捕了一些搞分裂的人和暗中推行资产阶级路线的人。然而那些曾亲自参与或煽动纵容火烧代办处的英国公民却逍遥法外。很难把他们划为右派分子，因为实际上，这些英国人与他们的中国朋友一样是“左”得过火，他们想成为最革命的，用马克思的话来表达即是“比别人更神圣的共产主义者”。

当时在华工作的外国人的活动，近几年来已逐渐搞清。它们反映出某些地方混乱到甚至是无法无天的境况。对于这一切，在京的50万学生应负主要责任。他们分成两大派，分别称为“天派”“地派”。地派组织极左，正是他们把汽油从学校运到附近公园，预先做好火烧英国代办处的准备。武汉事件之后，“地派”组织于1967年夏阴谋策划对周总理发起猛烈攻势，后来又冲击了一些军队干部。

最出名的外国人或许要数一位叫悉尼·里顿伯格(Sidney

Rittenberg) 的美国人，他是个自发的小头目。早在“文化大革命”前，在距大学区附近的北京外语学院里，有许多讲英语的外籍教师，悉尼·里顿伯格在他们中间很有影响。他曾经作为翻译到过延安，因此从延安时期开始就与一些共产党人一直保持着联系。后来由于同中国人结了婚，不言而喻，他常向其他在京工作的外国人讲述中国人的政治观点。除此之外，他还是一个享乐主义者，在他那舒适典雅的公寓里，陈设着罕见的明朝椅子。在这里他不断扩大自己的影响。

以往里顿伯格曾是有关中国饭店方面最著名的向导，还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口译员，甚至会译古装京剧。出人意料，1966年11月，即后来人们说的“刘少奇的最后一个冬天”，里顿伯格竟突然对大米粥、旧衣服产生了兴趣。他这一举动，引得不少外国“朋友”——“朋友”是中国共产党人对赞同共产主义的外国人的称呼——都纷纷脱掉绫罗绸缎，换上旧衣服。随后，里顿伯格竭力拉拢群众支持红卫兵。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推移，他也沿着极左路线越走越远。1967年他竟公开支持姚登山，坚信姚将长期负任外交部长。而最使人难以理解的插曲是，1967年8月中央“文革小组”分裂后，这个美国人竟设法控制了北京电台。在“5·16”组织的一个神秘的、有武装力量的极左小派别中，他有很大的权势。在外国报纸中，报道中国的重要宣传机构被一位美国人控制的，不止《真理报》一家。可以预见，他的权力不会长久。果然，他对电台的操纵结束后，就被电台工作人员送进了监狱。

在此之前，里顿伯格与北京外语学院的一些人关系密切，其中包括迈克尔·夏皮罗(Michael Shapiro)、伊斯雷尔·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和他的英籍妻子埃尔西·费尔法克斯·乔姆利(Elsie Fairfax-Cholmeley)。据报道，在极端分子捣毁英国使馆时他们曾予以支持，还有后来被称为“天津极左分子

的大阴谋”也与他们有牵连。在华工作而又支持“文化大革命”的外国人中，也有稳健派，其中包括作家南希（Nancy）和戴维·米尔顿（David Milton）。他们专门找到里顿伯格，提醒他说，他的朋友中有一些人已被宣布是极左分子、骗子，并与“5·16组织”有勾结。但里顿伯格不以为然，对他的极左朋友将最后取得胜利这一点抱有极大的信心。里顿伯格干的最后一件坏事是企图在天津组织一次极左艺术节，主要节目是一个名为《现代狂人》的剧，他为此准备了几个月。这个剧后来被称为“反动黑剧”。

1973年3月（在此一个月前我成为北京居民），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对一群外国专家做了一些解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以及乔冠华（后来任外交部长）也都在场。总理把在华外国专家们在“文革”期间所受的迫害归咎于“林彪及其反党集团的颠覆活动造成的过分行为”。总理带着抱歉的口气对大家说，弄清事实真相花费了很长时间，现在“外国朋友们”终于又自由了。总理说，戴维·克鲁克（David Crook）的情况例外，他看起来几乎是偶然在北京外国语学院被逮捕的。因为有些群众认为完全有确凿证据可以怀疑，他是被“5·16”组织操纵的造反兵团所抓，因为他被带进一所造反派控制的楼内。总理最后代表中国政府向被监禁5年的外国朋友道歉。周没有提到他们长期被隔离审查的事，或许因为他不希望这作为新闻传播出去。

里顿伯格没有同他们一起得到释放，周总理重申，他这个人坏透了。然而周总理没有提及，从上年（1972年）和英国全面恢复外交关系后，为使埃尔西·费尔法克斯·乔姆利以及自“文革”以来被监禁的其他英国公民获释，英国新任驻华大使约翰·艾惕斯（John Addis）爵士曾颇费周折，后来一两位获释者对使馆为他们所做的努力表示感谢。其他人还表示，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国当局把他们扣起来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还说他们不愿恢复自

己的英国护照。但几个月之后，他们又改变了主意。

使中国问题观察家们十分惊奇的是，1977年12月中旬，里顿伯格也获释出狱，比他的同伴晚四年半，在周总理逝世近两年以后。周总理自始至终认为里顿伯格是个坏分子，认为是他欺骗了其他外国人。里顿伯格出狱后，与他的中国夫人生活在一起。他们在友谊宾馆住了一段时间，埃尔西·费尔法克斯·乔姆利和伊斯雷尔·爱泼斯坦、戴维·克鲁克出狱后，也一直住在友谊宾馆。里顿伯格象他们一样从不谈论他的监禁生活及获释情况。即使现在在北京可以畅所欲言的气氛中，他们仍不愿会见在华的外国人。现在里顿伯格大部分时间在美国，在那儿他曾做了几次巡回讲学。

第十三章 林彪的覆灭

枪杆子与笔杆子

当江青把她拍摄的一张林彪的脱帽照片散布开来的时候，北京的“内部人士”——中共中央委员及部长们——才首次觉察到毛泽东主席与他“选定的接班人”林彪之间的关系已经有了严重的裂痕。林对自己的秃头非常敏感，因而在此之前，从来没有人拍过显示这位国防部长那发亮的秃头的照片。的确，林彪的虚荣心使他象中国北方的农民那样——习惯于戴着帽子，即使吃饭也不摘掉。

这一类重要的政治变化，经常就是通过北京市里频繁传播的这类细微末节泄露出来的，因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谨言慎行的人，即使在他们自己人中间也是这样。1970年盛夏，在林彪擦汗的时候，江青摄下了他的那张光头照片。然而，至少比这早四年，毛主席与他的“亲密战友”之间就已存在严重的意见分歧。而不少中国人则认为，毛泽东对林彪的怀疑还可以追溯到1955年前林与高岗的关系。那次，林彪丢掉了他已任五年的政治局委员资格。

对毛泽东的生命和其至高无上的领袖地位形成的最后一次、也是最严重的一次威胁，来自他的第二位接班人——林彪。当毛泽东再一次拒绝担任他认为是徒有其名的国家主席之后，林彪即开始策划谋害他。作为国防部长，林彪深知自己在冒险。他非常

清楚，毛的第一位接班人刘少奇曾因想“架空”主席而惨遭迫害。

许多资料表明，“文化大革命”中期，毛主席和他的机智忠诚的总理都不赞成把人民解放军当作中国唯一的专政力量，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怀疑林彪有个人野心。根据主席写给江青的信（前面提过）可以看出，毛泽东从1966年7月起就对林彪持怀疑态度，但他不愿对林彪以及政治局的同事们流露自己的真实想法。

人们会记得，早在1966年5月18日，林彪给一些党员做了一次异乎寻常的报告，指责刘少奇及其追随者。林彪在报告中没有提到周恩来时常表示担心的问题，即苏联会在中国制造事端，并企图从内部攻克堡垒。而是把中国历代的政变和未遂政变作为他讲话的主要内容。他提醒大家，刘少奇之流的阴谋活动还未被彻底揭露，还谈到反革命军事政变和颠覆的可能性。

林彪强调说：“政变，现在成了一种风气，世界政变成风。他说，“据不完全统计”，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过去六年内发生过61次政变，其中56次成功了。林彪津津有味地数说道：“8个国家元首被杀，7人成了傀儡，11人被废黜。”当时，毛主席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会后，江青向主席汇报了讲话内容。主席后来也承认，他当时的确有些吃惊。林彪在结束讲话时说：“夺取政权要靠枪杆子和笔杆子。”还强调：“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言外之意，一旦时机成熟，如爆发反革命战争或毛泽东去世等情况，一场政治灾难就会降临到这个八亿人口的大国头上。从1959年起到林彪做上述报告时，他已当了六年国防部长，手下的总参谋部里据局外人估计至少有百分之七十的人忠于他。然而他还没有完全控制下属的十一个大军区的司令员。当时他与江青关系密切，后者不仅控制着中国的宣传机构以及电影戏剧，在军队的政委中也有一定的影响。

虽然毛泽东与江青之间常有磨擦，但对于江青的绝对忠诚，他似乎从来没有怀疑过。1966年7月初，毛给江青写了封私信。林彪垮台后不久，中央破例向党的高级干部公开了此信的内容。主席是在外地疗养时写的这封信，当时，江青正在文化中心上海奔走。在这封意味深长的信中，毛泽东表示他对林彪的讲话持保留意见，并且抱怨政治局好象急于传阅那个讲话，“他（指林彪）的一些看法使我深感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的那几本小书会有那么大的神通”。毛这封写于1966年7月6日的信^①证明，甚至从那时起，他就对林彪的行为有怀疑，只是这种怀疑没有被公开而已。此信最初仅在政治局以及中央的一些“可靠人员”中传阅，大约在1971年被逐步公开，后来中国一些高级官员也证实确有此事。

信的开头，主席写了几句他的安排，随后告诉江青，他每日都看一些材料。他指出：“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接着又写道：“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毛接着写道：“我的朋友（指林彪）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象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我是有些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衷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人贵有

^① 原文日期如此，但据可靠资料，这封信是7月8日写的。——校者注

自知之明。今年4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又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狠些，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身碎骨的。那也没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这个问题我同你不知讲过多少次，你还记得吧，四月在上海还讲过。以上写的，颇有点近乎黑话，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吗？但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①，我则只说对于我所起的作用，觉得有一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们的区别。此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那样说的，公开就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而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所以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也许在我死后的一个什么时机，右派当权之时，由他们来公开吧。他们会利用我的这种讲法去企图永远高举黑旗的，但是这样一做，他们就要倒霉了。中国自从1911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中国如果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

① 据校者手头资料，毛泽东原信无着重点，看来着重点是作者加的。——译者注

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结论是：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①

这里，我根据官方译文，重复了毛泽东信中百分之九十五的内容，因为信中不仅指责林彪在1966年就想“推翻我们党及我个人”，还从侧面反映出毛泽东年轻时的壮志，以及他与江青的政治关系。后来，毛在会见埃德加·斯诺时，提到了信中的观点，指责林彪想把他与广大群众隔开。主席还感到气愤的是，早在党的“九大”以前，有几次在官方正式文件上，林彪把自己的名字紧排在主席的后面，还冠以“最亲密的战友和接班人”的美名。

有点儿让人奇怪的是，信中没有提到是什么因素刺激毛泽东给江青写了这封信。其实，刺激因素就是，1966年5月至7月间的一次部队大换防。那次，林彪不同任军委主席的毛泽东商量，就擅自将三十八军调入北京。这为说明毛泽东写信时为什么隐居外地、远离首都提供了一个辅助性的原因。然而，主席当时却强烈希望维持林彪忠诚的外表，掩饰对林彪的不信任，以致写过这封信之后不到一个月，在8月份召开的党的十一中全会上，这位国防部长仍可以一跃成为党中央委员会中唯一的副主席。此后不久，全国各大城市都出现了红卫兵，而在从1966年8月12日^②到11月26日期间不少于八次的大规模接见红卫兵运动中，林彪总是以“亲密战友”的身份站在毛泽东身边。

军队干部中一有空缺，林彪就安插自己的亲信。这一点，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有所察觉。但在主席看来，林将自己的亲信部队

^① 这段信的文字，直接引自毛泽东同志写的中文原文，与英文在个别文字上略有出入。——校者注

^② 原文日期如此。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是在8月18日。——译者注

调入北京，是为了另搞一套。尤其令毛气愤的是，林彪竟将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调离了这一至关紧要的岗位，因为至少在毛泽东看来，“文化大革命”之前，杨勇在首都的工作成效显著，堪称第一流军事指挥员。

周恩来总理的作用

周恩来总理看起来似乎完全安于作为党内第三号人物起作用。“文化大革命”初期，总理曾对一些中央委员讲过，在部队支持红卫兵一事上，他与国防部长曾有过激烈的争执。1967年8月以后，由于极左分子的出现，军队承担了保障法律实施、恢复社会秩序的义务。随着军队政策的改变，他们之间的关系有所改善。然而，在1968年到1969年4月党的“九大”召开这段时间里，总理对国防部长手中的巨大权力一直忧心忡忡，但他对此又无能为力。因为从1967年秋至1968年底，解放军一直忙于制止两派群众之间的武斗冲突，动员老红卫兵到农村去。

主席、总理与林彪之间有一种难以描述的三角关系。主席行使权力，施展才能，需要林彪及其军队的支持；而他建设党，管理国家，要依靠周恩来总理。林彪与周恩来缺乏共同点，意见经常不一致。显然，周恩来喜欢毛泽东的坦诚之言，而对林彪的“空话”则不胜厌烦。但最使总理厌恶的是：林彪诡计多端，对干部实行“无情打击”。尽管总理从没有考虑过要当接班人或第二号人物，但他们之间还是有权力斗争的。总理虽才华出众并举世闻名，他却从不为成为接班人做任何努力，这一点始终让林彪、康生和江青感到奇怪。对于林彪当“选定的接班人”，总理似乎也同意。但他反复强调，当主席“去见马克思时”（主席自己的话），应该由一批人——最理想的就是政治局常委会——管理国

家，实行集体领导。或许是因为当时还没有一个富有成效政治局常委会，周恩来才同意林彪为接班人。

在林彪策划制订《571工程纪要》前几年流传的有关林彪企图策划反对主席的军事政变的非官方消息，是以下述看法为基础的，即他与苏联的关系比他的同事（或实际上是主席）所了解的要更密切得多。他从前的一位助手告诉我：“林彪实质上是斯大林主义者。”还说他肯定已为苏联干了好几年了。当时我指出，身为国防部长的林彪，每到一处都被保卫人员簇拥着，因此实际上不可能干任何秘密勾当。对此，这位官员解答说：金·菲尔比（Kim Philby）和唐纳德·麦克林（Donald Maclean）都分别是在被怀疑并受到监视的情况下在英美两国取得成功的。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相信，林彪及其少数同党与俄国人的勾搭由来已久，但官方消息仍坚持说，只是在他妄图谋杀主席——即1971年9月——的前几个月、最多是一年，林彪才投靠莫斯科成为叛徒。然而，林彪曾在苏联住过三年半，并于1943年底或1944年初再次从延安去苏联访问。鉴于这些情况，人们怀疑他在赴苏访问之前，就在重庆与苏联代表接过头。周总理与林彪的紧张关系始于重庆。1942年10月，林彪应蒋介石之邀去重庆参加国共两党军事合作共同抗日的特别会议，而此前周已是共产党方面驻重庆的代表，两人在那里相处9个月。1943年晚春季节，林彪返回延安，就整编共产党军事力量进行商议。此后不久，他重访莫斯科。

1969年6月，北京出现了作为林彪正式传记的小册子，吹捧这位已被正式确认的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说他参加过苏联的卫国战争。不少人知道，林彪在1941年9月参加了列宁格勒保卫战。当时他虽伤未痊愈，但战绩显赫，受到了斯大林的高度赞扬。在苏联的所见所闻以及与其上层人物的重要交往，对于年仅三十一岁的林彪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会讲一口流利的俄语，能

看俄文并用俄语写作，这一点在传记中没有提到。

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林彪传记共有三个版本，其中两个是中国人写的，一个是俄国人所写。在上面提到的那本传记中，林彪被写成一位乡村穷苦农民的儿子，祖籍在武汉以东、长江北岸的一个小村落。而林彪出事以后，又有消息说，他父亲是个富裕而有权势的地主或军阀，曾执意按儒教传统培养林彪。事实上，林的父亲是“小业主”，经营着一家小手工艺厂，后来破产了。随后他又到长江某轮船上任事务长。林的父亲曾经去过苏联，但不知他此行是由于崇敬俄国革命，还是去卖手工艺品。

确切无疑的是，林彪从苏联返回延安的时候，整个延安城都笼罩着内部整风的气氛，而且毛泽东对当时在武器装备上仍依赖其供应的苏联常有不满意之词。这些都使年轻的林彪无法吹嘘他对苏联军队和苏式共产主义的崇拜。

从1947年到1948年，林彪率部在东北与国民党作战时，就与许多苏联人又有接触或重温了与苏联人的友好关系，如今中国的一些非官方评论都这样认为。中国人不讳言当时他们与苏联有密切协作。当时的林彪是一位既有名气又很卓越的指挥官，他的部队先是叫做东北人民解放军，后改为第四野战军。另外，在政治角色方面，他曾担任过中共东北局书记，后来，他被调到南方，由高岗接替他掌管东北。前面曾提过，高岗因与外国人来往过密而被清洗。林彪与高岗私交甚深，他因此被降职，并一度丢掉了政治局委员的资格。除此之外，怕再没有别的原因。从朝鲜战争爆发到1956年，林彪不是有病就是因为对被逐出政治局感到不满而情绪低落。北京有一派评论者深信，就在这期间，林彪又一次重新建立了与莫斯科之间重要而直接的联系。当时，出乎众人意料，林彪没有率第四野战军赴朝作战。相反，据唐纳德·克莱因（Donald Klein）和安妮·克拉克（Anne Clark）合著的那本较为成功的林彪传记上记载，他接受了新任命，担任中南军政委员

会主席。对于处于战时的军事指挥官，这个任命显然不合时宜。不过那时他正患肺结核病，而且因高岗而受到牵连。1955年4月再次被选入政治局后，1956年9月，林彪出席了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他五年来首次公开露面。不过，1957年4月，林彪确实与苏联军事领导人克·伊·伏罗希洛夫会晤过。这期间，也有不少关于他的谣传，说他身体不好，说他与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总理之间发生了争执，但分歧的主要原因没有透露，只不过是围绕着高岗以及林彪本人现已被人所知的讨厌的个人生活习惯这些话题。

林彪任国防部长以后，制定了所谓真正的情报行动计划以利于获取苏联军事情报和开展心理战，改善边境关系。50年代后期，边境常常发生严重冲突事件，有时一周之内竟达20起之多。据推测，林彪与苏联的交往都是在漂亮外衣的掩盖下进行的，而且林彪本人很容易否认这种联系。一些攻心战行动计划就是为了确保林彪与苏联军事力量的联系。他手下可能有一两个人专门负责与苏联的特殊联络，其联络方法既简便又安全，例如利用苏联驻京使馆等途径。

现在，一些评论毛泽东的人说，虽然主席完全知道林彪的历史，但却常常为林彪的吹捧“灌昏了头”。据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一位目击者说，林彪把主席奉若神明，肉麻地吹捧主席，想博得他的好感。他还说，当时许多干部都把毛泽东敬若“超人”，主席对此没有表示过反对。至于周总理，他仍然一如既往地尊敬毛主席，尤其是在一些正式场合，这种尊敬的态度就更为明显。而当他与主席单独在一起时，他们又象老朋友那样不拘客套。周恩来与刘少奇不同，他从来没有想过要在党和政府部门中树立一批政治上的追随者。总理知道，他可以依靠政府各部门的坚定支持（这是他唯一的权力基地），还可以依赖一大批经验丰富的军队老干部，特别是各大军区司令员。另外，据我的经验看来，总

—— — — — —

理当时不仅受到农村人民公社社员们的支持，而且广泛受到工业战线稳健派男女的敬重，他们都知道周总理提倡法纪，主张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少数中国人知道，这位从1949年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起就一直兢兢业业地为国操劳的总理也曾犯过错误：早在长征前的30年代初，由王明带领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受斯大林委派到中国向毛泽东推行莫斯科路线，作为一个回国留学生，周恩来曾对他们的方针计划表示同情。数年之后，周还提起过这件事，说他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后，立刻做了自我批评，从那之后，就再也没有偏离过毛泽东的方针、路线。事实的确如此。1935年1月在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标志着毛泽东战胜了他那些亲斯大林的对手们，从那时起，尽管周恩来在政治局或毛泽东的书房内偶尔也受到过批评，但他始终坚定不移地辅佐毛主席。

对于部分受“文化大革命”冲击破坏较小的领域，周总理曾设法削弱林彪及其军队对它们的控制。1968年下半年，随着秩序逐步恢复，在国家行政机构中的那些官员们又恢复了正常办公，工作效率亦逐渐提高，但非常缓慢。

虽然早在1958年2月总理就不再兼任外交部长，但实际上他对于国际事务仍给予极大的关注；尽管他仍然要处理大量有关国内决策的日常事务，中苏以及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一直是他关心的首要问题，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也是如此。大约在1968年，甚至更早些，总理把美国由中国的头号敌人降至第二位。也正是在这时，印度支那和北美的共产党力量都声称，有希望可以尽快结束越南战争。尽管总理善用外交辞令，但他身边的工作人员都了解，在生活中，他是非常讲究实际的。他很清楚，中国的力量难以同时与苏美两个大国抗衡。当美国武装力量对越南和远东的威胁逐渐减弱之时，苏联人却在边境制造了一系列骇人听闻的冲突事件。他们还沿中国东北边境修筑重要军事设施。这一地带，以

前称为满洲，后来由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的一部分形成一个大军区。

1967年10月，后来当选为美国总统的理查德·尼克松在《外交时事》上发表文章呼吁，中国应被纳入世界组织，并预言，与中国大陆直接对话已为期不远。这段话的译文被中国出的《参考消息》转载，引起周总理、甚至毛主席的注意，前者尤为高兴。（《参考消息》转载西方报刊上对中国的重要评论文章，包括友好的与不友好的，译文较粗糙，多在干部中发行，很少落入外国人手中。《参考消息》1973年的发行量约为300万份，到1977年增至600万份。）

因此，周总理和尼克松总统几乎同时开始转变态度，向对方靠近。总理耐心地期待着这位新总统在白宫安排就绪之后，能提出恢复两国驻华沙大使会谈的建议，这是当时中美两国唯一能够接受的联络途径。然而，恢复会谈是在1970年1月，其间中断联系两年。

作为国防部长，林彪自然明白苏联在边境修筑工事的详细情况。当时有人认为，苏联比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威胁更大。令人奇怪的是，这位大半生都以反修姿态出现的林彪，竟然反对这种提法。由于苏联在边境上搞庞大工事，周总理一再提醒部队政委们注意，莫斯科有可能从内部攻克堡垒。事实上，莫斯科的确发动了一场颇为成功的宣传运动，靠近边境的部分军队士兵以及农村社员偷听过苏联电台。更有甚者，不少亲苏的中国军官也影响着他们的下属部队。

陈伯达抛出了一系列精心炮制的文章，中心议题是想说明，对于中国来说，拥有洲际弹道导弹和核潜艇的“帝国主义者”比苏联具有更大的威胁，因为后者只有刚建立不久的核兵工厂。有些人认为，就是在这期间，莫斯科想同林彪进行高层次秘密交往。那时，他仿佛很快就会取代毛泽东成为中国全权领导人。正如林

彪身边的工作人员所说，俄国人没有遭到拒绝，由于林彪此时对主席又恨又怕，对苏联修正主义分子反而觉得亲近。一位老干部告诉我，林彪与莫斯科之间的“超级秘密”勾结最晚始于1959年，而且很快就发展成一种亲密的关系。

周恩来总理明察秋毫而又机智练达，他很可能对林彪与苏联的勾结早有怀疑。无论如何，他都能不断从他的老朋友、前总参谋长叶剑英（后来任国防部长）和部队其他可靠人士那里得到确切消息。其中一次是他们注意到，陈伯达曾到一些部队机关视察，借此机会纠集在政治上对他和林彪的支持。“文化大革命”后期，陈伯达感到自己虽然仍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职务，但实际上却缺乏自己的权力基础。另外，由于他在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时，曾支持过“5.16”极左分子，所以他很可能受到批评。实际上，他的同党们许多已被免职。

江青也理应受到同样的指责，但一方面由于她先于陈伯达撤回了对极端派组织的支持，另一方面，主席夫人的身份也为她起了保护伞的作用。陈伯达或许是感到孤立才投靠了林彪和军队。但是在此之后，至少在他和林彪勾结的初期，毛主席对他仍采取保护态度。毛泽东喜欢这个“秀才”，感激他在延安窑洞里的那9年中将自己的政治哲学系统化了（那时，陈伯达是主席的政治秘书还兼任宣传部的负责人）。由于他对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著作了解较多，主席的不少文章都经他“润色”。而且惟独只有他才是毛主席两次去莫斯科访问时都陪同前往的人。在很大程度上，陈伯达之于毛泽东，就象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哈里·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之于罗斯福总统或伊斯梅（Isma）之于邱吉尔那样。可惜的是，陈伯达不愿终生为毛泽东的政治权力作嫁，而想独揽党和国家的大权。

尽管陈伯达与林彪密切勾结，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始终支持了极左路线，主席仍然把他当作自己最亲近的政治顾问。只是

后来在是否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他们之间产生了严重分歧，致使关系彻底决裂。在毛泽东气愤地拒绝了陈伯达在林彪的授意下为毛准备的“九大”发言稿之后不久，先是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知道了陈伯达关于设国家主席的提议，后来一两位政治局委员也知道了这个提议。当然，陈伯达提议，增设的国家元首职务只能由毛泽东兼任。但是，在主席看来，这是继刘少奇之后，又一个架空他的阴谋，想让他作“供在佛架上的如来佛”。因此，陈伯达重新修改了发言提纲，因为他知道，尽管当时他还是政治局常委，且在军队里有影响，是仅居毛、林、周之后的第四号人物，他还是深深感到自己已经失利。此后，虽然陈伯达已不再象从前那样可以轻易出入于主席的书房，林彪仍然为有这位能言善辩、阅历丰富的人站在自己一边而高兴。因为他发现，自己之所以缺乏政治市场，不仅是因为自己不善言谈，而且还因为自己在与人接触、交谈以及参加讨论时，常常不善交际。

林彪与周恩来总理之间秘密的小规模权力斗争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后期。在此期间，林彪认识到，只有在党和政府领导机构内部都获取到地位，他才能有把握超过总理。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夕，他被预定为——后来被确定为——毛泽东在党内的接班人。但是他注意到，在一些正式场合，总理通常位居他之前，所有重要外宾都由总理接见，很明显，总理在管理着整个国家。此外，周恩来不仅曾在苏联短期留学，而且曾留学于法国、英国和德国，这使周占有很大优势。虽然他很少长篇大论地讲英语、法语、德语，但他时常用外宾的母语向他们致以问候，有时，还用他那地道的老式英语或法语纠正他的翻译。然而，在与来访的国家首脑或部长会谈时，林彪不仅缺乏这些语言技能——他只会俄语——还缺少风度（由于他的那些常被人提到的个人习惯），所以在接待重要来宾时，中国人不愿让他处于引人注目的地位。毫无疑问，林彪还妒忌总理的名望。

林彪伙同陈伯达再次策划让毛泽东当国家主席，尽管毛曾做过重要讲话，谈了刘少奇曾想使他成为有名无实的领袖的事。林彪确实曾以为，凭着他每次见面都对毛主席不厌其烦地恭维，他将最终说服主席同意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出任国家元首。林彪当时估计，党的“九大”之后，很快就会召开四届人大，到那时，林的同伙就会提出让他任国家副主席，以确立他的绝对领导地位。一旦毛泽东去世，他将让周总理靠边站。

在党的“九大”筹备过程中，陈伯达失去了政治市场，他惶恐不安而又执迷不悟。他又策划训练教导队，准备将这些教导队员安插在林彪不信任的几个大军区司令部内。周总理曾告诫军队，要警惕敌人从内部攻破堡垒。从1968年到1969年期间，林陈一伙以周总理的话为借口，训练了数以万计的教导队员，准备秘密执行上述任务。教导队的活动在当时没有立刻引起政界的怀疑。然而后来，军队的一些老将、周总理的知己好友向他汇报了教导队活动的详细情况，毛主席也得知了这些情况。

无论在大型宴会还是在党的会议上，陈伯达总是想方设法在总参谋部成员中了解情况，试图搞清他们究竟站在哪一边，谁能坚定不移地跟林彪走。当时驻在北京的西方外交官、少数记者和一般外国人士，对于林彪与周总理之间的对抗和林彪与几个大军区司令员的紧张关系，毫无察觉。然而华沙条约国家对此却很清楚。

在党的“九大”会议期间，陈伯达不大引人注目，或许与毛主席对他的讲话提纲不满意有关。此时，林彪和陈伯达都再次被选入政治局常务委员会，陈在党内仍居第四位，处境正在好转，一切如愿以偿，因此他也就不必再轻举妄动了。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呈现出团结的景象，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一个月前在海参威以北、乌苏里江的珍宝岛上发生的边境冲突事件。这一地区人烟稀少，据中国人讲，是属于他们的领土（一些苏联地图也证明

这一点），但苏联士兵侵占了这个岛屿。这次袭击，造成数百名中国士兵阵亡，也使“九大”代表中出现了团结的气氛，有助于林彪在无反对意见的情况下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现在，许多观察家们认为，对于苏联的这次袭击，林彪事先知道，甚至说，是他串通莫斯科搞的阴谋。

林彪暂时得势

“九大”会议闭幕不久，林彪就察觉到一股不可言状的强大势力正在增长。这股势力是冲着他、陈伯达以及他在军队中的一伙人而来的。当时，北京召集人大各委员会开会，就即将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有关事宜进行商议，准备颁布一部新宪法（人民代表大会通常被称为中国的橡皮图章议会）。

前面讲过，在设国家主席问题上，林彪已几次碰壁。但令人费解的是，他仍四处活动，给中央委员和高级干部吹风，提出必须设国家主席，由毛泽东担任。而陈伯达则按他的吩咐到处游说，说林彪既然是毛主席“选定的接班人”，就理应被选为国家副主席。但毛泽东一再重申，他不当国家主席（国家主席有一定实权，但还需做大量的礼节性应酬）。当林彪看到毛泽东本人对当国家主席的确不感兴趣时，他曾一度跃跃欲试，但这种不识时务的想法，遭到他的同伙与家人的劝阻，他们认为，这样可能会惊动周恩来和国务院，其中一位较高明的同伙指出，当国家主席还可能使林陷入“当政不当权，象英国女王那样”。

对于毛泽东的观点，陈伯达比政治局的其他委员更清楚。尽管如此，1970年8月在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上，陈还是再次跳出来，建议任命毛泽东为国家主席，这使与会的中央委员颇为惊愕。陈伯达在他那似乎是临时准备的发言中，以歌颂毛泽东为

幌子，让大家一致推选毛泽东为国家主席。他的讲话无人响应，因为在座的几乎都知道，主席对此事曾多次表示过自己的态度。另外，大家心里也明白，如果毛泽东当国家主席，那么国家副主席则非林彪莫属，而林彪的威信正在明显下降。（我前面提到过，林彪身上有股特殊的味道，他还有一些奇怪的生活习惯，譬如，极怕见阳光，他身边的人最讨厌的是他特别不愿上厕所。）

农民出身的中共河南省委书记纪登奎，不知内情，所以表示赞同陈伯达的提议。但没等大家讨论，毛泽东很快否决了这项提议。这次，陈伯达与林彪密切配合，并按他的旨意行事，再次提出设国家主席。此后，他虽官职照旧，但已受到审查。由于他表现得太露骨，以至于后来他的自由也受到限制，从此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不久，出乎陈的意料，开展了对陈的全面批判。这次很可能是由周总理发起的，因为周有他的战友们、大军区司令员以及总参谋部在京的“长征老干部”的坚定支持。由于陈伯达手中掌握着林彪亲笔书写的材料，林彪没有批判陈伯达，这是许多人没有料到的。然而无论如何总参谋部的人都明白，这两人是串通一气的。林彪很自私，他从自利的立场出发，认为这次事件对自己极为不利，因为，它使周恩来对林彪的活动更加警觉，而这些活动甚至在当时就已被那些传播反林小道消息的军队司令员称为“颠覆破坏活动”。

从1970年10月起，陈伯达就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但他垮台的消息一年多之后才公布于众。林的同伙告诫林彪，如果不立即改变策略，他也会遭殃。因此，在拿到那些对他不利的材料以后，林彪看风使舵，开始抨击他从前的这位同伙。实际上林彪当时的作法是呼吁军队批判这位实为大野心家的“小小老百姓”——在“文化大革命”的一次集会上，陈伯达自称为“小小老百姓”。

林彪此时一定焦虑不安，因为他的数以百计的同伙都由于同陈伯达有勾结正在做自我批评。他很清楚，自己这棵树正面临着

倒落的危险。但是，他仍竭力保持一副泰然自若的姿态。在华的外国人士注意到，大约从这时起，附有林彪前言的毛泽东的小红书，在一些大书店柜台上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和毛主席的四卷著作。在陈伯达下台的一个月前，毛泽东写了一封《给全党的一封信》，号召全党批判陈伯达，“纠正他们的工作作风”。接着，主席发动了一场“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报刊上也大加宣传，配合立场教育，强调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

庐山会议之后，党的领导集团对于主席提的“两个司令部的斗争”的真正含意自然是更清楚了。这种斗争不仅反映在国内政策上，也体现在外交政策中。林彪公开迫不及待地要改善同莫斯科的关系，而周总理则愈加关注对华盛顿的缓和试探作出反应。总理认为，同时与两个超级大国关系紧张，在政治上是很危险的，因此，中国必须努力改善与其中一个超级大国——美国——的关系。此外，周总理通过会见苏联总理柯西金，感觉到同莫斯科改善关系的可能性很小。那次会见极不愉快，那是在1969年9月，柯西金去河内参加胡志明的葬礼，回国途中在北京机场作短暂停留与周恩来会晤。对于在外交上机智练达的周总理来说，这次会晤竟会如此不愉快，实在让人费解。但柯西金那次确实是盛气凌人，讲话总带着挑衅的语气，对中国领导人没有事先邀他到北京小住恼羞成怒，口口声声威胁总理说，苏联的军事力量可以“把中国炸回到石器时代”。如果说这次会谈还有点成效的话，那就是恢复了双方边境谈判，尽管谈判时断时续拖了几年，并没有解决实际问题，但毕竟缓和了这两个共产党国家之间的紧张局势。

由于上述原因，尽管有林彪极力反对，周总理还是在主席的大力支持下对华盛顿于元月和2月期间的试探作出相应姿态，恢复了在华沙的中美大使间的会谈，就建立外交关系进行磋商。会谈进展顺利，已有迹象表明，中国人欲向尼克松总统发出访华邀

请。而恰在此时，美国从越南南部入侵柬埔寨，使会谈突然中断。此后的一个时期，毛泽东几乎认定林彪的观点值得考虑，他又开始称美国为帝国主义。然而在此之前，主席已邀请了他在革命根据地延安时的老朋友、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访问北京。主席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斯诺，并邀请他参加国庆观礼。在天安门城楼上，斯诺极为荣幸地站在毛主席身边。一个“大眼睛洋鬼子”出现在共产党领袖之中，这还是第一次。它无疑是对美国人民表示友好，向国内人民预示将要发生的变化，也为转变外交政策奠定了基础，对周总理开展工作十分有利。

斯诺的出现使林彪一伙极为不安。他们在军队内开展了一场新的政治教育，灌输宁与不友好的社会主义国家改善外交关系，也绝不与表示友好的帝国主义国家讲和。此时，埃德加·斯诺已返回美国，将中国人民的友好愿望和访华邀请带给了尼克松总统，尼克松立即作出反应，首次称中国为“人民共和国”。从1949年起，毛泽东很少研究国际事务，但他当时显然抓住了全球势力均衡的要旨。他意识到，当1969年^①彻底脱离苏联时，没有同美国建立哪怕是最基本的外交关系，实在是他的一大失策。然而，毛泽东却完全没有看到对外贸易对于迅速繁荣经济所具有的重要性，而且对日本在整个亚洲的新作用毫无准备。在延安时期，他曾相信——或者是梦想——殖民主义的结束将很快导致全球范围的第二次社会主义革命，一个统一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世界将取代垂死的帝国主义势力。“文化大革命”又把毛泽东与外部世界隔绝了。但尽管如此，除了极少数例外情况，他还是基本采纳了周总理的建议，理解到同苏联在西欧的对手们以及美国建立友好关系的重要性。

在国内事务中，毛泽东有一种基本的现实主义观点，认为要

^① 原文时间如此，疑是1959年之误。——译者注

打倒反对派需要一个一个来。这一观点使他在这年的深秋开始认真考虑，重新估量他个人在党和国家以及军队中的影响。这年年底，在周总理的大力协助下，他开始采取谨慎措施，清除中央军委和北京军区内的一些效忠林彪的高级军官，以逐步瓦解林彪的权力基础。

1970年12月，毛主席召集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即后来所说的“华北会议”。会议在北戴河举行，这里是海滨胜地，夏季常有许多外交人员和记者来此旅游。会上毛首先提出要被称为“五员主将”的那五位领导成员——众所周知，他们是支持陈伯达的——站出来公开批判他们从前的同伙。按军内职务排列，这五位分别是：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副总参谋长兼空军司令吴法宪、林彪的老婆（也是林彪办公室主任）叶群、副总参谋长兼海军第一政委李作鹏、副总参谋长兼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主席坚持让这“五员主将”当众批陈，这无疑是公开了他与其“选定的接班人”之间在党、政、军内日益加深的矛盾斗争。在许多中央委员看来，甚至在当时，他们的关系已无法调和了。

1971年1月初，毛泽东以军委主席的身份，将三十八军调离首都，这使当时正在养病的林彪惊恐不安。三十八军是他几年前煞费苦心安插到北京的，司令员郑维山是他的亲信。^①这次行动事先没同他商量。由于他和毛泽东的关系出现危机和转折，林彪感到，通过正常渠道接班已不可能，何况，正常接班还需等一段时间，而在这期间，他很有可能死在主席之前。同时，林也已意识到，他身为国防部长和“选定的接班人”的日子屈指可数，而他却无力改变这种局面，使自己免受贬黜和清洗。对于中国领导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外交人员略知一二，“内部人士”也察觉到有“两个司令部”，但广大老百姓对于他们敬爱的主席与他的“接

^① 有关郑维山的这种说法不确。——校者注

班人”之间出现的问题却仍然一无所知。

为了应付可能出现的情况，林彪和军内的间党在海军基地重新组建教导队并恢复了活动。在中国当时那种动乱时期，指挥员完全可以以冠冕堂皇的理由来掩盖他们那不可告人的目的。周总理将这一情况汇报了主席，毛泽东洞察其奸，立即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把民兵武装起来，进行训练（当时民兵数量约500万），由遍及全国的各级革命委员会领导。到当时为止，几乎所有的农村公社和工厂都成立了革委会。当然，民兵的教练员都来自部队，因而军队对民兵仍具有很大的影响。

这一阶段，林彪身体不好，情绪也低落。他开始筹划他以往朝思暮想的军事政变以除掉主席。自陈伯达在“文革”后期卷入极左路线后，林彪与江青的关系就出现了裂痕。他确信，毛泽东把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张春桥作为未来国防部长的人选，是江青从中起的作用。在密谋政变的过程中，林彪慑于毛主席的崇高威望，也不时地感到有点心虚。但他觉得自己正处于“你死我活”的形势下，别无其它选择。

林彪暂离国防部，在北京几乎没有引起舆论界的什么关注，因为“文化革命”后期他经常连续几个月不上班，况且这次他也的确有病。从毛泽东方面来说，他对林彪一伙迫不及待地跳出来感到很气愤。早在他们企图政变之前，毛就常说：“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分裂党，篡权。”每当中央或政治局召开会议之前，林彪总是象伦敦的上议院、巴黎的下议院、华盛顿的国会中一些议员那样，暗地里搞拉拢活动。因此，毛泽东敦促全党干部“要光明正大”而不要象林彪在庐山会议上那样“搞阴谋诡计”。毛泽东质问道：“为什么他们（在庐山）不敢公开站出来？”显然，庐山会议使主席警觉到，一场新的、严峻的“两条路线斗争”（或称为两个司令部之间的斗争）已拉开帷幕，林彪将与毛以往在原则问题上的劲敌陈独秀、王明、张国焘、彭德怀、刘少奇列在

一起。但毛泽东仍然相信——至少口头上表示相信——可以平心静气地解决这个问题，这一点与林彪形成鲜明对照。

政变计划是林彪与他在军内的亲信同党们共同商议的，而在此之前，他先同其妻一起罗列了毛泽东的几条“缺点”，以诋毁他在人们心目中“几乎不可抗拒的魅力”。在秘密记录上留下了他们列举的五条毛泽东的“罪状”：

1. 林指责毛把国民经济搞得一团糟，因为他的助手“腐败、昏庸、无能”。这里没有点名，但显而易见，他是指周恩来总理。除林彪之外，还从没有其他人指责说周腐败。
2. 外交政策上瞎指挥，脱离“光明的社会主义苏联”，而靠近“华盛顿腐朽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林彪写道：“中苏之间的冲突使苏联处境艰难。”这里又是不点名地指责周总理。
3. 毛“周期性地整干部”的政策，对党和国家都产生了破坏性的影响，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更是如此。
4. 林把毛泽东有关阶级斗争和继续革命的理论说成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教条的翻版。林讨厌他称为“走马灯式”的接连不断的政治斗争。他指责毛搞“社会法西斯主义”，而“残酷镇压”（林彪这里指政治斗争）是毛泽东国家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林已经看到，他就是毛泽东“残酷镇压”的下一个目标和牺牲品。
5. 林彪讨厌毛泽东的独断专行，一人说了算。虽然他曾经一直在竭力制造和树立个人崇拜，把主席吹捧为“天才”，但他内心里对毛泽东的权力既恨又怕，因为这种权力使毛泽东“仅仅一句话便可以使一位部长或党的高级干部下台”。

详细讨论了各种计划之后，林彪和叶群离开了他们在北戴河的避暑别墅（宅里装有防弹电控百叶窗），来到旅游胜地苏州这座被称为“东方威尼斯”的温暖小城。与此同时，他们的儿子赶

到上海，从安全可靠的上海大型空军基地与林彪未来的死党秘密串联。

自然，毛泽东对于他的这位国防部长的这些所作所为一无所知，他只是在北京与一些亲近的人士交换意见，批评林彪。主席反复强调，在庐山会议结束时，没有清算林彪的错误，这已经给了他“改正错误的机会”。会议闭幕时，主席还打破常规，没有就大家发表的意见评论谁是谁非。主席只是问道：“对于这些人我们怎么办？”又说，最好采取“教育的方法”，因为“我们对林还是要保”。主席甚至还说，他要“找他们来好好谈谈，如果他们不来找我，我可以去找他们”。然而，他确实也表情严肃地说过：“他们中一部分是可以挽救的，一部分不行，我们必须观察他们的行动。”

在林彪与其阴谋同伙们密谋商议之前，他的儿子和一两个同党已一起草拟了许多——至少20个——在政变时可能使用的方案。林的儿子还用代号给这类方案起了名字，包括政变计划“571工程”本身，都是林的儿子定的名称，其中的“571”与中文的“武装起义”谐音。给主席起的代号是“B-52”，叶群为“子爵号”。从一开始，林彪就担心毛泽东会不打招呼就突然撤销他这个国防部长。政变流产之后，从发现的大量文件里以及参与政变者的供词中得到确凿的证据，1971年2月至3月间，他们才真正开始周密地计划政变的具体细节，而在这之前的几个月中，林彪暗地里一直在同他的死党亲信讨论军事政变的可能性。

林彪的主要目的仍是将年迈的主席树为毫无实权的挂名领袖，这样他们就能借人民群众对领袖的盲目崇拜，捞取政治资本。不过，从一开始，林彪也做了周密的策划，准备谋杀主席或其他强烈反对他政变的人。

林的一个政变纪要开门见山地指出当时政治斗争局势对毛主席有利，并且强调，他们必须用“暴力革命政变制止反革命和平

演变……，否则，如果我们不能用‘571工程’去制止这种和平演变，谁知道会有多少人头落地？”在大致概括他们一帮阴谋团伙的力量时，《纪要》写道：“经过几年的准备，我们在组织上、在思想上、在军事上的水平有相当提高，具有一定的思想和物质基础，……我们的力量正在全国范围内日益形成、发展、兴旺起来……我们‘舰队’（这是林彪对他的武装力量起的代号）在中国未来的政治革命中将采取什么态度呢？”没有给出答案。这份《纪要》接着说，与俄国“十月革命”相比，林彪目前的力量不小。它还强调，“让空军照‘571工程’在全国夺取政权，比各军区分而治之要容易得多。”

《纪要》的第二部分第一句话就是：“B—52不会高兴太久了，几年内他必然急于安排自己的后事，……他是我们的心头之患。”接着，它称当政的领导人为“托洛茨基集团”，说从历史意义上讲，毛泽东是在开倒车，说实际上“他已成为当代的秦始皇”（即秦朝第一个皇帝，公元前221—公元前209年在皇帝位，是一个野心勃勃、凶狠残暴的人）。

《纪要》第三部分写道，“独裁者（毛）正日益众叛亲离”，局势“不稳”，“搏斗已进入最后时刻”，它指出，军队“受压”，“文化大革命”中挨整的干部“敢怒不敢言”，“农民缺吃少穿”，还说，“红卫兵上当受骗，先是被用作炮灰，后期受压制，当了替罪羊”。他们甚至出人意料地攻击如前面所述由毛主席提倡、而实际上是林彪发起创办的“五·七干校”。关于外交政策，文中说，“中苏冲突导致国内外矛盾激化”。然后，《纪要》上开始谈“困难”，承认“我们的力量还不够”，强调“群众对于B—52的盲目崇拜还很深”。阴谋者们还认为，“B—52深居简出，行动诡秘，且又戒备森严，”这给他们的行动增加了难度。在“时机”标题下，林写道：“现在，敌我双方正骑虎难下，……这是一场生死搏斗——不是我们吃掉他们，就

是他们吃掉我们。”

关于政策和策略，《纪要》指出“有两个关键时刻”，一是，“我们做好充分准备要动手的时候”；二是，“当敌人要干掉我们使我们处于危急时刻，这时与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

“时机和办法”中写道，对付 B—52 及其在中央的追随者们，“我们应利用上层集会”将他们一网打尽。“先斩断爪牙，待生米做成熟饭，迫使 B—52 投降。”

《纪要》还列举了要使用的特种手段，诸如毒气、细菌武器、轰炸、“五三四”（一种导弹的代号，这种武器还鲜为人知）、车祸、暗杀、投毒、绑架以及城市游击小分队等。其中的许多内容听起来极幼稚，我听说，这是林彪之子借此向他的同伙显示自己对秘密武器的一知半解知识的典型方式。

林的基本力量与潜在力量

《纪要》中提到苏联，“国外，苏联（秘密交易）”，“用苏联力量对付国内外各种力量”。还排列了林彪的军事力量：北京、上海、广州的“联合舰队”、南京的空四军（王维国任政委）、浙江的空五军（陈励耘任政委）、南京军区空军（江腾蛟任政委），上面为林彪的骨干力量；还有第九师、第二十一师、第三十四师、第二十一坦克团以及民航。

《纪要》的第五部分提出了一些经过讨论的向群众宣传的标语口号，“571 工程”号召军队指挥员“团结起来，推翻 B—52 的封建王朝”，强调林彪希望国富民强，而不是国富民穷。有一个段落里出现了露骨的俄国人提倡的口号，“发展中国家的马列主义者团结起来”。呼吁中国人民“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取代 B—52 的社会法西斯主义”。文中还写道，“要确保各公使馆工

作人员的人身安全。”这里是指华沙条约国。此外还有下列口号，要求“工人、农民、干部以及各行各业的工作人员”，要坚守岗位，维护社会秩序。他们还就计划的各方面对同党们进行了安排，包括地面部队的训练、物资供给（包括分配或自制武器）、车辆控制、仓库的设置（为专门进口的苏联设备）、弹药库和情报机构的设置。

《纪要》中体现了林彪“先抓首要分子”的宗旨，强调“必须逮捕张春桥”。当时的总口号是，“巩固我们的战线”，“尽力控制上海，控制广播电台、电报局，切断一切与外界的联系，……占领南京，修筑坚固的防御工事，守住浙江、江西，掌握伞兵部队和空运部队。”《纪要》接着写了“‘571工程’的内容，属特级绝密”，并强调“失职、动摇和背叛者将受到严厉制裁”。纪要中还加进了对 B—52 的人身攻击，说他“用甜言密语蛊惑人心，时而又捏造罪名置人于死地。”“今日是他的座上宾，明日将成他的阶下囚。”而林彪自己也指示同伙，要把犯人作为替罪羊，让他们——或逼迫他们——提供伪证，陷害那些妨碍他（林彪）的人。

林彪一伙很担心，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是主席和周总理的忠诚卫士，他很可能会出来干预。在局外人眼里，仿佛有不少人，包括那些正在奉命训练教导队、伞兵和特种兵的一百多人，都知道这一正在酝酿中的政变。后来，在几个仓皇出逃的死党乘坐的直升飞机里发现了一部分文件，还在林彪办公室找到一些计划。这些材料都证实，林彪一伙希望象传统起义那样，以南方城市南京为根据地。《“571工程”纪要》杂乱无章，言词累赘，读起来象胡诌乱编的故事，只是后来，他们才又有了一些更为详细而具体的计划。

一位中国官员声称，林彪在政变前的一年（1970年）里，曾与某些俄国军官保持着断断续续而又无明显结果的秘密交涉，他还说，

那些有关政变的详细计划是在1971年初与苏联串通共同商定的。但据专家们分析，林彪素来狡诈，甚至对俄国人，他也不会透露自己最拿手的计划。“571工程”计划经一些俄国同谋者同意之后，1971年3月20日至3月24日，林的主要的死党亲信们在上海召开的一连串会议上见到了这项计划。

一些参与政变的谋划者对计划缺乏透明度表示不满，实际上他们是在抱怨。因为关于苏联的配合与支持的详情，林彪对他们秘而不宣。他们想知道苏联的武器装备到达的时间、武器存放的地点、以及苏联将选择秋季什么时间在中国北部边境采取局部军事行动。据一位还活着的林彪同党说，林彪自己也搞不清楚有几次，他极为担心，竟显得情绪异常。或许由于这些阴谋家会面的时间太仓促，尽管他们对计划中上述各点不甚了解，他们也还是赞同林彪的说法，认为俄国人将在晚上发起攻势，有了他们，大获全胜就有了保障。当然，实质上此刻，这些阴谋同伙中的任何人都已难下贼船。

林彪利令智昏，竟盘算着整治政治局及中央内所有忠实于毛泽东的人，剥夺他们的自由。这里特别包括周恩来以及与周配合默契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军队里的老干部；有备受主席宠爱的张春桥；还有江青和偏激派。至于林彪准备怎样在不采用监禁手段的情况下来剥夺这些国家重要领导人的自由，就无从知道了。起初，林彪曾谋划，借口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中央紧急会议，由他的部队包围会场，将他们拿下。由于“两个司令部”之说已经传开，且相互之间关系紧张，林彪怀疑，周恩来和其他人是否会参加这个由他召集的紧急会议。但假如他们全部参加会议，林彪当时必定有所打算。然而，对这些计划我们亦无法推测。此外，林彪还制定了一系列具体可行的计划：控制所有的宣传工具，利用群众对毛泽东的崇拜，附和他们的情绪和要求，用巧妙的宣传方式迷惑广大群众，使之跟他走。林彪在与其同党进行密谋的过程中，

不时谈到，他准备在北京组阁，继续控制一个统一的中国；一旦成立新政府，将与苏联建立友好关系。或许是出于对这个身心交病之人的同情而不愿伤他的心，同伙们顺从但很草率地商议了这一海市蜃楼式的计划。

苏联赞同第二号计划，这个计划在林彪看来更为实际也最有可能成功。由于某些人说不清的原因，当草草写成的《“571工程”纪要》于1971年2月在林的亲信死党中传阅后，又由林彪炮制了一些更为详细具体的计划。这些计划却没有以书面形式传递给他的同党。后来的这个计划上，写有关于特种兵部队的责任，他们与苏联的配合以及如何处治亲毛派领导人等等。二号计划受中国传统影响，要在南方发动政变，另立中央成立新政府，建都于南京。按林彪的计划，首先控制重要城市以及在上海、广州、武汉的空军基地。林彪声称：苏联已经同意，当他的部队及空军在南方与毛泽东的部队交锋时，俄国人将在东北发动攻势。据林彪讲，莫斯科早就有意对这个满洲工业区采取重大军事行动，他们在那里沿中苏边界屯集了大约14到16个师的兵力。

对于毛泽东来说，要同时对付两个战场，特别是与苏联交锋，即使不一败涂地，也极难取胜。因为苏联在边境驻扎着装备精良的陆军，海参威有他们的海军基地，在海军基地的东北方，还有他们装备高度现代化的空军基地。俄国人时常举行陆、海、空联合军事演习进行训练。林彪声称，他与苏联已达成秘密协议，苏联将为他的政变及新政权提供最先进的通讯系统和监听设备，还有定时炸弹、火箭炮弹和一些微型武器，这些尤其适合于搞暗杀。但同党中那些老练的指挥员和政客们无疑明白，莫斯科不会投入大批力量与毛泽东抗衡，因为绝大多数中国人仍将他奉若神明。

第三号计划是，假如政变失败，则由林彪带所有主要参与人员逃往苏联。据推测，他们会在苏联煽动国内起义，推翻人民共和国。此外，据林彪讲，莫斯科答应过，将暂时把他们置于苏联核保护

伞之下。显然这个听起来不大可信。最后，林彪还是竭尽全力实施第二号计划。

林彪还向他的同党们透露，空军司令吴法宪已照他的意思，让林立果（林的儿子）全权指挥实施“571工程”计划。特别支队的领航员、通讯报务员已举行了效忠尽职宣誓，自然，他们也被列入“舰队”。春季，林彪亲信同党们多次窜到军事基地，极力想搞清楚究竟有多少力量是他们能调得动的。1971年3月的最后一天，林立果召集了一帮被他称为“联合舰队秘密骨干”的空军指挥员到上海，想建立指挥部，确保政变顺利进行（这一点是经官方证实，并在1980年11月至1981年1月期间举行的“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审判”中予以报道的）。他们商定了如何分配秘密库存的苏联高级通讯设备，还公开了弹药库的位置。

周总理当时无疑会猜到有一场秘密的政治活动正在进行，但他肯定不知道这场包括空军司令、海军高级军官甚至总参谋长在内的重大政变阴谋。

5月份，林彪感到身体明显好转，就到北京去“透透风”。这次他发现，周总理对他更加冷淡。一向与他一唱一和的江青以及一些亲毛的政治局委员也是如此。6月份，林彪和毛泽东一起接见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这是他最后一次以主席“接班人”的身份公开露面。在与这位国家元首会见的过程中，两人显得颇不自然，而在此之前的多次接见活动中，虽然双方个人关系紧张，也看不出他们之间有什么嫌隙，这是因为长期以来他们的亲密友好曾被极力渲染。7月初，林彪发出通知，要到全国各重要军事基地视察战备状况。视察始于7月23日，显然，他是以视察为名，了解《“571工程”纪要》中提到的南方各军事基地的设施情况，为在南方搞军事政变作准备。但这在当时是无人知晓的。

一些仍然留在军内的长征老干部，周总理的挚友们，对林彪的政治活动产生怀疑。他们告诉了周恩来，总理立刻报告了主席。

于是主席亲自决定，到南方一些省市“巡视”。虽然主席已设法降低个人崇拜程度，但所到之处，仍被奉若神明。巡视从8月中旬开始，先到武汉。历史上，这里曾有过反对政府的起义。而且，如前所述，“文化大革命”中这里还发生过一些让毛泽东头痛的军事问题。在这里，毛主席与当地党政军领导谈话，阐述了庐山会议斗争的重要意义，公开批评了林彪、黄永胜（总参谋长）、吴法宪（空军司令）、叶群等人，并提到党的“十次路线斗争”。在此之前，公开提到的反对毛泽东和党中央方针的斗争只有九次，而刘少奇是其中第九次，也是最后一次。

主席去上海途中，还在长沙、南昌停留。这期间，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第一政委李作鹏等人将毛的批评传给了黄永胜，后者又报告了叶群。当时她正在北戴河林彪作为活动据点的住处，这是离北京最近的海滨胜地。她接到消息后，立即通过电话用暗语与分散在北京、上海、南京的同党交换意见，最后一致认为，危急时刻已经来临，必须在巡视途中把主席干掉，地点最好在上海或上海附近。9月8日，林彪写下了武装政变手令，当日，所有的主要参与者都见到了手令。

关于随后发生的事件，有两种不同的官方报道。1973年3月，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过不久，林彪阴谋首次被公开。有位中国高级官员对一群外国记者讲道：林的一个同党胁迫一位铁路机修师，在主席专列要经过的铁路线上，埋下定时炸弹。虽然这位机械师忠于他的亲林上司，但他还是胆战心惊，埋上炸弹以后，他越想越怕，就将此事透露给他的妻子。这个女人很有主见，她立即携丈夫向当地党的领导报告，这位领导给北京总理办公室打了电话。总理迅速采取了措施。火车还没到危险地点就停下了，主席乘小汽车安全返回北京。

第二种说法，即现在被认为确切的一种说法，是在审判“四人帮”之前约一年左右逐渐透露给外国来访者的。按这种说法，

负责与上海、广州、南京、杭州政变领导人之间的联络工作的江腾蛟，指挥了暗杀毛主席的行动。根据他后来的交待和审讯中的供词，他当时的计划很象“571工程”里的行动方案，简直是异想天开，难以实现。计划的后一部分还有些实际成份，他准备用火焰喷射器和四零火箭筒打火车或用一百毫米口径的改装高射炮平射火车。最后一个方案是，林彪一个同党趁毛主席接见时，在专列上用手枪射击，杀害主席。这些计划听起来还比较实际。此外他们还计划，“在苏州附近炸铁路桥”，“在专列驶进上海虹桥机场时，炸附近的小油库，接着趁混乱之际暗杀毛主席”。

9月10日晚，专列从杭州到达上海。据后来讲，当时林彪的死党以为主席会在上海停几天，因此认为他们有足够的的时间。而实际上，火车停在铁路侧线上，主席只是在车厢里睡了一夜，次日上午便返回北京，于当日晚安全抵京。

对于这次阴谋的破产，没有公开和确切的阐述。只知道在此两天之前，林彪用红笔在一张白纸上写下了立即按“571工程”行动的手令，发动政变的密令被叶群装在写给黄永胜的专用信封里，由林立果亲手交给总参谋长黄永胜。当时，林立果乘专机从北戴河飞往北京，身上带着一大批供执行命令用的机密文件和指令。在国防部办公的总参谋长黄永胜被委以重任，负责全面指挥政变。一位年迈的中国高级官员告诉我，林彪发布了立即行动的命令后，下属们在这最后的关头，由于恐惧而显得惊慌失措，这使他大失所望。以往有几次，主席已完全处在他们掌握之中，而奉林之命杀害毛泽东的人往往因临阵手软而失败。见过林彪的人都说，他一副病态，还有不少人说他神经过敏，反复无常。

暗杀计划破产后，政变的主要参与者本应按计划立即飞往上海或南京，另立“南方王国”（这是后来毛主席这样称呼林彪企图建立的新政权），但林彪的女儿林豆豆向周总理报告了情况，至少是报告了他们想叛逃南方的消息。不过，有一位电话接线员

却否认知道此事的过程，并向林彪报告，说周总理不知从哪里得知他已备好飞机要飞往南方。豆豆的情报使总理警觉起来，他发现离北戴河不远停着一架三叉戟，就打电话命令，要飞机立即返回北京，然而他得到的答复是，飞机是去参加训练的，已经出毛病，飞不走了。

北戴河附近的居民们对我讲，当时的气氛很紧张，外人一律不许进入那个区域。一辆老式的苏联装甲车轰轰响着来往于林家住宅与海军基地之间。当然，人们那时不可能知道正在发生的事变，只是感到，平日壁垒森严的林家司令部内活动频繁。据官方消息说，周总理曾给林彪打电话想了解情况，叶群却说他不在此。这之后总理取消了原定的会见日本国会访华团成员并在人民大会堂共进晚餐的安排，立即召集党政军内忠诚于毛的99名高级干部到人民大会堂开紧急会议，他们讨论了一个通宵。

大约深夜十点钟以后，林彪感到成功无望了。在北戴河看到过他的几个人说，林当时气急败坏，歇斯底里，他办公室的四部电话整个晚上都很繁忙。大约十一点钟或再晚一点儿，林彪才决定改变南逃计划。此时，林彪竟荒唐地下令他在广州的同党利用广播电台传播一则消息，说“软禁”中的刘少奇出逃了，可能正逃往香港或东京，并说中国政府对此深感不安。无疑，这条在当时让许多人信以为真的消息是为了转移视线，以利于林彪向苏联叛逃。

周总理此刻实际上已发布过命令，要256号三叉戟在未经他（周总理）和另外三名高级军官四人一起批准时，不得起飞。这架专机名义上是参加训练，实际是当初为林彪飞往南京准备的。但主管人李作鹏（他是林彪的同党）篡改了命令的内容。机场一片慌乱，一名警卫想阻止他们进入警戒地带，不知林彪还是他儿子朝警卫开枪射击。只是在给三叉戟加油，或者说加了一部分油之后，机场控制塔里的负责人才感到起飞的命令不对劲。林彪惊

慌失措，帽子也丢了，沿驾驶仓的小梯登上飞机。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辆卡车急驶而来横在跑道上，想阻止起飞。飞行员强行起飞，以致碰坏了机翼和起落架。

9月13日零点32分，飞机起飞后不到半小时，周恩来命令，关闭全国各机场，所有飞机一律停飞。林彪即将叛逃之前，曾给他在京的同党们打过电话，告诉他们政变失败，他准备去苏联，让他们以最快速度跟上。林的这一行为被一部分官员称为“仗义之举”。林彪的一位同党邱会作，销毁了林的房里与“571工程”有关的全部证据。大量的信件、会议记录、照片、笔记本、电报等都付之一炬，邻近的人注意到了烧东西时的浓烟。

凌晨2点30分，载着林彪一家三口（他、他的夫人和儿子）和另外六人的三叉戟在蒙古温都尔汗坠落，机上人员全被烧死。起初，蒙古人说，机上人员都不超过50岁，这下更增加了此事的神秘性。几天之后他们承认，那种讲法不确切。原定会见周总理后来被取消会见的日本代表团一位成员告诉我，听到中国所有机场飞机一律停飞的消息时，他感到莫名其妙。另据一位外交人员说，当时收音机里宣布，部队休假人员全部归队，10月1日国庆节，每年一度的阅兵式也被取消。此后，曾一度出现“不露声色的惊慌”，许多外交人员迷惑不解。所有飞机停飞达56小时之久。综合几家电台的监听结果，香港得出结论，林彪已身陷困境，处境不妙，但具体情况无人知道。一些中国问题观察家们，看到《中国画报》第十期封面上刊出林彪的照片，感到不可思议。显然，这是政变前印刷的。北京曾设法从书店里收回这期刊物。外国外交人员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终于得到有关政变的部分情节，因为一系列有关文件已被走漏到台湾（后来被证实是真实的），在那里广为传播。

有些西方著名学者和许多愤世疾俗的中国干部还曾有另一种说法，认为在蒙古机毁人亡的三叉戟上并没有林彪夫妇。70年代

中期还传说，林是被击毙的，但死亡的具体地点说法不一，牵涉面积之大，从北京直到北戴河。一些人曾千方百计想找到真凭实据，但都一无所获。在北戴河，我听过大约20多人对出事当晚的回忆，其中三、四个人还亲眼目睹了林彪朝飞机场方向逃窜。虽然那些当晚在山海关海军航空基地见到过林彪的战士，已分散到各地，但我还是碰到了其中的一位，他向我讲述了林彪叛逃时的情景，说林彪的帽子也掉了、惊恐万状等等。他的阐述与官方公布的消息只有很细微的不同，这仍然可以证实，林彪夫妇的确登机而去。

虽然几年前，北京就曾对外交官们讲过，在官方宴会上不要提及林彪，然而，1973年8月，当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官方终于披露这个未遂政变的详情细节时，仍然引得舆论界一片惊诧。因为无论如何，到1973年8月为止，林彪的公开身份仍是国防部长和接班人。接着，外交人员以及来访的代表团逐渐得到更多的细节。1977年在新疆乌鲁木齐，一位高级官员用了很长时间向一些外国记者（其中包括我）讲述了政变的全过程以及它可悲的下场。

在京的阴谋同伙成员收到林彪从山海关海军航空基地打来的电话，电话告诉他们“一切都完了”，要他们立即行动飞往苏联。紧接着，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周宇驰从他在通讯部队的亲信那里得知，周恩来对他们谋划的政变已有所察觉。周宇驰当时自然很恐慌，但他故作镇静，以空军高级军官的身份命令准备一架直升飞机，说是要执行紧急任务。

周宇驰立即与在起草《“571工程”纪要》中起了重要作用的李伟信、于新野通了电话。这两人早已做好了南逃上海会合林彪的准备。据在场的值班人员讲，三人冲向停机坪，每人都带着大批文件钻入机内。另有一位中国人告诉我，当时，他们不顾一切，不等发动机热到一定程度，也没带向北的飞行图，只是催逼

着飞行员赶快起飞。飞机强行起飞后，他们开始销毁证据，边撕文件边催飞行员加速飞行。当驾驶员提醒他们，需要加油才能飞到蒙古时，其中一人竟歇斯底里地威胁驾驶员，说如果不带他们安全出境就枪毙他。飞行员意识到这里面有问题，通过内部通讯联络系统，他已接到全国一律停飞的命令，担心飞机随时可能被战斗机击中。他在空中绕了个圈子又飞回北京。最后三名同党决定先将飞行员打死，然后开枪自杀。

直升飞机在北京以北的空军基地降落后，飞行员被按照事先的预谋打死了，只有李伟信没有自杀成，受了点轻伤，他被当场活捉。一位中国朋友还告诉我，李伟信从此以后“一直象小鸟一样不停地唱歌”。许多撕毁的文件被复原，作为后来对阴谋分子进行审讯的依据。

1980年11月至1981年1月期间，北京举行了“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审判”。从这里公布的官方消息中获悉，在林彪竭力推举毛泽东任国家主席遭到失败后，他开始谋划军事政变。1969年10月，林彪授意空军司令吴法宪将空军实际指挥权交给他的儿子林立果。因此，10月18日，吴法宪召集一些高级军官开会，将林立果介绍给他们，提出“空军的一切由立果同志指挥”。官方文件指出，“这样，吴法宪就非法地将空军置于林立果控制之下”。先是以“调查小组”的形式出现，后来逐渐演变为一个阴谋集团，他们常在司令部办公室内聚会。1970年10月，他们组成了“联合舰队”，成为林彪武装政变以及阴谋刺杀主席的骨干力量。1970年至1971年9月13日，林立果在一些政委和高级军官的协助下，加上地方部队和民航的配合，先后在北京、上海、广州建立他们的秘密据点。

“从1970年9月起，林彪加快了他武装政变的步伐。”1971年2月，他派林立果到上海，3月21日至24日，“联合舰队”的主要干将在上海拟定了《“571工程”纪要》。纪要对形势作了估

计，制定了初步行动计划，决定了标语与策略。他们还密谋寻求苏联的帮助以对付国内外力量，通过了南京、上海、杭州等地政变领导人的名单，还确定了一位联络人员。此外，他们还在广州组织了“战斗小分队”，队员们宣誓效忠林彪父子。大约一个月后，他们又在上海成立了教导队，为政变做准备。

这之后的几个月直到听到9月5日毛主席在长沙对领导干部讲话的内容为止，关于他们如何活动，没有官方报道。收到有关毛主席谈话的秘密通报，林彪和叶群就决定立即暗杀毛泽东。9月8日，林彪为武装政变写了手谕：“照立果同志、宇驰同志的吩咐办”。9月8日至11日；在空军学院和北京机场的秘密据点，所有同党都看到了林彪手令，他们密谋了暗杀毛主席的具体步骤，包括前面提过的不现实的计划。与此同时，林彪叶群为逃往广州、另立中央、投靠外国做了准备。

当林彪、叶群获悉暗杀毛主席的阴谋彻底破产后，他们曾计划带着主要亲信同党飞往广州，分裂国家，另立中央。他们还准备，万不得已时，他们将勾结苏联，南北夹击。他们为南逃备好了八架飞机，还在北戴河为林彪准备了一架专机。林彪听说周恩来总理打电话讯问那些飞机的事，全家便立即“到山海关机场，……，爬上飞机，不等副驾驶员、领航员和通讯报务员登机，就强行起飞。”这些都与我后来在现场听到的相吻合。

再谈外交政策

自从10月1日埃德加·斯诺惹人注目地与毛主席一起在天安门城楼上露面后，尽管在华沙、柬埔寨遭到一些挫折，周总理仍通过各国来访的外交使节用书信形式与华盛顿保持着非正式的联系。“乒乓外交”使那些在“文革”初期离开或被赶出中国的外

国记者再次得以返回中国，报道乒乓球赛事（那些比赛中，中国运动员打得极漂亮）。接着1971年7月，当世人都以为亨利·基辛格博士正在伊斯兰堡患急性胃痛的时候，他本人却在秘密访问北京。尽管他下榻北京市外，但周恩来总理还是几次与他同桌进餐；两人处得很融洽。几天后，基辛格带着周恩来请他转呈给总统的一份语气中肯的访华邀请书离开了北京。

基辛格的来访充分说明，周总理已成功地说服主席采纳了亲美外交政策。对于这次来访，林彪了解得很清楚。基辛格的访华和中国当时初步实行的对其他外国人的开放政策，使得一些外交人员不再将目光单单集中在中国国内的政治局势以及领导人之间的分歧上。一些消息灵通的驻华使馆人员都感觉到主席与林彪之间发生了问题，因为后者极少在京露面；但惟独阿尔巴尼亚大使知道，中国国内正在进行着一场重大政治斗争。当时阿尔巴尼亚与中国在关系上的紧密程度超过其它任何国家，这位大使知道的甚至比在京工作的中国高级官员或高级军官所知道的还要多得多。

林彪叛逃苏联、三叉戟坠落、机毁人亡之后没几天，北京的外交部就宣布，说那个晚些时候，亨利·基辛格将再次访华。10月份，人民共和国被接纳为联合国成员，而台湾则被驱逐出去。加拿大、意大利都分别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接着，中国与它从前的头号敌人——日本——就双方互派大使问题开始会谈。

当时，周恩来总理似乎处在他的权力的鼎盛时期。多年来他总是任劳任怨地扮着一种调解人或稳健派的角色，现在他终于自唱主角、大展其才了。在“文革”中被拒绝办理签证的一些“中国的朋友”这时也应邀重返北京，因为中国人对“大眼睛洋鬼子”采取了较友好的态度。这时实质上管理着国家的总理甚至下令军队在军事训练上投入更多的时间，并号召群众、非武装民兵挖防空洞。另外周总理还想方设法使“文革”期间停课的大学尽快复

课，他知道，哪怕是很有限地对西方开放，也需要大量的语言人材、科学家和经济学家。

偏激派对周恩来的这些安排，采取消极接受的态度。毛主席仍让他们控制着宣传工具。尽管有周总理的忠告，江青在有关报刊、广播、电视在政治问题上所应坚持的路线问题上，似乎仍然对主席产生了重大影响。江青还控制着文艺战线。在北京舞台上，除了她树立的革命样板戏（如《白毛女》、《红色娘子军》等）以外，再难看到其它。偏激派授意报刊登载一系列文章抨击“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消息闭塞的中国百姓开始猜测，这是否意味着将要宣布毛的第二位“选定的接班人”已经垮台或甚至已经丧命。周总理认为，由于苏联的威胁，中国与美国建交已势在必行。所以他设法避开偏激派的干扰，积极做好迎接美国总统访华的筹备工作。这里我想特别强调一点，假如林彪仍大权在握，将不会有亨利·基辛格的几次秘密访华，也不会对西方逐步开放，更不会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

第 三 篇
衰 落 的 年 代

第十四章 毛和周的对立面

1973年3月底，周恩来总理参观在北京举行的英国工业技术展览会时，没有从六辆护卫车的第一辆里走出来，这使英国大使约翰·艾惕思爵士（John Addis）、英中贸易委员会主席约翰·凯斯威克（John Keswick）爵士和其他要员们大为吃惊。第二辆车停下来，乘坐的又是一位着中山装的中年男子。周总理从第四辆车——负有盛名的、有黑帘遮掩的防弹红旗轿车——里跳下来，匆匆走进苏联人建造的展览大厅。

尽管事先已有秘密安排，只让周总理参观超音速协和飞机模型和从300种展品中挑选出来的20来种，但他不予理睬，在展览大厅里到处转悠，使许多公安人员非常为难。迹象很快表明，尽管采取了严格的安全保卫措施，总理仍然感觉到他处在被暗杀的严重威胁之中。自然，周总理在厅里参观时，不允许任何一般公民接近大厅。外交使团之所以吃惊，是因为自1971年9月林彪的未遂政变以来，周总理一直引人注目，而他在北京机场迎接来访官员时总是显得轻松自如。当然那是因为机场有人民解放军极其严密的保卫，并且总理不走一般通往市区的主要街道，而是用为军事车辆所专用而不许大多数中国公民和所有外国人使用的路线。外交使团和外国记者们还注意到，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主持举行了几十个宴会，每次都非常轻松，但人们知道周总理和住在紫禁城里的其他政治局资深成员去人民大会堂都走的是秘密地下通道。甚至有从他们家直通人民大会堂的地道，他们可以乘中国吉普直

抵他们在人民大会堂里半公开的办公室。

林彪政变之后，周总理很不轻松。他已七十五岁高龄，中国八亿人民指望他建立某种形式的集体领导，以便毛主席去世后接管政权。的确，在1972年12月，人民可以感觉到周恩来总理的健康远比比他大五岁的毛泽东主席的健康更为中国人民所关注。因为主席象晚年的邱吉尔一样，过着受人爱戴和尊敬的生活，思想有时光辉灿烂，不乏建设性；有时却时昏时醒。管理庞大而复杂的中华民族的担子，全部落在了总理肩上。那时我还没有认识到这位主席那具有超凡魄力的个性的全部价值——因为正是他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把这个多民族的国家凝聚在一起。

总理负担过重的原因之一，是以前负责日常决策、分担官方接待和宴请的五人政治局常委已经不再起作用了。高级会晤可以同毛泽东进行，但前中央“文革”小组顾问、激进的安全部长康生却时常“无力为之”，的确他看起来消瘦憔悴、面带病容。此外，无疑他害怕总理知道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丑行”，感到还是收敛一点更为明智些。再一位成员就是“叛徒”林彪，而第五位陈伯达早在林彪未遂政变之前就失宠了。

在北京居住的最活跃的政治局成员无疑是江青，她仍然把持着宣传机构，给总理制造了许多麻烦。由于她的把持，宣传机构的调子仍然十分偏激，在外交事务中时常采取与总理的开放政策相对立的立场，使外交家和政治分析家们的任务变得错综复杂。除了主席之外，支持江青的还有张春桥，他经常往来于他的权力基地上海和首都之间。

毛主席的警卫部队——由不止一次救过毛的汪东兴指挥的8341部队——是很胜任的，但尽管这个部队的任务是保卫所有政治局委员，而它的注意力却更多地集中在紫禁城和人民大会堂。

周总理很清楚，在三种主要权力资源之中，军队和党这两条资源里他都有不少危险的敌人，因为尽管在林彪的未遂政变以后

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洗，但仍有部分军官接受他们前领袖的观点，这个观点是：向美国做出友好的姿态而加深与莫斯科的裂痕，对北京来说是一个重大的错误。那些在苏联接受过训练或者和来华苏联专家一起工作过的军官们尤其如此。无疑那些极端亲苏分子阴谋反对周恩来总理。总理生前的不少朋友都曾声称，几起被揭露的阴谋显然是莫斯科策划的。周总理住院之前，这些极端分子集团一直企图暗杀他，因为除掉总理是推翻现政权的最有把握的途径。

生活是平静的，公安秩序也非常好。记得我饭后常常独自漫步观察北京和上海（包括海港）。民族饭店是世界上唯一可以将珍贵的珠宝或者金镑随便放在哪里都绝不会丢失的地方，旅馆职员们最严重的违法现象就是打麻将。我不断听到有人在空房间里打麻将。饭店所在区有7万人口，这个区的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曾经面带愧色地告诉我：1973年1月至3月底这个区的犯罪率很高，发生了四起非法同居（即未婚男女发生性关系）案和六起盗窃自行车案。

但是，不仅外国人而且中国人都看得出，在良好的公安秩序背后潜藏着凶残的暴行，这些暴行发生在大城市，是江青唆使的。她在“文化大革命”中与林彪合作创造了一门残忍的艺术：对犯人酷刑折磨，威逼假供。这些暴行连他们精心安插在各省的党的领导人也不知道。据信毛泽东当时对妻子这种劣行有所了解，周总理也间或收到过有关这些事情的报告，但他对此却几乎没有或者说毫无办法。

还有其他一些由那些在“文化大革命”后期用尽了千方百计才没有被送到农村去的极左分子组成的集团。他们一般从事不愉快的体力劳动，互相之间继续不大方便地进行联系。这些极左分子背地里抱怨，说如果不是周恩来反对，毛主席和江青也许仍然站在他们一边。更危险的是那些已经被遣返到农村的极端分子，

他们逐渐厌恶与世隔绝的恶劣的气候和繁重的劳动。由于某些原因，在中国未经许可是不容易迁移的。一些头头们千方百计返回北京和上海，没有配给卡，就靠小聪明自谋生路。这些年轻人不断进行反对当局的阴谋活动。

英国展览会之前，没有几个外国人认识到周总理的生命处在危险之中，这个事实生动地说明了那时北京的生活是多么平静、安稳。反日标语逐渐从北京郊区和各省消失，反对帝国主义的标语更少。看起来，尼克松总统的访问和《上海公报》以及紧接着田中首相正式访问中国而来的与东京互派大使的重大意义已开始渗进大街上中国男女的心中。

但迟至1973年3月，上海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王青（音译——译者注）在一次少有的长达两小时的宴会上才告诉我，“掌权的革命委员会的首要任务就是对工人们进行正确的政治路线教育，以使他们认识到亲苏派修正主义的危险”，因为“林彪观点的余毒还远远没有肃清”。王承认，连红色堡垒和权力基地上海也还有以前的极左和极右派的学生捣乱。事实上党内的不顺应潮流者，不论是倾向于莫斯科的或者是极端激进派，常常是这一个月被冠以“极左分子”，几个月后又被斥为“极右分子”，怎么叫都可以。

俄国人加剧边境局势

林彪政变失败以后的这段困难时期，苏联发动冬季军事演习，加剧陈兵边境。这实际上帮了中国的忙，促成了“党的统一”。1973年3月，西方国家驻北京使馆的武官们从比他们消息更灵通的东方同僚们口中获悉：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的一个师和几个部队第一次参加了西伯利亚西部的一次大规模军事演习。据报导，

华沙条约国的军队一连几个星期被空运到位于西伯利亚境内贝加尔湖西岸的伊尔库茨克，而据日本游客的可靠消息，大量的重武器和车辆是在更长一段时间内经由起于欧洲、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运送的。

对此中国未作任何官方评论，只是向他们的政治伙伴透露，俄国的军事活动和一连串的军事演习是为了检验新式武器装备在北极气温和接近实战的条件下是否有效。俄国人似乎对他们的行动不欲遮掩，他们的飞机不止一次地侵入中国领空。尽管中国人不认为战争已迫在眉睫，但新的威胁和俄国人逐渐地、不断地增加边境军队这一事实，还是使他们警惕起来了。1973年3月，苏边境部队有40个师，大部分都比前些年更接近战备状态。几乎同时，中国人获悉俄国人正在中国北部边境附近部署洲际导弹和中程导弹。那些藏在岩石下“加固”了的地下基地里面的导弹，不仅当时而且现在仍然有能力击中中国任何角落里的目标。它们对于美国来说，是不堪一击的，但中国却对它们无能为力。

这种导弹取代了那种“无掩蔽”的导弹设施，那种设施使俄国人的能力受到限制，只能“拔除”中国新疆罗布泊的核基地，只能击中北京、天津以及东北的工业区、油田等为数有限的目标。直到1974年或1975年前后，中国人一直不无道理地担心俄国人会为了捣毁他们在新疆的核设施——包括靶场和备战物资设备——而发动先发制人的进攻。这就是他们疏散设备的原因。导弹弹头据说存放在喜马拉雅山和西藏的安全设施里。为了能够这样做，当然要修筑通往西藏的公路网。周恩来总理尽管承认边境威胁，支持重新部署军队，但他仍然确信，俄国人仍然企图“从内部攻破堡垒”，因而采取措施加强内部安全网。

在此期间，苏联的威胁不仅使毛主席和周总理背后的军队加强了团结，而且，事实证明它对全体人民的团结、对广大群众变得坚强而活跃，也是有所助益的。自1971年起，城镇、公社和工

厂的人们在号召之下修筑防空洞，全体人民都遵循毛主席的一贯教导：“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男女老少自愿在下班后和星期天挖防空洞（星期天至今仍是中国共产主义者休息日）。每个工厂、学校都有自己的防空洞，尽管其中大多数承受不了炮弹，能抵御常规炸弹的更少，但它们提高了人民的斗志。

在北京，来访外宾常常被引领参观市中心的防空洞网。地下通道的进口，是老城内一个卖制服的小店后面的活板门，距著名的原北京烤鸭店不到一百码远。通道里照明很好，通风设备是通往地面的通风口，不时还有凹进去的小室，小室里大多装有电话，有的里面还有盥洗设备。每个店都有自己通往地下通道的秘密进口，这样做倒并不是为了让人们有处可蔽，而是为了便于他们进去开挖更宽、更深的通道。这些通道最后一直通到现在仍在延伸的北京地铁网。

人们可以顺利地 from 市区疏散到十五、六英里远的地区去。一旦原子弹爆炸，官员们只需要一声令下，便可指挥群众通过新的地铁到最安全的地区——即最不容易遭受核污染的地区去。在这个地区，人们可以从当地人民公社的粮仓里得到食物（希望如此），然后转移到更远的农村去。一位爱开玩笑的外国专家曾经说过，如果是常规战，地道网还可能——只是可能——有点用，但如果是核武器进攻，只需把两端的口封上，防空洞就变成了万人坟墓。

可以断定，一旦战争迫近，掌管军权的军事委员会、政治局和政府高级成员们就会搬出北京，到一个安全的栖身之处去，这个地方很可能是西山。地铁的西端支道正在延长，似乎是预备为安全、秘密运送党、政、军领导人所用。最新消息称，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卫星、雷达和通讯系统的战争中，双方都企图阻止对方以任何手段从陆地和空中收集情报，但过时的电话尽管不安全，可至少还是有用的。尽管如此，地下也一定会有不止一个通讯联

络中心。

党的“十大”

一提起批判古代圣人孔子的运动，我那些理智的中国熟人们便表现出近乎厌烦的情绪，甚至在1973年春天和初夏运动刚开始阶段也是如此，那时党的“十大”还没有召开（“十大”是1973年8月召开的）。“学习”（或者叫政治灌输）阶段是为粉碎建立在必须尊重皇帝（国家）和家族基础上的哲学做准备的。一些非常理智的干部甚至当时就认为，所谓的批孔运动实际是江青及其偏激派朋友们发起的反周运动。偏激分子们一再强调党、政、军干部应该“红”而不是“专”，这种做法实际已经损害了总理和他的主张。此外，他们还使出浑身解数，以确保进入大学的学员要“红”。

《人民日报》刊登了许多来自边远人民公社的报导，强调农民们如何揭露孔子和他的思想。北京的电台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喋喋不休地广播同样的文章。毛主席是否知道批孔的动机，不得而知。尽管他一直给他的妻子以很大的支持，但管理国家、筹备“十大”他还要指望周总理，而他希望“十大”即使不能解决、至少也要缓解接班人问题。无论如何，主席肯定看到、听到了每天的报导。当时目睹毛和周在一起的少数人总是说，他们看起来关系非常好，非常亲密。而现在，据中央委员会的一位委员说，无疑主席当时知道他的妻子正在竭力发动的这场反对总理的运动。

在日常工作中与偏激分子经常接触的那些支持周总理的年轻人提醒周总理，说他是批孔运动的真正目标，他的名字迟早会和孔子连在一起。就是在这个关头，总理才安排在批孔运动中将孔

子的名字和“叛徒”林彪的名字连在一起。整个中国所有有政治头脑的人都意识到，周是真正的目标，因为他出身于旧官僚家庭，受过很好的教育，据报导他认识的汉字比高级教授认识的还多。大约就在这个时候，周总理的医生们告诉周总理，他的“心脏有问题”。于是他经常在监督下服用那些患有“心绞痛”的人用以缓解疼痛的小药片。现在仍不清楚当时他的医生是否也已告诉他，说他患有癌症——那时他的医生很可能已经知道他患有癌症。无论如何，邓小平出任副总理（1973年4月邓小平副总理复职，与几十个党、政高级官员一起恢复了权利）后的1973年6月份，周总理打算从一些缠身的政府机关工作中解脱，但没有放弃作为党内第二号人物所拥有的权利。他避开了在家中或办公室里可能飞来的子弹。

总理告诉他在外交使团中的亲密朋友说，他已在政府机关呆了25年，觉得该让别的人接替他做一些握手、讲话之类的事了，以便他能腾出时间建立一个和谐的领导集团，来继续执行他和毛主席1971年4月开始建立的“乒乓外交”政策。姬鹏飞（尽管他不能继续呆在外交部）接管了一大部分接待和宴请外宾的工作，从前党的总书记邓副总理代替周总理主持中国共产党的会议。

也许除了毛主席、周总理的妻子邓颖超和邓副总理之外，没有人知道周总理退隐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担心遭到暗杀而不是因为有病。批孔运动加剧了这种担心。当时和随后的一段时期，要指出偏激分子（现在称作“四人帮”）的错误是困难的，因为江青表面上一直接受周总理的对外开放政策，这种政策是在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后接着1971年的乒乓路线制定的。距“十大”召开仅有一个月的时候，一个美国游泳队的运动员还特意被邀请多呆一天，观看《红色娘子军》，这是江青倡导的现代革命芭蕾舞剧之一。美国联络处主任大卫·布鲁斯大使也到场观看演出，江青穿着裙子坐在第一排，紧挨着大卫·布鲁斯。

一位驻北京的老大使说：“当时我就曾经以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偏激分子们已经接受周总理和稳健派的政策，包括对外开放政策。”他完全错了。还有一些有经验的外交官们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内，在权力斗争中失败的少数派总是做出一种无可奈何、保留意见的姿态，这已成为一个传统，对于广大群众和使馆官员来说，这种姿态是一种改变主意的迹象。这些有经验的外交官也同样错了。还有人进一步推测，说仅有的两名没有倒台、在政治局任职的上海派领袖张春桥和姚文元，已经跟随江青接受了稳健政策，接受了他们原先推翻的邓小平副总理以及其他老干部的复职。

在北京，外交报告总是基于从中国的出版物、偶尔直言的中国部长和官员们的谈话以及与中国谈过话的少数“外交朋友”那里收集的一星半点资料。可一连几个星期，计划召开的第十次代表大会都笼罩在神秘之中。显然从8月初人们就估计到人民大会堂里要进行不同寻常的活动，因为这座巨大的建筑物打扫一新，外面挂起了比真人还高大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画像，花圃里栽上了新花木，增加了站岗的安全警卫人员，以阻止好奇的市民们接近停车场。到8月10日，北京的热烈气氛达到了峰巅，香港、澳门和台湾的代表陆续到达，一连串的谣言和反谣言在京城内众口流传。接近月底的时候，许多小轿车和大轿车停在大会堂外面。显而易见，要么是“十大”正在召开，要么是中央委员会和其它委员会的特别扩大会议正在召开。

有政治头脑的中国人第一次象外国观察家一样对这件事感兴趣，因为他们认为这次代表大会将会产生出在不久的将来接替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新的领导班子。并且，“九大”的党章是专为林彪当接班人而制订的，党需要一个新的党章。此外，鉴于俄国的威胁，人们希望会产生一个国防领域的新领袖。

最后，8月29日的一场焰火向人们显示出：“十大”已经结

束。就在这时，北京电台正式宣布：“十大”于8月24日至28日召开。“毛泽东主席虽然没有在大会上作报告，但却主持了这次象征着团结、胜利和力量的大会。”最引起轰动的新闻是，王洪文——现在被打倒的“四人帮”成员之一——当选为党的第三号人物。第二天，他的照片出现在各报的头版上，站在满面笑容的毛主席的左边，毛主席的右边是周恩来总理。

尽管一些外国人在上海的宴会上见过这位新领袖，但对他仍几乎一无所知。人们对他的年龄众说纷纭，有人说三十六，有人说四十六，总之他很年轻、很英俊，表面看起来生气勃勃。一贯反对公布领袖们历史细节的中国官员们承认，“文化大革命”中，王是上海一个纺织厂的负责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起了重要作用。他位居上海派领袖张春桥之上，对此大家都很惊奇。但张春桥还是在政治局常委中得到了一个席位，对这个位置一直垂涎覬覦的江青却未能如愿以偿。

第十五章 政治钟摆的反复

1974年“五·一”节，轻松、微笑的周总理与偏激分子江青肩并肩出现在紫禁城花园，“与广大群众在一起”。这幅画面从某种程度上减轻了外交使团关于党的领导中已经产生了又一场危险的权力斗争的担心。事实上，权力斗争只是暂时被掩盖起来了。1973年8月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以来，周总理和他的得力助手邓小平副总理又一次开始发展与外国政府加强联系的政策，在国内提倡“抓革命，促生产”。此外，成千上万名复职的党、政官员又重新登上了重要舞台。这些官员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免了职，那么现在就有许多旧帐要清算。

这一年5月到6月，英国反对党领袖爱德华·希思对中国进行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访问。访问期间，我们都注意到了昆明、广州两地的大字报，这些大字报都是批判地方官员的。另外，那些通常极不愿意承担外事局没有完全批准的任何任务的官方翻译们，也非常乐意站在如火的烈日下，试着翻译那些很难看懂的手写体大字报。据称毛泽东主席亲自“圈阅（批准）”了“革命造反派”发动的、反对北京和其它城市共产党领导人的这些进攻。许多人担心，一场如1966年至1969年那段武斗时期的政治动乱又要开始了。但是起初人们很谨慎，那些不署名的的大字报都是批判“头头”的，这些头头大都是工厂、港口、农村地区、大学甚至政府某部的革命委员会主任。大字报都是早晨一大早贴出去的。人们发现上边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压制贴大字报的人，胆子便大了，

于是运动发展起来，119张攻击北京市长（原文如此。其实按当时称呼是“北京市革委主任”——校注）吴德的大字报突然出现在街头。这一行动非常引人注目，因为人们记得，“文化大革命”就是从批判副市长吴晗开始的。大字报指责吴德“消极”，不能朝气蓬勃地领导群众参加批判孔圣人的运动。那个时候，注意贴大字报的人大多数都知道这个运动是为反对周总理而发起的。

回顾起来，初夏时期的大字报中最重要的是5月17日贴出来的28张，它们猛烈攻击最终将接替毛主席任党的主席的那个人——华国锋。当时华国锋作为经济专家和农业专家在首都刚刚开始出名。大字报谴责他在毛主席的出生地韶山工作时曾迫害他的故乡湖南的“左派工人”组织，现在又阴谋破坏批孔运动。此外还指控华有“严重的反动倾向”。尽管原来的大字报被揭了下来，为语气比较缓和的所取代，但人们永远不会忘记它们的内容。“内部人士”认为，这些大字报是江青策划的。这些大字报被揭下来这一事实表明，当受害人是刚刚选进政治局的一位大有希望的中年人时，官方不愿意使这场运动变得太激烈。

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每天步行到市中心去看大字报。这些大字报贴在“某某部”（这是我的那位过分谨慎的翻译用的字眼）和毗邻的宅院（这个院子里住着中国最尊敬的“外国朋友”）的墙上。隔壁的市政厅没有砖墙，大字报的作者们就把大字报贴在对面原国际俱乐部的高墙上。（我曾有幸到过这个极好的俱乐部，里面有舒适的酒吧，有墙壁上镶着栎木板的饭店，有不错的欧洲书籍图书馆。1972年中国人接管了这个俱乐部，提供了几座一般的楼房代替它，取消了图书馆。）

那里的绝大多数大字报是攻击北京革命委员会领导人的，说他们“滥用手中的权力，拥有私人游泳池、豪华的住房以及仅供玩乐的花园”。大字报的作者们不断提醒革命委员会：毛主席说过，大字报是一种新的有用的武器，“群众”想把它们贴到哪里

就贴到哪里。当时流传着不少悲惨的故事：受到大字报攻击的人遭受人身折磨，最后以自杀告终。随着运动的进展，显然五十一岁的市长吴德成了首都的主要目标。来自河南的一位矿工突然产生了一阵对我的信任，告诉我虽然到北京来是违背指示的，但首都都是唯一有人听人们诉说冤情的地方。

年轻的男女干部们则因婚前同居而受到谴责。婚前发生性关系在中国仍是一种严重的罪过，比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通奸还要严重。青年男女之间一旦被发现这种关系，便要一生受人唾骂。许多大字报下面的署名都是一个神秘的人物——“金猴”，这个人没有暴露真实身份，但看起来是一个曾支持过已失宠的陈伯达的人。“金猴”是中国神话中的一个把妖魔鬼怪赶出天宫的人物。许多地方领导人被攻击没有“保卫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这是一句很保险的话，因为这句话是周总理在党的“十大”上起用的。军队的领导人也没有逃脱批判，但批判他们的语气一般要比批判市长及其亲密朋友的语气缓和一些。

在地处东北、与苏联交界的黑龙江省，省委书记刘光涛被指控“把生产置于一切之上”，尽管他是中央委员会的候补委员，在约3,600万党员中位居前300名之中。一个林业部门的革命委员会主任被指控从黑市交易中积累了40万元（当时约相当于12万5千美元）资产。大字报指责他卖了工人的口粮，做了许多非法的木材交易。但大字报作者没有说明被控者把这笔钱用到了什么地方，这是不太恰当的。当地的工人每月平均工资60元，他不大可能把这些钱存入自己的银行账户上而不引起议论；也不可能私下挥霍了，因为私下挥霍50美元都是很显眼、很危险的。现在的黑市商人老练得多了，他们与亲戚（一般是海外的华人）“做买卖”，这些亲戚替他们保存钱，时常给他们带些中国国内搞不到的礼品。

在对一些外国人开放的昆明、武汉、苏州、哈尔滨、沈阳和

其它一些城市里，大字报的调子更富有好斗性、更偏激一些。几乎所有的大字报都是以热烈崇敬的措词写给毛主席的。除毛主席外，唯一备受宠爱的名字是原为上海的工人、后来成为党的第三号人物的王洪文。许多大字报作者表达了这样一个愿望：愿王能“领导激进的三派，掀起一个比‘文化大革命’更大、更好的政治高潮”。偏激分子声称，首都大字报运动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要将王推到政治舞台的中心。但邓的支持者们说：可以预言，王不仅会使周总理，而且也会使他的主要支持者毛主席失望。正式场合，王的工作是重组城市民兵和恢复“文化大革命”中瘫痪的工会，但据现在的官员们说，当时他几乎什么也不干，为江青跑腿。从理论上讲，江青在党的统治集团内比王的地位低得多。现在看来，显然甚至在党的“十大”之前，周总理就认识到王没有多高的管理水平。也许就因为如此，他才挑选这位英俊的年轻人作为一种工具，来分裂当时仍然抱得很紧的、后来被称作“四人帮”的偏激派集团。

当时，中国的许多中青年人都有足够的勇气向外国人表露他们因自己不能被提升到党、政、军领导岗位上而产生的绝望心情。批评家们总是说老干部们干得时间太长了，虽然他们总是有意避开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名字。一些消息灵通的中年干部，公开对王洪文明显缺乏当常委的能力表示失望，因为常委这个集体领导班子是要在主席和周总理“去见上帝”后接班的。

在这个狂热的阶段，北京的情况一直是平静的，但许多来自各省城的报告却说右派和左派在大字报前发生了拳斗。非常有趣的是，北京两种宣传工具并存，一个是官方的《人民日报》，另一个是生气勃勃、坦率直言的大字报。前者报导“丰收”（这个词在汉语中总是褒义的）和钢铁产量的增加，描绘幸福的、大公无私的工人们如何为党克服了难以克服的困难；而活泼却又常常是粗俗的大字报，则刻意揭示城市和地方工厂的“头头”们如何

滥用手中的权力，如何没有“保卫文化大革命的成果”。

渐渐地，北京的热情下降了，大字报的数量少了，对大字报的兴趣也不高了，因为官方突然决定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恰在这时（6月初），周总理的心脏病突然发作。党中央6月份发出一条指示，“强烈劝告”——实际上是命令——个人或集体在当地表达他们的抱怨，而不能到北京来贴大字报。同时党内在重大政治问题上的分歧在这场运动中也被披露了出来。这场运动在北京平息几个月之后，在各省仍有增无减。我在一系列的参观途中注意到，西南的昆明、华中的武汉、上海附近的苏州都贴满了大字报，据我的官方翻译说，百分之八十是严厉批判当地城市或工厂革命委员会的“反动路线”的。当地的政府和军队领导人再一次被指责没有支持“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大字报比北京更加激烈地抨击当地领导人，说他们把红卫兵小将和其他热情支持“文化大革命”的人赶下了领导岗位，而让“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取而代之。

在哈尔滨和沈阳，大字报批判李德生。李德生不仅是整个东北地区的大军区司令员，也是政治局委员。另外一般推测，他在某种程度上同情偏激派。但后来他不喜欢王洪文。大字报运动是政治权力斗争的一部分，这个斗争对高级军事指挥员影响很小，甚至在他们受到冲击时也是如此。他们中每一个人都无正当理由地认为自己身后有毛主席的亲自支持，因为主席最近一个时期所做的主要工作就是在邓小平的帮助下于1974年12月^①全面改组大军区司令员（这一点将在以后谈到）。

尽管王洪文当时已不如先前引人注目，但他与毛主席一起成了各地大字报运动中的很有诱惑力的中心人物。因为虽然“四人帮”的其他成员在王被提升到比他们高的位置上时大为光火，但他们都急于利用这个没有经验的年轻人在党内拥有巨大权力。

^① 这里的日期应为1973年12月，原文有误。——译者注

7月31日周总理出现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①建军47周年招待会上时，眼窝深陷，满面病容，显然这位25年来为管理中国日夜操劳的人永远不会再有能力继续挑起他那巨大的重担了。王继续神秘地在幕后为江工作，总理的管理工作则落在了年已七旬的邓小平肩上。因为没有任命新的国防部长，仍由当时已七十六岁的叶剑英代理（林彪的未遂政变以来，他一直代理这个职位）。据说他和邓小平与周总理一起分担管理核武器控制权的工作。

使周和他的代理人十分生气的是，周总理心脏病发作以后，江青的权力不断增长，因为她可以随便出入毛主席的卧室和书房。另外她还控制着毛的来访者。据传1973年某个时候主席曾给江写过一个短信，信中说：“我们最好不见面。”显然，这封信是不打算发表的，其中内容是她的工作人员中一些对她不满的人透露出来的。我听说这是因为一次家庭争吵（他们已吵过好几次），这次争吵持续了几个星期，跟江要建造拥有豪华设备、有高级厨师服务的第二住宅有关。但她的主要住宅仍然是紫禁城内与毛主席合住的四合院。

许多外交官和高级官员们认为，在这段时期江青与汪东兴关系有点儿不正常。汪东兴是特别保安部队8341部队的司令，前面曾经说过，这个部队的任务是保卫政治局成员的安全。毛死后汪竟同意8341部队负责逮捕江青和“四人帮”的其他成员，对此高级官员们感到吃惊。也不断有报导提及江的风流艳事，但她成为毛主席的夫人以及凭自己的头衔成为重要人物之后发生的这种事，在审判她时一件也没有提到。有理由推断江非常小心，因为她一直害怕原先在上海的风流韵事会被公之于众。果不其然，她为收集她往日的情书和照片所采取的残忍手段在她受审时被揭露了出来。

^① 此处原文误为“中国共产党”。——译者注

众所周知，毛和江在政治上有分歧，因为江比毛更左。毛知道江的长期策略是不让邓“上来”，或者最好仍然“不进来”，以便使张春桥在周逝世后继任总理，而她自己逐渐升迁为主席。江对毛主席后来称之为“四人帮”的“上海帮”的其他两名成员的考虑是时有变化的。她一般将已是党内第三号人物的王洪文视为在那个范围内为她工作的工具，至于姚文元，她要培养他负责宣传工具。同时，江是唯一能使用毛主席“御玺”的人，在中国，印比签名更重要。她在其它活动中肆无忌惮，而在使用毛主席印章时却非常谨慎，这一点令人惊奇。事实上，毛和妻子的关系，是从1973年8月党的“十大”结束到1976年1月周总理逝世这段期间负责外交、内务政策的中国部长们没有明说但却最感棘手的问题。这种状况在总理心脏病发作、不得不几乎长期住院后愈加严重。

1975年1月权力斗争突然出人意料地暂停了，因为突然宣布任命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据说这是“党指挥枪”的又一措施，但更有意义的是五十六岁的上海偏激派领袖张春桥同时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或者叫总政委。这两个人——务实派邓小平和偏激派张春桥——当时被普遍认为是毛“去见马克思”后党的主席这一职位的主要竞争者。而党的主席同时又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最高统帅，这是推迟很久才于1975年1月召开的第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刚刚通过的。同时此前一直由红军时期的老将们组成的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也由党的主席兼任。

最近一些年来无论是邓还是张都没有统帅军队的经历。著名的1934至1935年的万里长征开始之前曾在红军中从戎五年的邓，在战争中大半是当政委。但在解放战争的最后阶段，他成为第二野战军的指挥员之一。1949年春天，这支军队在长江沿岸广阔的战线上进行了一系列运动战，打败了统治者。尽管直到1954年以前，邓在名义上仍然是第二野战军和西南军区的政委，负责管理

军队，但实际上从解放以来他主要考虑的是党务、政务和经济事务。

邓被任命为总参谋长后，有了组织制造和试验核武器的权力，并逐渐从患病的周总理手中接过了政府工作。对邓小平的任命，毛主席是热烈支持的，但江青却十分恼火，激烈反对。主席家里的服务人员后来谈起这段时间毛和妻子关于邓问题的争吵时说，江青不无理由地认为，邓上台将会使张春桥不可能在军队坚决贯彻坚持“红”而反对“专”的路线。到1974年底，邓又接过了周在指挥外交政策方面的工作，包括接待所有重要的海外来宾。人们还注意到，邓在1974年春天访问法国以后，显得信心十足。这种信心从1973年4月复出以后不断增长，此前他因被包括张春桥在内的偏激派诬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遭罢免，整整六年未在公众面前露过面。重要而有趣的是，邓从未显露过张春桥政治史上的劣迹，而他对此是了解的。这些肮脏的内幕在审判“四人帮”时才揭露出来，其中包括“文化大革命”中对邓进行的纯属子虚乌有的诬陷。

尽管如此，仍然难以想象这两个人怎么能在一起工作。后来一位政治局委员告诉我，毛和周都曾“恳求”不大乐意的邓为了党的团结和张一块工作。于是邓同意尽释前嫌，开始与这位新的政治部主任合作。无疑总理认为邓在总参谋部办公桌前出现，自然会起到遏止张在军队里支持偏激派活动的作用。当时许多消息灵通的外交家们曾一再说，一旦偏激分子们公开表示同意总理在外交事务中的“开放”政策，他们就会真心实意地参与。事实证明，这些外交家们是大错而特错了！

早些时候曾采取过措施，以便在周总理和代理国防部长叶剑英生病期间进行重大军事决策、处理核武器研制工作、确保“决不容许枪指挥党”。于是成立了一个似乎不太可能的三头政体，由第三号人物王洪文、副总理邓小平和极其重要的北京军区司令

员，很有希望的陈锡联组成，这个执政班子不久便解体了。

重大军事改组

无疑，已经死去的林彪于1971年9月组织的未遂政变，使毛泽东和周恩来震惊非小，因为当时林彪是毛“选定的接班人”和国防部长。250多名高级指挥员被迫辞职，近百名被调换岗位，但这一措施基本上没有削弱由十一个大军区司令员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建立起来的权力基础的力量，这种基础使他们能够无视或怠慢那些来自北京而他们不喜欢的命令。十一个大军区司令员中，福州军区、南京军区、武汉军区、广州军区和沈阳军区的五位还在党内担任有高级职务。

这些大军区管辖的地盘之大是惊人的。例如沈阳军区的地盘有46万平方英里，是法国面积的两倍多；这个地区的人口为6,500万，而法国才有5,200万人口。这个地区为中国提供煤炭总需要量的16%、原油总量的47.8%、化学品的12.67%、汽车的39%以及27.6%的钢。这个地区三面毗邻苏联，其时苏联在这里布署的兵力不断增加，已达到65万军队、8,000辆坦克和1,500架作战飞机。加上稍往西一点的军队，苏军边境兵力总共约有100万。

除了政治和军事权力之外，工业地区的一些大军区司令员们还利用手中的职权，把农用汽车等产品转为为他们自己所用的军事产品。一些掌管重工业工厂的革命委员会也命令生产武器零件，尤其是过时的苏式坦克和大炮等部件。据说这种军方的干预严重干扰了将在1974年12月到期的五年计划的实现。

结果证明，很难把这些在废止军衔制以前被称作“元帅”^①

^① 原文如此，疑有误。——译者注

的十一位大军区司令员调出他们的权利基地。1973年秋天，经过为时几个星期的、总理和邓参小平加了的讨论后，主席派人依次请来八位司令员——这是主席亲自出马承担的最后一个任务。他给他们一个星期时间考虑是否接受调动，并通知他们每人最多可以带三名部下到新辖区去。

调动最后公诸于众，并强调任何人都不免职、不降级。实际上只是广州军区、济南军区、兰州军区和北京军区的司令员与南京军区、武汉军区、福州军区和沈阳军区的司令员们对调。应该说明，不少司令员都把任命书压了很久，在欧洲军队中这么长时间不到任是不允许的。新任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从1954年到1973年底一直掌管着南京军区（上海属于这个军区）；韩先楚自1958年到1973年一直是福州军区的司令员；而陈锡联从1959年到1973年一直掌管着非常重要的中国东北地区的军权。

1974年初宣布的最重要的一个调令，是北京军区和沈阳军区司令员对调。前总政治部主任、时年六十四岁的李德生是政治局九人常委之一，这个常委班子被认为（后来证明并非如此）是在毛主席和周总理去世后掌管政权的集体领导班子。李还是党中央委员会的副主席、党的统治集团内资格最老的军人。虽然，对于一个参与对调的军事指挥员来说，东北军区司令员这个职位已是第二个最重要的职位，但李还是不大愿意离开他在北京军区的位置。

六十一岁的陈锡联从沈阳调到极其重要的北京军区。他的职责包括保卫中国领袖们的安全这项首要任务，此外还管辖与蒙古共和国毗邻的边防军。这个防区特别重要，因为蒙古是苏联在亚洲的卫星国，苏联有可能利用它（曾经有过先例）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式的闪电战，进攻中国的首都和港口城市天津。这位新司令员非常活跃，又是接待贵宾、又是出席人民大会堂里的宴会。他还十分注意使自己显得既与邓小平关系不错（他时常和邓一起

在招待会上做东道主）、又与江青关系友好。别看陈是大军区司令员中最年轻的，他的资历却不浅：年轻时参加过长征，还参加过朝鲜战争，后来又任过炮兵司令。

大对调之后，有许多报道说李德生受到了大字报的攻击，并且作为党中央的副主席，他的职位降低了。调动后另一个受大字报攻击的司令员是韩先楚——兰州军区司令员，因为他在福州军区时，曾批准出版过一本由他的副手撰写的赞扬林彪的书。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大字报上受到抨击的高级军事指挥员据知无一被免职的。杨成武（将军）的复出使总参谋部稳健派军官的地位大大加强了。杨成武是前副总参谋长，曾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和20多位将军一起被解职。

但当时被认为最有可能影响未来国防政策的事是前总参谋长罗瑞卿的复出（1975年7月底）。罗瑞卿不仅是参加过长征的老战士和内保专家，还是制订政策的最高机关——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的秘书长。60年代初期（在朝鲜经历过与装备精良的美国正规军作战的）罗瑞卿，发现自己领导的正规军的战士们都拥护建立一支具有现代化装备的正规军，这与当时极力倡导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的国防部长林彪的观点是背道而驰的。1965年，罗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出“保卫城市”的战略，这个战略需要有一支拥有尖端武器装备的陆军。此外，作为总参谋长，他还强调政治教育要和军事训练有机地结合起来，断言首要的是士兵应当学会过硬的射击技术。结果，罗被指控“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成为“文化大革命”初期第一个被清洗出去的军队高级领导人。

中国人民解放军也和西方军队一样，在内部有意见分歧。在它内部，过去有、现在仍然有核武器派、海军派和空军派。另外，其中过去有、现在仍有一批强有力的指挥员，他们坚决主张要有更多的常规装备，尤其是最新的反坦克武器、大炮以及运载兵员的装甲车。“常规派”认为，苏联首先使用核武器进攻是不大可

能的，主要因为它会引起全球性的反应。并且专家们认为，苏联一次性毁灭中国罗布泊核基地和核装备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因为大家知道，自从苏联第一次打核武器的主意后，中国已陆续把很大部分核装置分散到西部，储藏在西藏的山里。

常规派援引周恩来的话说：苏联可能会在国内甚至军队内部捣乱，“从内部攻破堡垒”。他们声称，多一些运载兵员的装甲车和流动炮，不仅能在苏联进攻中国时起到无法估计的防御作用，而且一旦国内发生动乱，还可以提供有利条件，为另一个目的服务。复出的军官们使常规派大大加强。“四人帮”为此十分恼火。

中国的武装力量只适应于防御——现在仍然如此。除了一些小的边境冲突如1974年1月海军从南越手中收复西沙群岛外，中国没有足够的能力在常规战领域内发动大规模的进攻性战争。1969年，毛主席曾概括说明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防御立场以及受到侵略时应采取的战略，这就是：

“人家打来，我们不打出去的。一般来说，我们是不打出去的。我说不要受挑拨，你请我去我也不去。但是你打来呢，那我就要对付了。看你是小打还是大打。小打就在边界上打；大打，我主张让出点儿地方来，中国这个地方不小。……要让全世界看到我们打仗是有理的。他进来了，我看比较有利，不仅有理，而且有利，好打，使他陷在人民包围中间。至于什么飞机、坦克、装甲车之类，现在到处经验证明，可以对付。”

不幸的是，这已不再是真理。拥有尖端装备的敌人还会从空中和海上向弱小的、落后的空军和海军挑战。尽管筑有防空洞网对付空袭，但中国的力量仍然极为脆弱，因为中国长期以来缺乏对付低空飞行飞机的武器，也缺乏现代化的截击机。

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给军内各派别提供了在一些权威杂志诸如党的理论月刊《红旗》和更激进的上海杂志《学习与批判》

上对中国过去和将来的国防战略发表评论的机会。但由于毛主席还在世，因此，仍然继续强调人民战争思想。

与地方部队不同，主力军和炮兵以及核武器，直接归中央军事委员会指挥。主力军各单位可以调遣到国内任何地方，而装备更为陈旧、严重缺乏运输工具的地方部队则归军区司令员们指挥，不能调出所在的军区。到1974年，中国拥有的导弹已经有能力打击海参崴苏联海军基地、伊尔库茨克的重要工业和通讯联络中心、甚至乌拉尔山脉以西诸城市等目标。

当时，在北京的外国专家——主要是大使馆武官——对把现代战争指挥权收归党控制以及究竟要多长时间才能一致作出重大紧急决定这两个问题颇多议论。但一般推测，如果有充分证据表明苏联或美国的导弹已对准中国，只要年迈的主席和病弱的总理点头，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央军委有权下令发射核导弹。一旦最紧急的情况发生，比如说一旦华中的工业区危在旦夕，中国军队将尽量把设施疏散到西部和西南地区，这一点不是什么秘密。根据著名的解放战争的方式，一些部队将尽量占领事先选定的“山头”。在核武器时代，虽然听起来太简单化了，但许多老一辈中国军事指挥员仍倾向于以延安窑洞的思想方式考虑问题，认为这些据点可以作为基地发动进攻，收复失地。邓和中央军事委员会里真正掌权的“老将”们都已意识到，中国的主要危险是苏联在边界地区大规模增加地面军事力量。前面已经提到过，苏联常驻边境的40多个师每年秋天都扩编，成中队的轰炸机和战斗机从西部飞来参加大规模的联合军事演习。

中国人在边境线上仅有一个由边防哨兵操纵的火力阻击网，在背后撑腰的是农业人民公社。中央军事委员会认识到——尽管他们不会承认——人民战争在没有人的地方是不灵的，而新疆从罗布泊到苏联边界大部分是这种无人烟的荒漠。如果没有“水”，士兵们怎么能“如鱼得水”？也就是说，没有村镇怎么往村镇里疏

散？这是许多军事指挥员和当时在北京的武官们提出来的问题。他们还认为如果苏联用装甲部队突然袭击，拥有主要油田和工业基地的东北也就会象北京以及附近的港市天津一样，是不堪一击的。

但在有关苏联能占领这些地区多长时间的问题上，专家们的意见很不一致。一般接受这样一种看法：由于从西部获得给养有许多困难，不可能无限期地占领北京和东北地区，因为运输给养的唯一手段就是通过横穿西伯利亚的铁路。（俄国人正在原铁路线以北几百英里处修建一条与原铁路线平行的新铁路。）许多武官倾向于认为，如果俄国人突然袭击北京，中国人只能用坦克把城围起来，把城里的人疏散出去。这种姿态不仅是使中国领导人们在世界上丢尽脸面，而且在自己的人民眼里也不光彩。但有一些专家却认为俄国人会用海军潜艇占领天津，他们可以在那里向中国示威。

尽管中国在越南战争末期占领了石油潜藏量丰富、实际上没有任何设防的西沙群岛，但要用武力占领台湾是不可能的。虽然周总理早些时候讲过将来要建立“蓝色的”深海海军，要给水兵们发新服装，但中国海军只适用于保卫海岸。拥有4,000架战斗机的空军，事实上是由2,000架过时的“米格-15”和“米格-17”组成的，其中几百架长期停飞，因为缺乏零配件，尤其是缺乏制动器——这是工业计划不完善的结果。

中国人民解放军通过“选征兵役制”挑选新兵，因为每年渴望入伍的适龄男女比所需的多得多。成千上万来自偏远农村的应征者指望在解放军中服役可以学到一些技术，三年服役期满后，这些技术可以使他们在工厂找到一个梦寐以求的工作。

张春桥和民兵的作用

张春桥给解放军政委们下达指示时表面上看来非常谨慎，但

他的行动有毛主席作掩护，当他要推行邓副总理会认为是偏激的路线时，一般都有毛的书面许可。无疑由于江青的帮助，张逐渐负责重要城市和地区的民兵工作。甚至到现在也不清楚周总理或邓是不是了解这些，因为总理病情很重而邓当时工作太多。以后很久，1979年宪法规定了由“亿万”人民组成的民兵的地位。事实上1975年任何握过枪的人似乎都有能力管理那些没有武器、用木棒操练的民兵。但民兵的数量后来逐渐削减到3,000万，由部队进行训练。隔两、三年搞一次真枪实弹的训练。

武装起来的、受过训练的民兵组织在中苏边境线上的农村地区建立起来了，而城市的民兵组织则接受使用自动武器和高射炮的训练，学习管理在毛主席“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指示下修建起来的防空洞。许多城市民兵组织的“军官”们用很有效的中国造自动武器武装了起来。张曾秘密而明白地告诉上海和其它城市的民兵：尽管他们每天与解放军一起训练、一起工作，合作得很好，但“一旦这些正规军不听指挥、企图自己指挥枪而不是让党指挥枪”，很可能需要民兵们“把他们控制起来”。

1975年初，中国人采取了一种独特的措施，出版了一本叫作《军事基础知识》的插图手册。这本383页的手册不仅是供民兵也是供“广大群众”读的。书中详细介绍了如何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教导，“把敌人淹没在人民的汪洋大海之中。”另外民兵还可以学会在没有弹药的情况下如何用木棒塞进履带破坏坦克。书中还概述了受到原子弹攻击时的防护措施以及原子弹爆炸后如何实施急救。书中游击战的基本训练，尤其是如何在农村进行伏击和秘密作战，给全世界的非正规军也都提供了有用的资料。当时所有的日报都不允许外国人买，因此这本小册子在书店公开出现也就引起了关注。假如当时苏联在军需供应方面确有困难、莫斯科和西伯利亚间的运输设施真的有限，那么建立有效的民兵力量这一观点是有些说服力的。

在整个1974年和1975年，驻北京的外交官和新闻记者们认识到，江青指挥下的宣传机构的调子比这个时期的代总理邓的观点激进得多。但很少有人认识到一场即将发生的激烈的权力斗争又在各阶层酝酿。“一旦偏激派公开同意接受周独创的‘开放’政策，他们就会毫无保留地执行”，这样一种神话仍在继续——这也许是偏激分子们自我宣传的结果。

现在有人提出，陈伯达早在1966年10月就在“叛徒林彪”的指挥下发起了批判周总理的运动，当时他曾下令：“除了毛主席，林彪和江青，谁都可以批判。”这就意味着：“批判周恩来。”1967年1月，一张批判总理的大字报在大学里贴了出来，但两天后在毛主席的紧急命令下撕了下来。从那时起，尽管总理在“广大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江青领导的对他的攻击却或公开、或隐蔽，一直不断。虽然经常可以从照片上看到那些身体健康的领袖们在一起谈笑风生，但象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甚至已故的埃德加·斯诺这些有洞察力的朋友们仍然深深感到忧虑。

许多干部被送进“五·七”干校。前面说过，“五·七”干校始建于1968年，是用来对官员们进行再教育的。起初“五·七”干校被看作是惩罚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同情“走资派”的人的地方。但渐渐地这些干校的作用变了，到了70年代初期，我记得一个老于世故的高级官员说过，“一个干部上‘五·七’干校就如同一名有雄心的英国军官上参谋学院一样，是十分必要的。”尽管不少人这么说，甚至70年代初期官员们声称“非常喜欢”“五·七”干校里的那段生活，但他们仍有一种担心，怕被人们遗忘，怕有人乘他们在“五·七”干校之机接管他们的工作，甚至阴谋攻击他们。

毛起初主张干部应该和农民一起劳动，互相学习。这个主张很快就行不通了，因为农民明白表示，他们不喜欢城里的那些五谷不分、毫无经验的“白面书生”来帮助他们。两、三年后，来

自农村地区革命委员会的压力越来越大，主席不得不勉强承认干部下乡“弊大于利”。但是毛并没有完全让步，提出干校要有自己的农场，干部下乡和农民一起劳动的时间减少到每年两个星期，至多三个星期。我参观的那个“五·七”干校还是相当舒适的——既象一座开放监狱，又象一所学校。一所“五·七”干校的革命委员会主任直言不讳地承认，他们的亩产量只“相当于附近公社的百分之五十多一点”。

现在人们把1972——1974年这段时间划归“文化大革命”时期，但当时的人们却认为“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了。因为根据当时人们的理解，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已经宣告了当代史上这个特殊阶段的终结。在我的记忆中，那是这样的一个时期：人们在“好奇的异邦人”不太注目的公开场合见面时，常常窃窃私语、

担惊害怕而又即使在冬天也不愿散去。但使我惊奇的是，竟有那么多人相信我，愿意跟我谈话，也许他们希望“一旦发生了什么事”，一个既不会得到什么也不会失去什么的外国人能把他们的生活用文字记载下来。这里有一个典型的例子：一位到过欧洲的妇女告诉我，他和丈夫如何搞到一瓶法国酒，如何在他们结婚纪念日那天晚上，待自己十几岁的子女和邻居们都睡去之后，拿出藏在地板下面的晚礼服，就着烛光享用了一顿欧洲式的晚餐。他们冒着很大的风险，因为一旦被发现，夫妇二人就会被拆散送到苏联边境那些令人不愉快的农村去。

第十六章 权力斗争公开化

周总理逝世与天安门广场事件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的去世，对压抑了两年（1974年至1975年）的权力斗争的公开爆发起了催化剂作用。尽管他已七十八岁高龄，尽管他的去世早在预料之中，但举国上下依然万分悲痛。江青趁周总理卧病之机，小心翼翼地采取各种手段切断主席的视听，以竭力阻挠对邓小平的提升。邓小平提升是在预料之中的、自然而然的事。因为在过去的一年里，邓实际上起到了总理的作用。

当然主席本人也疾病在身，但“内部人士”透露，是因为江的阻挠，他才没参加任何悼念周总理的活动，包括向遗体告别、火化以及把骨灰撒在“他热爱的祖国的各个角落”。并且，人们还注意到毛没有公开说一句悼念“老战友”的话，尽管他肯定从他常看的电视屏幕上看到了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失声恸哭。通过长安街到火葬厂送葬的中央领导集团代表仅有偏激分子王洪文和毛的前警卫员汪东兴二人，对此外交官和外国记者也大感不解。但普遍感到欣慰的是，应总理生前的请求，邓小平在1月15日的追悼会上致了悼词。总理生前还毫不隐讳地希望邓小平接任。

这块大地的每个角落里，不论是大城市还是闭塞的农村，到处都举行着追悼仪式，但在偏激派控制的报刊上却几乎没有出现

关于这位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鞠躬尽瘁54年的人的文章。外国人不许组织任何公开悼念仪式；举国上下追悼正值高潮之时，忽然下令停止悼念活动，要求人们摘掉黑纱。

在北京的外国人对邓没有被任命为总理、没有公开露面这个情况很是关注，但他们相信最终主席会任命他的，因为他受到过周总理的悉心栽培。一月末，我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现邓又一次失宠了，当时我想买一幅官方通讯社——新华社——出版的照片，那是邓1973年在党的“十大”上与周总理的遗孀邓颖超在休息室的合影。我查到了这张照片的索引号码，但柜台里面的人硬说从来没有这张照片，还说 he 从未听说过谁叫邓小平。尽管我猜测这是告诉我邓又一次被清洗出去了，可我还是想：可能因为我是“好奇的外国人”，没有把名字念准他才对我无礼。于是我把我的翻译领到这家店里，店员仍告诉她：“从来就没有叫邓小平的这个人。”（我现在一直希望这个人该受到一些责备，因为他如此撒谎。）那天晚些时候，我写了个报导，说邓不会接任总理，他已经失宠，到农村某个地方去了。（不幸这条消息没有吸引住新闻编辑，大删大砍后用到插页里去了，没有受到人们的注意。）

一月末的最后几天里，继邓小平之后，国防部长叶剑英、“财政奇才”李先念也消失了，这两个人都是周总理的密友。同时大学里贴出了大字报抨击“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的甚至点了邓小平的名字），而理论刊物《红旗》大骂“极右分子”。这场激烈的权力斗争引出了一个折衷的结果，公安部长、来自毛泽东家乡的农业专家华国锋被任命为代总理。2月8日的《人民日报》在接待委内瑞拉新任大使的报导中首先使用这个称谓。宣布华从第五副总理直接升到第一位之后，报刊和大字报开始猛烈地批判邓小平和周的其他朋友。大字报指控邓“肆无忌惮地分裂党中央”，有一张大字报强烈要求“把邓小平拉下马来，以便痛打”。但是有远见卓识的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匆忙用飞

机把邓接到舒适安全的华南，把他安排在广州附近一个温泉旅馆里。邓在那里乘坐救护车或警车到处走动，看望朋友和他的支持者。

江青依仗权势，在北京恣意张贴反邓的大字报，接二连三发表报导，批判邓对她的偏激政策和样板戏所作的尖刻评论。同时还批判邓强调生产、削减工厂和农村中专事政治灌输（称之为“学习”）的专职工作人员。偏激的教育政策主张学生要“红”而不要“专”，选拔教师和干部要看他们是否是激进的共产主义者，而不是取决于是否具有专业知识。邓反其道而行之，为此也遭到无情批判。

尽管红卫兵不再破坏寺殿和古迹，但古迹除对海外华人或外国人外极少开放。买不到外国书籍和报纸，看不到电影、戏剧或中国传统戏。江青和当时称作“上海帮”的“四人帮”强调穿简朴的棉装——即“毛式服装”，吃粗茶淡饭，过节俭的生活，娱乐也只有古怪的中国革命电影和样板戏。但他们自己却另行一套。江青不和毛主席在一起时，就住进旅馆、宾馆或公寓里，纵情于西餐美酒、珍奇水果、西装洋裙、锦缎铺盖。据说江青只要喜欢上她在电视上看到的某个漂亮的运动员或演员，便打发人把他叫来，晚上共榻同眠。如果说这是真的，那么使我惊奇的是，这种事情在审判她时只字未提。

但她坚决主张关闭北海公园及那里著名的饭店，因为在那里可以俯瞰政治局委员们居住的故宫，这一点是确凿无疑的。她自己启用这座饭店是为了使她的帮派朋友享用美味佳肴。据这段时期侍奉她们的一个年轻服务员说，她们吃过晚饭就看外国电影，显然她们都很欣赏这些电影。但这位服务员强调说，无论是在江与她的帮派朋友还是与她宴请的男人之间，他从未发现过任何风流艳事的蛛丝马迹。

那时候，中国的青年夫妇生活必须十分节制，除非工作关系，

从不单独一块散步。群众经常接受这样的告诫：婚姻的基础是对党的忠诚，而不是爱情或者性生活。并且提倡知识分子与工人或农民结婚。美发师不准开业，除了对外国人和江青——江青每次在公共场合出现都要做发型。但这种类型的服务业却是不允许的，因为据说中国工人为他人服这种务是不合适的，是有损尊严的。

在报纸和广播上，邓成了主要的受批判目标。张春桥甚至说：“要人头落地……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首先把邓搞下来，然后再对付华。”“四人帮”不无根据地把手中无权归咎于已故的总理。中国人民对总理的崇敬和怀念使他们忧虑不安。

已故总理的遗孀邓颖超这段时期日子非常艰难，因为众所周知她是邓小平的好友和支持者。记得3月份庆祝妇女节时我在招待会上见到她，她的朋友们对允许她露面并配给她一辆汽车表示欣慰。但中国人没有几个敢同这位即将成为政治局委员的著名孤孀攀谈，因为他们怕被人看到与她接近而遭受“四人帮”的惩罚。

宣传工具仍然控制在“四人帮”手中，新闻报导的质量和发表的观点即使从中国人的标准看也是十分低劣、一味重复的。华当上代总理后，一些比较可靠的时事消息是从秘书和其他服务人员们口头传出来的。我记得就是通过这种渠道得知毛建议邓公开承认过分强调生产、承认对江青的文化产品的批评有失公允。当时毛显然是有意让他回到重要位置上来，但邓没有答应毛的要求，拒绝承认自己犯有政治错误。自然邓的这种做法使“四人帮”非常高兴。他们似乎清楚国内有支持他们的力量，声称支持他们的人有三分之一到一半——许多专家认为他们的支持者不足全国总人数的三分之一。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爬上领导岗位的人（大多是年轻人），是“四人帮”的有力支持者，这些人担心一旦邓复职，他们就会蹈前面一批人的覆辙，被解除职务。当时有3,600万共产党员，几乎一半是“文化大革命”中入党的。1976

平上半年，无疑主席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2月份他还能够与一位著名外宾进行长达一个半小时的谈话，而到了3月下旬，就变得靠人扶着才能站立了，有时他的露面令人很难为情。但人们仍强调他还能活很长时间，而“四人帮”坚决认为，人民想看到他们的领袖。1976年初，大多数“局外人”就认为“四人帮”在使广大群众对毛的死和江青的提升有所准备。北京外表上看来非常平静，在这平静的外表后面，江青正在四处奔走，企图说服或者胁迫主要部长和高级官员们公开出面支持偏激派分子。同时，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成功地左右了不少作家群——如“梁效”、“罗思鼎”等，在报刊上辱骂那些在“文化大革命”武斗期过后被周总理、邓小平或者中国人民解放军恢复职务的官员们。在江青看来（她援引毛主席的话支持她的论点），这些官员们不能够“继续革命”，因为他们已经“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变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姚文元还安排把《人民日报》记者从北京派到各省，捏造那些支持邓的地方领导人的黑材料。同时，华国锋的肖像开始出现，人们对他的性格，当然还有他和主席的关系很感兴趣，他只有在江青陪同下或者江青说主席“身体可以”的时候才能接近主席。当时江青把牵线说媒当作扩大势力范围的手段。前外交部长乔冠华的妻子去世了。这个人叫龚澎，她与丈夫的生活经历相同，战争年代在重庆同在周总理领导下工作，后来在香港和上海当记者，1949年进入外交部当新闻司司长，1964年升任部长助理。龚澎公开忠于周恩来，1954年陪同丈夫参加日内瓦会议，1963年和1964年陪丈夫出访非洲。每个人对她的死都非常沉痛，江青则不然，她马上给乔冠华介绍了一个漂亮活泼的女子——章含之。章含之曾经教江青学外语，后来当王洪文的翻译。江青安排章含之与丈夫离了婚。乔与她结婚后不久便中断了同所有老友的联系。他的这些老友也是周恩来的故交。

华当上总理以后，三角权力斗争仍在继续，他试图既安抚偏激派，又不得罪“老将”们，他还要依靠这些“老将”。

非常奇怪的是群众把这场斗争推向了高潮。他们在4月初的清明节聚集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显然这场传统的“扫墓”仪式几个星期前就开始准备了。3月30日，一个献给周总理的巨大花圈安放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我就住在附近，因此注意到从这时开始，从工厂和郊外人民公社来的人们纷纷把用白色人造花朵制成的花圈带到广场上。尽管电台强调人们不应该浪费宝贵时间去制作花圈，不要在“祭奠亡灵”的仪式期间把花圈送到天安门广场，还说祭奠死者是旧习惯，但到4月2日（星期五）涓涓人流还是变成澎湃的洪流。广场几乎所有的人都佩带黑纱，许多人胸前还挂着自己制作的白花。消息在北京传开了，到了星期天，全城的人都认为，去天安门广场是必做的事。那天早上我有事出城到西山去了一趟，路上碰到成千的人或步行、或坐车、或骑自行车有秩序地向城里汇集，有的唱着他们自己潜写的歌颂已故总理的歌曲，有的背诵着诗词。

这天晚些时候，广场上的人似乎有几十万了（这个广场可容纳100万人），纪念碑四周的花圈堆了50英尺高。还有几百个挂在灯柱上，有的放在桌子和卡车上，上面飘着写有悼念诗词的绶带（悼念活动的几天中出现的诗歌、悼词现在已选编出版了几册）。还有一些用近乎直言的词语批评江青的标语，诸如“打倒女皇”、“打倒英迪拉·甘地”，还有一些间接地批评主席没有实施周总理“务实而又进步的政策”。整整一天，大学里的大门关闭着，以阻止学生加入天安门广场的人群，但许多学生爬过高墙，把悼词送到了广场。

星期日凌晨，由民兵驾驶的军队汽车开进广场，几百名穿制服的男女扯下花圈和标语，扔到汽车上。天亮后不久，我看到几百名很有战斗力的士兵在广场附近的兵营里从大轿车里走出来，

但据我所知，这些正规军一直保持沉默，在后来的骚乱中没有出动。

当花圈被搬走的消息传开后，尽管电台三令五申警告人们不要到广场去，但愤怒的人群还是聚集起来质问警察和民兵花圈被弄到哪里去了。又有消息说（这次消息不准）花圈被搬进了人民大会堂。于是人群潮水般涌进大会堂，高声疾呼，要求进入大会堂。但突然出现了几百名警察，阻挡人群接近大会堂。这使人们更加愤怒。这时一个显然是坚决支持江青的年轻人站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台阶上高喊说人们的要求是错误的，声称没有必要向已故的周总理献花圈，周总理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派”。我看到人群怒不可遏地把他包围起来，把他从台阶上扔了下来，使他受了重伤。然后一群群的人聚集起来，在广场上高唱《国际歌》，要求面见市长或者公安局的“头头”。下午两、三点钟，正当警察和民兵用大喇叭命令人群散开时，一群如痴如狂的人放火烧着了一辆空轿车，然后又点着了后面两辆吉普和一辆面包车。与此同时，广场上另外一些人群正在放置比原来还多的花圈，显然直到看见浓烟、闻到烧着的橡皮气味时他们才注意到着火的汽车。人群一会儿向这个方向涌动，一会儿向那个方向奔突，几十人受了伤。如果说有排斥外国人的情绪，那么我没有发现。随着下午的流逝，人群更加骚乱，两辆吉普车烧掉之后，人群闯进公安部队的一个指挥部，起初是想与一位高级警官交涉花圈问题，接着机密文件被愤怒的青年男女从窗户里扔了出来，最后这座建筑物被点着了。

晚上六点钟刚过，大喇叭广播了北京市长吴德的呼吁，要求人们解散，不要“上了有人预先设置的圈套”。有几千人遵命而去，主要是因为该吃晚饭了，他们已经很累，并且看来原来那些花圈没有希望要回来了。没有离去的人们则50到100人一组聚在纪念碑、灯柱或树丛旁边。这些人在一阵阵《国际歌》和其他爱国歌曲声中议论着此刻的处境。他们显然预料到迟早警察或军

队要把他们赶出广场。

我和一位日本记者在广场里转悠，注意到一些人的朋友们给他们送来了食物和水，黑暗中，一队队警察慢慢地把一组一组的人隔离开来。晚上九点半左右，忽然灯火齐明，大喇叭播放着狂热的战歌，几千名民兵从故宫、人民大会堂和广场南部的建筑物里冲进广场。当时我就在广场南端，大部分目睹这个场景的外国外交官员和记者在广场北部。

大卡车开进广场，命令人们都上卡车。我不知道他们是否要被逮捕。有几组人拒绝离开，但渐渐地天冷起来，加上他们要解手，人群相继散开了。凌晨两点半多一点，广场上便空无一人了。人们的确遭到了民兵的殴打，但我没看见流血，尽管确实发生了流血事件。第二天上午，几十个示威者又来到广场，尽管他们认识到希望渺茫，但他们还是直言不讳地告诉外国人，以江青为首的“上海偏激派”应该对搬走花圈以及后来的行为负责。

第二天，为讨论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毛主席没有到场，但后来透露说他建议撤销邓小平一切职务，保留党籍。然后华国锋升为副主席，仍任代总理。很明显，官方认为向周总理献花圈的活动是邓发起的，把天安门广场的骚乱归咎于邓小平。但北京几乎没有人相信这个罪名，因为众所周知邓小平已经失宠，在南方某个地方住。

江青早些时候曾在党中央委员会内领导了一场把邓作为“走资派和人民的敌人”“永远”开除出党的运动，由于没有得到毛的全力支持，所以没有得逞。因为天安门广场的示威和接下来的事件，主席的心脏病不断发作，但他偶尔还能活动。全世界都可以从电视屏幕上看到，主席的健康状况急剧下降。在迎接有名望的外宾时不搀扶他已不能站立，谈话时常常语无伦次。

尽管江青没有能够把邓开除出党，但偏激派分子们的权力还是扶摇直上。江青总是在自己的命令或建议之前冠以“毛主席想

要……”或“毛主席已经指示……”，加上她是唯一不受任何约束可以直接与毛见面的人，因此她达到了目的。当时似乎相当多的部长和政府高级官员认为她最终会接任主席，因而争相遵照她的旨意办事。

天安门事件过后两天，江青下令组织一场反对邓小平的大规模示威游行。使我备感震惊的是，我亲眼看到外交部长乔冠华（现已作古）跟在锣鼓队后面，领着中国外交官们绕着同一个广场，用西方妇孺皆知的一种节奏高呼“打倒邓——小——平”。（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①曾用同样的节拍——三长两短——高唱“阿尔及利亚——法兰西”。）乔的朋友们尽量原谅他，说他是受了新婚娇妻的影响，但部长的这种行为使许多中国高级官员深感尴尬。我的翻译是邓的坚决支持者，她很聪明，干脆躺在我的卧房兼办公室里装病，最后我出面证明她“病得太厉害”，不能按照指示参加反对邓小平的示威游行。

毛泽东逝世

不久以后，电视屏幕上一组毛主席接待新西兰、新加坡和巴基斯坦首脑的镜头使中国人民清楚地看到，他们敬爱的领袖已经衰老得几乎不中用了。但是，华主席4月30日陪同新西兰总理马尔登之后还能够留下来单独同毛主席在一起半个小时。据说就是在这段时间，毛主席给他写下了“你办事，我放心”。

我第一次在北京听到这句现在人人皆知的话是在大约一年以前，那时周总理重病在身，邓几乎接管了他的全部职责。当时主席曾对几个外国来宾谈到过他越来越为总理的健康状况担心，并加

^① 阿尔及利亚原为法国殖民地，1962年独立。——译者注

上一句：“邓办事我放心。”巴基斯坦总理、时运不佳的布托是最后一个见到这位主席的外国人，虽然他在公开场合说毛主席“身体还可以”，而私下里却承认毛“极其虚弱，怕要不行了”。

无论这位主席是否已经不行了，千百万中国人仍然把他奉若神明，无限崇拜。他支持新总理华国锋，但华一开始就受到两方面严峻而沉重的压力——一方面来自偏激派，另一方面来自认识到毛已不久于人世、需要有人接替的务实派。

普遍认为，能使毛改变对邓的看法的只有江，因为毛曾公开请回邓小平，欢迎他作为周总理的接班人。尽管没有确凿证据支持这一观点，但许多高级官员相信江确曾利用她手下人伪造的假证攻击邓小平。

邓第二次公开蒙辱后，江显得坚定自负、得意洋洋，在正式场合她显然“仗势欺人”。从“文化大革命”武斗阶段后期的1969年一直控制着宣传工具的偏激派，开始采取明显的行动使中国人民接受江作为共产党主席的继任人。他们指示出版界再三宣传吕后，此人在汉高祖死后自公元前195年至前179年统治着国家。历史学家们对吕后很不客气，因为在他们看来她“违反了正统原则”，而现在，按偏激分子的宣传，除了清除她丈夫家族的人（“清君侧”）之外，她似乎是存心良善、治国有方。更多的篇幅则用来宣传武后。武后原为唐太宗的妃子，唐太宗死后，她被迫削发为尼。新皇帝高宗巡视寺院期间爱上了她，并一反传统道德，纳她为妃。到了公元655年，高宗与她越发如胶似漆、难舍难分。为了正式娶武氏、立她为后，高宗废了皇后。武则天当上皇后以后，权极一时，因为除了天姿国色之外，她还通晓翰墨，能赋诗作词。683年皇帝驾崩后，她便成为她的长子和次子的摄政王，最后她不愿再幕后摄政，便自称“天子”，自立为女皇。她自己拥有很多情人，她统治的国家里，男女几乎平等。她治国严厉，坚决主张

修改科举制度，主张女子有自主权。

在各国大使馆工作的中国翻译们乐于阅读或者翻译关于武后的那几近色情的下流报导，因为他们的生活里极度缺乏浪漫的爱情故事，至于过去那些描写性爱的文学作品，许多青年人只是从老一辈人口中听到过。

尽管人们喜欢读报纸上那些关于这位妃子生活细节的故事，但这些报导对于提高江青的形象并没有很大好处。事实上，它们引起许多关于江青私生活的传说，在工人中悄悄流传。整个城市似乎突然间全都掩口窃笑、交头接耳，讲述江青过去的故事。旅馆餐厅的服务员们甚至也向我讲述江青的历史。

毋庸置疑，在遇到毛主席之前，江青有过许多风流艳事。许多人传说她母亲是天津的一个妓女，并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这一点。但是当时叫作淑蒙的江青，大部分时间是与祖父生活在一起，随后又进入山东省试验戏剧学院学习。她年轻时极其轻佻，有过一些放荡不羁的私通乱交传闻，后来她狂热地爱上了一个年轻的左翼知识分子俞启威。在他们同居期间，江进入了左翼电影界，开始对共产主义感兴趣。她“很有魅力，但爱出风头”，人称“自大的李小姐”，后来她移居上海，取名蓝萍。

和许多年轻女演员一样，江不吝与能帮助她获得角色的男人同枕共眠。她的一个情人帮她争到了一个月薪25美元的小角色。最后蓝萍与另一个情夫——剧作家兼导演唐纳结了婚，他帮助她在一个故事片中争得一个主角。但据她的一个同事说，她的“演技平平”。后来，在她自认为已跻身于二流名星的行列之后，又演过一连串令人失望的次要角色。

无疑，失败使她绝望。她的一位同事称她为“卑鄙残忍的少妇”。她过去的电影和舞台剧照不时出现在地方报纸上，这是她与记者们“鬼混”的结果，剧团的许多同事对此很是气愤。后来，蓝萍忠诚的丈夫发现她为了追逐《大雷雨》中一个角色而与

要制作这部影片的章泯睡觉时，企图自杀。这下子蓝萍便不必向记者们献媚委身即可见诸报端了。在大量关于“痴情丈夫”的报导中，江青成了当地颇有知名度的人。

（1950年，我在巴黎遇到了自称为蓝萍之夫的人，他在罗浮宫附近开了一个中国小饭店。我和丈夫在《新闻编年史》办公室里老是工作到很晚，下班之后我们常常到这个店里吃晚饭，听店老板讲述他是如何同现为毛泽东主席夫人的这个迷人女妖结婚的。因为职业——后来为了政治的原因，那些剧团不断更名，因此我们无法验证这种说法。并且我们当时也没有记笔记，很是遗憾。）

1937年，日本对上海进行轰炸，许多电影和戏剧剧团不得不离开上海，蓝萍因此到了武汉。到武汉后，她又演了一系列的小角色，结果更加使她失望，于是她决定离开武汉，取道西安到重庆。据报导，当时她因为放荡行为以及缺乏演技遭到同事们严厉的批评。与30年代她在上海那种放浪行为以及后来流浪北京时的传说相比，这些报导是极其温和的。这些报导和传说，与现在关于她从体育运动员中挑选情夫（我觉得不大有根据）的传说结合在一起，破坏了江青作为主席接班人的光辉形象。

天安门广场事件后的几个月里，江青曾把她的生活历史口授给一个被她称为“她的埃德加·斯诺”的美国学者，因此，国外对她的私生活作了报导，我个人认为已故周总理的追随者们对这种报导是知情的。当时看来“四人帮”很可能在毛主席去世后——甚至在此之前——接管权力。一旦偏激派掌权，务实派便将永远销声匿迹。因此许许多多一度守口如瓶、缄默寡言的男男女女突然开始交头接耳地谈论起务实派的国际和国内政策的目标，而不再那么谈论“四人帮”的罪行了（“四人帮”的罪行经过一阵流传，肯定已人人皆知）。

我的一个讲法语的情报员急于想把周恩来总理对党和人民的

忠诚作如实的报导。她认为多数久居北京的“外国朋友”在即将到来的危机中，会象在“文化大革命”中一样支持偏激派，而另一些则会因为心存恐惧而不敢对周“作出正确评价”。人们推测，周总理的遗孀邓颖超会与叶剑英、李先念、李德生，当然还有许世友以及所有的“老将”和各大军区司令员们一起遭到逮捕。人们不断听到偏激派分子们叫嚷“建立一支独立的军队”，这意味着他们已经掌握了上海和其他几个城市的武装民兵组织。负责这项工作的是张春桥，他不仅是人民解放军的总政治部主任，还是上海市市长（按当时称呼应称“上海市革委主任”——校注）。作为总政治部主任，他曾激烈反对邓小平任总参谋长时倡导的政策。当他策划把500万武装民兵同正规军分裂开来的时候，他的地位是稳固的。他在上海是成功的，搞到了大量的武器弹药，藏在其它地区以备应付“紧急情况”。张恐怕还掌握了南方的其它地区，后来在那里发现了大量的库存弹药。

7月末的唐山大地震使一切小道消息骤然平息。这场地震使中国人民感到惊恐，因为在传统观念中，重大自然灾害是改朝换代的先兆。根据官方统计数字，这场地震是世界历史上最严重的自然灾害，将近25万人丧生，16万多人重伤。地震后很长一段时期首都千万人住在帐篷里躲避余震，当时的政府管理工作效率很低。武汉、洛阳、哈尔滨等工业中心发生了罢工，铁路系统也到处出现麻烦。江青在各地的支持者们暗中煽动政治骚乱，他们声称华主席已被“保守派分子”控制起来。城市民兵开始公开袭击兵营，夺取小型武器和手榴弹、地雷。

一帮部长们和几十个高级官员装病呆在家里或干脆住进医院，以躲避表态，因为许多人受到残酷压制，要他们公开站出来支持江青和“四人帮”。官方宣传工具花很大时间和篇幅向全国进行宣传，以备主席去世，因为他已经八十三岁，身体日趋虚弱、日趋衰竭。电台不断播送他的诗词，他的思想也被用人们熟悉的书

法写了下来，比以往更大篇幅地被人们引用来引用去。北京的许多人仍住在街头以防余震。1976年9月9日下午4时^①，大使馆的中国工作人员告知所有外交官员，说天安门广场下了半旗，这条消息让这些外交官们感到震惊。几分钟内，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发布了一个讣告。因为这个讣告典型地表现了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报纸的语言风格，我在这里将它原文抄录下来：

《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

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敬爱的伟大领袖、
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伟大
导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
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③毛泽东同志，在患病
后经过多方治疗，终因病情恶化，医治无效，于
1976年9月9日零点10分在北京逝世。

究竟他死于什么疾病，没有透露，但据推测是因为震颤性麻痹症（从60年代末至今他一直苦于这种疾病），加上一系列的心脏病发作。街头广大群众在为尽职责而哭泣，但甚至还没有宣布追悼会何时召开，人们就急于知道“下面会发生什么事情”、“谁将接任主席”。政治局马上在尸体是火化还是保存的问题上发生了意见分歧（外交使团得到了这个消息）。在这个问题上华支持务实派，并取得了胜利，从此著名的天安门广场便被新的纪念堂所损坏，毛的以香料防腐剂保存的尸体现在就在这座纪念堂里供世人瞻仰。

① 此处时间有误，实际上是1976年9月9日下午3时。——译者注

②③ 这两个称谓原文中没有，是译者根据中文讣告原文加上去的。——译者注

粉碎“四人帮”

仅在毛逝世一个星期前，领导集团还尽量做出非常团结的样子。但没有几个北京人为这种表象所欺骗，尽管谁也说不了谁将在这场继任斗争中获胜。与此同时，几百万人到天安门广场无言然而又不安地默哀。一连几天，电台一直播送国歌和关于毛的讣告，讣告念得非常缓慢。电视台非常为难，在毛露面的电影甚至照片中，都有先后反对过他的十个人中的一个或多个，而这些人形象现在是不许出现的。过了一段时间，照片出现了，多是长征时期或共和国初期的，刘少奇和林彪的形象给抹去了。电视播出了事先安排好的镜头，多是孩子们听到毛主席逝世顿时眼泪如注的场面。一些外交家意识到这种悲痛是表面的，而周总理逝世时悲痛才是自发的、真挚的。这些外交家认为成千上万的人只是在扮演要他们演的角色，而内心却担心着他们自己和国家的未来。

这时，邓小平在许世友将军的帮助下发表了一个讲话，这个讲话是对“四人帮”的公开进攻：我们决不能让党和国家“变质”，被“那四个人”毁灭。因此他们要求他的支持者们“只要一息尚存，就要与他们斗争”，并说如果胜利了，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万一失败，可以再拉到山里去。他最后说他们——务实派——至少有广州、福州和南京三个大军区作为后盾，并要求他们务必不要拖延，拖延会使他们付出更大的代价。

江青此前已经预言：毛主席去世后，一个月内，“人民的敌人”将会采取行动反对她。毛主席去世后几天，中央委员会宣布，决定由华主席组织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她为此十分恼火。

追悼会象毛的去世一样，对中国来说是虎头蛇尾的，因为没有棺材，不安的政治局委员们成了注意的中心。的确，当他们从天安门城楼的门楼中走上俯瞰天安门广场上的、毛主席曾在上面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城楼平台时，互相没有说一句话、没有交换一下眼神，各自表情木然地站到事先按地位安排好的位置上。每个人都表现得似乎平台上只有他或她一个人，而江青给人的印象是超然而自制。下午3点整，宣布向死者“默哀三分钟”，然后奏起国歌。接着王洪文宣布华国锋致悼词，华念悼词时没有一点感情。悼词中没有一点线索暗示谁是毛的接班人。华宣读时，王洪文从他肩膀上探着身看，似乎要证实上面提没提到他。华呼吁团结起来，重复许多毛过去的口号，诸如“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悼词结束后，军乐队奏起了《国际歌》，然后人群散去了。德国大使曾写道：“全国对毛的告别虽然庄严却简单得令人吃惊”。据传，政治局怕人们示威游行支持一方或另一方。仍然在“四人帮”控制下的新闻界要求全国人民“按既定方针办”，但好象没人能理解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

追悼会后，政治局召开了一次紧急扩大会议，江建议华支持她接替丈夫作主席的要求，华拒绝了。“四人帮”一边命令宣传工具“进一步深入批判邓小平”，一边秘密鼓动上海武装民兵准备投入重大军事行动。

10月12日，全国的人突然全都转向能收到英国广播公司播音的收音机，收听它的汉语和英语广播。这家广播电台宣布了“四人帮”被捕的消息。虽然两天以前外交官们已经得到了“四人帮”被捕的风声，但中国官方迟迟没有证实。已成为共产党主席和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华国锋受到了老将们的极大压力，要他“迅速解决问题”。据报导，许世友威胁——尽管是微笑着——说若不“逮捕那个女人”，他就要“北上”。

逮捕是在负责保卫政治局委员们人身安全的8341部队司令员、毛主席的警卫员汪东兴指挥下进行的。尽管江青在毛死后不停地搬家，一会儿住在城内的宾馆，一会住在城外的宾馆，但8341部队自然知道她每时每刻的行踪。逮捕每个人的部队都由一个比此人的警卫队长官衔高的人指挥。王洪文和张春桥是以召开政治局常委紧急会议的名义被叫到会场的，几分钟内便束手就擒，华主席通过闭路电视监视着现场。江青是在西山一座宾馆里被擒的。

毛泽东一去世，“四人帮”就命令上海民兵秘密精心准备，随时准备接管。夜间，一车车自动步枪和弹药被分送到城内、郊区、港口和机场周围地区的指挥部里。当地的民兵指挥官们接到命令：警告排以上“军官”要“处于战备状态”，军装随时带在身边，睡觉要守在电话机旁。王洪文此前已接管了一个经过加宽、加固、装备有当时中国最新联络系统、电视以及无线电广播设施的地下防空洞。这个防空洞用来作为拥有100万兵力（这一定是大体估计或者愚蠢的吹嘘）的民兵司令部。受过训练的青年男女分组向民兵司令部报告当地人民解放军——尤其是步兵——的活动。

简单地说，北京的新领袖们使用了一个聪明的计谋（这是中国人惯用的手法）——用计通过分裂反叛者的领导集团和延缓时间的手段，摧毁了反叛力量。“四人帮”被捕几个小时后，担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华总理传召上海市党的领导人、著名的偏激派分子马天水。起初马不愿去，但由于用电话与“四人帮”或其在北京的支持者们联系的企图没有成功，最后只得在安排了一套电话密码（用于说明所发生的情况）后启程了。上海地下指挥部由于得不到马的消息，顿时紧张起来。终于马与他们通话了，但他的密码电话不清楚，说他们的朋友们——“四人帮”——都很好，只是太忙，没有时间与他们通话。

上海的民兵继续加紧在关键地区部署特别武装民兵，这些地

区包括火车站、银行、桥梁以及市政府大楼。这些活动全被人民解放军正规军精心安插的人注意到了。

张春桥、王洪文和姚文元在上海的私人秘书和工作人员由于不能与北京的老板们取得联系，异常恐惧起来，过去与他们联系是易如反掌的。此外，他们无法从任何人那里得知首都的情况。最后经过漫长的、不顾一切的努力，终于又与马天水联系上了，他用密码告诉他们：江青被捕了。

同时，群众越来越急躁不安，民兵领袖们决定封锁北京的电台。据报导，到这时为止，市区和附近地区的要塞已部署了3万多民兵力量。这时，北京命令另外两名民兵领导人立即出发到首都去。党、工会和民兵三方的官员们随即召开会议，经过紧张的讨论，决定还是服从命令。他们非常惊慌害怕，有些官员认为应该马上发动起义。他们还担心上海的代表一到北京就有可能被捕。但两位代表于10月10日安全抵京后给民兵指挥部打来电话，说他们安然无恙，不久便可返沪。同时他们要求继续准备（进行反叛）。但是，民兵指挥部派出的小分队到各个工厂对工人进行鼓动时，已经不象过去那样受欢迎了，因为“四人帮”被捕的传说已经传开。

民兵的狂热也是官方推迟证实“四人帮”被捕的原因之一。

“四人帮”和他们的高级同党所犯的根本错误是他们对汪东兴太相信，因为江青曾对他们说过，汪在延安给毛主席当警卫员期间，她与汪的关系很密切，在北京的这些年里，他们的关系也从没有冷淡过。此外，他们经常去毛主席的住处检查安全措施，向毛主席问安。江对她的支持者们暗示，她与汪有“特殊的关系”（当然没有性关系），这种关系会使他们的人得到保护。另外，汪东兴确曾不断向其他偏激派成员表示过他理解他们的事业。

邓小平再次复出

逮捕“四人帮”后，华主席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和军事压力，但是，也许是因为性情宽厚，他没有认识到与政权俱来的全部危险（尽管他知道政权会带来喜悦），因为他非常缺乏做党和政府领导工作的经验。当时在他身边工作的人员觉得，百分之九十的时间他都显得沉着冷静，但一旦听到坏消息，他就变得生硬、粗暴、不可接近。非常明显，他缺乏毛那种超凡的魅力和周总理的风度与智慧。这位新主席永远也不会成为亿万中国人民“心中的红太阳”，孩子们永远不会象对毛主席那样唱：“爹亲娘亲不如华主席亲。”

在报纸上，也仅仅是在报纸上，华比毛一生任何时候权力都大，因为毛从来没有集总理和党的主席于一身。这个双重角色不用说对华，就是对比华经验丰富得多的人也太重了，并且，他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困扰。一个是鼓噪得很凶的“凡是派”，以逮捕“四人帮”的汪东兴为首，支持者中有人熟知的北京军区司令员陈锡联。他们声称“凡是”毛主席说过的都是正确的。但在这场新的斗争中更有力量的是邓小平的支持者们。

华开始培养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起初他遵奉毛主席路线——尤其在外交事务中，要求他的朋友们支持“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苏联的代名词）的正义斗争”。同时他又提出支持“革命的、进步的事业”。

邓的支持者——务实派指望一逮捕“四人帮”邓就能重新上台，当他们听到华号召群众“深入批判邓小平”时，深感沮丧。这个号召没人理睬，到了1976年11月——毛去世两个月后，反对邓小平的运动自然而然寿终正寝了。许多党的干部说，华就

要陷入无法排解的严重困难，因为他才刚当了3年政治局委员，几乎毫无经验，而邓在政治局里已经干了21年。当时华的支持者都害怕这位个性坚强、经验丰富的人的影响。

大字报开始在北京街头出现，开始是表示对已故周总理的崇敬，然后开始呼吁邓小平复出。“我们要求华主席给邓小平同志一个工作”、“召回邓小平”之类的标语比比皆是，大字报贴满了全城的大街小巷、每个工厂和大学。这些大字报大都是学生写的，他们要求“恢复民主政治”，尽管很可能这些学生中谁也没有经历过这种形式的政府。象以往的大字报运动高潮一样，不少大字报的作者诉说他们在机关、工厂或农村受到的冤屈。有几十张谴责“四人帮”的支持者们的腐败和严重渎职行为。还有不少大字报强烈要求“为1976年4月5日的天安门事件平反”，揭下贴在它上面的反革命标签，谴责北京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和北京市长吴德镇压这场运动。另有几十张大字报要求审判“四人帮”。那些间接严厉批评华及其直接支持者们的的大字报，被警察夜间扯掉了。

华的有利条件是，他已经实实在在地掌握了权力，并且手中握有他在任公安部长期间搜集的大量人事和政治情报。比如，华之所以能说服大家采取果断行动逮捕“四人帮”，是因为他曾是调查林彪事件的调查委员会成员，从中认识到林彪失败的根本原因是他实施自己的计划的最后时刻常常优柔寡断。

许多干部都了解，毛主席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曾要求华和其他政治局委员“帮助江青高举红旗”，“不要让红旗倒下，帮助她避免重犯过去的错误”。这一点加上他对华那句人人皆知的但难以理解的“按既定方针办”的教导，使许多中国人觉得毛主席想（无疑是在江青的影响下）让江青作他的接班人。甚至当时人们就知道，毛办公室常发出互相矛盾的指示，然后由江青参加的政治局常委会议或压下或挑选出来。江青为自己不是常务委

员会正式成员而非常痛苦，但她可以参加常委会的非正式会议。

北京的12月，严寒彻骨，但上千人仍继续书写大字报，成千上万人冒着零下气温看这些大字报。大多数看大字报的人是年轻人或者中年党员，他们想从中得到邓小平复出的消息，这种消息从报纸和广播中是得不到的。这些人们担心，如果不执行周总理生前提出的国家现代化方针，如果不立即采取务实的经济政策，国内就会出现令人担心的局面，这种局面将会转化为危机。“四人帮”的支持者们当然不吃香了，但工、农业生产仍在下降，主要是因为缺乏鼓励和刺激。尽管人民解放军的指挥员们支持邓，但许多年轻士兵们受那些偏激派政委们的影响颇深，那些政委是张春桥任政治部主任时安插的。出现在北京大字报上的消息有时需要几天或者几个星期才能流传到各省去，但逐渐整个国家都知道了这些大字报的主题。

不断有消息传出，说邓小平“下星期”或者“下个月”就要恢复职务了。这些消息是中央委员同外国大使们谈话中透露出来的，但邓仍然没有露面。越来越多的负责人对毛进行口头的公开批评，说“文化大革命”的过火行为不仅是江也是毛煽动起来的，“凡是派”们对此深感忧惧。有的人甚至敢在私下谈话中称“五人帮”，包括毛主席。

华害怕审判“四人帮”，不仅因为在“四人帮”最后阴谋篡权那段时间他负责公安工作，还因为他是毛主席的“造物”，来自毛主席的家乡。并且对已故外长乔冠华在天安门广场事件后进行的那场过火的反邓表演，他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阻止。据当时西德驻中国大使和其他一些人说，乔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曾同葛罗米柯见过面，请求他一旦江青和她那帮人接管政权引起近于内战的动乱时给予支持和友好的表示。这位俄国人的回答十分巧妙。据报导葛罗米柯回答说，苏联“兄弟般的帮助”将需要时间组织，偏激派们必须自己坚持一个星期。换句话说，只有当

偏激派们眼看着就要胜利的时候，俄国人才去帮助。

1977年2月初，显然是在“凡是派”的授意下，《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强调“凡是毛主席说过的，必须照办，凡是毛主席决定的，必须坚持”。这震动了越来越多的邓的支持者们，尤其在广州。广州一批高级干部写信要求华主席和中央委员们“检讨、批评毛主席犯过的错误”。他们警告说，如果“继续掩饰毛主席的错误”，党就会失去人民的尊敬。

1977年3月，华主席召集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①参加人员包括各大军区司令员和约20位在各省的中央委员，专门讨论邓的问题。会上发生了尖锐的争执，但总的来说同意邓回到北京，恢复权力。但邓将担任什么职务，没有形成决议。以国防部长为首的政治局常委们最后同意让各省委领导同志知道，邓最终将恢复他原来担任的党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职务，也许（也是最重要的）还要恢复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叶和老将们担心（这种担心是有道理的）如果不放出邓复职的消息，天安门事件一周年纪念日将会出现全国性的大乱。他们安慰“凡是派”说，无论如何，在中央委员会同意邓复职之前，邓不会公开露面的，而且组织召开中央委员会至少需要三个月的时间。人们越来越急躁地盼望邓小平的平反复职。3月30日晚8点^②，电台和电视台宣布了邓小平复职的消息，顿时整个北京城“爆竹、烟火”直上云霄。第二天，全国各地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各省领导人也高兴地庆祝邓的复出。邓的第一次公开露面是观看一次足球比赛，当大喇叭宣布邓小平来到时，巨大的北京体育场内8万名观众起立欢呼。几乎没有人观看比赛，所有的眼睛都集中在邓身上。但人群注意到，陪同他的是以前公开批评他的

① 应为中央工作会议。——译者注

② 原文如此，疑有误。——译者注

北京市长吴德。

邓小平逐渐掌权

1977年，华国锋继续担任党的主席，但部级职位的一系列撤换已经削弱了他的权力，每次撤换都显得增加了邓小平各方面的权威。

北京的观察家们认为，1977年上半年的权力结构由三方组成。但事实证明这种划分失之简单。1977年8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叶剑英和他的伙伴们就完全同邓同呼吸共命运了。邓的政治影响虽然不断增长，但他仍然停留在政治舞台的幕后，不大露面。事实上，他在准备开放“文化大革命”初期以来一直关闭着的大学、学院和其他学校。在此之前，这些教育机关即使开放，也只是招收激进的学生，学生的选拔按照“四人帮”宣扬的要“红”不要“专”的条件。邓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认识到：如果不立即着手加强科学的训练，将缺乏工程师和专家去实施“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计划。

此外，邓一直对毛主席那套“赤脚”医生的提法不满，建议这些医生“接受一点医药知识的训练，穿上草鞋”。起初这些医生的职责是分发避孕药和治疗一般感冒的药品，但后来他们不经任何训练就开始治疗复杂的疾病。邓进一步起用在“四人帮”的统治下蒙冤受屈的人。

当邓小平提升他的忠实支持者赵苍璧取代华主席任公安部长的时候，许多外交官们认为华和邓那时就已经私下里达成协议：华不干涉邓为提高教育水平、为实施现代化计划做准备所做的尝试；而邓则同意放慢政治步伐，暂不对毛主席——尤其是毛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行为——作批评性的评价。在北京、上海、

其他政治上活跃的城市以及一些工厂、农村和党员中，毛的历史地位问题日渐成为争论的焦点。更重要的是，在人民解放军的许多部队中，这个问题已成为一个棘手而敏感的话题。虽然毛的雕像、画像以及表达他的思想的语录牌已经从车站和城市中的大广场上搬走，但中国家庭里仍然挂着他的肖像。为了保险，有的家庭还在毛主席像旁挂上了华的肖像。到了1978年春天，可以明显看出广大群众想知道他们这位共产主义的帝王和偶像是否已经因为他的妻子及其支持者被逮捕而降低了形象。他们明白，“四人帮”与毛主席关系很密切，他们的地位和晋升全都仰仗毛主席。

许多事后诸葛亮式的中国问题专家现在对这样一个问题表示惊奇：为什么天安门事件后，没有人作出任何努力把毛从主席职位上换下来，给他一个更高然而无权的职位，用毛本人在“文化大革命”前曾用过的话说，使他成为“供起来的如来佛”。因为那时从电视上看到毛的全国人民已明显看到，他们敬爱的领袖无论身体还是头脑都在迅速衰落。缺乏这种开创精神的主要原因是华象“四人帮”一样，仍在依靠毛来加强自己的地位，并且邓已下野，没有人具有勇气和力量把毛从他多年来自己封授的主席职位上换下来。

就是在1976年4月至9月这段时间江青树立起了她的权力，但基层党员中极少有人认识到江青和她的支持者们如此彻底地支配了毛主席。但江青没有认识到国防力量的至关重要性，“四人帮”没有控制住几个重要的大军区司令员，他们很可能受了年轻士兵们极左观点的影响。新兵们受连或者营一级偏激派“政委”们的影响很深，而这些政委们是按照“四人帮”成员之一张春桥的指示办事的。但老兵和军事指挥员们大都不同情偏激派。

1977年末，邓的忠实支持者胡耀邦（现任党的主席）被任命为党的组织部长，这是一个负责提拔和降职的关键职位。胡耀邦于1978年组织了一次长达一个月的政治工作会议，会议开幕式上

放映了几部以前连中央委员也看不到的旧影片。在这些影片中，毛主席不止一次承认他在“大跃进”运动中犯了严重的错误。这就为指控“凡是派”（或称左翼保守派）铺平了道路。这些人包括副主席汪东兴、北京军区司令员陈锡联、曾负责扼杀天安门广场示威运动的北京市市长吴德。作为农民模范被毛主席提拔到政治局里的陈永贵也受到了指责。在邓第二次被“四人帮”革职后保护了邓的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领导了这场对“凡是派”的抨击，华没有为“凡是派”辩护。

华“放弃”了他接替毛主席时得到的“最高统帅”的称号，请求将来称他为同志而不称“英明领袖”。他的权力在“内部人士”中迅速跌落。邓在讲话中批评了“凡是派”，但调子不太激烈。他说自马克思、列宁和其他共产主义奠基人以后，政治界又出现了许多新问题。恩格斯从未坐过飞机，斯大林没有穿过缘纶。同样，毛主席以后时代也变了，不可能死守他的指示去“做或不做”每一件事。

政治工作会议之后，共产党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开始谴责对毛的个人崇拜，攻击的主要目标是“企图束缚人们的思想的反革命势力”。华还为天安门广场大示威期间出现的诗词选集题写了书名。

1977年北京许多街道上开始出现大字报，称邓为“活着的周恩来”，有的质问“凡是派”扮演了什么角色。坐落在长安街上的中心电报局西面有一个汽车站，1978年11月，这个汽车站四周长长的围墙突然成了大字报的中心。象过去一样，一些大字报诉说凄惨的个人遭遇，比如有一个人因在政治学习会上“用小红宝书搔了搔脊背”被投进监狱长达15年。一个铁路工人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没有毛的支持林彪能有那么大的权力吗？”还有一些大字报说，毛对“四人帮”的行为一定点过头。而邓小平则因他的务实精神受到赞扬。大字报说许多工人的工资长了百分之四十

之多，工厂还恢复了物质刺激和奖金。有的大字报作者感谢邓允许他们从农村回到北京或其他城市，这些人是“文化大革命”武斗阶段后期被下放到农村去的。

这道墙以“民主墙”而为世人所知，因为它吸引了100多名当时驻北京的外国记者。这些大字报不断严厉地批评已故的毛主席。因此，那些有新闻价值的大字报，立即被电传到伦敦、东京、纽约、罗马和巴黎。几个小时之内，全中国都可以从BBC（英国广播公司）、东京电台和美国之音的华语节目中听到这些大字报。这些青年、甚至中年学生有时为突然间扬名于亿万中国人之中而欣喜若狂。

越来越多的大字报指向“凡是派”，说他们在毛逝世和打倒“四人帮”之后仍继续“维护镇压性的统治”。大字报作者们开始印行刊物，更详细地阐明他们的观点，要求享有同西方一样的个人和政治自由，这些自由在西方是当然的。

有一半以上的大字报是申诉个人冤屈的，这些大字报马上被另一些大字报盖起来。大多数政治性的大字报都表示对邓的支持，谴责华和毛。这些作者们张贴大字报不仅要冒些风险，冬天还常常要冒北京刺骨的严寒。不少作者对外国记者友好起来，甚至请他们到家里去。（在北京这是难以想象的，因为在我居留北京的三年半中，除了农民或工人模范的家之外，没有任何外国人到中国人的住处。中国干部招待我们都在饭店里。）

有一段时间，老于世故的老干部们却站在较远的地方看民主墙，或者从朋友那里打听大字报的消息。还有一些有趣的漫画，画的是穿着一身纳粹制服，与汪东兴紧紧地站在一起的康生。

1979年6月召开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①恢复了一些1954年的宪法曾设想过的人权，并宣布纠正过去法院错判的冤案

^① 这种提法不确。应是五届人大二次会议，——译者注

和改进司法制度的计划。根据我在北京和上海从法庭律师们那里听到的情况判断，一定有几千件不为人知或没有公布的错判案。这些律师都有几十年的出庭经验，他们说所有的被告都被判了罪，就他们所知无一例外。用我的情报员的话说，“被带上法庭的没有一个不判罪的”。

随着大字报的批评日趋尖锐，毛的形象愈加失色。许多大字报再一次要求审判“四人帮”，清算他们的刑事和政治罪行。大字报谴责他们是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无所不偷的盗贼、残忍折磨私敌的魔王。另一些大字报称，中国几乎所有的灾难都是因为他们和他们施加给毛主席的影响造成的。大字报还要求，与林彪政变有牵连的人都要作为“叛徒”审判。有的对法庭至今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反对这些“人民的敌人”表示强烈不满。这些大字报出现后不久，民主墙被封闭了，被一大队工人们洗刷一空。

显然一些消息灵通的大字报作者们认识到，之所以没有采取任何行动组织审判，是因为“四人帮”猖獗之时华担任公安部长，他自然顾忌审判中必然要抖露出来的政治劣行会推到他的身上。并且华无疑认识到，即使不再使自己与邓及其支持者们的关系更加复杂化，他的处境就已足够艰难了。尽管他竭力维持关系，他的地位仍日渐脆弱，因为邓已几乎把死守毛从前的教条的人全部清除出政治局，换上了他信任的人，包括经济计划专家陈云、党的总书记胡耀邦和四川省领导人、在建立成都与欧洲的贸易往来以及当地自由市场方面取得成功的赵紫阳。我1979年底到成都参观时曾目睹过成都的市场，卖肉、果、蔬菜和衣服的小摊不下一千个，甚至你可以在这条街烫发。

华主席对欧洲进行了一次为时很长的访问。它到了英国，那里有经验的中国研究专家从随员的态度便可一眼看出，他没有实权。甚至在他视察德比的罗尔斯——罗伊斯工厂时，工人们都明显看出了这一点。尽管中国人为他受到女王的款待而自豪，但当年最成

功的出访活动是邓小平对华盛顿的访问。邓访问美国后，中国在南部边境教训了越南人。这场短暂的冲突使北京在全世界享有的威望暂时下降了，但从长远利益看，中国人民解放军从这场战斗中吸取了不少的有益的经验教训，这对国防领域的现代化计划是大有裨益的。

社会和文化领域发生了很大变化。“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被禁映的中国电影复映了，外国的书籍刊物引进了，公开场合又听到了西方音乐。前面提到过的“五·七干校”——毛主席以前设想的使高级干部与农民相结合的地方——很快人去楼空。姑娘们开始穿裙子，使用西方的化妆品，小伙子们穿起了喇叭裤，戴上了精致的太阳镜。随着中国前所未有的自由市场的出现，有海外关系或者可以搞到外汇的人买到了电视机、手表和卡式收录机，随之也出现了一些妓女（我1972至1976年在北京住时，这是不可想象的）。另外，一些大城市开放了一些教堂，许多城市的清真寺修葺一新，尤其在中国最西部的新疆。宗教又受人“尊敬”起来。同时还发动了一场宣传“一夫一妻一个孩”的运动，那些生育两个孩子以上的父母将受到社会的惩罚。

有必要指出，尽管许多人，尤其是城市人正在享受着毛死前不可想象的生活方式，但事实不断表明，个人自由还是有一定限度的。

有几个月华国锋一点权力也没有，最后终于在1980年9月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辞掉了总理职务，这是党政领导集团的第一次大改组（共有两次大改组和几次小的改组）。接替他的是在中国已经很知名的经济人才赵紫阳，他曾通过设置自由市场使四川繁荣起来。后来于1982年当了国防部长的张爱萍担任副总理。邓小平为了给老干部树立一个好榜样，从副总理位置上退下来了。但应该强调的是，他的卸职对他的权力来讲没有任何影响，尽管至今还有些中国干部认为，邓犯了一个错误，他本应坐政府的第

一把交椅——哪怕是短时期的。

1981年，人们盼望已久的对“四人帮”和林彪余党的审判终于开庭了。华国锋竭力逃脱了出庭作证的可能性。1981年3月，部长职位又一次作了调整，副总理耿飚接任国防部长。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耿实际一直在做这个工作。四位年纪在七十到八十之间的老部长接受了邓的请求，当了“国务院顾问”。当顾问可以保住他们的“面子”，体面终生，并享受优越的住房条件，有时还可以使用小汽车。

邓越来越希望提拔“正在崛起的五十到六十岁之间的年轻指挥员”，因为他意识到了人民解放军一些部队里的不满情绪。这种不满情绪的出现，一是由偏激派政委的行为引起的，二是因为许多年轻士兵与他们的父辈不同，想回农村去。他们知道回农村去可以帮助家里养猪、养鸡、种蔬菜和果树（这些现在都允许在附近自由市场上出售），实实在在地增加家庭收入。与此相对的另一种不满的原因是国防力量在现代化计划中是第四位，也就是最末位。此外，许多军官渴望恢复军衔标志，而那些对年轻士兵很有影响的政委们却极力反对这样做。

1981年6月，华国锋终于卸去共产党主席职务，由胡耀邦接任。尽管邓小平（1984年八十岁）仍然是人们心目中的领袖，但在正式场合，赵紫阳和胡耀邦总是坐在他的左右，他们三个被公认为三巨头。八十五岁的叶剑英元帅1983年2月改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但仍是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委员的平均年龄仍为74.5岁。张爱萍（1984年）负责国防，黄华任外交部长，负责香港和澳门事务的姬鹏飞任副总理。邓不止一次告诉来访的外宾说国内问题占去了他太多时间。他提高了人们的工资，并象其他任何国家一样正在努力防止通货膨胀和严重的失业问题，这两个问题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新问题。

尽管存在苏联武装占领阿富汗和越南入侵柬埔寨问题，但中

国与苏联的关系还是稍稍有了改善。从《上海公报》发表后中美交换大使至今已近9年，但中美关系的改善远远小于双方的预期，北京方面对此感到失望。邓小平最担心的是华盛顿继续向台湾提供武器，同时中国在向美国购买高级技术问题上也出现了麻烦。北京认为美方提出的有关使用这些进口技术的条件有侵犯中国主权之嫌——而侵犯主权在中国是一个敏感的问题。但是，尽管有这些困难，北京同东京、华盛顿的关系还是令人满意的。

北京似乎承认亨利·基辛格提出的理论：世界经济和工业中心正在由大西洋转移到太平洋。他们认为从长远的观点看，这将会使中国得益。但邓是一位性急的老人，他渴望在有生之年看到台湾和祖国的统一。同时他必须对付这些迫在眉睫的问题：如何从西方得到机器制造工具、通讯设备和计算机，以便开始四个现代化计划的第二个项目——工业现代化。虽然谁也不会说农业作为第一重要的项目已经抛锚，但很难设想目前的务实派会鼓励用机械化农业装备使千百万农民失业。

反对激进派的运动仍将继续下去，为了使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能接受，自由派作家和知识分子将参与这些运动。“解放”以来中国发生了这么多戏剧性的变化，因此只有大胆的人才能预言它的未来。但目前可以看出的是，邓的后继者们——只要他们团结一致——很有希望在本世纪末将现代化计划付诸实现。

第 四 篇

总 体 概 观

第十七章 毛泽东：神？

人？或是怪物？

中国有句古老的箴言，叫做“你可以骑着马征服一个国家，却无法骑着马统治一个国家”，据说，这是一位姓陆的学者向汉朝第一位皇帝汉高祖（公元前202—前195年在位）提的忠告。^①毛泽东主席当初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时候，也有人向他提出过这个忠告，遗憾的是未引起他的重视，以致斗争年代毛泽东表现出的旷世才华（最初是作为一个地下工作者，随后是作为游击战士和延安共产主义区域的领袖），在他成为“第一位共产主义帝王”——即事实上的党和国家元首——以后，显得并不那么光彩夺目。

中国的官员们如今强调，说毛泽东主席是“伟大的舵手”和导师，说他们自己都深受主席恩泽；与此同时，他们也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不赞成毛的行政管理方式和毛对待持不同意见的人的方法。作为一个杰出的叛逆者，毛泽东继承了中国古老的游击战思想，用之于20世纪的中国，同时又对马克思主义加以改造，使之适合于他那独具特色的中华民族政治纲领。因此，他的名字无疑将永垂不朽。他推翻了腐朽的蒋介石政权，使四分五裂的中国重新统一起来，因此，毛主席又将作为伟大的民族英雄永远活在

^① 这是汉初学者陆贾的话，原文是：“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陆贾帮刘邦平定天下后，便弃政从学，刘邦知道后就责问陆贾：你是骑在马上帮我用武力定国的，为何现在却要为本？于是，陆贾便作了这句答复。参见《史记·卷二十七·陆贾列传》。——译者注

世人心中。的确，直到去世，他都一直受到“广大群众”（这是他对中国人民的称呼）的尊敬，甚至几乎要被敬若神明了。然而，即使在“解放”前，对他作为主席所采取的政策，也一直是不同意见的。解放后，知识分子中间对他更有强烈的不同意见，可悲的是，知识分子一般来说都太胆小怕事，不敢直陈己见。在毛泽东看来，每隔一段时间就需要有一场象“大跃进”或甚至象“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政治动乱。这种看法，使得连大多数真诚敬佩他的个人才华的共产党人也不能与他合作。

毛泽东之所以能长期保持领袖地位，这一方面归因于他个人本身那种超凡的魅力，另一方面归因于他从其他人那里得到的辅佐，特别是刘少奇和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间对他的辅佐。当这些人在主席创业的岁月里协助主席的时候，他们都敢于、也能够和主席争论，而且一般都是过很长一段时期之后，不是毛泽东抓住了他们观点中的要害，就是主席自己承认错误。实际上，除了“大跃进”狂热时期和“文化大革命”早期武斗的那段时期之外，当江青不在场、主席独自一人时，这些实干家们也还能够向主席直陈己见。

虽然毛泽东信奉只要目的正当就可以不择手段，但他也不时会受到良心的折磨。例如当刘少奇受红卫兵摧残而情绪沮丧时，他就曾短期保护过刘少奇。毛泽东确曾承认中国需要外国的技术，但和他之前的“帝王”一样，他也认为“天朝”是世界文明的中心。一般情况下，他很少过问外交事务，只有在处理同苏联及第三世界各国的关系上，他才一定程度地对外交事务有兴趣。他认为第三世界最终都会抛弃苏联模式的共产主义，皈依他自己那种类型的共产主义。

除了陷身于组织政治动乱，毛泽东总是集中精力考虑内政——大多是党务——问题。这方面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就是：进京以后不久，他就不再象青壮年时代那样对哲学和未来的婚姻问题

感兴趣。主席对外交事务缺乏兴趣，这一方面在许多问题上给国家带来了麻烦；另一方面，这又使周恩来总理能够在估计主席和政治局会接受自己的主张时提出新政策。

毛泽东入京执政的时候，他的思想无疑已大部分定型了。随后的四分之一世纪，他都是在运用他在上海、江西和延安学到的理论，结果使他变得脱离国际现实。他完全误解了非殖民化的要旨，以为由非殖民化会导致社会主义革命、最后导致共产主义力量全面战胜他认为正在急剧灭亡的帝国主义。他还常把国家预算比做算“家务帐”，坚持中国只能进口与自己出口的东西持平的东西，由此可见他对国家或综合财政也是一窍不通。主席确实也说过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可以贷款，但是，即使在中苏两国互称“兄弟”的时候，每次一提到贷苏联的款，他都会感到沮丧。无论是周总理或是财政奇才李先念，都无法说服毛泽东相信这么一个道理：对外贸易具有重大意义，它既有助于本国经济实力的增长，又有利于国家在国际上的权力的增长。毛主席在中央委员会里的同事们认为，试图用农民易懂的语言来解释国际政治经济问题，这与毛主席的人民战争哲学有关。诚然，周总理或他的亲密战友也有许多次成功地说服了毛泽东，支持象制造核武器之类的复杂计划。但是，直到毛自己实际上已公开表态为止，政治局都总是小心翼翼，生怕偏离延安时期的战争观念。

毛泽东根本没有重视发挥联合国的作用，他试图靠自己的专门代理人来对苏联及其盟友实行打击。为了争取毛泽东在比这更重要的外交问题上持支持态度，周总理和职业外交家们也有意接受毛在这个特殊问题上的指示。一位在主席身旁工作、且很敬重主席的女士说，主席虽然两度出访苏联，但他百分之九十的时间都用在考虑中国政治问题上。这位女士说，在毛主席看来，中国以外的世界都是虚假的、不真实的世界，只有偶尔几次主席才不这样认为，例如，当周总理访问非洲或1954年参加有关印度支那

问题的日内瓦会议的时候。

照毛泽东的看法，日本这个没有自己的国防军的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竟然如此迅速地得到复兴，真是不可思议。他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相继独立的东南亚各国很少采用社会主义制度，这让他感到“纳闷”。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新加坡，这些国家为什么要重新建立起资本主义类型的政府，这件事真让毛主席大惑不解。他毫不掩饰地在来访的知名人士面前表现出对这些国家的情况不了解，这简直让来访者们为他的天真而抚掌叹服。

不过，有一件事毛泽东却很清楚，即俄国人想竭力控制中国。这也许是因为俄国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候、在长征以前的游击战争时期就力图控制中国共产党。到50年代中期，毛主席、周总理和政治局其他成员都得出了一个很不希望得出的结论：莫斯科没把北京当作平等的伙伴看待。他们并没有把这个结论对外人讲，但俄国人却毫不隐讳地表现出打算利用中国为俄国的利益服务，就象利用东欧各国一样。1954年，毛泽东吃惊地发现中国正在冒一种危险，即可能丧失国家主权于他的共产主义“兄弟”之手，而为了从西方强权手中夺回国家主权，他曾经付出了如此高昂的代价和如此艰苦的奋战。早在1955年，赫鲁晓夫就对德国总理阿登纳说过，他对中国日益增长的潜势感到惊恐，并提出要与德国政府重修旧好，“共御黄祸”。对赫鲁晓夫来说不幸的是，周恩来的一些朋友把这位俄国领导人同德国政府谈的私房话转告了毛泽东和其他一些欧洲政治家。后来，阿登纳的回忆录也证实有过这些私房话。遗憾的是，中国有些领导人不大相信周总理的情报来源，只有主席一人重视了这条灾难性的消息。

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批判了斯大林时期的统治及斯大林的人品，事前没有向苏联的共产党盟国打招呼。这件事又一次激恼了毛泽东。毛与斯大林是有磨擦的，而且他和周总理都

认识到斯大林在朝鲜战争中“利用”了他们。然而如前所说，最初的朝鲜危机却使毛泽东能够把新中国统一起来共御外敌；随后又使毛泽东可以从苏联得到武器装备援助。

近来，一位年迈的政治局委员还揭露说，早在赫鲁晓夫之前，斯大林就企图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变成苏联的一个主要卫星国，就象蒙古人民共和国那样成为苏联在亚洲的卫星国（当然在面积上与蒙古大小不同）。不过，斯大林在对待毛泽东的时候更谨慎些。

如前所述，毛主席决定与苏联分手，走自己的外交路线，这件事发生在1959年赫鲁晓夫与毛泽东的不幸会面之后。除了与北京在军事和技术合作方面日益增长的矛盾之外，莫斯科当时在外交政策方面也要了两面派手法。俄国人拒绝向北京提供核技术，借口是北京不定哪天会头脑发昏，用原子弹攻打台湾；同时，俄国人却又要求有权在中国建立一个情报收发站，用以监视美国空军和海军在太平洋和东南亚的活动。同时，他们还要求在中国建立一个无线电转射台，和上述情报站一起归俄国军官指挥。莫斯科还提议建立一支中苏联合舰队，监视美国在太平洋日益扩大的舰队。据说，拟建的这支新舰队将利用在中国海空港口所能利用的一切便利，但指挥权却归俄国人。

与上述态度相矛盾，赫鲁晓夫强烈希望周总理撤销每天对属台湾管辖的金门、马祖两岛的炮击。中国的炮手们消耗了昂贵的弹药，制造了大量的噪音，但却没有杀伤一人。继毛泽东之后担任党的主席、至今（即1985年——译者注）仍是中央委员的华国锋说：“我们曾经称俄国人叫‘老大哥’，但是，1956年他们实行修正主义政策，企图限制我们的主权，使我们听命于他们在莫斯科的控制，从那时起，我们就不再称他们为‘老大哥’了。”

毛泽东确实清楚中苏之间的争论，因为中国——中央之国

——已受到牵涉，并且在已经从蒋介石和帝国主义统治下解放了的时候。他知道俄国熊已准备好了，打算把他和他的人民置于受俄国支配的地位，因此才在1959年气急败坏地撤走了5,000名技术员和专家，在中国各地扔下了大量没有图纸的在建项目。这种作法给北京带来了巨大的麻烦，但北京的领导人认为：这是为了保持独立主权值得付出的代价。

“文化大革命”使全世界都布满了反华情绪。在武斗阶段没有结束的时候，除了主席本人，政治局任何其他成员都把时间用在考虑自我保存和紧迫的国内问题上了，无法再去考虑其他问题。1968—1969年之交，国内局势稍有安定，周总理就开始着手考虑说服毛泽东对美国持较友好的态度。起初，他的话虽然在主席身上有些作用，但却微乎其微。因为毛泽东天生是一位坚定的“反帝”战士；况且，当时他仍然受到由他“选定的接班人”、国防部长林彪的影响。

周恩来对在与两个超级大国为敌的情况下中国的政治军事问题有自己的看法。他向主席陈述了自己的看法，随后，他破天荒地听到主席怒气冲冲地反复说“中国与苏联的关系一万年也不会改善”——在中国的北京官话中，“一万年”的意思是说时间非常之长。当总理提出应当尝试改善与美国的关系时，毛泽东甚至于更加暴怒。但是，尽管如此，几个月后（如果不是几年的话），主席还是允许可以讨论一些有关问题。

在这件事上，最使毛泽东受感动的是周总理的一番话。周总理说，为了和美国改善关系，他至少愿意忘却他以前当众受过的奇耻大辱——虽然他决不会完全原谅这次侮辱。毛主席和当时在京的其他人都听说过周恩来受辱的事。那是1954年的事。当时，周总理在出席有关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时，曾伸手向当时的美国国务卿福斯特·杜勒斯表示友好。杜勒斯当着法国政治家和一群记者的面，粗暴无礼地拒绝和周恩来握手。周恩来描述说，

那是“我一生中最丢脸的时刻之一”。可是，他现在竟愿意再次向美国人伸出友谊之手，这实在让毛泽东受感动。

正巧在“文化大革命”那段狂热阶段，以前与毛泽东有过深厚友情的埃德加·斯诺申请办理访华护照。当时把持外交部的红卫兵头头，粗暴地拒绝了他的申请。周总理听说后，立即命令给斯诺送去一张特殊护照，邀请斯诺携夫人访华。总理亲自负责安排了斯诺的访华日程表，其中包括与主席的多次会谈，以及主席嘱咐以斯诺名义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一次宴会。由于总理精心安排，这次斯诺访华结果很圆满，主席和斯诺又重温了他们在延安时代建立的友情。斯诺谈到了有关越南战争后美国对外政策将会出现的变化，他的话对主席产生了影响。出乎一般群众意料（其实也出乎中国共产党某些中央委员意料），国庆节那天，主席竟邀斯诺一起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城楼下的人群看到：他们敬爱的领袖正和一个“圆眼睛的洋人”亲切交谈——这个人也是一个美帝国主义分子，而正是为了反对美帝国主义者，最近刚举行过许多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主席让斯诺给理查德·尼克松带信说：“无论是作为一位总统或作为一名游客”，尼克松都会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欢迎。据当时伦敦《观察家报》消息灵通的记者丹尼斯·布拉德沃斯（Dennis Bloodworth）说，主席当时对斯诺说自己是“和尚打伞”。这句话是一句湖南歇后语的前半句；后半句是“无发（法）无天”。毛泽东这位叛逆者，当时正对他的马克思主义上帝隐瞒着一个事实：他已经准备同魔鬼打交道了。

在同样的气氛中，1971年，一支由6人组成的乒乓球队应邀访华。同时访华的还有一支英国乒乓球队，路透社派出乔纳森·夏普去遮掩这次锦标赛的真相。自从中国人逮捕安东尼·格雷以来，他是他们社里第一个进入中国的人。因此，当中国外交部一位高级官员一再为“火烧”英国代办处表示歉意、并且甚至出席

了庆祝代办处重新开馆的宴会时，一帮盎格鲁—撒克逊记者得以目睹北京在路线上的变化。

乒乓外交顺利进行之时，周总理又通过他在巴基斯坦的老朋友给华盛顿捎信，说他将为能见到美国一位高级官员而“高兴”。就这样，两个大国同时开始采取措施改善双边关系。如前所述，1971年7月，当全世界都以为基辛格正在伊斯兰堡患胃病的时候，他却进行了他的首次访华之行。这次访华，安排了尼克松总统1972年2月对北京的访问；至于详细情况，亚历山大·黑格将军后来曾有说明。毛泽东在尼克松踏上中国土地不到四小时的时间内就接见了尼克松。会见中，毛泽东明显表示了他对这位美国国家元首的友好态度，以及他对周总理的新外交政策的支持。也只有象毛泽东这样受人敬爱的领导人，才可能既在外交政策上做出如此戏剧性的变化，而又得到党和政府的支持。

毛泽东虽然对外国缺乏了解，但却很喜欢接见国家元首或其他重要外宾。引进电视以后，政治局就通过在电视上宣传这种接见活动，帮助主席与人民群众保持接触。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在1971年“五一节”庆祝大会上。随后，在1973年8月召开的党的“十大”上，他虽然主持了会议，却并未象往常那样对与会代表讲话（这是第一次这样）。

差不多就在周总理发现自己患有心脏病的同时，毛泽东也第一次真正感到患震颤性麻痹症（又译“帕金森综合症”——译者注）带来的不适。可是，1974年他在会见英国反对党领袖爱德华·希思的时候，仍然是神采奕奕，两人在一起谈得十分融洽。有一位翻译人员对这次会见做过生动的描述。他说：在一番寒暄之后，主席接着问希思先生对在机场上受到的接待是否满意。听到这位前首相回答“太满意了”，毛说：“但我却不满意。恩来，你听着，我从电视上看到了当时的情况，我很想知道，为什么没有象迎接国家元首那样迎接希思先生。”

周总理回答说，在英国，女王是国家元首，担任现职首相的是哈罗德·威尔逊，如果把欢迎希思先生的仪式搞得太隆重，威尔逊会不高兴的。主席一听就激动起来了。他说他不打算对威尔逊所说和所想的说三道四，他只要求在希思先生访华期间，要象接待国家元首那样给希思先生以充分的荣誉。周总理点头答应了此事。希思离京赴沪以及希思访华的整个过程中，都象皇帝一样受到了三军仪仗队的迎接，且有漂亮的舞蹈姑娘和歌唱家伴随左右。他最后从广州乘车离开中国，站台上大约有500多名着长礼服的舞蹈姑娘伴着音乐跳着舞为他送行。

不幸需要指出的是，1975年以后，主席的记忆力严重下降，而且江青对他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由于人民公社的超前成立，导致许多人遭罪受难。为此，主席受到了严厉批评。由于缺乏农具，农民刚分得地主的土地不久，就不得不进入合作社。随后，农民又被推向农业公社，由此造成成千上万的牛羊死亡。毛泽东去世后，这些单位——大都各有35,000左右人口——在没有造成任何生命损失的情况下重新解散。有千百万农民，他们原先打算终生拥有一块田地，后来却被迫进入人民公社。所以，最后解散人民公社，对于缓和这些农民的后代们的失望情绪，起了一定作用。如今，他们又可以稳稳当当地拥有一块私有地，在上面种菜、养鸡、养猪到市场去卖。

毛泽东不是行政管理家，甚至不善于管理自己。他在青年时代就曾多次因为诸如缺钱买火车票或忘记共产党开会的重要地址之类的原因，造成一些意外事故。对他来说，值得庆幸的是，他有一批能干的助手，包括杰出的行政管理专家周恩来和刘少奇。前者逐渐重建了一整套行政机构，后者则和邓小平一起把党务工作搞得井然有序。

作为第一位共产主义的“皇帝”，毛泽东曾多次对“内部人士”回忆说：在他青年和中年时代，他就已经认识到自己必定会

成为第三个白手起家统一天下的人。按照毛泽东自己的说法，第一个这样的人是汉高祖刘邦（已在前面提到过）。刘邦原先是一个半路出家的士兵，他从一个占山为王的造反者开始，经过一番奋斗，最后君临天下。第二个这样的人是孙中山，即1911年中华民国的第一位总统，他曾经受过医学教育，开业行医。毛泽东在成为“统治者”之后，先是被那些对他毕恭毕敬的人包围，后来，当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树立对他的个人迷信时，他所得到的效忠比原先那些人对他的俯首贴耳更有害得多。毛泽东在会见斯诺时说过，对他的个人崇拜搞得太过火了。这时，他实际上已经认识到了个人迷信的危害。此后，毛泽东告诉他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的第一批年轻人，要他们“还我飞机”，并且补充解释说：如果把用在制造毛泽东像章上的金属用来造飞机，保卫祖国，将会有用得更多。

林彪的叛逃是毛泽东一生中遭受的最大一次打击。这件事导致主席的身心健康状况急剧恶化。过去也有些“同志”曾站在苏联一边，在政治上与苏联勾结，这当然也让人不快；但是，这与得知“已选定的接班人”在苏联的协助和纵容下搞军事政变时产生的憎恶感相比，实在是大不相同。虽然当时毛泽东与林彪之间关系已很紧张，乍一听周恩来汇报说林彪及其同伙实际上已准备谋杀自己，毛泽东还是大出所料，不愿相信。毛泽东确实击败或排斥过反对他的人，但他在与许多来访的外国人谈话时一再重申说，他从没想到过要置这些人于死地。林彪的未遂政变既强烈刺激了毛泽东，又在他还头脑清醒的时候为他临去世之前提供了一段“黄金时期”，因为他从此可以重新坐下来发挥他的领袖作用。“文化大革命”告終了（尽管如今人们认为当时这场动乱仍在持续），周总理在掌管国家机器运转的同时，也使中国同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关系趋于密切。

遗憾的是，无论是周总理还是他的助手邓小平，这时都没有

想到应该把毛泽东变成一个没有什么实权的挂名国家元首。这倒不是因为以往在这方面的尝试失败了，而是因为他们觉得他们还特别需要仰仗主席的权威来对付林彪在军队里的势力，这种势力当时仍然很强大，有时很难对付。另外，即便周总理当时处于权力的鼎盛时期，他也还是受到来自江青的制约。邓小平就更是如此。主席虽然说过对江青不满意，并说江青会在他去世后制造麻烦，但他依然信任江青，准许江青继续控制宣传工具。随着周总理病情日渐恶化，随着反对邓小平和反对务实派的一方权力越来越大，“黄金时期”就逐渐消失了。毛泽东急于结束他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生活，却依然希望保持一个叛逆者的生活。考虑到大多数人在步入中年后都变得右倾，他便设法使自己保持激进的身份。他虽然很有权力，但生活却很俭朴。每当他认为有必要的时候，每当他看到有人正在变成新的共产主义特权人物时，他就会领导一次小起义，起来反对新的共产主义特权人物。他对当时在苏联形成的阶层结构总持批判态度，力主中国应当避免出现政府机关和官员特权阶层。不幸的是，他没能实现他最后的抱负。

在主席生命的最后一年中，江青和“四人帮”一伙丧心病狂地把可怜的、几乎已丧失说话能力的主席用作他们手中的工具。1976年4月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的示威活动前后，“四人帮”的所作所为使毛泽东遭受到一系列打击，此后，他再也没能从这些打击中恢复过来。其时，毛泽东已成为一具活尸，丧失了思维能力，这就使一条条互相矛盾的指示得以从他的书房里发出。他以前说过，在他“去见马克思”之后，应当由一种集体领导来继承他。然而，当他需要把权力移交给集体领导时，他却不能够说话了。再说，就算他能说话，他也无力阻止偏激分子与务实派之间的权力斗争。

第十八章 审判“四人帮”

1980年11月19日开庭的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审判，常被不少人拿来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时在纽伦堡对德国战犯的审判相比较——后者是一次由胜利者对被征服者的审判。这种比较有一定道理。不过，公正地说，把林彪和“四人帮”为达到其篡权目的所干的恶魔般的勾当向广大中国人民揭露出来（或至少是揭示其中某些勾当），这也是合乎情理的。

除了在“文化大革命”前夕和“文化大革命”期间双方之间的密切勾结之外，与林彪的其他所作所为相比，江青的所作所为是一个有其特点的混合体。的确，两人的行为都是狡诈、疯狂、罪恶的行为。他们都理当受到审判，因为他们犯下了大量杀人罪行，捏造了无数谎言，在肉体和心灵上对千百万无辜的人民实行迫害。不过，假若能把全部审判程序向公众公开，国际上对这次审判的合法性本该会了解得更多些。但是，中国当局宣布不可能全部公开，因为那样一来就会泄露某些国家机密。

法庭上公开出示的证据，确凿无疑地表明林彪和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相互勾结、捏造假证、反对国家元首刘少奇。值得注意的是，毛主席当初虽然不在北京，但是，他的夫人“直接掌握着”调查“刘少奇及其夫人王光美的专案”，这一点他是清楚的。也许，主席并不知道江青所用的恶魔般的手段，特别是她在把刘少奇和王光美诬陷成美国战略情报特务的时候使用的手段。为了取得打倒这对夫妇的证据，江青把刘少奇家的厨师关到监狱

里，断断续续折磨了6年之久。王光美那位年迈的老师杨承祚教授，被抓进监狱的时候正患慢性病，江青丧心病狂地下令专案小组，“要在杨死去之前从杨口里榨出我们需要的材料”。

江青在法庭上辩解说，她真正犯的全部罪行，都是“以毛主席的名义”或“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干的。她扬言：“把我抓起来弄到法庭上受审，这是对毛主席的侮辱，我执行和捍卫的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另一个场合，江青说：“我是主席的一条狗，他说叫，我就叫；他说咬人，我就咬人。”

但是，主席绝对不会下令让她勾结林彪的夫人叶群，销毁她30年代在上海当电影演员时的私生活照片和情书，以便她涂改她的历史。确切无疑的倒是：这两个女人下令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三名高级军官，搜查了上海电影界那些老人的家。50多名“青年和解放军战士”乔装成“红卫兵”，于10月9日凌晨的几小时内，同时洗劫了5位老电影演员和电影制片人的住宅——江青早年在上海时，这些人都与江青接触较多。他们保存的1949年以前的日记、信件、笔记本和照片，全被劫掠一空。一位电影男演员的妻子告诉法庭，她的丈夫因年轻时与江青有瓜葛，被抓进监狱，两次受传去见张春桥，张春桥命令他交出“有关材料”，他也照着做了。原因很简单，因为江青记得她写给这位演员的一封信现在不见了，于是这位演员才被抓起来一直关到死。江青早年的一个女仆也被抓进监狱，因为她知道江青过去的许多风流艳事。京剧《红灯记》的作者也身遭诬陷，惨遭迫害，因为江青想把他写的戏收进江青声称由自己创作的8个样板戏之中。

江青声称，凡不是照主席指示办事的时候，她就是和她的老搭档、安全部长康生一起工作。至于江青的活动究竟主席知道多少，在这个问题上也有不同的报导，但有意思的是，江青的许多讲话都被她的“敌人”录了音。这些录音在审判时成了驳斥她的铁证。有人甚至说，应周总理要求，江青的有些讲话被送到了主

席那里，但主席却没采取公开行动。当时中国人对磁带录音机极为敏感，例如，当时就不许带录音机进人民大会堂。在这种情况下，竟然真敢有人把江青的讲话录下来，这可实在有趣。另外，当时即使想为拍电影录一次公开讲话也是极困难的事（很难得到批准），可见江青的“敌人”中有胆大敢为之人。

1968年9月江青曾说过：“我告诉你们，刘少奇是一个大反革命，一个隐蔽起来了的大卖国贼、大叛徒、大内奸，五毒俱全……我认为应当对他凌迟处死、千刀万剐。”她的说话风格就是地地道道的刺耳、唠叨。江青用来恐吓人的手段就是：你如果不提供她要你提供的陷害人的证据，她就把你抓起来关进监狱。我理解人们被江青的威胁吓成了什么样子，因为他们明白，如果被江青或江青的爪牙列入黑名单，他们就永远不会再见天日。

据说，1966年3月，江青曾经召集党和国家领导成员开会，在会上骂邓小平是“法西斯分子”、“大内奸”、“反革命两面派”。人们猜测，主席当时可能是闭目塞听。“文化大革命”狂热阶段，江青、康生和林彪在军队里的同党相互勾结，他们当时对主席肯定是采取了任意支配的态度。任何人，只要你无论是对江青或对林彪持批判态度，你都会受到陷害。中共中央内部至少有88人在1968年7月因此被打成“内奸、叛徒”，“里通外国的坏分子”或“反党分子”。实际上，几乎所有不受江青欢迎的人都被打成了“凶恶的内奸”。北京市有一位副市长、两位部长和著名作家廖沫沙，都被关押8年之久，在肉体和精神上备受摧残。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民族委员会副主席王昆仑说，“他们（指江青、康生或谢富治）一句话，我就被抓起来蹲了七年监”。张春桥在广大群众心目中虽然从不是一位领袖人物，只不过是一位“冷冰冰的”管理官员，但是，在和林彪集团勾结一事上，他对江青的影响却很大。张春桥总是强调“改朝换代”的必要性，强调“我们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掌握从基层到

中央各级组织的权力，包括党、政、财、文和其他领域的权力。”

张春桥宣称，老干部是阻碍夺权的绊脚石，“他们都是坏家伙，一个也不能放过”。他认为老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常常阻碍挡道，这也许是主席同意的看法；但他不可能怂恿清洗老干部，他只是主张要老干部退休。回想起来，主席对张春桥的讲法竟然不害怕，这真让人纳闷，因为张春桥当时为“四人帮”掌管着一个非常凶恶的组织，即一个特殊谍报小组，代号244。这个小组在北京、上海、天津、杭州（暂且只提到官方正式说过的这几个地名）都设有组织极为严密的分部，它有权拘留任何一个人。受害人常常是秘密受审，而且，为了得到想得到的供词，“四人帮”总是滥用刑讯。

受害的人数多得吓人。例如，当陈伯达煽动大逮捕时，有84,000人受到刑讯，其中至少有2,955人受酷刑致死。法官问陈伯达凭什么对河北省东部党组织中的这么多人下毒手，陈回答说：“根本没有凭据。我是信口胡说的。我服罪。”

有些当时和毛主席一起工作的人认为：“主席根本不知道正在背地里进行的骇人听闻的事情。”有人则认为，毛主席即使不知道这些事情的全部，至少也知道一部分，因为周总理的支持者曾设法通过抱同情感的翻译人员把这些事情告诉主席，而这些事情对江青是不利的。就象众所周知的那样，陈伯达一直与主席关系十分密切，直到因为缺乏自己的权力基础而投靠林彪和江青为止。成功地捏造了一大批重要人物的证据之后，这些偏激分子又在1974年企图诬陷周恩来总理。根据法庭上提供的证据，这件事正好发生在1974年主席提名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的时候。江青认为周总理是她最大的敌人，所以她让王洪文到长沙告诉毛主席，说周总理虽然住进了医院，但仍在和邓小平一伙“密谋篡权”，就象林彪“九大”前后在庐山所做的那样。当时主席被“四人帮”激怒了，他当即把这件事告诉了在场的来访者，这些

来访者都是政治局成员。

1976年4月，天安门广场发生了清明节示威活动，公开悼念周总理，歌颂周总理的丰功伟绩。这件事对“四人帮”的刺激，比当时在京的外交官和新闻记者所认识到的更深重得多。如前所述，张春桥诬告说邓小平组织了这次示威，而实际上邓当时已经失宠，从1月底就已离开了北京。张春桥称邓小平是“中国的纳吉”，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修正主义者。这次示威过后，“四人帮”煽动对上海市原市长、副市长和其他一大批人进行迫害，致使这些人惨死狱中。

尽管毛泽东对“那十个起来反对我”的人感到恼火，但却很少反对任何来自党内左翼的人。主席几乎对每一个访问他的外国人都提到过那“十个人”，但据这些来访者说，他们对他说的东西基本上是不知所云。在主席的印象中，那十个人中只有张国焘没有走过亲苏路线。其他人在建党初期大都接受了莫斯科的观点，认为党和将来的革命应当以城市工人和工会为基础，而不是以毛所偏爱的农民为基础。

究竟应当坚持以农民为基础的游击战争，还是应当坚持阵地战，这对于毛泽东及其追随者来说，在长征之前和随后的延安时期，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早在独立前夕，俄国人就提出要把他们的行政管理方式强加给解放区。虽然刘少奇在建国后并非亲苏，毛泽东还是经常提到他年轻时在上海和其他城市组织秘密工会的事。提到林彪，毛泽东则说他指望在他的军事政变中得到苏联人的帮助。这样，毛泽东晚年就显得把情况过分简单化了，以致对情况的认识有些歪曲。他在老百姓中寻求支持，这些老百姓的百分之八十是农民。他错误地认为农民的绝大多数是左派，认为城市的百姓都是右派，而且认为后者可能同情苏联。

毛泽东认为应当不断向真正的共产主义社会前进。他认为在真正的共产主义社会中没有货币，无论干什么工作的，都可以有

饭吃、有衣穿、有房住、有娱乐，“各取所需”。从根本上说，他反对形成象当时苏联形成的那种共产党人特权阶层。为了避免形成这么一种阶层，他认为必须隔上七、八年就来一次阶段性的动乱（例如“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动乱），阻止形成这种特权阶层。别的中央委员都穿新衣服、脚蹬皮鞋或从通常只对外国人才开放的商店里享受特殊商品，毛泽东自己则穿的是带补丁的衬衣，他那双毛毡鞋也是几经修补的。无论什么饭，只要有辣椒他都可以吃。刘少奇和林彪这两位“选定的接班人”相继让他失望以后，他无法再建立起一个令他满意的、他可以信赖的集体领导班子，来接他和周总理的班。听说周总理去世，他除了写“你办事，我放心”之外，就已没有精力再做更多的事了。当时，他有许多时间都是受江青支配的。

第十九章 毛泽东反对过的 十个主要人物

毛泽东晚年常常为十个人感到恼火，他认为这十个人领导了反对他的十次战役，旨在推翻他的政治和个人权力。他经常提到“那十次有关我们〔党〕的路线问题的重大斗争”。实际上，这些斗争不过是在政策和领导问题上的一些重大争论而已。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十次事情中，有九次都深深牵涉到苏联，牵涉到共产国际和俄国共产党。

陈独秀 他是一位知识分子出身的中共创始人，1927年武汉召开的第五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他不允许对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作任何讨论，由此引起与毛泽东的争吵。陈独秀当时因为反对共产国际关于同蒋介石国民党联合的政策，已经把与苏联的关系搞僵了。他认为，毛泽东这份报告中关于土地问题的激进观点，将导致中苏两党关系完全破裂，但当时中共在财政上却还要依靠莫斯科供应。后来，毛泽东告诉埃德加·斯诺，说陈独秀犯了“动摇不定的机会主义错误，它使党失去了决定性的领导作用”。毛说：“陈独秀确实害怕工人，特别是害怕武装起来了的农民。当武装起义的现实终于摆在他面前的时候，他就完全失去了理智。”在被国民党逮捕入狱之前，陈辞去了党的职务，投入托洛茨基分子的行列。获释后，他又重返他青年时代的古典研究行当。

瞿秋白 他是中共党内职务最高的一位烈士。因为患慢性

肺病，长征开始时他留在了江西，36岁时惨遭国民党杀害。他翻译过托尔斯泰的作品，一般来说，他与中共党内亲苏派的关系也很好。他也和陈独秀一样，不赞同农民起义，认为革命的主力军是城市工人。不过，毛泽东曾多次说过原谅瞿秋白的全部政治错误，因为瞿秋白是作为共产党人和马克思主义者被监禁和杀害的。

李立三 在中国，最著名的积极反对毛泽东的一位早期领导人就是李立三。他曾留学法国，归国之前去了一趟莫斯科，回国后在广州担任组织工会的工作。

他提出了如今人们所说的立三路线，并且在工人中间颇有影响。他的一位同事描述说：他是一位“优秀的劳工领袖，一位具有非凡的说服力的鼓动家。几乎每一个听过他演讲的人，都会被他打动”。他是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的主要组织者之一，那次起义尽管只持续了5天，却使共产国际对在中国城市可以有何作为产生了误解。公正地说，李立三实际上是想在一种困难的三边关系中维持中立，构成这三边关系的各方分别是：莫斯科、设在上海的中共首脑机关和正日益壮大的解放区的游击队伍（这些队伍都有“山头”）。在向莫斯科汇报来自工人之中的对共产党的支持和红军所能提供的军事力量时，他也许过于乐观了。事实上，当时群众未能起来响应党的号召，红军也撤退了。他预期的长沙起义和武汉起义从未成为事实，他也丧失了莫斯科眼中的权威。毛泽东谴责过李立三，但直到30年代中期，他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仍然小有影响。

罗章龙 他对中国共产党来说虽然要次要得多，但毛泽东还是不喜欢他。不过，在个人感情上，毛泽东却为他感到痛惜，因为毛泽东当年在报纸上登广告征寻友人，希望找到“刻苦耐劳、准备为国捐躯”的青年朋友，他曾经响应过毛泽东的广告。罗章龙曾经响应并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据毛泽东告诉斯诺说，他

又“转向了”。他也认为应当以城市工人为革命主力军，不赞同以农民为基本力量。他是一度曾有权有势的亲苏派“归国学生小组”中的知识分子之一。毛泽东谴责他，说他是一个“反革命分子”。他曾遭国民党逮捕，后来逃到了香港，最后又逃到了北越，有人认为他死在北越的一座监狱里。^①与解放前反对过毛泽东的其他中共领导人不同，罗章龙的能力还不足以使毛泽东感到不安。

王明 王明的名字至今仍是中国人所共知的一个名字。他曾经留学苏联，毕业归国后是“归国学生小组”的领导人，1930—1931年，在人事权力斗争中，他击败了李立三，取而代之。不过，王明虽然取得了对城市党的领导权，却从不曾得到各游击区的拥护。毛泽东认为，由于王明的错误领导，几乎使国民党统治区共产党的地下组织被国民党破坏殆尽，最后又使农村根据地在国民党的连续打击下丧失掉了。因此，共产党游击队不得不进行长征。

1935年红军长征到达贵州遵义后，才首次有机会坐下来讨论红军本身的问题。王明这位挂名领导身居莫斯科时，在国内——可能是上海——组织与国民党斗争的是刘少奇。毛泽东这位几乎是在蒙受耻辱的情况下离开江西的人物，在遵义发起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同时有归国学生参加。所有的红色将军——红军指挥员——都象周恩来一样支持毛泽东。在此之前，作为一个归国学生，周恩来一直是同情莫斯科的。这样，毛泽东就有把握对党内那些亲苏分子取得第一次关键性的胜利。此后，王明就不再起领导作用了，但他仍然留在中央委员会里，不时起一些次要的作用。

张国焘 中共高级党员中，唯一叛逃到国民党方面去的人

^① 这种说法不真实，详见第二章有关译注。

就是张国焘。从那以后，他成了毛泽东和政治局其他成员严厉抨击的对象。他与毛泽东的争论，最根本的起因在于对红军长征去向的不同看法。1935年，张国焘主张红军继续西去，一直退到新疆，以为红军在那里可以得到苏联援助。毛泽东则主张红军北上。经过几天的激烈争吵，二人各奔前程。张国焘率领的队伍基本上被全歼，不过，他本人还是设法生还，到延安投奔到毛泽东手下。

虽然张国焘此时已不是对手了，他与毛泽东之间的激烈争论却依然在继续着。毛泽东指出，张国焘表面上假装赞同毛泽东，实际上却在准备“最后叛党”；并且指出，“他投向了国民党的怀抱”。张国焘的确是逃到了重庆，在那里为国民党效劳，直到国内战争结束才逃往香港。“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怕红卫兵攻占香港，于是逃到了加拿大，在那里也没能摆脱毛泽东对他的谴责。

高岗 高岗对共产党根据地的发展起过关键作用，那块根据地在长征结束时为毛泽东和他那支人困马乏的队伍提供了栖身之地。高岗和毛主席一直相处得很好，以致40年代末，当别的高级干部都随林彪的队伍南下时，高岗却留下来当了东北三省的最高官员。1949年7月，高岗去莫斯科谈判一项易货协议，用大豆、菜籽油和谷物换取苏联的工业设备、汽油、汽车、纸张和药品。当时，苏联和国民党之间还保持着外交关系。高岗从苏联回来，很快又去了北京，在党和政府的好几个部和委员会担任职务，这些部委都与东北有特殊关系。随后，高岗把大本营扎在沈阳，在那里对政治形势施行控制。作为中国第一大解放区，在他的领导下，党派活动第一次经受了考验。当时，中苏还共管着中国长春的铁路和旅大的海军设施。人们普遍认为高岗的工作成绩卓著，以致他又被召到北京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第一任主任，同时还保留他在东北的全部职务。

另外，高岗还受到至高无上的颂扬，被官方称作毛主席的“亲密战友”。高岗认为，用集体领导的方式管理工矿企业，是不可能取得高效率的管理结果的。他从不隐瞒自己的这个观点。他认为，每个工厂都应当有一个可以负全责的经理；他摒弃那种书记应是厂里第一把手的思想，说那是一种“荒唐的”观点。这些见解，逐渐导致他与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之间的冲突。高岗和莫斯科之间的友好关系，也加剧了他们之间的意见分歧。而高岗之所以寻求同莫斯科建立友好关系，显然是出于商业上的原因。高岗认为，莫斯科（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摸索）已经建立了一套稳定的经济政策，这种政策赖以建立的基础，就是给重工业以优先权，同时辅之以高超的行政管理（这一方面，他在东北已有目睹）和优越的部门控制。这就又引出了一个老问题：究竟是把重点放在农民和农业上呢？还是放在工业、特别是重工业上？

1953年9月出席悼念列宁逝世30周年大会以后，高岗就没再露面。起初，他只是受到刘少奇的不点名批判，刘说：“有些高级干部”把自己领导的“地区或部门”当作他们的“个人财产或独立王国”。一年后才揭露了“反党阴谋”的详情。揭露工作是邓小平负责的，这就更加增强了这件事在如今许多高级干部中的可信性。邓小平称：高岗的篡权“阴谋活动”早在1949年就开始了，当时他就把东北当作他自己的独立王国，在军队和地方的高级干部中拉拢同党，企图建立一个相当于独立国家的地盘。当时，内地的一般党员都把开除高岗看成了一件重大的人事冲突，认为高岗这位从东北来的头面人物企图窃取周恩来的总理职务或窃取刘少奇的党中央书记职务。但是，这事当时却包含着强烈的亲苏活动成份，其中包括当时身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饶漱石和据说也参与了“阴谋”的其他七位高级官员的活动（这七人同时受到开除）。他们都公开支持高岗的主意，认为迫切需要和苏联合作，认为应当在中国建立重工业。

据邓小平揭露，当高岗的阴谋败露时，他的篡权活动已接近成功。不过，无论是对高岗，还是对他的阴谋同伙，都没有用“卖国贼”这顶帽子，这表明当时确实没有足够的证据可以断定有苏联参与，或断定高岗确实与苏联勾结企图推翻毛泽东。他用自杀作为“叛党的最终表现”，始终不承认自己有罪，由此也会引出许多判断。然而确切无疑的是，在随后的一年内，在由高岗的同僚担任最关键职务的东北，无论是党还是国家行政机关，都感受到了由此引起的反应。

彭德怀 1959年对彭德怀的清洗，被人们认为是毛泽东所犯的“最大的错误”之一。身为国防部长，彭德怀在部队基层也具有极高的威望。他与苏联的关系相处得很好，而且，虽然他对“大跃进”持批评态度，但他基本上是极端忠诚毛泽东的。象他那样具有宽广而杰出的军事基础的人，即使在全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很鲜见。失去他，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重大损失。因为彭德怀从1928年起就一直是中央委员，而且早在这之前他就是一位游击战士了。由于在长征中的出色贡献，他在陕西被任命为第一野战军司令员。他在陕西期间，花费了大量时间往返于共产主义首都延安和前线战场之间。1940年“百团大战”后，他成为负责全面战略的最高官员之一。虽然他本人并没去北京参与创建中央人民政府，他还是被任命担负了一系列最高军事委员会的职务。

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他受命担任这支军队的司令员。整个朝鲜战争中，他都一直担任此职，并荣获元帅军衔。朝鲜归来以后，他又被任命为新成立的国防部部长。他协助周恩来同赫鲁晓夫谈判，从苏联争取来大量的经济援助，同时成为新建立的朝鲜停战委员会事实上的首脑。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元老”，被公认为最重要的常务军事领导人，并且很快就成了众人瞩目的对象。与庆祝苏联革命40周年同时，彭德怀率领一个专家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讨论中苏军事事务和军事战略问题。

当时，俄国人刚刚试验成功了一颗洲际弹道导弹和人造卫星，所以，彭德怀后来说，俄国人“总是只想到他们自己”。彭认为，这是一次不完全令人满意的谈判。谈判结束，他又参观了苏联的军事设施。回国后，他决定中国不得不尽量依靠自己的工业基础。

北京所持的进攻性的台湾政策，使赫鲁晓夫惊慌不安，他用了4天时间访问中国，也没能怎么缓和中国的这种态度。实际上，没过几个星期，北京就开始炮击金门岛了。这种炮击并没给对方造成什么损失，主要是幸亏彭德怀，炮击才很快停了下来。1959年4月，彭德怀又率领一个军事代表团出访东欧，在东欧各国首都大约都停了一个星期左右，其中包括阿尔巴尼亚首都地拉那。6月中旬回到北京之前，他再次访问了莫斯科和蒙古。

在此期间，毛泽东与彭德怀之间的意见分歧变得越来越尖锐（这种分歧在几年前还被认为是“有益的”）。在有分歧的问题中，包括究竟战士应当“红”还是应当“专”，以及对台湾应持的态度问题。许多“内部人士”都认为这一时期是江青开始对毛主席产生影响的时期。总之，彭德怀是公开对“大跃进”的缺点及其造成的浪费持批评态度，他还把在华沙听到的对“大跃进”的批评转达给政治局——他访问华沙时，华沙条约成员国正集中在那里开会。后来，彭德怀在地拉那和赫鲁晓夫也谈到过“大跃进”。

彭德怀回国不久，中苏关系就最后破裂了。此后，彭德怀真是“傻”得够劲，他竟然在这种情况下还以自己在朝鲜的经验为据，对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的有效性提出怀疑。他还主张有必要“在社会主义国家中间实行互助”。毛泽东妒忌彭德怀在人民解放军中的崇高声望，对彭德怀提出的批评意见也感到气恼，1959年8月的庐山会议上，他用林彪取代了彭德怀的国防部长。彭德怀就这样从舞台上退了下来。然而，部队将士和“内部人士”

却从没有忘记他，经常有一些浪潮，要求恢复彭德怀的职权。除了毛泽东和江青，从来没有人怀疑过彭德怀的耿耿忠心。

毛第一次“选定的接班人”

曾经身为国家元首、在党内位置仅次于毛泽东的刘少奇，最后惨死在古老名城开封市一座监狱的地下室里。他是湖南人，与毛泽东在同一个学院里读过书，是最早去莫斯科学习的中国共产党人之一。因此，他认为社会主义政权应植根于城市工人之中。他有好几年时间都用在组织城市地下党方面。他参加过长征，长征结束后又再次致力于地下秘密工作，在许多城市的产业工人中建立了工会。同时，他在延安也分担有工作，职务是“劳工部长”。刘少奇在延安的时候，写下了他最著名的著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以此为题作过演讲。随后，他逐渐进入领袖层。1945年4月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一共有3个重要报告，其中就有刘少奇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其他两个报告分别是朱德关于军事局势的说明、主席的政治报告。毛泽东去重庆谈判时，刘少奇任代理主席。在铁托与斯大林的争论中，刘少奇站在莫斯科一边，指责铁托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刘少奇有过3个（或许是4个）夫人，毛泽东也是如此。当不再因从事地下工作而冒生命危险的时候，他在延安过上了比一般农民和一般士兵优越的生活。从30年代初期开始，刘少奇就是政治局委员，人们一般都认为，由于他在城市工人问题方面的知识，使他对毛泽东起了互补作用，后者关心的主要是农民问题。刘少奇主张东南亚人民的“解放”应以“武装斗争”为基础，为此引起西方人对他的不满。

毛主席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刘少奇就站在主席

身边；主席“手捧讨饭碗”去莫斯科时，接替主席工作的是刘少奇。实际上，在他正式成为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之前很久，人们就已公认他是主席的接班人了。起初，他是“大跃进”运动的热情支持者；后来，去农村作过一番调查之后，当主席在他身后近乎狂热地催促建立人民公社的时候，他的态度转变了。人民公社运动导致主席让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元首的职位，由刘少奇担任。刘少奇当时在中央的作用日益重要，频繁接见外国来访者。他敢于批评主席在建立人民公社一事上的急躁冒进，这无疑导致两人之间政治关系紧张；不过，他们之间的真正反目，还是由于江青对刘少奇夫人王光美的强烈妒忌造成的。王光美风度迷人，且很有教养和学识，这让出身低贱的江青妒火难消；再者，江青当时还未获得参政权，王光美却可以伴随丈夫出访各地，而且在大多数场合都可以公开和刘少奇一起露面。尽管主席与江青有过争吵，尽管江青动辄就大吵大叫，但是，据在主席身边工作过的人讲，江青在政治上对主席的影响还是比人们所知道的要大得多。本来，主席当时就已经认为他那位“选定的接班人”已开始走“资本主义道路”了，江青对主席提出的有关王光美的警告，无疑又对主席的不满情绪起了火上加油的作用。

虽然刘少奇的性格明显缺乏色彩，但他仍被认为是一位“伟人”，只不过与主席、总理或甚至与“名将之花”朱德不同，他的性格有些抑郁。人们一般都认为刘少奇是一个顽强坚毅、不易动感情的人，他能够机智地贯彻主席的意图。他的勤劳精神也是著名的，每天都起五更、睡半夜。中共的大多数领袖人物都很勤劳，周恩来每天就总是工作到凌晨3点左右才睡觉，中午11点钟以前又可以看到他在工作。

无论怎么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确实是要打倒刘少奇及其支持者。但如果说他有意要把刘少奇整得那么惨，那就言过其实了。不过，当刘少奇主动提出要回到离刘的故乡不远的

农村务农时，毛主席确实说过“不行”。毛泽东显然是不愿意让他到离毛的故乡不远的地方去，因为毛的故乡当时已成为国家圣地。

毛第二次“选定的接班人”

林彪，这位属于中国产生的许多伟大革命军事家之一的人物，最后竟然以叛国贼的恶名了却生命。他在乘坐三叉戟飞机企图叛逃苏联的途中因飞机坠毁，摔死在蒙古境内，当时机上人员全部丧生。

林彪的军事政变阴谋败露后，周总理就下令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派机追赶林的座机。究竟是空军把林彪的飞机击落了呢？还是他的三叉戟失事着火坠毁的？这个问题一直是个谜。蒙古人后来，有证据表明在飞机坠毁之前机舱里有打过的弹头。不管怎么说，总之最后是林彪全家都死掉了，他的许多同党却活了下来，并且在和“四人帮”一起受审的时候出示了证据。

林彪1907年出生在长江北岸离武汉不远的一个村庄，在村里上学的时候就涉足过激进的民族主义运动。刚过20岁不久，他加入国民党部队，随后被送到广州的黄埔军校受训，在那里认识了周恩来。林彪告诉埃德加·斯诺说，1925年，蒋介石下令军校里既是国民党员、又是共产党员的学员，只能在国共两党中选择一个，林彪选择了共产党。南昌起义刚过，林彪加入了贺龙的20军，1927年8月又参加了朱德领导的湖南农民起义。由于在同国民党军队的战斗中多次获胜，林彪的声誉上升了。1931年，他担任了红一军军长。

长征途中，林彪担任的是当时最危险、最困难的任务——殿后。刚到陕北根据地，他就负责筹建了一所军校，培养青年军官。

直到负伤被送往苏联之前，他一直战斗在抗日前线，所以他作为师长的名声很高。据苏联来的消息讲，他在苏联时参加了列宁格勒保卫战，学习过现代战争课程。去莫斯科之前的1937年，他就已经可以列席政治局会议。1942年他才从苏联回来，去重庆参加同国民党政府协商。不过，在他驻渝的9个月中，蒋介石只接见过他3次。

据当时在延安的美国人讲，他给这些美国人的印象是：一位37岁却已有20年军龄的沙场战将。眼看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即将来临，共产党人便开始向东北调兵遣将；这样，到日本投降时，林彪的手下已有大约3万人马。随着兵员迅速扩充、缴获的日军装备迅速增加，到1946年春，人们认为林彪率领的部队已有近25万人马。经过一段时间的整编，这支队伍开始占领东北的城市。蒋介石企图插足，于是，到1946年年中，国共双方的停战协定就宣告作废，开始了一场全国范围的内战。

林彪把他的军事行动称作“运动战”，在战略上实行撤退，“放弃城市，占领农村”。共产党军队集中兵力，相继攻占了一系列小城镇，随后，林彪就发起了毛泽东说的“国内战争中最大的三次战役之一”。两个月内，共产党人就控制了东北全境；随后，由高岗留守东北，林彪率80万大军入关，拿下天津，迫使北京的国民党将军傅作义不战而降。

1949年4月下旬，中国人民解放军三路野战大军打过长江。攻克武汉后，林彪被任命为华中军区司令员兼书记。短短几个星期，林彪的部队又继续南下，在10月中旬解放了广州，国民党的指挥员又一次投降。到12月，就只有海南岛还在国民党手中。

林彪没有参加新中国开国大典，但他在中央和华南仍然担任重要角色，直到因患肺病休息。因为患病（这病肯定是假装的），他没有参加朝鲜战争，他的第四野战军许多指战员都参加了那场战争。尽管从理论上说他仍然担任着一系列重要职务，但实际上

他一直处于养病状态，不出头露面。直到1956年9月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他才在消沉5年后第一次公开露面。随后，虽然他在党内排名第七，但一直退居二线，直到1958年春他入选政治局常委。

1959年8月，林彪接替了彭德怀的国防部长职务。从此，他开始显声扬名，并且因为强调政治教育的重要性，使许多高级军官心灰意冷。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他发表了那篇如今臭名昭著的文章《高举党的总路线和毛泽东思想的红旗前进》，文章在那些主张军事训练高于政治工作的司令员中间引起了许多麻烦。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正值苏联撤销援助并从中国人民解放军撤走专家之际。林彪明明知道军事训练的重要性，却扮演了在政治上和偏激分子一致的角色。

1965年，林彪发表了那篇题为《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的文章，引起了全世界关注。在那篇文章里，他把北美和欧洲比作“世界上的城市”，把亚洲、非洲和南美洲比作“地球上的农村”。他在文章中鼓动革命的力量建立人民军队，依靠自己的资源而不要依赖外援，包围和攻打“城市”。

“内部人士”都承认这么一个事实：林彪与毛主席关系密切，因为毛主席当时认为在与刘少奇、与党的经常争吵中，有必要依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支持。反过来，林彪在夫人的支持下，紧紧抓住江青行使的权力，对这位昔日的女演员百般献媚，以此得以利用江青手中的权力。表面上讲，林、江之间的亲密关系是有理由的，因为江青当时负责军队的“文化娱乐”活动。一位熟悉这一时期领导关系的女士说，在社交场合，江青总是无法掩饰她那愚蠢且缺乏教养的真相，林彪和叶群总是替她打掩护，尤其是主席不在场的时候。

“文化大革命”那段狂热时期过后，林彪过了数年得意日子，他认识到，由于军队的权势，自己是仅次于毛泽东的第二号

人物。但他反而忌妒周总理手中的权力，忌妒周总理在外交政策上的作用。特别是，当时与美国及西方的关系在日益密切，却把苏联当作最危险的超级大国，在这方面，周总理的作用也让林彪忌妒。令人奇怪的是，在林彪被正式定为“选定的接班人”之后，他与江青及主席间的不和竟会很快就变得十分明显。不过，有一件事不难理解，即知道自己无法得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各军区司令员的全体拥护，林彪才转而寻求他的老朋友苏联给以帮助，因为，由于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行为，他清楚他在周总理和邓小平那里没有什么市场。有些人在林彪正在布置反对毛主席的军事政变的时候见到过林彪，其中许多人都总以为林彪精神失常了，并且以为不久就会送他到某个舒适的海滨或山区疗养院去，因为他不只病病歪歪，心不在焉，而且常常头脑发热，失去理智。

参考文献目录

1. 塔考·阿莱：《林彪的时代》，东京1970年日文版；《一个革命者的实践：周恩来》，东京1979年日文版。
2. 《远东经济评论》，载《亚洲年鉴》，香港英文版。
3. A·多克·巴尼特：《动乱年月》，华盛顿1974年英文版。
4. 克莱因和克拉克：《中国共产主义史册》，哈佛大学1971年英文版。
5. 丹尼斯·布拉德沃斯：《有确定继承权的人》，伦敦1973年英文版。
6. 丹尼斯·布拉德沃斯：《救世主和达官贵人》，伦敦1982年英文版。
7. 大卫·巴那维亚：《中国人画像》，伦敦1981年英文版。
8. 大卫·巴那维亚：《北京的判决》，1984年英文版。
9. 奥托·布拉恩：《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理人》，伦敦1982年英文版。
10. 福克斯·巴特菲尔德：《苦海中的中国》，伦敦1983年英文版。
11. 杰克·陈：《文化大革命内幕》，伦敦1975年英文版。
12. 杰罗姆·陈：《毛泽东书信集》，伦敦1970年英文版。
13. 居尔根·杜麦斯：《中国内政：1949—1972》，纽约1973年英文版。
14. 居尔根·杜麦斯：《文化大革命后的中国》，伦敦1976年英

文版。

15. 罗伯特·S·埃勒根特：《毛泽东的大革命》，纽约1971年英文版。
16. 大卫·弗洛伊德：《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纽约1964年英文版。
17. 哈里森·福曼：《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纽约1945年英文版。
18. 罗格·加赛特：《振兴：毛泽东之后的中国》，伦敦1981年版。
19. 约翰·吉廷斯：《中国军队的作用》，伦敦1967年英文版。
20. 李·古德施塔特：《毛泽东》，香港1972年英文版。
21. 费利克斯·格林：《双面墙》，伦敦1964年英文版。
22. 安东尼·格雷：《扣押在北京的人质》，伦敦1970年英文版。
23. 萨缪尔·B·格里菲思：《中国人民解放军》，伦敦1968年英文版。
24. 韩素音：《凋谢的花朵》，伦敦1966年英文版。
25. 韩素音：《2001年的中国》，伦敦1967年英文版。
26. 韩素音：《百鸟绝迹的夏天》，伦敦1968年英文版。
27. 韩素音：《黎明时分的暴风雨：毛泽东和中国革命》，伦敦1972年英文版。
28. 韩素音：《风满楼》，伦敦1976年英文版。
29. 韩素音：《我的房子两扇门》，伦敦1980年英文版。
30. 理查德·哈里斯发表在伦敦《时代》上的文章。
31.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集团》，香港1975年3月英文版。
32. 哈里德·C·欣顿：《世界政治中的共产主义中国》，伦敦1966年英文版。
33. 克里斯多夫·豪：《中国经济：基本线索》，伦敦1978年英文版。

34. 艾丽斯·L·希：《共产主义中国的军事学说和战略》，圣莫尼卡1963年英文版。
35. 理查德·休斯：《外国恶魔》，伦敦1972年英文版。
36. 兰德·麦克纳利1972年为美国政府绘制的《加注中国地图册》。
37. 《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重要文件》，北京1970年英文版。
38. 斯坦利·卡诺：《毛泽东和中国》，纽约1972年英文版。
39. K·S·卡罗尔：《第二次中国革命》，伦敦1975年英文版。
40. K·S·卡罗尔：《中国：另一种共产主义》，伦敦1976年英文版。
41. 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二卷英译本，伦敦1971、1974年版。
42. 亨利·基辛格：《白宫岁月》，伦敦1979年英文版。
43. 《林彪和文化大革命》，载《当代特写》，第8卷（1970年8月1日版）。
44. 罗德里克·麦克法奈尔：《百花齐放运动与中国知识分子》，纽约1960年英文版。
45. 《毛泽东选集》四卷本，1961—1965年北京外文版。
46. 《毛泽东军事著作选》，北京1963年英文版。
47. 《毛主席语录》（有林彪写的前言）。
48. 《军事均势》，每年一卷本，伦敦版。
59. 大卫·米尔顿和南希：《风波不止：在中国革命的岁月里》，纽约1976年英文版。
50. 哈维·纳尔逊：《中国军事制度：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制度之研究》，科罗内达1977年英文版。
51. 理查德·尼克松：《理查德·尼克松回忆录》，伦敦1978年英文版。

52. W·卢西恩·派伊：《毛泽东：领袖人物》，纽约1976年英文版。
53. 爱德华·E·赖斯：《毛泽东的道路》，伯克利1972年英文版。
54. 托玛斯·W·鲁宾逊：《周恩来和中国文化大革命》，伯克利1971年英文版。
55. 托玛斯·W·鲁宾逊：《中国文化大革命》，伯克利1971年英文版。
56. 斯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初步评价》，哈门德沃斯1974年英文版。
57. 斯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传》，纽约1966年英文版。
58. 约翰·S·谢伟思：《中国丧失了机会》，纽约1974年英文版。
59. 效禹：《毛泽东和我去乞讨》，伦敦1959年英文版。
60. 艾格尼斯·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纽约1956年版。
61. 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伦敦1937年英文版。
62. 埃德加·斯诺：《漫谈红色中国》，坎布里奇1957年英文版。
63. 埃德加·斯诺：《走向开端》，纽约1958年英文版。
64. 埃德加·斯诺：《大河彼岸》，伦敦1963年英文版。
65. 埃德加·斯诺：《漫长的革命》，伦敦1973年英文版。
66. 海伦·福斯特·斯诺：《现代中国的女性》，黑格1967年英文版。
67. 海伦·福斯特·斯诺：《中国的共产主义者》，韦斯特彼特1972年英文版。
68. 路易斯·韦尔斯·斯诺：《埃德加·斯诺眼中的中国》，伦敦1981年英文版。
69.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中国来信：1962—1964年》，二卷本，北京新世界出版社1963—1964年版。
70. 罗斯·特里尔：《800,000,000：现实的中国》，伦敦1975年

英文版。

71. 罗斯·特里尔：《中国的差距》，纽约1979年英文版。
72. 罗斯·特里尔：《毛泽东之后中国的未来》，伦敦1979年英文版。
73. 罗斯·特里尔：《毛泽东传》，纽约1980年版。
74. 罗斯·特里尔：《白骨精：毛泽东夫人传记》，伦敦1984年版。
75. 西摩·托平：《两次中国之行》，纽约1978年英文版。
76. 汉弗莱·杜威廉：《分裂的世界》，伦敦1971年版。
77. 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纽约1932年英文版。
78. 加普·范·金尼肯：《林彪沉浮记》，伦敦1976年版。
79. 王明：《毛泽东的背叛》，伦敦1979年版。
80. 威廉·威斯顿：《中国的高级指挥员：共产主义军政史，1927—1971》，纽约1973年版。
81. 巴克特·沃尔夫冈：《中华人民共和国名人》，哈维斯特尔，1981年英文版。
82. 迪克·威尔逊：《毛泽东：人民的皇帝》，伦敦1979年英文版。
83. 迪克·威尔逊：《长征：1935年》，伦敦1971年英文版。
84. 迪克·威尔逊：《周恩来的故事：1898—1976》，伦敦1984年英文版。
85. 罗克珊·维特克：《江青同志》，伦敦1977年英文版。
86. 姚明乐：《毛泽东接班人的阴谋和暗杀活动》，伦敦1982年英文版。
87. 《周恩来著作选集》，北京1981年英文版。

译 后 记

本书译者衷心感谢河南人民出版社及中共河南省委党校有关同志对本书翻译工作的大力支持。中共河南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主任孙保定副教授热忱认真，花费大量精力审阅了全部译稿和译序，这里特致感谢！

全书翻译过程中，参考了国内许多有关论著、译著和文献资料，这里一并向有关作者、译者和出版者表示谢忱。

全书翻译工作是在高湘泽组织和主持下，由高湘泽、尹赵、刘辰诞三同志合作完成的。具体译事分工如下：高湘泽译目录、前言、导言、第一、第四篇；尹赵译第二篇；刘辰诞译第三篇。全部译稿由高湘泽统校定稿并写译序。

书中的外国人名、地名、报刊杂志和机构名称，凡国内已有定译的，皆从定译；否则以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英语姓名译名手册》、《世界地名译名手册》、《世界报刊、通讯社、电台译名手册》等翻译参考资料译出。

受译者、特别是主译者水平限制，书中译文难免不当之处，诚望读者不吝赐教。

1989年2月 谨记